巴西近代史

（1889——1964年）

〔巴西〕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巴 西 近 代 史

上 册

（1889—1902年）

〔巴　　西〕 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英　译　者：詹姆斯·L·泰勒
新续一章作者：罗利·E·波皮诺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75年·沈阳



巴西近代史

下册

(1902—1964年)

〔巴西〕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英译者：詹姆斯·L·泰勒
新续一章作者：罗利·E·波皮诺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5年·沈阳

José Maria Bello

A History of Modern Brazil

1889—1964

Translated from the Portuguese by
James L. Taylor

With a New Concluding Chapter by
Rollie E. Poppino

1966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译出

内部读物

巴西近代史

(上、下册)

〔巴西〕若泽·马里亚·贝洛著
英译者：詹姆斯·L·泰勒
新续一章作者：罗利·E·波皮诺
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 3/5　插页：1
字数：440,000　印数：1—15,000
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90·30　定价：2.50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原名《(巴西)共和国史》，作者是巴西人贝洛。美国人泰勒根据1959年第四版译成英文，改名为《巴西近代史》，于1966年出版。中译本系从英译本转译。

英译本对原著的内容和结构，都进行了大量的增删和修改。这些变动，是否有损于原著，值得存疑。

本书着重论述巴西建立共和国以来的历史，对巴西帝国的末期也略有涉及。原著者和英译者都以唯心史观从事著述和编译。书中对总统、将军等不厌其烦地予以介绍，而把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则视为无所用心和无所作为的消极因素。关于帝国主义对巴西的侵略，亦未能进行有力的揭露。但是，它对巴西近代史作了综合性的论述，其中资料较为丰富，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75年2月

英译本出版者说明

本书是贝洛所著《共和国史》第四版（1959年）的英译本，但在结构和细节方面都作了一些更动，以便使它更适用于非巴西的读者。作者论及美洲和欧洲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一般性背景资料，大部分被删去。另一方面，巴西的读者所熟悉的事件，在我们看来，却需要替非巴西的读者写得更详尽一些，并且更严格地按照年代的顺序加以排列。在作这些必要的改动时，我们不仅一直细心地保留作者所论述的事实，而且还保留了他的解释和强调的重点。总之，我们的改动，始终局限于结构和顺序方面。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至十章以及第二十二至二十四章，都经过了彻底的改编。

詹姆斯·L·泰勒远远超出译者通常所承担的责任，而在学术上给了我们帮助和指教。罗利·E·波皮诺教授异常熟巧地增订第二十四章并撰写了

第二十五章。 艾丹·A·凯利为使本书以现有面目出版，设计和完成了综合编辑方案。为此，我们愿意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我们也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大学出版社联合会所属的拉丁美洲翻译委员会，他们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索引和年表由泰勒先生编写。地图是戴维·J·波利特地为本书绘制的。

英译者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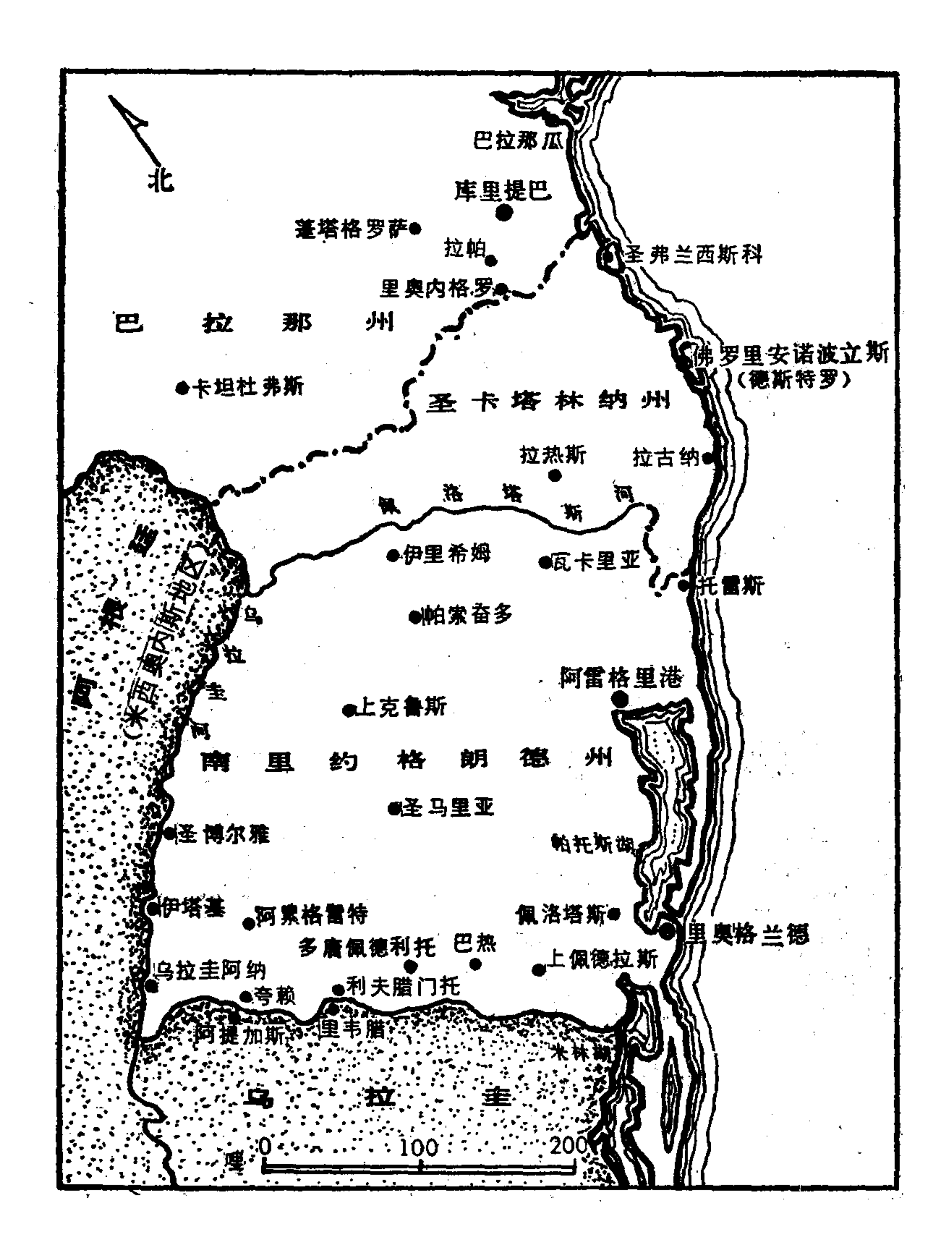
贝洛先生的这本书，受到他本国同胞的欢迎，已经出了好几版；这证明了它的优点。这个英文译本如果也有什么优点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正如出版者说明所提示的那样，这个译本对原文作了通篇的修订、补充、注释、删节及移动，并且在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五章里，增加了波皮诺教授对1946年以来历次事件所作的无与伦比的论述。我们的努力，一直是为了使本书尽可能地有益于那些对巴西历史了解得不多或者完全不了解的英文读者。

完成这个译本的整个过程，说起来倒也很有意思。我首先比较拘泥字义地译出了原文，理顺了佶屈聱牙的文句，将叙述历史事件所用的现在时态改为过去时态，删除了各种离题的闲话，又补充了极少的注释。然后由斯丹佛大学出版社的艾丹·凯利先生进行编辑，并交给我进行校对，附带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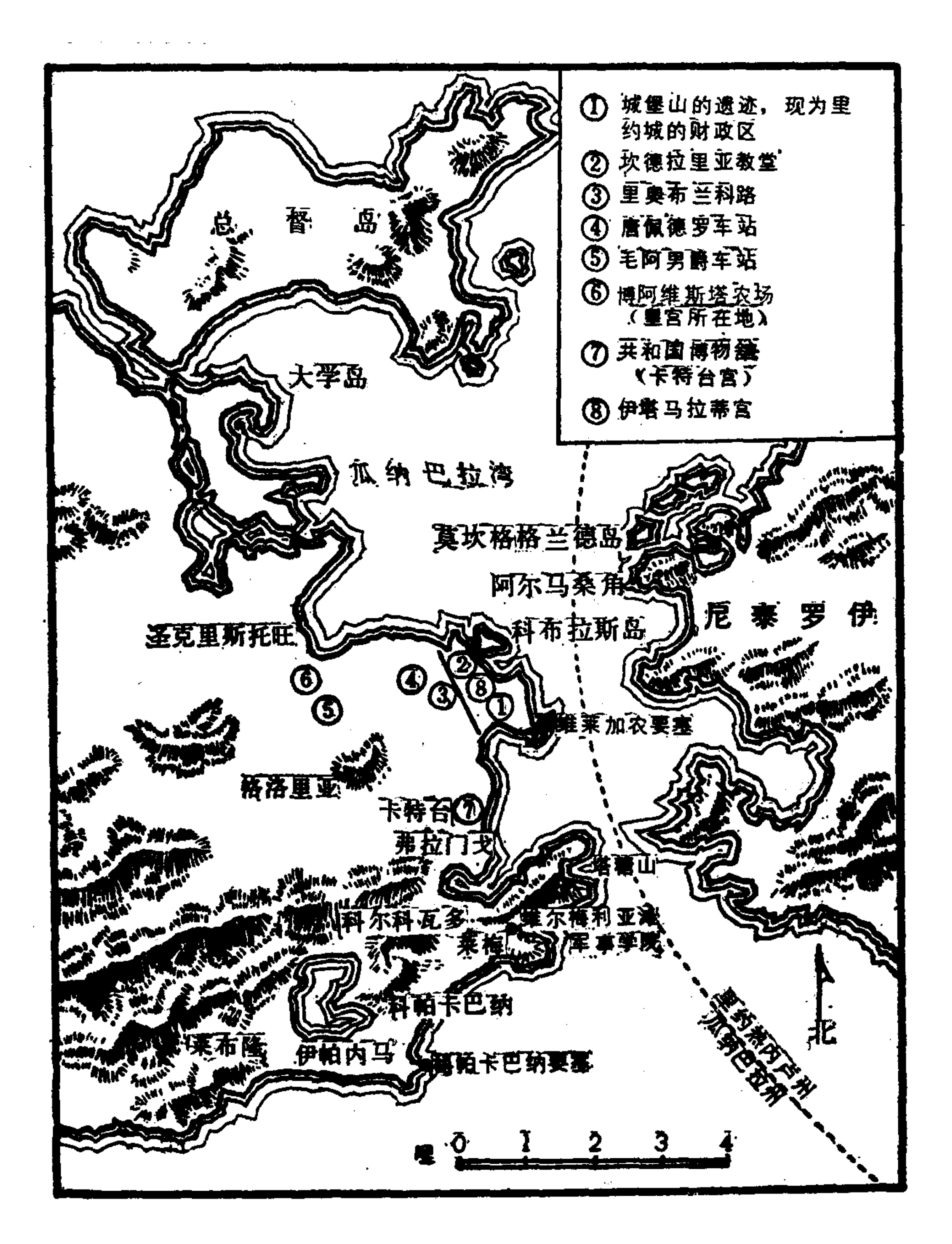
我提出了在编辑方面各种可以想到的疑难问题，其中有一些，是我从可供我利用的资料中找不到答案的。未经编辑加工的原稿，由波皮诺教授读过，第一次校样由凯利先生和我自己校阅，第二次清样是我和出版社的J·G·贝尔先生校阅的。尽管每个步骤都查出了一些错误和不够贴切的地方，然而，遗留下来的，当必还有很多。

对索引问题，简单说几句。众所周知，按照巴西人的习惯，在提到别人时，有各种叫法，唯独不用他们的全名，这样一来，给一本关于巴西的书籍作索引的人，就遇到了一些取舍上的困难。例如，在本书里，1893年海军叛乱的领袖，通常被称为库斯托迪奥·德·梅洛，但是贝洛先生又称他为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海军上将梅洛、或者只叫库斯托迪奥。除去少数例外（我把它们互相参照地列入索引），对于所有的姓名，我都自作主张，按照作者最常用的名字的最后部分，加以排列，如：梅洛，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有时将省掉的部分添写在括弧里。我保留了作者对全部专有名称的拼写法。

詹姆斯·L·泰勒



地图1．南里约格朗德地区（书中所提各地方位示意图）



地图2. 里约热内卢城，前联邦区，现属瓜纳巴拉州

作 者 序

摘自第一版(1940年)序言:

为一个存在至今刚刚够半个世纪的政体写历史,未免有些操之过急,因为对问题的观察还不能充分地放开眼界。时间还没有用它的古香古色,给一切事物都加上那种诗意朦胧的润饰,使那些去今遥远的事件和人物,甚至于细小的事件和平庸的人物,都变得悱恻绮丽,楚楚动人。巴西的历史画面令人感到单调,其中那些端庄守法的人物,超群出众的真是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在共和国的初期,弗洛里亚诺·佩绍托那种两面三刀、隐瞒真实感情而心理异常的个性,才使他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

如各个副标题所示,这是一篇汇集而成的序言,内容取自本书在作者生前发表的四个版本的序言。我在辑录这篇序言时,删掉了原序中那些在本版的读者看来似乎没有多大兴味的部分。——英译者

这部研究巴西共和国时期历史的著作，是我自告奋勇，为了解我的祖国而进行的一部分尝试。从这个观点来看，这部书乃是对我其它著作的补充。我在这本书里，也如我在早期的著作里一样，力图做到真诚与客观，忘却个人的爱憎和同情，并在评价人物时，始终倾向于保持宽仁的态度。

摘自第二版(1952年)序言：

假如真有历史学这样一个明确的学术上的门类，那么，它首先就要求进行详尽的、客观的分析，至少也要达到有可能产生客观性的程度。我所写的主要是四十年来国家生活的综述，试图把我们集体活动的千变万化的表现，高度地综合起来，加以说明。因此，这也是一项评价判断的工作，它很容易出错，但态度却始终是忠实诚恳的。我没听说别人做过使巴西共和国史系统化和简明化的尝试。因此，我一向不得不到稀少的官方文件以及专题论文和小册子里去搜集资料，而它们又几乎全都浸透着时代的政治激情。各种外国书籍，虽然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当作我的范本，但却帮助我广泛地熟悉了我国国内最近发生的事件，使我更充分

地了解了祖国，从而也更强烈地热爱她，并对她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在这些书籍中我格外应该提到：D·L·杜蒙德所著的《我们时代的美洲》（1896—1946年），班维耳[①] 所著的《第三共和国》（1870—1935年）和B·克罗齐[②] 所著的《当代意大利》（1871—1915年）。

那些编写本国当代历史的欧美作家，比起一个贸然进入同一领域的普通巴西作家来，除了有某些内在的优越条件之外，他们还有着许多外在的优越条件，如丰富的文献资料，一贯明达而宽容的读者，而尤其重要的，乃是一种思潮云涌、方兴未艾的气氛，在这种气氛里，一股股思想潜流，正在影响着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动向。对比起来，我们巴西人，也同那些和我们处境相同的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在思想意识上都十分缺乏远大的抱负。我们的一些最巨大的成就，始终带有经验主义的气味，带有迫于当时环境而临机应付的气味。……因此要在我国的历史当中，探索类似今天

① 班维耳（1879—1936年），法国历史学家。——译者

② 克罗齐（1866—1952年），意大利政治家和哲学家。——译者

存在于美国的那种具有成熟思想的伟大路线，以及重大的利害冲突，都将是徒劳无益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特别强调那些标志着共和国历史的经济变革。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且也反对唯物史观，但是在我看来，当一个人研究象巴西这样的国家时，经济事件，以及它们对政府连续进行的财政实验和一般政策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摘自第三版（1956年）序言：

关于巴西所经历的过渡和不稳定时期，我一直不得不克服许多调查研究方面的困难，方才能够找到事实论据，这些事实之中，有的杂乱无章，有的富于戏剧性，有的情节生动，简直可以入画。我曾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这本书，我说我觉得自己好象是置身于亚马孙野生密林中的一个割胶工人，他要从盘根错节、千差万别的树木里边，找到橡胶树，才会使他的努力得到报偿。哪些是主要的事实？哪些又是次要的？一个从表面上看来不大重要的事件，难道不常常因为它那难以预知的后果，而竟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吗？

我充分意识到写当代历史的作家们所冒的风险。这些风险，总不外乎是所提出的文献资料不全和直接地反映了个人的同情和爱憎。然而，对于那些打算把遥远的过去，按照本来面目重新再现出来的人们来说，在他们的道路上，陷阱是决不会很少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地超然于自身之外。总之，在历史学里，也就和其它那些被狄尔泰[①] 说成是"属于精神范畴" 的科学里一样，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对话是永远不停的。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所做的客观判断都是相对的。例如，吉本、蒙森和费雷罗[②]，同样地精通罗马史，但是他们的结论却很不相同。

我读泰恩[③] 所著《现代法国的起源》时，还很年轻。我同我那一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满脑子都是顽固的宿命论思想，认为作者对法国革命和

①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年），德国哲学家。——译者

② 吉本（1737—1794年），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蒙森（1817—1903年），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费雷罗（1871—1942年），意大利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译者

③ 泰恩（1828—1893年），法国资产阶级评论家和哲学家。——译者

拿破仑所作的评价，便是最后的定论了。后来，我通过其它作家（从浪漫主义的到最现代的作家）的著述又重新读到法国的历史，这时候，我对这位老一辈的大师的信仰，便不可挽回地动摇了。别人的一些不同意见和反映，使我看清了泰恩自称是他思想“支柱”的那些概念化、机械论和根据薄弱的成份，而他的这种思想，乃是从黑格尔那里汲取来的灵感。这个教训就是：不要写历史，不管它是现代史、近代史还是古代史。从这种说法引伸出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什么东西也不要写。

与写当代历史的所谓不利条件相比，自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争议的有利条件。作者不需要进行那种困难的心理转变，去适应已经消逝了的过去的环境。他所回忆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的世界，他直接经历过的世界；其中的人物，他曾经与之见面交往，或者是他们的足迹尚存；而其中思想感情的激流，也曾经同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融会在一起；总而言之，他所回忆的是他一直在其中生活的那种风土环境。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他应该把自己束缚在枯燥无味的日常新闻里。他要作出结论，进行归纳和演绎，进行解释和判断，因而，他要靠着

自己的想象、直观和敏感进行干预。H·I·马罗在他新近的一部作品中，引用了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话："历史不过是扩大了的自传"。这句俏皮话是有些道理的。

吉尔贝托·阿马多在他那部杰出的《我在累西腓学习》一书中叙述说，当年他作为一个学习法律的青年，刚一来到这座古老的城市，便急欲尽可能地打听到他那位著名的塞尔希培同乡——托比亚斯·巴雷托的"人品"。他向一位博学的伯南布哥人——托比亚斯从前的一个朋友和弟子，提出了许多问题。巴雷托的容貌、声音、姿势、步态以及衣着等等，都是什么样子？这位学究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只会钻理论，死抠书本，因而不会观察他周围的现实生活。吉尔贝托又去询问这位塞尔希培哲学家先前的另一个弟子和朋友。然而这个人，尽管是一位富于想象力而且也很敏感的作家，也照样什么都回答不出来，因为他只谈论他自己。这就是需要记取的另一个教训：贫乏的想象力和过分的利己主义，对于任何一门学问，包括历史在内，都是起消极作用的东西……

如果我可以谈谈自己的话，那么，我实际上是

所谓旧共和国时代的一个“斗志旺盛的政客”。刚过四十岁，我就是一个任期九年的联邦参议员，并且是我本州——伯南布哥州公认的当选州长。1930年的革命，使我的政治生活突然中断了（我不久便承认这实际上是永远停止）。象当时几乎所有的同僚一样（尽管他们是诚实而怯弱的），我也经受了由于宪政秩序遭到破坏（这在辽阔而动乱的拉丁美洲，真是屡见不鲜）而时常落在政界人士头上的痛苦的折磨。虽然如此，我对于承认那些从前的当权人物缺乏判断力，承认他们没有远见并且犯过错误，却从来也没有感到困难。纵然我过去的遭遇比别人的遭遇还要严酷，但是我并不觉得痛苦或许连我已经失去的东西，也一丝都不去想念。我对那些胜利者就更没有什么怨恨了。作为一个巴西人，我只能感到惋惜，那些胜利的革命者，由于其领袖缺乏智谋，再加上其它方面的缺欠，未能抓住大好时机为国家带来他们所许诺的好处，反而使它陷入全面危机的状况之中，以致它今天变得实力衰弱，道德堕落了。

我那位智力敏捷的朋友巴尔博扎·利马·索布里诺，在写关于本书的评论时，曾说这本书很少

注意到群众运动。据他讲，因为我出身于伯南布哥州的“农村宗法社会”，所以我这个历史学家是属于上层人物的。当然，我不能把自己分析一下，来断定我的身上还保留着多少伯南布哥州甘蔗田的成份。但是我相信，在一个由主人、仆庸和奴隶所构成，而被局限于一种原始形式的农业经济的等级社会里，群众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仅仅起到了一小部分作用。城市工人阶级开始形成的阶级意识，是巴西的一个新现象。它是随同制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由此而产生的城市的支配势力而一起出现的，接着，它又被瓦加斯的各项劳工法提高了一步；但是这些劳工法的实施，却因为煽动家和剥削者们的干扰而严重地遭到了破坏。

当我回过头来检查这本书的打字稿时，我问过我自己，对于一个象前任总统瓦加斯那样显然非常复杂而又十分矛盾的人物，我所作的评价是不是有不公正的地方。他作议员和财政部长的时候，我同他经常接触，但是在他任总统之后，接触就少得多了。他那无可疵议的人品道德，使我消除了在另一种情况下我很可能对他产生的一切偏见。在某些私人情谊上，我很感激他。然而，对于一

个传记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瓦加斯这个普通人，而是国家的元首、指导者、政党的领袖……

摘自第四版（1959年）序言：

某些评论家认为我没有把这本书增订一下，写成一部包罗共和国历史各个方面的长篇巨著，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实际上，这项工作也不过需要再稍微多拿出一点耐心或空闲的时间罢了。但是它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而且它永远也不会使我动心……我一向打算完成的，是对我国生活的各种表现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说明……因此，这本书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个社会学家朴朴实实的心血结晶，而不是只关心一系列事件的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家的作品。

对于我按四年一届的总统任期来划分共和国的历史，一些评论家曾经表示过反对，好象这些任期都变成了有某种意义的单元。谁也不如我清楚，它们并没有这方面的意义。共和国在政治上，和君主国时期一样，从未出现过一大批看来能够创造历史而不是消极地被历史牵着走的杰出人物。共和国时期的大多数政府，甚至连机关的工作常规，

也没有打算去改变，而仅仅满足于能够服务到任届期满……在这一方面，巴西试行过的独裁主义制度，也并不比一般的宪政制度有什么优异之处。我所以按照总统的任期来划分这段历史，只是要设法建立一种切实可行的体系，使分析工作更易于进行罢了。

一些对我很友善的评论家注意到在这本著作中(按照他们的看法，和在我的一切作品中一样)，如果说不是常常表现出一种含糊不清的悲观情绪，那么，也存在着某种幻灭的倾向。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看法正确。我远非乐观，但也决不悲观。正如我在另一本书里所说的那样，巴西使我经常感到苦恼。在我看来，她伟大、富饶、坚强、庄重而又幸福，然而现实却每每严酷地粉碎了我的幻想。这片土地——我使用这个词，乃是取其最广泛的含义——同它的那些老老少少的吹嘘者所认为或想要认为的情况相反，并不是最肥沃的。要在巴西建立起一个在政治和技术上先进的文明国家，过去不曾是、现在并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各个方面的障碍都越来越大了……然而，这项亟待完成的浩繁而复杂的工作，对于那些响

应召唤、着手处理这项工作的人，却应该是一种鞭策，不管他们是在政府里还是在私人企业里。而且，那些论其职业性质，并不属于有形事物范围的人们，也同样能够对智力和艺术的发展，作出贡献，对那个可以给技术文明的收获增添意义、力量和稳定性的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这一部研究我国当代历史的作品，就一个不能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人来说，或许能够为她稍尽绵薄，但是作者相信，她未来的伟大，早在本书所描写的种种危机里，就已经确实无疑地处于缔造的过程之中了。

目　　录

第一章

1

帝国时期概述

巴西社会——文学和艺术的影响——教士及政教之争——巴西的经济地理——经济周期——废除奴隶制和奴隶经济——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帝国的财政金融政策——极端中央集权制

帝国临终时期的巴西社会，自然要反映出国家的一般经济状况，而这种状况又决定于奴隶劳动所促成的、乡村大面积私人占有土地的粗放耕作制。因此，当时的巴西社会结构很简单。基本上只有两个阶级：上面是社会名流，由种植园主、知识分子和有爵位的贵族组成，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广阔土地的恩赐过活；下面是卑贱的奴隶和佃农群众，他们被许多有势力的农业大家族奴役着。

处于萌芽状态、由商人和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组成的城市阶级，其影响仍然微不足道。有一点工业，也无非是属于家庭工业的类型。北方是自给自足的制糖作坊，南方是大农场（Fazendas），这种体制妨碍了乡村地区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阻碍了商品和服务性劳动的广泛交换。因此，对通货的需求，便保持在最低限度。

巴西当时是个没有小市镇和村庄的国度，这种情况比今天更为明显。然而，自有其古朴的优点和无数缺点（其中如：宗族观念、极端地墨守传统以及死板的清规戒律等）的乡村文化，却比城市文化还占优势，纵然这些城市更容易受到那种正在使西方发生革命的机械工艺的影响。几十万移民，在帝国临近结束的年代，到圣保罗的一些大农场定居下来，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巴西人生活当中那种传统的慷慨、热情与友好的气氛。不讲卫生、缺少公共设施，又时常为流行病所侵袭的城市，只不 2 过是一些广大而丑陋的村落罢了。务农的大家庭，都宁愿在他们的大庄园里居住，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以较低的费用过着更为充裕的生活，而且完整无缺地保持他们的权力和社会威望。古老的北

方大城市——贝伦、累西腓和巴伊亚（萨尔瓦多），差不多是自治的文化中心。里约热内卢的四、五十万居民，散布在后来称为联邦区的广大区域里；它尽管是首都，但却不是全国的社会中心。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等省的人口不大稠密的城市中心，就更不重要了。

佩德罗二世处事拘谨和生活节俭的习惯，表现在他对物质享受抱着一种摈弃的态度。第二王朝的朴实无华，以里约城、圣克里斯托旺及皮特罗普利斯等皇宫内不甚考究的生活方式为其象征；这些地方，舒适和便利的生活设备之缺，是举世皆知的。在北方，富裕的巴西人去过欧洲而未游历过里约城，是很普通的事情。拿当时的时代来说，私人招待会已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排场，然而在里约城能够找到的客厅，却寥寥无几。拉马略·奥尔蒂冈在帝国临终时访问巴西以后，给爱德华多·普拉多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若干年前曾在圣保罗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他在信中哀叹说，这个国家的首都，连让太太小姐们炫耀长袍的沙龙都没有。他又诙谐地补充说，他的一位女友曾经告诉他，在里约城，仅有两位女士能够“领导一个提倡

风雅的运动”，一位已经逝世，而另一位则已迁往欧洲。

佩德罗二世密切地注视着公众的道德风尚。他对于在廉洁正直方面可疑的人，怀有本能的嫌恶，并且不肯原谅那些不适当或者不正派的行为。他那支著名的“决定命运的铅笔”，是供他圈点可疑者的姓名用的，它确实能够引起人们的惊恐。他私人生活中的高尚品德，对他那些政治和行政僚属来说，就是一个榜样，甚至是一种针砭。那时候，金钱还没有成为衡量价值的通用标准。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都是诚实的模范。而且，这个正直传统十分强固，所以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时代，甚至在“恩西利亚门托”时期（这是一个通货膨胀引起暴富和破产的时期，人们普遍地把它归罪于1890年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鲁伊·巴尔博扎所公布的金融政策），也经受住了到证券交易所去搞投机活动的巨大诱惑。

巴西知识界的一般思想倾向，必然是蹈常袭故、千篇一律的。盛行一时的形式主义，甚至影响到了日常服装，所以无助于知识界的思想奔放。佩德罗二世的书卷气、他对古典文学和外邦学问（例

如国内知识分子不感兴趣的梵文和阿拉伯文）的着迷，都自然要对他王国里的重要人物发生若干影响。

到十九世纪初期为止，巴西的文化艺术生活，一直都是葡萄牙（那种本来就很贫乏的）文化艺术生活的反映，并且很少受到外界影响的触动。浪漫主义在巴西的兴起（以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斯的平庸诗歌为其前奏），标志着独立的巴西文学的开端。其后不久，因为从夏托布里昂①和费尼莫尔·库珀②等人已经有点过时的作品中得到了启示，巴西的民族浪漫主义，便同若泽·德·阿伦卡尔及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的印第安主义合为一体了。这种多少有些矫揉造作的形式（尤其是阿伦卡尔所运用的那种），从爱国的角度颂扬了巴西的原始居民，或者在无意之中反抗了葡萄牙文化的

① 夏托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年），法国作家。——译者

② 费尼莫尔·库珀（Fenimore Cooper，1789—1851年），美国小说家。——译者

长期束缚，它在拜伦①、维克多·雨果②以及社会诗歌的影响之下，又发生了变化。巴西的两位伟大诗人：卡斯特罗·阿尔维斯③和阿尔瓦雷斯·德·阿泽维多④，是这些思潮的最高代表。等到这些思潮过时之后，现实主义和高蹈主义⑤便占据了显著地位。

随着共和国的日益临近，巴西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文学家们虽然自认为是反对浪漫主义的，但却洋洋得意地培育着1830年巴黎的那种放荡不羁的老传统。可是，到了最后，

---

① 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年），英国诗人。——译者

②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年），法国戏剧家和小说家。——译者

③ 安东尼奥·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Castro Alves，1847—1871年），巴西诗人和剧作家。他在一场打猎的意外事故中，不幸身死，当时虽然只有24岁，但是他的著作，却对巴西的诗歌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英译者

④ 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德·阿泽维多（Alvares de Azevedo，1831—1852年），巴西诗人和短篇小说家。只是在他20岁患肺病逝世后，他的诗歌和小说才发表，人们公认他是巴西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英译者

⑤ 高蹈主义，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诗坛中的一种主张，重技巧而不重情感。——译者

他们在那些关于"人性记录"① 的写实小说和那些冷静而客观的高蹈派诗歌当中，便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远远脱离了本民族的生活。

马查多·德·阿西斯设法摆脱了这些昙花一现的法国影响，他那英国式的幽默、非凡的心理洞察力以及文体上的艺术技巧，使他得以独具一格。他的青年时代，浪漫主义还在流行，那时他喜欢写一些有关宫廷贵族生活的短篇社会小说（从中很难发现有什么地方暗示着他将成为未来的大师），不过，由于他为人质朴、羞怯，恐怕他对于这种生活，是不会有多少亲身体验的吧。到了他的成熟时期，即当他才情焕发，精神上亟需解脱长期愤懑的时候，他那些长篇小说和短篇幽默小说里的人物，就变成了人间的弱点、荒唐无稽和诸多琐细的痛苦不幸的表象了，尽管它们在本质上带有普遍性，但却仍然是根植于巴西，尤其是里约热内卢的土壤里。

法国对巴西艺术的影响，同她对巴西文学的

① "人性记录"（Human document）意为记录活生生的事实，用以表现人性的真实面目。——译者

影响是一样大的。在经历了早期限于模仿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而且多少有些虚矫华丽、装饰恶俗的“原始”阶段之后，巴西的画家和雕塑家几乎专一地汲取了法国人的情感和技巧。在帝国末期，一种民族主义的倒退倾向开始了，它主张在描绘巴西生活方面，采用较为自由的表现手法。在音乐方面，法国和意大利的影响大致相等。在宗教的和民用的建筑方面，古老的葡萄牙殖民地传统形式影响最大。

当时正在流传的一些从世纪中叶起就不断革新欧洲思潮的哲学学说，使巴西文化开始有了它自己的同一性。孔德① 和斯宾塞② 的哲学，即使还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也已经对学术界、政界和军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了。在帝国临终的年代里，政论文引起了诸如若阿金·纳布科和鲁伊·巴尔博扎等杰出人士的兴趣。这两个人都热心地赞美英国的典章制度，不过纳布科所受的文化教育，却几乎

---

① 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法国哲学家。——译者

②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英国哲学家。——译者

完全是法国的。

政治界和知识界名流当中的老一辈代表人物，也都满怀兴致，或者至少是带着天真的虚荣心，效法起英国议会里的辩论来了。他们的知识教养基本上是属于古典的，但也来自科英布拉①大学古老的风尚，来自累西腓和圣保罗的法学院，来自法典和帝国的法学家。民法不过是对未来的许愿——顺便提一下，许的这个愿，是直到共和国胜利以后又过了二十七年，方才实现的。

报界已经失去了摄政时期的那种激烈情绪，而或多或少地宁愿使自己适应于帝国的和平气氛。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煽动公众的感情，甚至是最有名气和最为生动活泼的报纸，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要显得枯燥乏味，版式拙劣。新闻记者，在一种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发挥其职能作用，这就鼓舞了象埃瓦里斯托·达·维加和儒斯蒂尼亚诺·若泽·达·罗沙这样一些空谈理论的人。在一个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又没有书籍或文化刊物予以激励的国家里，报纸便成了传播思想的最

① 科英布拉（Coimbra）：葡萄牙城市。——译者

好媒介。在报纸的荫庇之下,文人在探索着他们自己的道路。阿普尔克罗·德·卡斯特罗遭到恶意谋杀而谋杀者未受惩办一事,也许把讽刺作家们吓破了胆。老一代的政论小册子的作者们,如著名的《民众的讽刺》一书的作者萨莱斯·托雷斯—奥门,到头来就在政府的参事会里获得了职位。

5 《商业日报》① 在其著名的"特约稿件"栏里,发表有报酬的文章,开展了当代的重大政治辩论;同这类文章比肩并立的,是些私人的论战、各式各样的抨击、无聊的诽谤、琐细的牢骚以及一个乡土习气很深的城市所特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祝辞、贺帖。主要的报纸夸耀它们的政治中立,而那些与轮流执政的党派之中的某个党派有密切联系的报纸,便只有在它们相互斗争的时候,才能够有销路。临近帝国终期,反对派报纸的呼声就愈发响亮了。若泽·多·帕特罗西尼奥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激昂慷慨的游说,以及鲁伊·巴尔博扎在《新闻日报》与《祖国报》上发表的强有力的文章,都清楚地显示了新的战斗精神。

① 现今仍然是里约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而且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也许是最有价值的。——英译者

教会，在帝国时期没有成为一股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势力，部分原因是教会的忠仆们品德和智力平庸，而主要地是因为它对国家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情况，与佩德罗二世那种帝王对教会政治掌握绝对权力的严格主张，是完全符合的。巴西教会未曾有过那种使法国教士受到鼓舞的长期斗争的光辉传统，而这种传统，使得法国教士们心灵上的美德和品格，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专政时期，得到了加强。与此相反，巴西教会却效法了葡萄牙教会的榜样。因为它和帝国的官僚政治融合在一起，所以教士们受不到外界的激励来完成他们的使命。

大多数统治阶级所遵奉的天主教教义，都和皇帝所信奉的一样，即：虔诚的自然神论，一种无精打采、拘泥外表的宗教仪式，以及一种永久性的恐惧，害怕被别人当成是教皇至上主义者，或庇护九世①那套异教谬论的拥护者。在私人家庭生活中，宗教的崇拜，具有一种诗意的和传统的形式，而在许多方面，都和罗马人对家庭守护神的崇拜

① 庇护九世（Pius IX），1846—1878年间的罗马教皇。——译者

相似。在广大的群众(其中大部分是奴隶和奴隶的后裔)里边，宗教崇拜很自然地带着一些令人想起非洲拜物教的活生生的痕迹。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纪律和风俗很容易变得松弛。教士与人姘居，轻易地就受到了宽恕，在乡村地区，尤其如此。教士集团里的一些成员，其中包括领导过重大政治斗争，或者作为政治首领而受到敬畏的人物，也都毫不在意地夸耀他们的私生子。在一个有官方宗教而禁止共济会秘密结社的国家里，竟不单是政治家，而且连天主教的教士们都是共济会会员。巴西关于见习修道士的禁令，当时正在迅速地消灭着修士会，它们的大量教堂财产，从而就变成了公共的产业。

维塔尔·德·奥利维拉阁下，不到三十岁，便6得到了乌林德(一度是伯南布哥省的首府)主教的职位，他在1872年，决定发起一个宣扬道德和严明纪律的整肃运动。他精力充沛、斗志旺盛，有点象个年轻的拉姆内①。他禁止其管区的教士去参加共济会会员举行的仪式。他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并

① 拉姆内(Lamennais, 1782—1854年)，法国天主教教士，资产阶级宗教和政治问题的作家，曾受教皇谴责。——译者

凭借着巴拉省主教安东尼奥·德·马塞多·科斯塔阁下的支持，竟然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强迫天主教教友会公开放弃它们立下的共济会 誓 言。不服从他的时候，他便下令将教友会和教堂的职权一并停止。这样一来，教会和政府之间就发生了冲突，因为没有政府的明文批准，便不可能改变民法，而教友会是按照民法组织起来的。

共济会的主要首领里奥·布兰科子爵所主持的内阁，并不打算同这两位主教妥协。当他们拒绝撤销该项停止职权的命令时，政府便在国务委员会的支持下，把他们传到法庭上审讯。他们被判了四年苦役，只不过将该项刑罚改为单纯的监禁。

一年半之后，当卡夏斯公爵出任首相时，他们受到政府的特赦。但是君主国和教会之间的严重纠纷（尽管与世俗政权有过几个世纪外交来往的罗马教廷甘心把它忘掉），却使巴西教士们的愤懑久久未能磨灭。这帮教士即使没有走得太远，以至于公开依附共和主义运动，他们至少也是对帝国的命运失去了兴趣。

然而，我们需要分析的主要是帝国的经济生活，因为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应该从这

方面去寻找。

在巴西刚被发现的时候，它的土著居民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社会结构极为原始。因此，葡萄牙人在他们这块新的庞大殖民地里，并没有象他们过去在东印度群岛那样，遇到当地土著文化的抵抗，甚至也没有象西班牙人那样，在墨西哥遭到阿兹台克族、在秘鲁遭到印加族文化的抵抗。在巴西，他们向所发现的土著居民，灌输了典型的葡萄牙文化。当然，不久以后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也强有力地影响了巴西平民的普通的，或者用句老话来说，不大光彩的生活面貌。这里所说的平民都是由这三个种族通过家庭生活上的密切接触实现异族通婚而生育的后代。这些人破坏了葡萄牙殖民者那些已经衰退的优良品德，而给了他们另外的一些品德，影响了他们的语言，也改变了他们的宗教活动。但是，比较优秀的分子所带进来的道德上和政治组织上的根本基础，却完整地保留下来。这里附带说一句，在殖民地的大发现时代，所有的殖民地，情况都是如此。

巴西最初的经济开拓地区，不用说也必然是她的大西洋海岸。因为缺少可供殖民的人口，又缺

少资金去开发这块巨大的新殖民地，葡萄牙人不得不闭居在沿海岸线的一些零星据点里，即贫瘠荒芜、巴西红木①丛生的地带中一些不固定的交易点②里。后来，放牧者在一端，沿北方河流而行，而圣保罗的远征队队员③在另一端，攀越高原南沿的山脉，然后顺河西下，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完成了巴西经济开拓地区的第一次大移动。开发这片土地的过程，并不象美国那样，发生在政府实行控制之前。向西方推进的巴西拓荒者，想靠着俘虏和奴役印第安人，靠着开矿投机，来追求意外的奇遇和轻易到手的财富。他们曾在广大的区域里艰苦跋涉，而所有这些地方的政治疆界，差不多都早已划定了。在这个殖民地的第三个世纪里，黄金和钻石的发现，又引起了国内开拓地区的一次新变动。继远征队之后，流动商人、探金者、小贩、骡夫和放牧人开辟了海岸与偏远内地之间的交通和

① 巴西红木，为一种灌木，可以用作红色染料。一说巴西即因这种植物得名。——译者

② 同土著居民进行交易的地点。——译者

③ 十七、十八世纪，那些结成武装的帮伙，在前所未知的巴西内地到处飘游，而以掠夺为目的的开拓者与冒险家，称为远征队。——英译者

贸易。

这种早已开始但尚未完成的内地占领活动，并没有影响到巴西的原始经济中心——东北地区的炎热而潮湿的甘蔗产地。葡萄牙殖民者因为不能依靠懒惰强悍的印第安人去从事一连串不可缺少的笨重田间劳动，他们便在殖民地的第一个世纪里，引进了非洲奴隶。甘蔗种植园，以伯南布哥和巴伊亚两地为主，迅速地增加起来，并且很快就变成了全国财富和文明的中心。制糖工业使一大帮傲慢而又有权势的封建主得以兴起，他们实际上是不受各省首府约束的。因此，这项工业就确定了巴西社会的型式，而这种型式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方才受到城市工业文明型式的威胁。

甚至当巴西的经济中心已从北方的甘蔗种植园转移到南方的大咖啡农场的时候，由于采用了同样的生产方法，古老的宗法社会仍完整无损地保留下来，其心理状态，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想起那种原始的氏族集体的心理状态。种植咖啡的里约热内卢省人①或圣保罗人，跟伯南布哥或巴伊亚

8

① 原文为 Fluminense，指里约热内卢省的土著或居民。另一词，Carioca，指里约城的土著或居民。——英译者

的蔗糖大王一样，都深深地依附于土地之上。而且，他们也表现出同北方人一模一样的缺点和长处，所不同的，可能是北方人的贵族派头更大一些，更奢侈一些，更没有长远打算，更不愿意离家外出，更害怕搞经济上的实验，而且在政治上也比南方那些与他地位相同的人物更加激进。

在葡萄牙政府看来，将巴西划分为无隙可乘的世袭管区〔capitanias，意为大面积的授与地〕，仿佛便是保护这个地区，抵制外国人的贪欲的最好方法。英国人在北美洲采用过的、并由葡萄牙人在亚速尔群岛试验过的殖民地开拓方式，又在巴西重新运用起来。管区领主〔管区的受赐者或被赠予者〕，除了在伯南布哥省和圣维森特省以外，实际上都不起什么作用，因此，他们的权力便被国王所剥夺，而他们本人也处于巴伊亚一个总政府机构的统治之下。由于任命了总审计长，并由于被授与了向里斯本上诉的权利，巴西在创建司法机构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巴伊亚设立的第一个上诉法院（西班牙统治期间被撤销，而当葡萄牙重新获得独立时又恢复起来），便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里程碑。纳绍一毛里茨在他对伯南布哥实行有效的统

治期间〔在1630—1654年荷兰人统治时期内〕，所制定的自治区①和初级的立法会议制度，并没有传播到巴西的其它地方去。葡萄牙王权复兴时期②，王位继承人被授以巴西副王的称号，随后这块殖民地也被提升到副王辖区的名誉地位，这样，巴西的地方自治范围就逐渐扩大起来。国王的法律，在巴西和在葡萄牙同样适用。葡萄牙的专制主义政权，将大面积的授与地，从他们的管区领主的专横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到处推行了"国王的正义"。

虽然议会（在这里本来很有可能和平地促成向代议制民主的演变）在葡萄牙已经不复存在了（事实上，几乎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但是仍然残留着某些类型的城市自治，令人联想起旧的议会形式。在巴西，某些团体被授与特权，并同在葡萄

① 类似郡的地方政府单位，是由省划分而成的。关于自治区性质的透彻论述，请参阅J·林·史密斯所著《巴西：人民和典章制度》第三版（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3年）。——英译者

② 十六世纪末，葡萄牙开始被西班牙控制。1640年，在葡萄牙贵族的策划下，布拉甘沙公爵登基，建立了葡萄牙自己的若奥四世王朝。此后一个时期，称作葡萄牙王权复兴时期。——译者

牙所享有的特权完全一致。治安官都是平民出身，正如若奥·里贝罗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在反对政府当局的叛乱中，常常站在最前列。

劳动力向黄金和钻石产地迁移，造成了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衰退，在一向由糖业大王和大农场主控制的自治地区里，也引起了相应程度的生活下降。巴西人不再为争取地方特权，而是为争取"宪政"，不久又为争取政治独立而进行斗争了。在殖民地时期，土地大王藐视首都，或者对它的政治和行政机关，抱着一种沉默不语或直言不讳的敌视态度。佩德罗一世在位期间和嗣后的摄政期间，他们就越发不肯服从了，在伯南布哥尤其如此。他们在本质上是地方主义者，因而，他们也是带有强烈共和主义倾向的联邦主义者。他们毫无热情地接受了佩德罗二世的登基。然而，他们很快也就屈服于政府那种政治上坚强有力的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了。这是因为他们毕竟觉察到，凭借着他们经济上的优势，国家的政治统治权终究会落到他们的手里。奴隶制再加上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就同他们大地主的利益绝妙地协调起来了。佩德罗二世的统治所以长期平安无事，其奥妙大概

就在于对大土地所有者有利的东西，对君主政体也同样有利。巴西前进的步伐之所以缓慢，以及城市之所以降低到次要的地位，也都可以用种植园那种宗法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所占据的支配地位来加以说明。

佩德罗二世由于确信国内的领导阶级支持他，所以就忽视或轻视了其他一些原可以加强他的地位的力量——值得注意并且居于首位的，乃是武装部队。在国王当中，唯独佩德罗二世这个人不想，或者说不懂得，怎样使君王的命运与军人阶级的命运契合一致；因为即使是在对巴拉圭作战胜利之后，军人阶级也从未能够在帝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获得较高的地位。

1870年对巴拉圭的战争结束之后，考虑到美国发生的实例，统治阶级和皇帝本人都迫于良心，不得不接受了废除奴隶制的思想。为了防止北美悲剧的可能重演，帝国的一些谨慎的政治家便求助于缓速进行的，或者说是循序渐进的解决办法。“新生儿自由法”① 和解放年满六十岁的奴隶的法

① 直译是关于“自由子宫”的法律，意即奴隶母亲所生的一切子女均应是自由的。——英译者

令,对原来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作了补充，这样就为奴隶的最后解放铺平了道路。然而实际上,这个费尽辛苦方才获得通过的里奥·布兰科的新生儿自由法,在第二王朝的整个持续期间,也只不过是继续延长奴隶制度的寿命罢了，而这种制度在废止奴隶贸易的时候，本来就是可以废除的。但是，在君主政治的最后十年里，当废奴运动又重新兴起的时候,它便深得民心,并且冲开了那个曾经拦阻它的闸门。建筑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古老的巴西经济大厦,开始在各处崩溃了。

在社会结构被奴隶制度玷污了多年之后，这个问题,终于以一种崇高而令人感伤的姿态,得到了解决,它损害了那些帝国支持者的金钱利益,也瓦解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假如是由一个象佩德罗一世那样易于冲动的统治者来领导，或者假如是在若泽·博尼法西奥① 或贝尔纳多·德·瓦斯康塞洛斯那类坚强人物的统治之下，巴西便很有可能在美国的内战之前，并在对巴拉圭的战

① 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一席尔瓦（1763—1838年），地质学家，佩德罗一世手下的大臣，佩德罗二世的私人教师。被称作巴西独立的“元老”。——英译者

争之前，就将奴隶制这个大污点从她自己身上洗刷掉。那时候，滚滚涌进美国的欧洲移民洪流（这里顺便插一句，它是佩德罗二世所厌恶的），也很可能有一部分转入到巴西广大的空旷地区上来，并和那些已经开始为阿根廷尽力的移民一样，开始对这些地区从经济上加以开发，从人种上加以改良了。

巴西经济中心的南移，虽然没有立即影响到社会上的统治阶级，它却为农村劳动力的使用，实际上开辟了新的前景。在里约热内卢省以及在圣保罗省的帕拉伊巴谷地，土地和奴隶，还象伯南布哥省和巴伊亚省的情况一样，继续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存在着。然而，在1883到1889年之间，却大约有三十万从外国移来的农业工人（其中主要是意大利人）进入圣保罗省境内，而当咖啡种植业，从圣保罗省的北部向西部转移的时候，人们便发现，这些移民当中的自由劳动力，对于解决奴隶的强迫劳动问题，正好是一个答案。黑人农奴进行的数量微小的生产，再也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咖啡工业的需要，这些黑人都靠监工用皮鞭来管教，并且由大地主家的厨房发给食物，而这是北

方和里约热内卢省的传统方式。对圣保罗的大农场主来说，从工业的繁荣上来衡量，使用移民的自由劳动好象是更为有利得多。假如1870年的共和国宣言推迟十五年再起草的话，它的作者们便用不着担心他们会得罪那些圣保罗的奴隶所有者们了。

再进一步来说，工厂和城市商业的发展尽管是缓慢的，却已经明显地突破了庄园主所长期占有的控制权。乡间，由于被一种依靠强迫劳动的经济制度所约束，因而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抗使用自由劳动的地区和新兴工业所迅速取得的支配势[11]力，这一事实，使得巴西没有发生那种引起美国南北战争的悲剧性的敌对行动。

巴西南北省份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分歧，从来也没有象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那样达到失去平衡的危急程度。举例来说，奴隶制已经传布到整个巴西，它在各地的情况不同，可是它并没有使这个国家按照一条习惯上的分界线，分裂成两个巨大的敌对区域。黑人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巴西的种族成份（达到了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人种混杂地区的程度），而且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巴西的文化。他

们贡献给巴西的是仁慈厚道的心肠，不为将来打算的态度，听天由命的顺从，而尤其突出的是使巴西减少了主动性、自信心和自我管束能力，虽然这三种品质，在早期的葡萄牙殖民者和首批冒险进入内地的那些拓荒者身上，实际上是十分显著地存在着的。奴隶制度废除之后，从前的奴隶们，因为对于自主的生活毫无准备，便丢弃了在农场的工作，成群结队地涌到城镇和村庄，扩大了那种挣一天吃一天的游民队伍。关于他们新近获得的自由，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再也不受监工管教了，或者换一句话说，他们现在有权耽溺于安闲、懒惰的习惯和堕落的行为了，这在他们那种幼稚的思想里，反正都是一回事。

因此，1888年5月13日这一天，既标志着奴隶的解放，又标志着帝国临终时的痛苦。失去了强制劳动这个农业上的经济命脉，唐·佩德罗的君主国就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它既得不到军队的援助，又没有中产阶级的支持。这个古老的并且不时表现仁慈的历史产物，即将永远地消逝了。

全国经济活动的性质和范围，以及它们对公共财政的直接影响，值得我们稍加研究。巴西经济

的重心经常转移，而其次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它在全国广大的地理区域上分布得极不规则。当咖啡还没有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等省占居优势地位以前，南北两方的经济潜力仍保持着一定的平衡。巴西的经济开拓地区，并未伸展到沿海地区以外很远，全国大约四分之三的生产活动，都集中在这个地区。占优势的消费经济，正慢慢地向出口经济发展。咖啡种植的迅速兴起，深刻地破坏了旧有的平衡。北方人口纵有增长，但很有限。从 1870 年巴拉圭战争结束到 1889 年共和国成立，东北各省的人口指数，从 100 上升到120；而同一期间，圣埃斯皮里托、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的人口指数达到148左右，而在巴拉那到南里约格朗德的地区内，则达到195。

橡胶在亚马孙流域的出现，把非常多的外乡人吸引到遥远的北方——巴拉和亚马孙两省。但是除了东北海岸和东南地区之外，巴西实际上是一片荒漠。亚马孙、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这几个中部省份。占地面积达392万平方公里〔150万平方哩〕，而居民却只有大约47万人。在1,400万多

一点的总人口当中，有 600 万人分布在种植咖啡的省份里。东北的产糖区容纳了 450 万居民，而遥远的南方各省则将近 150 万人。在这些居民当中，100万是奴隶，其余绝大多数是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巴西的各个区域之间经济上的不平衡，比起人口上的差异，更加引人注目。一张关于帝国终期生产活动的地图，和一张关于巴西殖民地时代最后一世纪的同类地图，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别。经济上的有效开发区，沿北方海岸，用一个淡颜色的长条形，就可以表示出来；在伯南布哥的巴伊亚的产糖区，长条的颜色加深，在圣埃斯皮里托，渐渐地淡下去，而在里约热内卢，便重又变深了。接着，这个长条就要加宽，而将米纳斯吉拉斯的咖啡种植区和旧矿区，帕拉伊巴谷地乃至圣保罗都包括进去。圣保罗省的西部，实际上是马托格罗索沙漠的延长。巴拉那和圣卡塔林纳的沿海一带，以及后一个省的德国旧殖民地区域（那里有一些人口稀薄的小块定居点），都会有一些涂上颜色的斑点。南里约格朗德境内，有山地的产粮区和平原的牧畜区，这两大区域正慢慢地繁荣起来，并

将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愈趋发展。

这些不同的地区，相互之间很少来往。以各个地区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各自平衡为依据的国民经济或者国家市场，严格说来，当时并不存在，这就和直到今天它也还不存在的情况一样。恰好象每个港口要控制一个为它自己所特有的后方地区，当时每个省都构成了一个小型的自主的市场，这在今天也仍然如此，只不过不那样走极端罢了。唯独属于全国范围的财政金融体系，才使人感到国家在政治上是统一的。

君主国所修建的9,700公里〔6,000哩〕铁路，都遵循了同一个模式，它们提供了从某些偏远地区到达海滨最近地点的交通运输，但是没有全面的衔接联系。内地供牛车和驴队缓慢爬行的道路，又坏又少。邮政和电报两项公共设施的情况也是如此。1880年邮局大约处理了5,000万份公私信件。十年之后，这个数字便已增加到两亿份以上。

13

第二王朝关心物质进步的热情尽管有限，但它仍然修建了一些重要的铁路，而当时修建这些铁路的益处，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佩德罗二世最初建设的一些铁路线段，是一项很值得注意的

技术设计。从累西腓和巴伊亚开始，有两条铁路伸向圣弗兰西斯科河。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的铁路网，不是为地区性的系统，而确实是为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系统，建立了基础。12,000公里〔7,500哩〕的电报线路，一点一点地伸向内地，而海底电缆也将巴西同世界其它地区连接了起来。最初的大型制糖厂，都是由政府提供津贴的。

在1808年建成的商船队，靠着它享有沿海航运的专利权，本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当这项特权在1862年被取消时，它便又衰退了。亚马孙河和巴拉那河的运输线，是在毛阿男爵① 倡导之下创建的。在几项基于征收特别入口税以保证港口建设与开展业务的港口特许权当中，只有圣多斯港的特许权开始执行。

因此，用若奥·里贝罗的俏皮话来说，巴西就

---

① 伊里内乌·埃万热利斯塔·德·索萨，毛阿男爵，后为子爵（1813—1889年），南里约格朗德人，是商业银行家、内河运输线的创立人以及里约的曼格运河、干船坞、瓦斯照明体系、市内电车路线和里约—皮特罗普利斯铁路的建设者。——英译者

是由许多几乎不相往来的人岛所组成的一个群岛。在君主政体控制之下，政治和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并没有为这个国家创造出经济上的统一。出口的只是一些农产品和原料，实际上所有的工业品以及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准所需要的大部分消费品，都是进口的。若奥六世执政期间进行过的建立小型钢铁工业的尝试，并没有继续下去。在帝国那种墨守成规的环境里，毛阿男爵的计划，几乎成为遭人诽谤的因由。砂金矿床，在十九世纪初期被耗尽之后，巴西地表以下的土壤便失去了一切经济意义。“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这种古旧并且有点轻蔑意味的说法，毕竟是正确而又真实的。

可是，农业财富并没有稳定性。构成农业财富的主要产品，时时改变，并且经常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殖民地时代，并一直到十八世纪中 14 叶，在东北地区，糖占居着支配地位，棉花则居于第二位。甚至在那个始于十八世纪也止于十八世纪的黄金和钻石周期里，北方的甘蔗种植园，也因为它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坚实稳定，而继续代表着巴西。但在十九世纪中期，制糖工业被国外的竞争挤垮了，于是在里约热内卢省及圣保罗的帕拉伊

巴河流域，咖啡种植业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使国民经济，从巴西东北地区，加速向南方转移。东北失去了它的经济领导地位，因而也就失去了它的政治支配权。

君主国临近结束时，橡胶价格开始猛涨，而在同一期间，咖啡也突然进入并且垄断了国民经济。1889年，巴西生产了占世界总产量57%的咖啡，并由此取得了对外贸易的平衡。咖啡建设了圣保罗，也支持了巴西，当咖啡不再依靠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的时候，它便阴谋建立一个共和制的联邦政府，而听凭君主国去接受命运的支配。巴西在君主制与共和制时期，都和各地的情况一样，因为栽培单一作物而引起了周期性的危机，把国家弄得非常贫困，并迫使政府采取了危险的救急措施。因废除奴隶制而严重恶化了的蔗糖危机，标志着第二王朝的衰落，而1889年诞生的共和国，则恰巧是在1930年，圣保罗发生咖啡危机的同时垮台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每发生一次与某项主要产品有关的经济危机，都要在政治秩序中相应地出现一场剧烈的天翻地覆的变化。1930年革命运动的胜利，可以用咖啡经济中出现的漏洞来解释，这

正好和1889年的情况相似，当时共和国政府的胜利，实际标志着经济中心自北而南的转移由于引进自由劳工而提早达到了最后阶段。

巴西帝国时期的经济弱点，使国库长期陷于空虚状态。国家无法开辟新的财源。所以，它并没有跳出殖民地时期旧有财政制度的框子，只不过文牍手续和拘泥小节的地方少一点罢了。尽管进行了一些保护贸易的尝试，但国家的关税，通常都以取得岁入为宗旨，因为岁入的50%来自进口税。预算赤字差不多每年都出现，平均要在2万干度和3万干度之间（而每年的岁入，却只从1871年的10万干度上升到1889年的15万干度①）。在君主国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正常预算的六十六年期间内，岁入总额是874,298干度，而贸易顺差总额却没有超过43万干度。国家独立之后发生的组织问题、第二王朝成立之前的内战、对巴拉圭的战争以及公共灾害等，都是造成长期赤字的原因。 15

独立后欠下的外债达632,000干度（按每密耳

① 一干度（一千密耳瑞斯）的价值，按1871年的汇率计算，约为500美元。在世纪交替的前后，为333美元，1925年为100美元，而今天（1965年）还不到50美分。——英译者

瑞斯可兑27辨士的假定汇率计算），其中175,000千度到1889年仍未偿还。这个数目加上543,000千度的国内统一公债和75,000千度的流动债务，我们得出的总额是793,000千度，它再和流通中的20万千度纸币加在一起，便凑足100万千度，也就是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鲁伊·巴尔博扎所报告的帝国负债总额。

奥罗·普雷托子爵在答复他所任政府首脑职位的直接继承人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元帅时说，在君主国统治下所支出的额外开支是1,230,218千度，其中63,779千度用于独立战争、同原宗主国清算账目、拉普拉塔河战争以及对巴拉圭的战争；425,000千度用于改善物质条件；87,000千度用于救济公共灾害的受难者，等等①。因为在凡笔国内外的信贷交易中获得了87万千度的收益，帝国为支付临时费用只花掉了大约36万千度的正常岁入。

① 这些数字加起来，凑不上1,230,218千度，但贝洛提供的数字，就是如此。可能是把战争费用记错了，而应该是637,790千度。那样便余下80,428千度的差额，贝洛很可能打算用“等等”来加以概括。——英译者

帝国的最后一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525,000千度。在26万千度的出口额中，咖啡占了15万千度。圣多斯港的吞吐量几乎同里约城的相等，并且大大超过了累西腓和巴伊亚的吞吐量。

在殖民地时期，巴西与通货的缺乏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在内地，某些农产品充当了交换媒介。若奥六世为了在他的新政府所在地筹建行政管理机构，便乞灵于各种权宜措施。他创立了新的巴西银行，并让它作为一个发行银行，一直维持到1829年(当他于1821年返回葡萄牙时，他把他能够弄到手的一切现金和贵重金属，都随身带走了。巴西变得一贫如洗。铜成了铸造钱币的唯一金属，不久之后就给各种可耻的诈骗行为开了方便之门)。

巴西银行在1829年一倒闭，国库券的发行制度便开始建立起来，密耳瑞斯对英镑的汇率降低 16 了两次：1833年从67.5辨士降到43.5辨士，继而在1846 年又降到 27 辨士。第二个巴西银行没有能创办起来。拥有独家发行权的第三家银行，是由毛阿男爵的银行（已经同罗思柴尔德财团① 密切协

① 罗思柴尔德财团，是十九世纪控制欧洲金融的一个财团，由德国犹太人罗思柴尔德创建。——译者

作)和商业银行合并而成的。在1864年那次基本上是由世界规模的萧条所引起的大崩溃之后，独家发行纸币的权利，便已交回国库。这一体制一直实行到1888年，而政府的财政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相对稳定时期，可惜这一稳定时期却在对巴拉圭战争的直接影响之下中途打断了。

十九世纪末，几乎整个欧洲都处于经济平衡状态之中。大体说来，那里盛行的是汇兑的平价、稳定的通货、自由的流通、适度的关税，以及自由贸易的倾向。在经济上，世界似乎是分成了两大互相平衡的区域：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家和没有任何财富累积的农业国家。作为一个供应原料和农产品以换取工业品的国家，巴西自愿地把自己划入第二个区域。当自己的储备金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她便向罗思柴尔德财团去借款；这个财团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化身或者延长，巴西从独立的时候起，便已经被纳入到它的势力范围里了。巴西不大不小的贸易顺差，保证了利息的支付。但是，这种财政上的稳定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因为它并不反映经济的生命力。

在君主国临终的年代里，北美洲的繁荣，开始

给巴西的政治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人对国内外的经济状况都不大了解。他们觉得，北美洲的繁荣应归功于美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她的特殊环境、气候和人民。他们问道，巴西为什么不应该效法北方那个强大共和国的榜样呢？北美合众国的伟大，是从林肯时代废除奴隶制度之日开始的，巴西经济历史的新阶段，同样也将要从解放她自己的奴隶之日开始。

1888年11月，若奥·阿尔弗雷多内阁放弃不兑换的国库发行制度，开始实行新的可兑换的银行发行制度，其最终目标是成立一个未来的中央发行银行。把一笔600万英镑的外国贷款换成了现金，使得公众对于国家健康繁荣的信心受到了鼓舞，因为通货的增加及银行信贷的发展都是良好的朕兆。1888年5月到1889年11月之间，在里约城创办的公司的资本增加了402,000千度（这是有助于信任巴西经济生命力的另一个因素），奥
17
罗·普雷托曾经不失时机地指出了这一点（后来作为成功的证据，鲁伊·巴尔博扎也同样地唤醒人们，注意“恩西利亚门托”时期各公司新增资本达到120万千度）。

奥罗·普雷托子爵在废除奴隶制所造成的自信与乐观的气氛里，组成了他的内阁。他成功地更换了大部分外债，又借到了一笔有利的内债，而且提出了关于在不久的将来发行兑现货币的希望。汇率的稳定（平价的保持，主要是靠从1887年外国贷款中得到的黄金，靠废除奴隶制之后外国在这个国家的投资，而不是靠真正的经济繁荣），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对于他的计划所抱的信心，他的计划是在三分之一黄金储备的传统基础上，巩固纸币的发行。

为了在中央发行银行（至今仍然是一个未经实现的梦想）成立之前，实行阿尔弗雷多计划，奥罗·普雷托与巴西国家银行订立了契约，逐渐用可以兑换黄金的其他通货来取代国库券。同样的安排也适用于设在里约城的另一家银行及圣保罗的一家银行，但是里约城的那家银行没有利用它，而圣保罗的银行也只发行了少量的新通货。政府作了保证，不再发行更多的通货，并将五厘公债券付给国家银行，以交换该行所收回的国库券。在发生政治或者经济危机的时候，国家银行将有权停兑它的纸币。

与此同时，作为一项临时办法来解决那些主要是由于废除奴隶制而引起的农业问题，奥罗·普雷托命令国库从借内债得到的10万干度中，拿出84,000干度，无息贷给各银行，而银行则可以按百分之六的利息，以一到十五年为期，发放农业贷款。奥罗·普雷托所设想的那个宏伟的财政改革计划虽因这项措施而臻于完善，但是共和国的革命却使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行。不管怎样说，它大概也并不如它的作者所想象的那样美妙。

今天，当我们分析帝国临终时期的经济和财政的一般状况时，我们感到很难理解，象奥罗·普雷托那样有才智有经验的人，竟然会认为有可能对国库以及随之而来对金属铸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政府激发起来的关于市场的安乐感，可能是为了安抚那些失去了奴隶的奴隶主，并且为佩德罗二世王位的和平继承，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气氛，可是这种安乐感却必然要导致不久以后成为鲁伊·巴尔博扎金融政策标志的那次“恩西利亚门托”危机。

我们把那些迄今尚不能完全平心静气进行讨 18 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尽一个人的最大能力加以

简单概括之后，对帝国遗留给共和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也只能作出如上的描述。如果人们只看到外汇平价和国家信贷的话，经济和财政状况似乎是很美妙的，然而在这个生产劳动设备十分低劣的、广阔而贫困的国度里，真实状况却完全是另一番情景。紧挨在唐·佩德罗王朝临终痛苦之前出现的安乐感，即使不是证明，也至少是大体上说明了共和国初期财政管理的不稳定、矛盾和错误的原因。

为了结束这个关于帝国一般状况的简略叙述，对行政管理上的特殊情况，也必须回顾一下。政府的中央集权制，使各省的发展遇到了困难。因此，成立联邦政府的想法，在较富足的区域里极为盛行。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省长，一般并不接触当地的问题。他们追求逐步晋升官职，只想讨好他们的政党和他们为之效命的内阁。

杰出的政治家们，其中如塔瓦雷斯·巴斯托斯，早就指出过极端中央集权制的恶果。北方的贫穷省份抱怨说，他们贡献给中央政府的，要比他们从那里得到的多，而南方的富裕省份则抱怨说，他们的首创精神正在遭到破坏。有见识的君主主义

者，如鲁伊·巴尔博扎和若阿金·纳布科，却认为使帝国同联邦制协调起来是可能的。在政治上，自治区并不占重要地位。地方行政机构，由声名狼藉、营私舞弊的选举机器控制着，而后者是由大约15万名或者20万名成问题的、无足轻重的选举人所组成的，他们全都缺乏自治精神和公民的意识。公务人员是诚实的而且往往也很勤勉，但他们对中央政府那种严密的隶属关系，却造成了官僚政治的文牍主义和拖拉现象，这就使他们把仅有的那点工作效率也都失掉了。

那些不曾被帝制时期议会政治的假象所欺骗的少数政治家和政客，偶而也指出过形势的真实情况，如：连续不断的商业萧条；关于货币发行权的政策变幻无常，有时只将这种权利授给国库，有时又只授给银行，有时又允许这二者同时发行货币；利率很高；80%或90%的农村财产，负有抵押债务；没有全国的贸易区；运输和信贷系统极不稳定；以及奴隶劳动对国民生活所造成的无法补救的毒害等。只有属于那个小小阶层的政客，身穿夜礼服的皇帝，土地大王，佩带金穗绶带的大臣，那 19 些在炎热的气候里身穿大礼服，全神贯注于《两个

世界的评论》以及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英国议会里考虑和谈论什么的议员——只有这些利己主义迷住了心窍的人，才看不见巴西是个怪物。

宫廷生活，在政府各部和议会走廊里悄声进行的密谋，占去了政府首脑们的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这些人当中，也包括具有无可争辩的才干和真诚爱国心的人士。皇帝，长期以来对琐细的工作或者行政事务的严密监督失掉了兴趣。在普遍不满的气氛里，他长期在位的巨大贡献，大部分已被人们遗忘了。可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气氛也许使临时政府所承担的复兴工作减少了一些困难。

20

第 二 章

君主制度的实质

帝国的薄弱而虚假的基础——抢先阻止共和国的建立——帝国崩溃的三个原因——共和主义的复活——非现实主义的帝国政治——佩德罗二世其人及这位国家元首——对巴拉圭的战争——帝国的参谋本部——君主制度日薄西山

巴西的君主制度为什么会在1889年11月15日清晨轻而易举地被推翻呢?这个问题,在各有千秋的编年史作者和历史学家当中,曾经引起长期的论战。而当年那些对共和国的降临负有(或自认为负有)最大责任的一班人,彼此之间发生的意见不和,又自然要使作家学者们难以明断是非。这班人的争吵,在事过五十多年之后,据那些对互相矛

盾的文件进行钻研的人们看来，似乎有点不切本题。因为，这班人当时所以相争不已，就在于要争夺这次不流血而战胜了一个政治制度的胜利荣誉，而这个政治制度，实际上是被它那种从一开始便容易地患染上的疾病消耗罄尽之后，自行消亡的。

今天，当我们研究共和国诞生的直接原因时，我们有两个条件，比最初研究它们的那些人优越。这就是我们不受时代激情的影响，并且有了新的政治实验的教训。1930年那次迅速完成的革命〔当时瓦加斯获得了政权〕，便使我们对1889年发生的事件，格外地增加了心理上的理解。既然巴西的一般民众的思想倾向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她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不稳，而且又缺少具有政治远见的领袖，所以相似的事实便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巴西从她独立的时候起，便企图探索出她自己的命运，即她存在的意义。因为对过去那些饱含着喧嚣的热情和救世主般的天真抱负的实验很快就感到了厌倦，她已经轻易地沉溺于一些其他的实验了。她所以具有很大的忍耐力，基本上是

由于她害怕发生某种更糟糕的情况①。

佩德罗二世王朝所能得到的最大赞美，便是它延续的时间很长。当年〔1840年，当时佩德罗十四岁〕，它作为一项临时解决办法，通过“达到成年”的阴谋，而强加于这个国家之后，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奇迹在于：它是靠佩德罗自己的行动创造的，而不是靠他所建立的那种来自外国的制度——君主制度创造的。一等他的沮丧、他的幻灭以及他在体力和智力上的早衰都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候，这座古老的建筑物便不可避免地崩溃了，因为它的基础非常薄弱。人们可能要说，巴西的第二位皇帝既不知道怎样替他的继承人作准备，也没有想去准备。在君主制度的最后阶段，他所表现的那种奇怪的漠不关心态度，看来就好象是一个人已经听天由命，睁着双眼向死亡走去。

人们千百次地说过，帝国的元气当时已经丧

---

① 作者的意思显然是这样的，即尽管巴西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有许多重大的病症，而且为了医治它们，也时常进行过使用暴力的尝试，但她仍然从1822年起，即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继续生存下来，这是因为巴西人情愿忍受坏的情况，也要防止发生更坏的情况，就是说，他们害怕离开油锅又跳进火坑。——英译者

尽了。它那种家长制的氛围环境，是一种抚慰国民的温水浴，但它不能吸引住青年一代的兴趣，他们正在同各种伟大的世界新思潮热心地进行着接触。甚至它的老一辈文职官员，也早就对它那危在旦夕的局面感到幻灭而漠然置之了（1930年，在行政和议会方面占据关键性职位的政治领袖，也陷入了类似的思想状态）。如果说当初对这位少年皇帝——“国家的孤儿”所表示的同情心，曾经大大有助于他的王朝的生存，那么，对这位年老而多病的君主所表示的尊敬和怜悯，便只会延长它临终的痛苦了。

法国在第一共和国灭亡后，于1830年接受了“市民国王”路易·菲利普[1]的资产阶级统治，作为法国的君主制传统与英国式议会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妥协办法。1789年革命的过火行动，她记忆犹新，这使得她对共和国产生了恐惧。但是十八年之后，由于对一个缺乏胆略或威望的政府感到厌倦，她便赞美起拉马廷[2]所说的“傲慢无礼的革命”来

[1] 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1773—1850年），法国国王（在位期间1830—1848年）。——译者

[2] 拉马廷（1790—1869年），法国资产阶级诗人和政治家。——译者

了，其结果只能是，四年后又在重新发生恐慌的痛苦之中，屈从于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主义。法国和巴西的情况，存在着某些相似的地方。

宣布年轻的佩德罗已届成年的宣言，预先阻止了共和国的建立，而在逻辑上，共和国本来是应该紧接在摄政时期之后就立即出现的。这个宣言也是君主制度（它促成了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主义理想之间的一种妥协方式。只有到了1822年，由于佩德罗一世王朝的诞生，巴西的独立才有可能巩固。那个时期的伟大人物，尤其是杰出的若泽·博尼法西奥，对于历史的现实，都有正确的看法。摄政时期的骚乱，明显地表现出联邦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愿望，而且在一小批巴西上层人物中间，引起了唯恐国家分裂的惊惧不安。贝尔纳多·德·瓦[22]斯康塞洛斯那次著名的反叛，清楚地反映出这位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恐惧。

因为巴西安然地度过了她历史上最动荡和最有趣的阶段（即第一王朝和随后的摄政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骚动，她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便得出结论说，只是由于第二王朝的仓卒建立，国家的统一方才得到维护。然而，通过假想将事实恢复到本

来的面目，便会把我们引向一个不同的结论。

各地区间缺乏或根本没有相互联系，某些州见识浅薄地渴望分离，对殖民地时期那种独立自给省份的愚蠢怀念，经济制度尚未发展成熟，这一切都威胁着巴西，但是她的统一，却仍然被语言、宗教和种族等固有的紧密联系给巩固起来，而且在一个共和国的统治下，也很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她和南美洲其他共和国一样，有可能把革命的期间延长一时，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智力上和精神上的猛烈冲突，也有可能使这个国家年轻的民主制度变得更为有力、更加牢固。这样，巴西的性格中有了坚强的骨气，她就有可能比她的实际经历提早七十年度过国内的灾难和斗争时期。从开始时期起，佩德罗二世的统治，用一句旧话来说，就只是一贴不对症的消炎药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最初引起的希望和信心，很快就消失了。

但是我们对回顾过去感兴趣，并不单单是为了臆测可能发生过哪些事情。我们只是想从帝国自己的有机体内，找出它解体的原因。共和国如此意外地出现的原因和情况如何？为什么没有人维护旧制度呢？

历史学家们一致同意，君主制度的崩溃，有三个主要原因，即：宗教上的争论，奴隶制的废除，以及军界的争端。如果这些问题（或者至少是后两者，因为它们最为重要）没有发生的话，佩德罗二世很可能在皇帝宝座上结束他的一生。或许象金蒂诺·博卡尤瓦赞扬军队在推翻君主制度中起的作用时所断言的那样，巴西说不定还要继续生活在第三王朝和第四王朝的统治之下。废除奴隶制是向共和国迈进了一大步，这是毫无疑问的。军队对共和主义者的支持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帝国的基础已非常薄弱，所以任何重大事变都会把它推翻，这一事实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

巴西上层阶级之中的一大部分人，尽管他们不够稳定，也很混乱，却基本上是始终主张共和的。不过，君主制度乃是支撑既定秩序的骨架，它 23 的合法主义和官僚主义传统是从葡萄牙那里继承下来的。所以，害怕破坏这些熟悉的传统形式，完全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对许许多多牢记着法国1789年和1848年的实验并且观察了周围各个西班牙美洲国家的人们来说，共和国也无非是引

起骚动和苛政的祸根罢了。一旦克服了这些恐惧，君主制度便要消逝。公众对皇帝本人的爱戴和尊敬，都不足以阻止共和国的出现。

巴西的历史学家，甚至那些罕见的、从哲学上来说明问题的人，都把君主主义的衰落，回溯到巴西历史上很早的时期。例如，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认为，巴拉那侯爵的"调和"党（它一直生存到1860年）就标志着衰落的开始，或如若阿金·纳布科嗣后所说的那样，标志着民主浪潮的开端。奥利维拉·维亚纳认为，共和主义的理想"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孤立的观念，显然和1868年扎卡里亚斯内阁倒台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反应有关"，而且它也导致了1870年共和党的组建。皇帝的公开干涉，不仅牺牲了扎卡里亚斯内阁，而且又导致将权力移交给伊塔博赖领导下的保守党人，用以防止出现清一色的自由党议会，这样一来，就使得当时的政治观念发生了普遍的变化。它使人们"对君主议会制度的优点越来越感到怀疑，而对一种新制度——事物的一种新秩序——则越来越抱着强烈的希望"。

虽然如此，对巴拉主战争结束之后的那一段

时间，却恰恰是第二王朝的全盛时期。以里奥·布兰科子爵为首的内阁，是第二王朝任期最长、最富有成果和最卓越的内阁。它使唐·佩德罗有可能到欧洲去进行第一次访问，在那里愉快而安静地旅行了将近一年。新生儿自由法，使废奴主义者的热望缓和了十年之久。1868年的“不流血政变”，尽管在一小批巴西政治上层人物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在本质上，它与充斥于帝国虚假的议会生活之中的许多其它政变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而且对于公众相信或者不相信议会制度的优点，也几乎没有发生影响。

执政党的轮换，始终由皇帝裁决。因为是在公民意识刚刚萌芽的一个国家里，各项选举都公开地进行舞弊，而且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公众舆论，所以皇帝本人始终把持着特权（这样做，分明有它的好处）来限制每个政党的执[24]政期限。除了那些次要的公务人员之外，这个支离破碎、人口稀少、贫穷不堪而且风化未开的国家，对执政党的例行轮换并不怎样感兴趣。议会中的那些亟力模仿英国人甚至模仿英国服装的一小撮没有根基的上层人物，对于这种毕竟是由他们扮

演的喜剧，是不会不了解内幕的。费雷拉·维亚纳在他对丹塔斯内阁提出的那份著名的控告中，道出了许多人的心情，当时他说："我对于在这种政治喜剧中充当一名演员，已经感到厌倦了"。然而这个事实却并没有妨碍他参加内阁会议。

因此，将第二王朝的衰落归咎于任何一次纯属政治性的事件，看来都是不大切实的。我们必须到全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里去寻找原因。国内的政治事件和它们对外的影响，是由帝国内在的瓦解过程决定的。君主制度对于巴西人的性情来说，一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若把它当作一种适用于这个国家的特定的政府形式来研究的话，就势必要受到局限。因为君主制度是在特殊环境下，从欧洲移植过来的，它代表着多少个世纪的历史给欧洲所造成的一种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同时，按照既往的情况，它还要求人们对其历史渊源表示无限神秘的崇敬；所以，它在美洲从来也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上层建筑。对1889年被消灭的那个政权进行分析，差不多可以归结为㉒对一些有决定意义的人物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自然要从最上层的一个人开始。因此，我们最好的

办法就是评论佩德罗二世这个人物本身。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曾被巴西的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们更多地注意过。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短期的洋洋得意之后(在那个时期里，贬低佩德罗二世乃是一时的风尚)，他便成为经久不衰的被歌颂和赞美的对象了。人们差不多可以说，在这种近乎无条件的颂扬之中，有一种复古的意味。好象是帝国正在使巴西人充满了怀古恋旧的渴望，好象是他们把那位老国王——“马库斯·奥雷利亚斯的孙子”当成了巴西统治者的毫无瑕疵的典范。如果说从私生活方面来看，他的诸多美德还可以遮盖那些细小缺点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从事公务的的人、即作为一个年轻国家的指导者和领袖，他的过失便不会那样轻易地得到人们的宽恕了。

认真思考一下佩德罗的长期统治，我们常常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是在努力实现他个人的愿望，而不是在建设一个现存的国家。实际他够不上一个政治家；他缺少远见，不喜欢政治，并且缺乏胆略。他是一个忠实尽职的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对于土著居民甚至抱着某种保护主义的偏爱态度，因而成了公务人员最高典范的化身。在私人

生活方面，他的高尚品德是无懈可击的。他漠视金钱，就和他厌恶不忠诚和不道德的行为一样，既属伟大，而又出之于天性。他这个人，才智略高于中常水平，他并没有真正为艺术或者生活之中富有诗意的方面所感动。后来，他在流放期间写作的《忠于职责》（一种告别辞）里说过："我承认，我非常缺乏想象的才能……我现有的一些知识，主要是靠孜孜不倦得来的。"虽然他对于同外国作家和学者交往经常表示的关心中可能掩藏着一些鄙俗的自我炫耀倾向，但他还是喜欢锻炼智力的活动的。他的天性尽管是真诚地宽宏大量，他却不能始终做到不念旧恶。他有时任性而执拗，甚至于顽固，譬如在洛佩斯遇难之前，他几乎是独自坚持延长对巴拉圭的战争，又如在处理伯南布哥和巴拉大主教的问题上，他傲慢地坚持要求自己的特权；但他一般来说是怯懦的，本质上是因循敷衍的，甚而抱着幻灭和怀疑的态度。

他的才智，甚至于他的仁慈，都没有发出炫人眼目的光辉。他不懂得怎样交朋友，怎样去激发献身精神和热情。他甚至同那个平庸的知识分子的小社会也有隔阂，尽管他最感兴趣的便是同这些

人交谈。那些为他效命几达半个世纪的政客，对他也并没有表示崇高的敬意，而那个时代最富有才华和独立不羁的巴西著名人士，对他表示的崇敬就更其微少了。然而，他的冷静、温和以及神智清爽的品德，都与他父亲的易于冲动迥然不同，所以很容易地引起了一般民众的尊敬。他和大部分人一样，在心理上同他的母亲更为接近。他可能从他的祖父若奥六世那里，继承了温和的性情、对工作的热爱、掩饰自己感情的能力以及一个行政官所具有的那种无比敏锐的洞察力。他那孤独而不幸的童年，以及他初期教育中的无法弥补的错误，是形成他那种严肃而又孤僻的性格的主要原因。他以他的祖先自豪（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但他也毫不勉强地做到谦虚、稳重和朴实，他蔑视一般社会上那种金玉其外的浅薄行径。例如，他由于不拘泥于虚礼，有时便在外国的宫廷里发生了滑稽可笑的失礼行为。他因为不爱好政治、体育或社交活动，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到内心的思想世界里去寻求安慰。然而他的内心世界，毕竟不是十分宽广的，它不能使他在哲学或宗教方面有什么精深的理解，也不能使他的审美能力超出一般的水平，结

果，他的生活，在他看来，很可能是没有意义的。①

26　每天照章如数的例行公事，审查工作的乐趣，以及处理琐细事务的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消除了他内心的烦恼，但同时也使他的知识范围受到了局限。他试图象一个耐心的教师那样，指导这个国家，用烦琐的官僚主义纪律来监督受他管教的人民的生活。由于他禀性宽宏而又十分珍惜他那种"哲学家国王"的气派，所以他便极力使这些感情不超出议会立宪制的限度。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切事都出自于他的意志。他没有象那些辱没了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人似地成为一个可笑的暴君（他本来可以大着胆子那样做），而是冠冕堂皇地使人相信，他在统治着一个自由的国家。

---

① 最近公开发表的他写给巴拉尔伯爵夫人的信件，泄露了他有过一度秘密的交往，人们很难怀疑到他会同一位美丽而聪慧的贵妇，长期保持过一段"情意绵绵的友谊"。然而，就在他断绝这个亲密的通信关系时（他将烧掉她写给他的信件），他也证实了他的那种固定不变的心理状态。他很少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所写的信，始终用着同样严肃的腔调，同样枯燥无味的笔法，同样被巴西大大小小的事情纠缠个不清，而最重要的是流露了他长期以来要从他那虚矫而单调的环境中逃脱出来的愿望。——原著者

正如我们几乎替所有的人都能够作到的那样，我们也能够把佩德罗的心理发展过程，分成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大概持续到他年满五十岁的时候，即对巴拉圭作战结束时为止。当时，他已经在一个同世界其它地区多少有点隔绝的国家里，成为人民生活的最高主宰者。刚刚度过了少年时代，佩德罗便摆脱了那些在他即位之初曾经指导过他的人，而开始运用他个人的统治权，因为他自己觉得，他的权势已达到最盛时期。他那种冰冷倔强的年轻意志，尽管他亟力加以掩饰，仍然常常显露出来。他以相当圆滑的手法，利用了当时到处散布着的政治和解愿望，劝诱巴拉那侯爵，在1853年拼凑了所谓的调和党。这次调和，乃是各党派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合并，这些党派消除了思想上的分歧，并为这位年轻皇帝的最高统治扫清了道路。靠着在特殊环境下硬塞给这个国家的议会机构，他变成了巴西人生活的大主宰，而这件事本身，便是建筑在大庄园奴隶制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的一种表现。

由于形成了两个轮流执政的大党——保守党和自由党，由于它们轮流担任国务会议的主席，互

相竞争的集团之间的冲突便逐渐地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了。佩德罗二世象一个家长那样，主持着这个国家平时的各项活动，他时常放弃使用自己的权力，以便向他的人民（以及外国的知识分[27]子，因为他极其重视这些人的评价）展示一个自由政府的形象。一桩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使他得到了一位妻子，而她可以说是各种家庭美德的典范。他的子女，使得他的家庭幸福臻于美满，并且使他充满了希望。他变得不那么孤僻了。

在欧洲，君主立宪制已经接近于它的全盛时期。1837年，维多利亚时代在英格兰开始了，它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一个榜样。1848年建立的浪漫主义的法兰西共和国，在1851年12月2日的一次新的“雾月政变”中崩溃了。席卷旧世界的革命浪潮，正在慢慢地低落下来。在机器时代和经济自由主义开始获得胜利之初，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以为，温和的君主制是一种可以在传统和进步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完美的政体。就是这样，由于有了欧洲君主政体的影响，有了奴隶劳动的制度，以及由于党派意识的消除，佩德罗二世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建立起他的反动帝国。如果他具有一位真正

的政治家的天才，如果他能够理解巴西生活的意义，他也许就能够加强这个国家的薄弱的基础了。

巴西感激他给带来的和平与国内秩序，同本大陆其它各国所发生的紊乱现象（譬如，以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暴政为代表的那种地方性的骚乱）相比，这种和平与秩序似乎是更加宝贵了。佩德罗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实行的干涉政策，一部分是从若奥六世王朝、而另一部分是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历史性的竞争当中继承下来的，其目的不仅在于免除南里约格朗德的内部骚乱，而且还在于确保乌拉圭和巴拉圭的独立。这个政策，再加上被克里斯蒂事件所激化了的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就转移了民众出于爱国心而有可能产生的不稳定情绪。摄政期间和摄政时期之后，一直非常活跃的共和主义梦想，已经烟消云散了。英国公使①克里斯蒂傲慢无礼的行为，损害了佩德罗的爱国自尊心，但是对巴拉圭的战争，当时却把他的大部

① 1862年，当巴西拒绝某些要求的时候，英国公使威廉·杜格尔·克里斯蒂便命令一艘英国军舰在里约城附近截捕巴西商船作为报复。君主国立即同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有好几年未予恢复。——英译者

分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当战争结束时，他又重温起他那个废除奴隶制的旧梦，然而却始终保持着他一贯的谨慎态度。

若阿金·纳布科说得好，巴拉圭战争是巴西同外部世界的第一次重大接触。且不论是好是坏，这件事总算把她的外交问题推到注意的焦点上来了。巴西正在放弃她以前与世隔绝的政策。那个世纪的伟大思想潮流，也正在逐渐地扩大影响。虽然南美洲各共和国的范例不足为训，它却使君主制度的观念开始瓦解，因为在一个共和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美洲里，这种观念无论如何也是反常的。奴隶制这个梦魇折磨着最有良心的人们。巴西帝国很有可能经受不住一次军事上的失败，正如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在巴拉圭战争结束的同一年里，就被类似的一次失败给毁灭了的情形一样。但是，经过穷追而杀死洛佩斯，佩德罗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使他延缓了他自己的君主国的灭亡。

然而，佩德罗也正在发生变化。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开始未老先衰了。人们可能说军事出征的沉重负担，已经使他精疲力尽，并已粉碎了他对于自己在巴西的使命所能抱有的一切幻想。他逐

渐地放弃了他一向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的特权。虽然他对待日常的例行工作，仍同平素一样地聚精会神，但是政府的高级职务和责任，却好象显得对他过于沉重了。他的欧洲与北美之行，大都是为了摆脱那种使他的精神受到困扰的厌倦情绪。

佩德罗力图忘却王位的操劳；他匆匆地游历了乡村和城市，用观光者的陈词滥调评论着过去的光辉史迹或他看到的艺术精华，而往往不能正确地评价他想要寻找的杰出人物（不过由于他对瓦格纳①的音乐革命的理解，以及他对帕斯特②和爱迪生③的天才的尊重，却在这一点上，替他挽回了一些声誉）。他那冗长的旅途通讯（或者其他类似的文件），没有一个地方透露出一位政治家所专心思考的问题。他好象并不关心经济问题，也不注意机器时代正在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文明中

① 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德国作曲家。——译者

② 帕斯特（Louis Pasteur，1822—1895年），法国化学家和细菌学家。——译者

③ 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1847—1931年），美国发明家。——译者

引起了早期巨大的社会变革。他对学习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倒是有很大的兴趣，或者说他自以为如此。

他时常把自己看成是从城市来到博物馆和本大陆历史遗迹当中长期度假的一个有学问的资产者，或者是一个怀着无名伤感的实业家。他贪婪地阅读书籍，而让自己的好奇心涉向四面八方。但是在精神产品方面，他无非只写过几首平庸的十四行诗和几篇同样平庸的散文。他的书信写得毫无文学风味，人们看不到他的思想或感情的自然流露，也看不到他对最赞赏的事物所产生的强烈的情绪反应。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可以证实他那一贯高雅的情操。

他最亲近的亲属——妻子、女儿、女婿、外孙——没能够靠着他们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一种热诚地与社会交往或是对个人亲切相待的气氛，来弥补他的缺陷。这是一个路易·菲利普式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其中没有一个杰出的人。因此一切事都向佩德罗表明，帝国将和他同归于尽。哪怕是有一点点迹象说明最高权利有可能传给公主，国民也是不会容忍的。她这个人虽说虔诚而又

值得尊敬，然而她所嫁的那位外国王子，公众却对之深为反感，即令这种看法可能不大公正。

与佩德罗二世共事达五十年的参谋本部的那些政客们，也同样居于显要的地位。在公务人员所不可缺少的道德品质方面，他们给人留下了最好不过的印象。他们几乎全都忠诚而且勤勉，但一般说来，他们又都具有妨害皇帝行动的同样的缺点，即没有雄才大略，并过分追求形式主义和守法主义。他们自己的那种虚假的议会制度把他们给害了。他们既没有表达出国民的真正愿望，也没有重新唤醒这种愿望。他们过着宫廷、议会和国务会议的温室生活；他们经常醉心于模仿英国人和法国人。不管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学方面，他们大多数人，内心里都是旧式的浪漫派。他们全是大学毕业生和“博士”，以受过古典的和拉丁语的教育而自豪（但是，这种教育并没有阻止他们写的文章不风雅，也没有阻止他们不糟塌本国语言的语法）。热衷于细小的政治阴谋，而对当时的社会、哲学和经济等重大问题漠不关心，身为农业企业家又几乎都是奴隶主——佩德罗参谋本部的成员也就如此而已。在他们与卑贱的奴隶群众之间，存在

着巨大的鸿沟。中间阶层，即构成代议制民主政治支柱的那种活跃而自觉的资产阶级，当时还不存在，或者至少可以说，还不具有政治意识。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对于帝国统治阶级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君主制度来说也是一样。也许是因为受到使巴西堕落和停滞不前的倒霉制度的阻碍和束缚，他们没有能够为巴西做出更多的事情。

在知识和文化方面，他们的确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佩德罗二世。说实在的，在他当政的期间，佩德罗一世在位和摄政时期的那些精力旺盛、富于自信的伟大人物，已不再活跃于世了。也没有出现具有象若泽·博尼法西奥·费若，或者贝尔纳多·德·瓦斯康塞洛斯那种才干的领袖。尽管如此，在佩德罗二世当政期间，仍然有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时常表现出很有政治家的眼光，或者说得更恰当更真实一些，他们表明自己是有才干的政府成员。这类人物中，有巴拉那，奥林达，乌鲁瓜伊，伊塔博赖，里奥·布兰科和奥罗·普雷托等。按照维森特·利西尼奥·卡尔多佐通常的明快说法，至少是另外两个人，即塔瓦雷斯·巴斯托斯和

毛阿，曾经显示出帝国时期最高程度的现实主义和富有建设性的才智；但是由于没有受到佩德罗的重视，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便未能充分施展其胆量。这位皇帝的极端谨慎的态度，在整个的巴西生活中都有反映。所以，闹得塔瓦雷斯·巴斯托斯好象是在半沙漠的地方讲话，听者寥寥无几；而毛阿也被剪掉翅膀，活动大受限制。

里奥·布兰科男爵几乎是不反对君主政体的，他后来记叙说，帝国的政治生活，可以概括为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不大明显的权力之争。深刻的思想分歧，曾使摄政时期的上层政界人物明显地分裂成对立的阵营，而在第二王朝那种社会风气里，这些分歧就消失不见了。巴拉那拼凑起来的调和党，已使这些分歧再也无法出现。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安热洛·费拉兹的尖刻批评是恰当的，这种调和，歪曲了议会制度，并且把政治竞争的水平，从国家这一级降低到地方上去了。

自由党的纲领，即使在改革运动之后，也没有1831年激进派的纲领那样大胆，甚至于还被保守党人部分地和毫无偏见地执行了。这个纲领并没有放宽尺度，或者超出那个按照欧洲的方式，尤其

是路易·菲利普的变形方式，去夺取光明磊落的政治胜利的范围。这个纲领几乎没有涉及到经济问题。到帝国结束为止，巴西的政治历史，可以很容易地概括为内阁与议会的一种比较单调的接续。在这个旧政权的最后一些年代里，情况更加混乱。通过一些不那么丢脸的选举来整顿各个政党的反复尝试，都遭到了失败。佩德罗二世无论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都使他自己的特权，陷入被人忽视的状态，这种状态并不意味着民主主义获得了胜利，而有可能改进和加强议会制度。相反，它似乎已经预示了君主制度的终结，这种情况，恰如拿破仑三世帝国在自由主义的改革之后出现的被人忽视状态便预示了它的末日一样。

佩德罗二世王朝，为巴西作出了两项无可比拟的贡献：完善了她的司法制度，并且使国民养成一种普遍尊重法律的风尚。这个王朝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它所造成的痛苦也较少，而如果共和国紧接在摄政时期之后出现的话，便会制造出更多的痛苦。这个王朝忠诚而又正直，但是一诞生就注定了它生命的短促。它的行政机构工作缓慢的情况，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

出国王本人的形象。在半个世纪中，它忙于解决这 31 个国家的表面上的问题，而未能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假如在一个政治和经济业已发展成熟的国家，譬如说目前斯堪的纳维亚的任何一个国家，佩德罗二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优异的挂名统治者。但是，他缺乏必要的伟大组织能力来统治这样一个民族，它新近才获得自治，在一片辽阔的领土上，还不知何所适从，它正处于古今最大的种族融合的过程之中，而且直至今日，从沿海城市到荒芜的内地，它也在展现着人类长期进化的各个阶段。

我们打算从它的黎明直到它的现在，都加以研究的巴西共和国，甚至到了今天，不仅仍然在补救它本身的过失，而且也在补救它那份帝国遗产中的过失，这份遗产包括奴隶制、怯懦、计谋——因而，其中也就包括着对学位价值的过分夸大。

32

第 三 章

共和思想的高涨

共和思想的历史和蛰伏时期——巴西在美洲大陆上的孤立地位——外国的影响——1870年共和宣言——共和运动——巴西和葡萄牙——现代哲学的传播——军事骚乱——奥罗·普雷托——心理上的几种类型——共和国的前奏

十八世纪末期，美国的榜样引起了米纳斯吉拉斯许多密谋者的热切思慕；民主的理想，已经取代了1710年伯南布哥省土著居民权利保护者所主张的那种古代乌托帮式的实行贵族政治的共和国。在欧洲的精神生活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少数巴西上层人物，受到了自由理想的鼓舞，这种理想乃是十八世纪末期的特征，并在法国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拿破仑的梦想宣告结束的

时候，自由主义的思想反应，就同要求实行一种设立政治宪章和权力范围的制度的强烈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了。王权神授的假说，被人民通过立法议会来行使主权的假说取而代之了。

已经扩展到葡萄牙的立宪运动，在巴西传播得更加顺利，因为自(1808年)若奥六世来到以后，这里就成了君主制度的真正中心。这位犹豫不决、处境窘困的国王，过去曾经被迫接受了波尔图①革命洪达②所提出的宪法，过不多久，他又接受了西班牙宪法。最后，他竟逃避了已经承担的义务，而参与了葡萄牙议会所策划的反动阴谋，反对这个老殖民地所赢得的自治权。

一俟若奥返回葡萄牙(1821年4月)，而由佩德罗一世亲王殿下摄政的时候，巴西立即朝着完全独立的方向急速前进。巴西的爱国者很有办法，他们运用巧计，使这位凭冲动办事的亲王发出了

① 波尔图系葡萄牙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

② 洪达为西班牙等国的议会。——译者

33 “伊皮兰加的呼声”①，正式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甚至在这之前，这位亲王就已经召集了国民制宪会议，并于1823年5月3日为大会举行了开幕式。这个急于求成的制宪会议，唯恐失掉它的权力，同时也受到了安德拉达三兄弟那种②激烈情绪的感染。会议所产生的许多意见分歧，激怒了这位专权的年轻皇帝，并惹得他采取了解散议会的突然行动。尽管如此，他仍然亲自颁布了巴西人所热烈期望的宪法，并且对于他们的自由主义倾向，也确实进行过考虑。1824年伯南布哥省的革命，对国王那种据信可以藐视制宪会议的权力提出了一次武装抗议，而从根本上来说，它却再度表明了

① 指“不独立毋宁死”的口号。二十四岁的佩德罗一世以这一口号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这个历史性事件发生在圣保罗附近伊皮兰加小河岸上。佩德罗视察圣多斯后返回该地，当时由里约城来的两位信使携带着他的妻子和若泽·博尼法西奥的信件赶到他那里，把他们刚从葡萄牙宫廷收到的关于新的蛮横要求的消息通知给他。1822年9月7日这一天，是巴西历史上最值得庆祝的日子。——英译者

② 安德拉达三兄弟出生于圣保罗州的圣多斯，他们都上升到巴西政治家的显要地位。人们最怀念的是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他被称为巴西独立的“元老”。——英译者

地方上对于极端的中央集权制是何等深恶痛绝。

1824年的帝国宪法，和当时最完美的政治思想是吻合的，但它也是中央集权制对联邦制所取得的一个胜利。当时，这两种制度的斗争，在巴西和整个拉丁美洲都同样地十分激烈。巴西抛开了北美的榜样所引起的那种共和与联邦制的旧梦，而接受了欧洲式的君主与议会立宪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中央集权制，在整个文明世界里，胜利地成长起来了——而1824年，对人们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理想，也正在于此。

巴西的选民——皇帝御赐宪章的创造者们，热爱法国革命所流传的种传奇式的自由。他们都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信徒，他们确信“自由主义原则”和“人权不可剥夺”是绝对的真理。然而，他们所汲取的灵感，其直接的来源，还在于法国政治家邦雅曼·康斯坦所著的《立宪政策》一书，而这本书本身就是十八世纪哲学的产物。他们从这本书里所汲取的是：由国王来直接行使起节制作用的权力，以及实行拿破仑传统的严密的中央集权行政制度。

因为内阁大臣可以由皇帝自由地任命而不靠

议会来决定，这样，议会制度实际上就是遭到了曲解和误用。1834年的宪法补充条款，扩大了主要通过地方议会实现的各省的自治权，这标志着联邦派所获得的一个胜利。然而，在六年之后，一度身为自由党人的贝尔纳多·德·瓦斯康塞洛斯的反动独裁势力，却把这个条款给取消了。

34 佩德罗一世退位后的摄政时期，是一个思想冲突很激烈的时期。当巴西通过选举摄政，而向民选政府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她实际已经走到了共和国的大门口。1835年法拉波斯革命①，最初是为了保卫地方自治，后来即被引导到主张分裂与建立共和国的方向。但是1840年佩德罗二世的登基，却保证了君主制度的延续，并且标志着共和主义的一个漫长的蛰伏时期开始了。

经过摄政时期的纷扰，经过伯南布哥省1817年和1824年两次短暂的、保护土著居民权利的初期共和运动，以及那次拖得很久的法拉波斯战争之后，随着佩德罗的登基而出现的帝国和平时期，

① 这是一次南里约格朗德省的分裂主义共和叛乱，开始于1835年，持续了十年。法拉波斯一词意为“破布”，用以讽刺叛军缺少军服。——英译者

主要是反映了人民的疲惫，而决不说明他们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有什么信仰或者热情。1848年那次不光彩的"海滨人"叛乱是伯南布哥省反叛精神最后的一次闪现，也是最后一次革命的暴动。①

第二君主国的寿命所以比较长久，基本是因为巴西与西半球的其它地区互相隔绝。她那东临大西洋的漫长边界，使她失去了与邻国的实际联系，只有乌拉圭和阿根廷两国例外，而它们当时又正处于卑劣的"考迪罗"的独裁统治之下。巴西的语言本身，就把她给隔离在西班牙美洲大陆的社会之外了。她在从独立到摄政这一段时间里，对美国所表示的那种明显的热情，已经大大地下降。说句老实话，美国实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头一阶段（约在1840年至1860年之间），就已经使人们从热烈地尊重华盛顿的共和国及其道德观念，一变而为普遍地怀抱成见了。巴西真正受到的外部影响，还是来自欧洲。

随着1862年卡夏斯侯爵（现在总被称为公爵）

① "海滨人"是自由主义分子的绰号，他们的机关报，是在累西腓的海滨大街上的一家商店中印刷的。他们的叛乱是反抗1848年帝国内阁的组织结构。——英译者

内阁的倒台，巴拉那侯爵所开创的怀柔政策就宣告结束了。因为自身不团结而寿命很短的进步党，是由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左翼联盟组成的。对巴拉圭开战的后果，在帝国的议会政治中得到了反映，而且使它增加了混乱。

对巴拉圭的战争开始以后，在文官政府与军人之间，不止一次地突然发生冲突。1868年，当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总司令卡夏斯同扎卡里[35]亚斯内阁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位首相嗣后说，他的内阁“在尊严方面曾经受到某些损伤”）。皇帝被迫向国务会议提出咨询，究竟要在这两者当中牺牲哪一个。这种局势，经过调解，平静了一段时间，不过，扎卡里亚斯内阁的寿命，却已屈指可数了。过不多久，在违反议会制度的一切程序准则的情况下，皇帝直接进行干涉，解除了它的权力，把政府交给了伊塔博赖子爵控制下的保守党人。

自由党的领袖们被皇帝的突然一击所激怒，他们试图组织一个以“不改革就革命”为行动纲领的联盟，来弥合他们旧有的分歧。那些旧的自由主义思想，又在1869年宣言的誓词里被重新综合起来了：选举和司法改革，废除征兵和国民警备队，

解放奴隶。这一期间，一批比较诚实和性急的政界人物，对于那种反反复复而并不可靠的党派和解，已感到厌倦。于是他们便与君主国轮流执政的政策分道扬镳，另外建立了激进党。自由党人要“改革”不要“革命”的纲领，不能够满足这些妥协性较少而更富于理性的激进党人，他们并不打算组成一个新的联盟来反对伊塔博赖的保守党人，或者反对“皇帝的苛政”，而是把他们自己的短命政党，看成是通向共和国的必由之路，他们实际上已经站在共和国的大门旁边了。

从激进主义到共和主义，距离是很短的。它很容易地就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胜利消灭了。这件事在巴西的统治阶级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他们对于法国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总是十分关注的。在拿破仑三世垮台三个月后，1870年12月3日巴西共和国宣言发表了。1870年的共和党人提出的口号是：“中央集权制等于分裂，地方分权制等于统一。”他们以此来反抗自由党人的“不改革就革命”的口号。法国议会制共和国的建立，再一次唤醒了巴西的共和思想，这种思想从摄政时期以来，已经陷于间歇性的沉睡状态之中，但是，

那些幻想新制度的人，却和摄政时期一样，受着联邦共和制的鼓舞。

对巴拉圭的战争结束之后，巴西仔细地检查了她自己的良心和力量。尽管军事上取得了胜利，然而使人感到幻灭和失望的各种因素却益发增强了。巴西开始痛切地意识到，她与整个美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美国经过内战废除了奴隶制，又重新获得了她原有的威望。她的特殊繁荣（据信是她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结果），也再度成为一个永远摆在眼前的范例。1873年的西班牙共和国虽说是短命的，然而它很可能是另一股间接的影响力量，譬如墨西哥人对马克西米利安①的反叛，或许就是受了这个影响。

1870年，一度是自由党员的萨尔达尼亚·马36里尼奥，和新由美国回来而极其倾慕阿根廷共和国的金蒂诺·博卡尤瓦变成了第一个共和主义俱乐部和报纸的创始人。当年发表的宣言，统一了这个新党的目标；它从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集团（其中大部分是属于知识界的）和全国各地吸引了一

① 马克西米利安（1832—1867年），是奥地利大公和墨西哥皇帝，在墨西哥被处决。——译者

些签名者。不久之后，它的一些最著名的签名者，便又恢复了他们先前所持的立场。

1870年的宣言，曾被人们屡次进行过分析，但态度却未必是宽容的。的确，这个宣言缺乏热情，缺乏创造性和感情上的号召力。它冷酷抨击帝国的那些冗长而脱离主题的段落，只不过是把议会和报刊上进行过的批评又重复一遍而已。它的主要论题是政治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当时所实行的代议制政府的错误和缺点。它并没有尽力去认真探讨国家最重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的根源。它避而不谈奴隶制这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而这正是君主政治的本质所在。甚至在美国的痛苦经验之后，1870年的共和主义者仍然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全国热切渴望的联邦制度，才是这个文件的主题。

也许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不允许提出更大胆的想法。宣言的作者把他们自己限制在自由党人的纲领上面，而自由党人比摄政时代的人们还要胆小，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顺应着那种惯常的稳健原则。他们规避“黑人问题”以免使他们的事业受到南方富裕地主们的牵累。但是，他们没能预见

到，那些比较聪明的地主会主动地率先废除奴隶制，而使用外国移民充当雇佣劳工。

然而，在1870年的宣言中却出现了一种新鲜而独特的事物：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美洲意识的曙光。巴西共和主义者在批评帝国时，虽然没有忘记提到拿破仑三世的垮台，然而最叫他们烦恼的，还是君主政治与美洲的共和制社会大相径庭这件事情。引用文件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在美洲而且我们愿意做美洲人。我们的政体，在本质上和在事实上，是既反对遵从道德律又违反了美洲各国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这种政体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它除了在我国境内成为压迫的手段之外，还必然要成为我们与周围的国家发生敌对和战争活动的永久根源。"

宣言最初所引起的骚动一经平息之后，对共和主义事业的热情也就消退了。在宗法制的巴西，各种政治学说不能够长时间地流传，因为它当时还是一个贫穷而未开化的半荒凉的国度，是一个只有主人和奴隶的国度，真正的中产阶级尚未兴起。昨天，甚至今天也是如此，在一切事务中，人们总要用一种实用主义的而且多少有点忧郁的眼光

来看待那些作为权力象征的人物，无论他们是友好的还是不友好的，是宽大为怀还是采取镇压手段。用诉诸感情的办法，恐怕比诉诸理智，还更能够替共和主义事业争取到较多的拥护者。同一时期的废奴运动中，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结果使它所取得的成就，比改变政体的运动要大得多。

如火如荼的废奴运动，已经唤醒了全国人民，只有被权势迷了心窍或不肯正视现实的人，才不相信这个冒冒失失把自己的命运束缚在奴隶劳动之上的政体，将要被这场运动所毁掉。当时，废除奴隶制的宣传，多少有点和共和主义的宣传重叠在一起，对最高统治权的问题仍然心怀不满的天主教教士们需要共和国；受到孔德派哲学强烈影响的年轻军人也需要共和国。

另一方面，传统的君主主义者却袖手旁观。与以金蒂诺·博卡尤瓦为首的那些温顺而谨小慎微的共和主义者相反，席尔瓦·雅尔丁和他率领下的一小帮青年人，在公共的集会上进行了革命的宣传。奥罗·普雷托重建旧政权的基础并为佩德罗二世准备继承人的努力，没有能欺骗当时的有识之士。

这样，共和主义运动，就在废奴运动的遮掩之下，多少有些隐蔽地缓缓向前推进了。奥利维拉·维亚纳于1889年11月在所著《帝国的没落》一书中指出，当时全国存在着七十二家共和主义的报纸和二百七十三个共和主义的俱乐部，他并且对其中的大部分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作了精确的叙述。南方各省（主要是圣保罗）受共和主义宣传的影响，要比北方各省为大。事实上，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领导者们，为了改变政治制度而进行的那种和风细雨、见风使舵的宣传，虽与他们本地区的普遍情况很适合，却并不适合于较为贫困的北方地区。若奥·里贝罗说得对，北方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始终都趋向于极端主义和采取暴力行动。这场猛烈而具有传奇性质的废奴斗争，把北方比南方更加深入地发动起来，并成为北方所唯一关心的事业。

1870年宣言的第一个具体结果，是圣保罗的共和党正式组织起来，制订了规章条例，并于1873年在伊图和圣保罗省的首府召开了大会。在那里，圣保罗的共和党人，因为发现他们再也不能避开38废奴问题，便对别人认为他们持激进态度的一切

猜疑都表示了遗憾。他们不顾路易斯·戈麦斯单独提出的抗议，仍然宣布反对立即废除奴隶制，而主张根据每个省的具体情况和自由劳工的可能发展来决定是否废除。由于他们赞同赔偿损失的原则，所以也就承认了人占有人的制度是合法的。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和坎波斯·萨莱斯——他们二人后来都成了伟大的民族领袖和共和国总统——在议会中再度庄严地申明了这种温和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这个反对王朝的党派，还比不上大多数君主主义的自由党人乃至一些保守党人那样先进，因为这些人已经接受了废奴运动的基本原则，即：占有奴隶是不道德的。包括鲁伊·巴尔博扎在内的自由主义青年政客（即索萨·丹塔斯顾问的朋友们，他们被称为“丹塔斯先生的英国人”），在估计众议院通过解放奴隶法令的倾向时，把共和党的三位议员列为拥护奴隶制的人。

这样一来，共和党首次选举参加君主国议会（1885年）的代表，便不是什么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情了。这些代表终归也不过是一些小心谨慎的保守派罢了。虽然议会中的演说和报纸上的文章起了推动帝国崩溃的作用，但其中很多都是帝国

的党羽（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有）为支持在野党而发表的。譬如，对共和国的建立起了间接推动作用的人中出力最多的，谁也比不过原则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的鲁伊·巴尔博扎，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奥罗·普雷托内阁，并且替建立联邦的想法辩护（联邦制和君主制纵然不是完全势不两立的，但无论如何，它也是一种很难推行的体制）。

坎波斯·萨莱斯后来写道："这个党的目的在于彻底地改变制度，其行动的最大特点是它战斗精神之中的那种谨慎而温和的情调、明显的保守倾向以及毫不松懈的非凡精力与沉着冷静的坚定性，它在勇往直前地朝着它的目标前进时，就用这些来抵抗它的对手。"坎波斯·萨莱斯也象圣保罗的其他共和党人一样，不希望彻底废除奴隶制，而倾向于一种不致打乱国民经济基础的逐步解决的办法。

等到解放奴隶的思想为老共和党人所接受的时候，它几乎已经把皇族、政界人物、军事学院中的年轻人甚至大地主，都给争取过来了。塞阿腊和亚马孙省也站在主张解放这一方面，而在里约热内卢，实证主义者们则要求共和党的议员候选人

明确地承担起支持废除奴隶的责任。

然而，共和党人却能够以严格遵守党纪来弥 39 补这次变节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这在巴西始终是一件罕有的事情。他们的一些最卓越的早期党员叛变了，可是共和党却依然存在着。例如，在1878年，西宁布子爵的自由党内阁，把1870年宣言的签名者拉法耶特·罗德里格斯·佩雷拉拉了过去，让他担任了该内阁的一个职位（司法部）。但是，共和党人却经住了拉法耶特以及其他早期拥护者的背叛。坎波斯·萨莱斯在《原野报》(Gazeta de Campinas)上劝告所有忠诚的共和党员们加强团结，以捍卫他们自己的主义。他后来宣布，只要西宁布内阁答应进行的改革，有助于联邦共和国的胜利实现，他们就将给予支持。而且，共和党人也到处都播下了许多建设性纲领的种子，譬如，1878年的"圣保罗宪法"(属于一个"巴西合众国联邦"的范围之内)，就是其中的一个。共和党开展的运动，在南里约格朗德取得了进展，而且不久就处于实证主义者的影响之下。

在北方，伯南布哥似乎是最活跃的宣传中心。不过，共和思想的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巨大胜利，还

在于它把军事学校的青年人都争取过去了。那些思想尚未定型或者也不愿意对哲学进行探讨的人(军事学校的青年人的思想想必就是这样的)，吸收实证主义理论是非常容易并且也非常危险的；追溯起来，这种理论的传播，也可以说是军界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从而加速了帝国崩溃的主要原因。

巴西的上层人物，即国家的独立以及第一个君主国的创造者，他们的知识基础是在欧洲的自由主义气氛中取得的，可是由于他们就读于葡萄牙的科英科拉大学，他们原来的知识便又受到了软化，因为在那里，人们力图把浪漫主义和传统主义调和起来。他们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前宗主国的气氛。他们对于法国和美国政治运动的印象，虽然转瞬即逝，可是却很鲜明；而他们效法英国议会制的愿望也是真诚的，但对巴西关系最密切、影响最大的典范，仍然是佩德罗四世和他本国的佩德罗一世〔在 1824 年〕分别颁发的两部宪章所规定的葡萄牙式的立宪政治。各种各样的正常联系，彼此相同的思想和文化背景，已经把巴西人和葡萄牙人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了，因此他们对于政治的和

文学的思潮也都有互相类似的反映。佩德罗二世的君主国往往会发现，葡萄牙佩德罗五世和路易斯一世的王朝在许多方面，都和它自己是极其相似的。

葡萄牙的君主主义者，对他们政治制度的缺点和弊病所进行的批评，同巴西的君主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所进行的批评，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他们辩论也好，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也好，沉溺于修辞也好，在里斯本的圣本托和里约热内卢的卡德亚·维利亚作诗也好，所用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只不过按照巴西的韵律学，又加了一些“糖分”(象埃萨·德·克罗斯后来所说的那样)而已。他们表现了一种多情善感的倾向；他们对司法审判用的陈词滥调有着同一爱好；他们有着互相类似的易于逃避现实和脱离实际的毛病，然而也常常被常识迸发出来的作用所矫正；他们的诺言里包含着同样的不真诚；而他们对于那种谋得一官半职和满足个人虚荣的政治态度，也同样地恋恋不舍。

依靠奴隶劳动的、广大而半属荒凉的巴西农村社会，同狭小而区划细密的葡萄牙农村社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们的城市文化却是完全相同的。

巴西帝国的大城市，如里约城、巴伊亚、累西腓以及贝伦等处的生活习惯都和里斯本以及波尔图一样。里约城的狭窄而毫无动人之处的欧维多尔街——满足里约人虚荣心的一种日常展览和集市的游廊——实际上是照着里斯本的西亚多街依样画葫芦。

巴西所设立的院校，特别是累西腓和圣保罗的法律学校，学术活动气氛和科英布拉的学院并没有很大区别。志愿参加学位考试的人，都在罗马法和教会法规方面受到了同样严格的、形式主义的教育。法典和王国法令是他们的主要精神食粮。自然法则的理论，看起来要推翻旧的经院哲学，这种情况，正好象库赞[①] 的折衷主义，看起来要成为哲学上大胆创造的高峰一样。政治家主要是受诸如托克维尔[②] 和邦雅曼·康斯坦等伟大的法国自由主义者的影响。那些最著名的人物，则同意伯克

---

① 库赞（Victor Cousin，1792—1867年），法国哲学家。——译者

② 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译者

和白哲特① 等一些英国保守派政治家的观点。

在巴拉圭战争结束，安特罗·德·肯塔尔与埃萨·德·克罗斯等一代科英布拉人开创葡萄牙文艺复兴的同时，当日盛行于欧洲的唯理论和不可知论，也在巴西迅速地传播开来。介绍这种“新思想”的功劳，应该属于托比亚斯·巴雷托。“累西腓学派”，就他们对达尔文的物种变异学说、斯宾塞的进化论以及海克尔② 的唯物论，所表现的那种富有朝气的热情来说，标志着巴西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文学的浪漫主义，从它那富于印第安人趣味的朴素形式，演变成为维克多·雨果的追随者们所创作的那种壮丽优美的社会诗歌，这一特点，在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天才创作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萨维尼和亚林③ 对法律的解释，恢复了法律学的青春。这样，后期的这些知

① 伯克（Edmund Burk，1729—1797年），英国政治家和演说家。白哲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年），英国社会科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译者

② 海克尔（Ernst Heinrich Haeckel，1834—1919年），德国生物学家。——译者

③ 萨维尼（1779—1861年），法国的法学家。亚林（1818—1892年），法国的法学家。——译者

识分子便把一种新的世界观带到社会生活当中来了。

尽管如此，这种哲学和文学上的影响，也并没41有使得知识分子们必然地接受共和主义的理想。首先接受了这种影响的作家们认为，政体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相比，是处于次要地位的，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议会制的君主政体中，或许更易于得到发展。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若阿金·纳布科和鲁伊·巴尔博扎这样一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对共和国也很不热情；巴尔博扎差不多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持反对共和国。在年轻的军人当中，特别是在本雅明·康斯坦特① 任教的那所里约城的陆军学校，孔德的哲学十分得势，它用那些数学上的论据、基本的伦理体系、不可知论、反神秘主义，以及对于教条主义和纪律的强烈偏爱，大量地向他们进行思想灌输。在非军事学院的那些唯理论者和进化论者看来，最高的理想是自由和平等，但对于实证主义来说，最高的理想却是惩戒

① 巴西军事工程师，后任共和国的陆军部长。不应与前两段所提到的同名法国政论家相混。——英译者

的权力，就上述第一种人而论，自由和平等，在瑞士和美国两个共和国，同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君主国一样，都令人感到安适自在。而另一方面，实证主义的伦理体系，则认为独裁的共和国才是十全十美的国家。

皇帝和他周围的大多数政客，似乎都不理解巴西的一代新人，尤其是年轻的军人当中，在心理上所发生的变化。佩德罗二世和他的参谋本部，始终诚心诚意地反对军国主义；他们认为文官制，对于民主政府来说，乃是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在帝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中，陆军的地位是低下的。海军因为贵族的根基较深，所以取得了优于陆军的地位。陆军把它在佩德罗一世王朝期间那种有点好兴风作浪的传统忘掉之后，已经忍从地居于次要地位，一直到对巴拉圭开战，才使它想起了自己的力量。

流血牺牲，几乎是专由军人阶级来完成的爱国职责。数量很少的自愿部队，是由社会最低阶层招募的新兵，或者是被迫服役的奴隶来补充的。帝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都远离战场，但是他们却随意议论和批评军事行动。内阁和议会里的政客们，

往往毫不犹豫地就把他们狭隘的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战时利益之上。战争期间，替那些在巴拉圭沼泽中为祖国奋战的人的利益肯于挺身进行辩护的所有非军事人员中，要数佩德罗二世最真诚、尽责和热情，这给他的名字和职位增添了光彩。再也没有42另外一个巴西人，象他那样忧国忧民地为战争的结果而焦虑不安。战争结束时，他还不满四十五岁，但已经是一个须发斑白、心力憔悴的老人了。

然而，过不多久，他的人道主义与冷静的和平主义倾向（这在当时的政界上层人物中是非常典型的）便又重新冒了头。在巴西的政客们看来，一支从对外战争中凯旋归来的军队，简直有点象吓人的妖怪；因此，要提高它在国家中的地位，那是不行的。但巴西的政客们并没有让这种态度发展到逻辑的极端；他们没有效法1870年法兰西共和国的榜样，拒绝把竞选公职的权利授予军人。恰好相反，他们设法把卡夏斯、奥索里奥、佩洛塔斯、德奥多罗和弗洛里亚诺等军界大人物，都吸引到党派斗争当中去。高级军官的纪律性以及他们对皇帝的尊敬和感激，保证了他们对既定秩序的忠诚态度。但是，那些资历较浅的年轻军人，却持有一

种不同的态度，他们在乌拉圭长期出征作战期间，与南美其它各国战友们的接触，使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作用，有了一种不同的概念，其中也包括不大值得称赞的地方。把军事研究从中央军校转到一所专门的学院去，这件事也大大地助长了他们的阶级自豪和阶级感情的发展。这样一来，孔德的哲学就在年轻的军人当中，找到了培育独立精神的肥沃土壤，而这种精神同反抗精神一向是紧密相连的。不久，军事工程师又获得了可以列身于“博士”（文职官员的最高社会地位）之间的权利。那些代表他们阶级身分的绿松石戒指，替他们博取到的威望，比红玉、翠玉和青玉戒指给律师、医生和土木工程师带来的威望要大得多。尽管有实证主义那种有些自相矛盾的和平主义影响，陆军的社会地位，却由于对巴拉圭战争的胜利，和大学军事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得到了改善。陆军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它要服从于文官党派利益的情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注意。

皇帝，尤其是他的政府的官员，却缺乏必要的政治判断能力，来预先防止后来发生的所谓军队问题。他们在同伯南布哥和巴拉圭主教发生严重冲

突之后，于1875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很可能使他们过分相信了文官当局的力量。尽管他们对这个事件处理得很笨拙，然而他们却能够泰然自若地获得了胜利的果实。而同一时间，巴西的教士们则在痛苦的沉默中，忍受了他们的耻辱。教皇莱奥十三世，在与世俗政权打交道的时候，一向小心谨慎，因循敷衍，所以他的态度，不会引起教士们做出更积极的反应。

对于陆军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本身43所负职责的性质，就决定了他们要产生一种远比文职人员更为强烈的荣誉感。当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并且能够获得他们整个阶级的直接支持。由于他们的生活，同文职人员的社会有些脱离，而且又专心致力于他们的本职任务，所以他们很容易发生怀疑和猜忌。他们认为文职人员对他们很不理解（这有几分是正确的），而文职人员则觉得军界人员误解了他们。这样一来，就往往引起了误会，而唯有那种开诚布公和大公无私的态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这都是同军界人员打交道时，取得成功的最稳妥办法）才能够加以避免。

废除奴隶制的宣传，渗入到军界之后，立即成为引起冲突的新的推动力量。1884年，自由党首相拉法耶特·罗德里格斯·佩雷拉，向一个陆军训练单位，就他们盛宴款待塞阿腊州的一位主张废奴的木筏业主（Jangadeiro）一事，提出询问的时候，他得到了马杜雷拉中校粗鲁无礼的答复。不久以后上台的科特吉佩保守党内阁，试图抵制废除奴隶的宣传，因为共和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文官和军人都已经被卷入其中了。但是，这种采取反动措施的企图，也只不过又激起了新的反抗运动而已。实证主义者所称颂的军民一致原则，鼓舞了军界人员，最后甚至还影响到许多最高级的军官，其中包括引人注意的佩洛塔斯和德奥多罗。

从此以后，层出不穷的事件，使得军队中的问题更加尖锐起来。临到末了，最受人们尊敬的军事领袖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元帅直接出面干涉，又打进了一个楔子，最后造成了君主国与陆军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政府承认，它的威信已经遭到损害 。军官团对据说要用军队兜捕逃亡的奴隶一事提出了抗议，这是向那个可耻的制度，而且也是间接地向帝国本身，进行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若奥·阿尔弗雷多(科雷亚·德·奥利维拉)的保守党内阁,以为把德奥多罗调离国家的首都,再把他在新成立的军事俱乐部里担任的主席职务免掉,就可能使裂痕弥合起来。不久,这种幻想就被奥罗·普雷托的自由党内阁给消除了。德奥多罗从马托格罗索省归来时,他在同僚们当中获得了更高的声誉,而他对帝国所抱的幻想,则当然是更少了。奥罗·普雷托内阁在议会中所受到的接待(当时,教士议员若奥·曼努埃尔高呼"共和国万岁"!)和本雅明·康斯坦特对智利军舰"科克伦海军上将"号的军官的欢迎词,都表明最后的破裂已在迅速临近。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主张共和的领袖们,同军人结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联盟,为推翻君主政体的阴谋奠定了基础。如果有一位比奥罗·普雷托子爵更圆滑更灵活的政治家,而他对于当前局势的种种无法估量的性质更能够设法顺应,并且更为敏感的话,那么或许还能够使王朝的崩溃延缓于一时。但君主国的最后一位首相,却偏偏是一位最不能指靠他来挽救君主国的人。不妥协的精神和惊人的精力,对于当政者来说,并不一定是一种

美德。社会危机当中的事件瞬息万变，对于它们所造成的新情况，能作出现实主义的估计并与之相适应的素质，往往比那些基本品德更为重要。正如若阿金·纳布科所正确论证过的那样，政治永远不是一条直线。一位身居政府首脑地位的人，只要不让风暴刮倒他船上的桅杆就算尽到了他的首要责任。如果以后又刮起了一阵台风，那么他可以向新船长去发泄他的愤怒。奥罗·普雷托是在巴西最大的一次历史和社会危机——废除奴隶制——达到顶点时，负责掌管巴西帝国的。1888年5月13日的法令改变了巴西的整个经济结构，使得差不多100万奴隶获得了自由，而他们事前并没有为此做好思想准备。这个法令触到了巴西生活基础的最深处。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对法律消极服从的精神都减弱了，而试图采取激烈手段的诱惑力，却不断增长起来。

从废除奴隶制的那一天起，君主政体就变成了一件过时的东西。君主国仅仅靠着它早先的一点残余力量，在凄惨的末日中苟延残喘，这就和若奥六世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他的朝廷（1808年）之后，殖民地的巴西又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的情况

是一样的。佩德罗二世对自己王位的命运漠不关心的病态心理，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或者不如说是事态正趋于结束的一种象征。用一句老话来说，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地产制宗法式经济是它的血肉，而僵硬的官僚中央集权制是它的政治骨架。共和国预示着一种自由和进步的生活。巴西人梦寐以求的是一种较为活泼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梦想一种不那样矫揉造作而更富于勇敢豪放的精神、更能适应他们现实情况的环境。

奥罗·普雷托忠于君主制度的信念，并且相信他自己的镇压力量，他认为他能够粉碎刚刚开始的革命。他实行放宽信贷和增发通货的财政政策，其目的不仅在于满足为工资而工作的自由劳工所引起的对现金的新的追切需要，而且也在于开创一个新时代，其中充满乐观、安适，并有很多抱负不凡的商业和财政计划，用以消除军民之中那种公开和隐蔽的不安状态。若不是成立了共和国，他为了躲避财政上的灾难，恐怕已经被迫向后转了。在政治上，他的策略并没有超出那种旧的虚妄的手段，即取得两院的一致同意和做出勇敢的反应，但不久他就将发现，他在这种反应中是孤立

的，并且注定要成为这种反应的牺牲品。对于共和 45 国的最后胜利来说，当时还需要的，只是德奥多罗1889年11月15日的最重要的决定了。德奥多罗·达·丰塞卡的巨大功绩，即他能够对巴西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他在最恰当的历史时刻，使长达一世纪之久的共和主义愿望变成了现实。他在最后一分钟多么犹豫不决，都是无关重要的，因为这仅仅是他那种慷慨豁达而易于冲动的性格表现得过分谨慎而已。

这样，在总结共和国的直接起源时，我们可以说，有两种巨大的力量同时存在，即：共和主义的直接行动和君主主义者的间接行动，而君主主义者是一大批危险的失败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帝国已经失去了迷惑力，尤其是5月13日以后 。在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共和国效劳而从理论上讲是君主主义者的人们当中，还可以分为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废奴主义者、联邦主义者以及心怀不满与漠不关心的人，例如，因废除奴隶制而受到损害的保守党人。在共和主义者当中，也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流派：1870年的历史性人物，主要是金蒂诺·博卡尤瓦领导下的圣保罗人；席尔瓦·雅尔

丁领导下的热情的年轻人，他们善于在报刊上和在街头进行革命活动；接受了孔德的理论，并且受到本雅明·康斯坦特影响的年轻军人；最后是以德奥多罗为代表的年龄较大的军官，他们走向共和国，并没有明确的理论上的倾向，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团体精神，由于他们在直观上确信巴西历史上的帝国这一页已经永久地翻过去了。

共和国的宣布成立，确实要归功于最后这一批人。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就是使共和国胜利的伟大的中心人物。他那向前冲击的勇气，把巴西从一种不能激发其能动性的腐朽政治制度中解放了出来。然而，11月15日的胜利行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共和国的理想已经为它奠定了基础，而这种理想，虽然在佩德罗二世登基以后，即处于蛰伏状态，但已被那些再度显示了巴西固有的情操和愿望的人给重新唤醒了。临时政府以诚实、爱国和采取权宜措施的特殊才能著称，它的富于建设性的工作，乃是德奥多罗身边的那些人物的荣誉。而这种工作，又大大地弥补了这些人展开活动的时代和环境所容易产生的缺点和错误。

第 四 章

共和国的建立

奥罗·普雷托与帝国最后一任内阁——德奥多罗与阴谋反叛者——弗洛里亚诺·佩绍托——1889年11月15日事件——国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皇室被驱逐出境——临时政府的组成——全国的反应

若奥·阿尔弗雷多保守党内阁，在明令宣布废除奴隶制之后，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被同党之间的倾轧所削弱，又遭到了反对派的顽强抵抗，所以它对于陆军之中普遍存在的一触即发并严重威胁着君主制度的造反精神已经被迫采取了姑息态度。皇帝依照国务会议的劝告，拒绝解散众议院（解散的建议是他的首相按照议会旧有的惯例提出来的），而求助于自由党人。当时公认的最有才能的政治家萨赖瓦拒绝组织新内阁，他并提议由

奥罗·普雷托承担此项任务，奥罗·普雷托也就接受了。

只有五十岁的奥罗·普雷托，尚未获得一位领袖所具备的巨大权威，虽然如此，人们仍然有理由认为他是帝国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他为人富于自尊，奋发有为，有胆识，而且正直。这些优良的道德品质，同他那缺少文采然而清醒的头脑、同他从法学家的经历中取得的真实教养、同他对财政问题的特殊兴趣都融合在一起了。对巴拉圭战争期间，他在扎卡里亚斯内阁中执掌海军部，那时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但从那时起即以一个勤奋的行政官而闻名于世了。

1879年，奥罗·普雷托在西宁布内阁中，接替西尔维拉·马丁斯充任财政大臣。在他的任期内推行过许多新的计划。当时，西尔维拉·马丁斯、小若泽·博尼法西奥、里奥·布兰科子爵以及科特吉佩这样的演说家正在得势，鲁伊·巴尔博扎、若阿金·纳布科正开始崭露头角，而就是在这种时候，他通过在议会里进行的辩论出了名，他主要关心的是给农业发放贷款和使预算平衡。为了达47 到这些目的，就必须征收新税。其中，对火车票和

乘坐电车新征的税，即所谓“分文小税”，激起了群众的抗议运动。这使奥罗·普雷托第一次直接触到在市井上不得人心的局面，而且这也许就是帝国衰落的最初的明确迹象。

奥罗·普雷托是1889年自由党国会的组织者之一。未来的行动纲领就是在这里制定的，但它们并不是什么巨大的进步，而无非表达了关于世俗婚姻、宗教自由、扩大选举基础、改革省的行政机构和国务会议、限制参议员的任期等旧有的自由主义愿望罢了。鲁伊·巴尔博扎率领着一帮持不同意见的人，主张在联邦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增加各省的自治权利。

自由党的国会组成一个月以后，奥罗·普雷托着手组阁，以贯彻该党赢得胜利的纲领。然而，鲁伊·巴尔博扎却拒绝接受任命，因为他未能使奥罗·普雷托改信联邦制的原则，而当时传说佩德罗二世本人是很有可能接受联邦制的。这个内阁的组成人员与历届内阁成员的一般水平不相上下：他们都是一些或多或少精于议会辩论和在议会走廊中玩弄阴谋的律师和政客。然而，奥罗·普雷托也许是为了抚慰军队，竟把陆军和海军大臣 48

的职位交托给两位高级军官，这就违反了几乎从未中断过的由文官担任大臣的传统。

和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所有政治家一样，奥罗·普雷托感到他必须提防君主制度的迅速解体。从他接管政府以前的言论与态度来看，尽管他在原则上并不十分热衷于君主制度，他却相信唯有它才适合于巴西。他认为共和国还不成熟；更为严重的是，他把共和国与本大陆其它地区带有地方性的"考迪罗"主义联系在一起了。他感到在君主国的体制内，有可能满足国民获得更大的自由、安宁和物质进步的要求。完成这项任务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能够明确它本身任务的坚决果断的政府。

他在送交国会的政治纲领中，提出了一些本着"民族的自由良心"已经考虑成熟的意见。在财政经济方面，它要加速开发自然资源，通过银行信贷使农业再度活跃起来，统一整理公债，而且要最后使通货建立在金属货币的基础上。不过，奥罗·普雷托内阁公开声明的主要目标，尤在于抵制共和主义的宣传以消除陆军中的革命骚乱。

因此，从当时那种偏狭的政治哲学能够让它

取得的广泛成果来看，这个政府是进步的，它的工作方法仍然主要是武力镇压的方法。从一开始，奥罗·普雷托想必就感觉到了他必须在真空中行动，因为他的努力注定了要归于失败。那位疲惫不堪、体质虚弱而又意志力衰竭的皇帝，已经和过去判若两人了。军队日益严重的反抗行为，既不能用武力，又不能用说服的办法加以制止。用国民警卫队来对抗陆军——法国的一种惯伎——可能成为最坏的自取失败的办法。

巴西对于君主制度已经失去了幻想，而且对于可能来临的第三王朝也怀有敌对情绪，所以她决不会赞成政府的反动政策。即使好战的君主主义者，也对帝国的提早结束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其中有些表现得很明显的人物，如保守党领袖、参议院议长保利诺·德·索萨，就被人隐隐约约地怀疑为亲共和派。萨赖瓦暗中准备直接归顺共和国，还有一些别的人效法安东尼奥·普拉多的榜样，准备立即承认共和国为既成事实。

反对派对帝国最后一任内阁的不满情绪，从这个内阁于6月11日被介绍给众议院的时候起就日益增长。若奥·曼努埃尔神甫发表的谴责政府、

欢呼共和国的演说，言辞激烈，语含讽刺，而又具有预见性。奥罗·普雷托勇敢地面对着他的反对者，将共和国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与君主制度“使巴西繁荣、自由”的丰功伟绩作了对比。反抗运动，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展开了。

在人民的要求之下，政府与国会被迫于5月13日废除了奴隶制。取得这一胜利以后，全国好象就发现了舆论的力量。共和主义者的宣传方法，从因循拖延一变而为立即采取行动。鲁伊·巴尔博扎虽然不断地反复说明他喜欢君主制度，可是他在《新闻日报》上瞄准奥罗·普雷托政府而发出的炮弹，却猛烈地攻击了君主制度本身。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了解，如何去加剧陆军中的不满情绪，并利用这种情绪来反对政府了。

共和国的最后胜利，就是在军队中进行策划的。关于所谓军事阴谋（也就是多年来议论纷纷的“军队问题”的继续）的编年史，已经写过了若干次。但是，即使有可能把这个问题准确地重新编写出来，它对于一个要在历史当中寻找事实的紧密联系、并说明其涵义的人来说，也毕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为了设法接近军队，以便煽动它们进一步

反对君主制度，共和主义者运用了拉丁美洲革命者的传统经验。

在奥罗·普雷托内阁期间，政府与军队之间 49 每天都发生冲突。当若干个市议会提出召开一次制宪会议的要求，以便决定皇帝逝世后的国家政治制度时，就出现了一些共和主义的新动向。在平时，一些小的带刺激性的事件，如为了公共利益解除塞阿腊军事学校校长的职务、或者逮捕国库警卫队队长，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军队中的各个阶层在思想普遍激动的情况下，却很容易受到影响而去参加共和主义阴谋者所一再进行的活动。

德奥多罗在陆军中所获得的崇高威望，也许竟和卡夏斯或奥索利奥曾经享有过的那种威望相等。他是一个有名望的军人家庭的成员，除此之外，他为人勇敢、豁达、易于冲动，在对巴拉圭的战争中，他有过英勇的光辉经历，而且他表现出来的一切外表上的美德，也完全适合于为他安排的那种历史使命的需要。一种强烈的阶级意识，长期以来就在他的内心里发挥作用，在摧毁着他对当时的政治制度的献身精神。

关于这一点，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前夕，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和弗洛里亚诺·佩绍托，这两位军事领袖的态度，就很可以说明他们性格的特点。德奥多罗退缩不前，这是由于他本人对佩德罗二世非常尊重，他"要对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到了最后关头，三种因素——共和主义者巧妙的策略，德奥多罗的职业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以及他在内心深处认识到帝国的空虚——使他克服了那些仍然存在着的顾虑。尽管他曾经是保守党的一名比较积极的成员，可是这个政权的命运，对于他来说，好象已经是次要的了。弗洛里亚诺曾是一名自由党员，他头脑冷静，深谋远虑，而又口是心非；在他看来，对佩德罗二世的尊敬，或者是可能对首相承担过的义务，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共和主义的观点，与他那种主张权力服从的性情，是大相径庭的。然而，在关键的时刻，当他觉察到动用他的总司令部的军队去抵挡德奥多罗的叛军和当时的局势相抗衡纯属劳而无功或者并非爱国行动的时候，他还是以惯常的冷漠而平静的态度，接受了共和国。

10月中旬，新从南里约格朗德来的梅纳·巴

雷托上尉，向德奥多罗第一次正面提出建议，要他对陆军所受到的侮辱进行“报复”。德奥多罗拒绝了，可是却为向他施加影响的新尝试敞开了大门。不久以后，那个军官在其他一些军官的陪同下，又返回来坚决地提出了他的要求，他论证说，奥罗·普雷托的各种措施，如动员国民警卫队、增加宪兵的数量等，都属于镇压。这位老首领，因为已经更深地陷入了那个共和派军官的阴谋，最后终于屈服了。11月11日他开始与军方和非军方的叛乱者进行个人接触，其中著名的人物有金蒂诺·博卡尤瓦、鲁伊·巴尔博扎、阿里斯蒂德斯·洛博、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代表圣保罗的共和主义者）、本雅明·康斯坦特，以及索隆·里贝罗。第二天，他们就在德奥多罗元帅的领导之下，磋商了有关首届共和政府的组织事宜。剩下来的只有最后一步，那就是推翻皇帝的宝座的军事政变了。 50

就这样，本雅明·康斯坦特和那个顽强的、由共和派青年军官组成的小团体终于成功地消除了德奥多罗最后的疑虑，消除了他对于会见文官叛乱者的那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当他同意让这些人

在他家里集会以策划起义之后，他的态度就无可挽回了。对于有责任感的军人来说，违反纪律，违背他们要保护法律和保护已被公认的政府的誓言，据我们猜想，那一定是和传教士放弃宗教信仰差不多同样痛苦的巨大牺牲。德奥多罗既然已经同意了颠覆运动，那么，他原来打算走多远：是只限于推翻奥罗·普雷托内阁，还是直到摧毁帝国本身为止呢？这个问题已是次要的了。

在佩德罗二世王朝存在的半个世纪中，巴西还没有见到过对它的合法秩序进行挑战的事情。好坏先不论，内阁的更替，其借口都是同意各党派机关报纸当中所表达出来的政见，而皇帝则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决者。由于军事叛乱而被迫撤换政府的首脑，对于这个政权来说，将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军事叛乱发生之后，任何一位官员，不论他是象萨赖瓦那样有手腕，还是象西尔维拉·马丁斯那样激进，都不能发挥足够的权威来治理这个国家。只有依靠一个坚强有力、亲自抓住直接统治权并且建立起一种生死攸关的独裁制度的国王，才能够保住这个王位。很明显，这样一项任务，对于衰老多病的佩德罗二世的温和性情来说，是并不

相合的。

只靠单一的思想感情和单一的计划，就想把所有反对奥罗·普雷托政府的人以及所有对帝国不满的分子都团结在一起，那是不容易的。即使所有非军方的阴谋家都公开主张用暴力来改变政治制度，军队之中也还存在着若干不同的倾向。一大部分陆军的趋势，还无法确切地了解。绝大部分海军，则被认为是效忠于帝国的。而且，德奥多罗元帅不稳定的健康状况，又使整个运动受到了失败的威胁。

由于这一切原因，拟定在11月15日发动的政变，从表面上看来是轻而易举的，但它和所有试图突然改变政治制度的尝试一样，却有一定的冒险和盲目行动的成份。一个令人不安的理由是，弗洛里亚诺·佩绍托的态度有点暧昧，他当时担任陆军的军务局长，乃是合法主义的最高保卫者。他在几天以前的一封著名的信件中，曾经声明，他忠于奥罗·普雷托政府。各省警备队的团结也是令人怀疑的。再拿国民本身来说，他们将如何对待由于军事叛乱而诞生的共和国呢？衰老而受人尊敬的皇帝将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国民将如何去适应

51

新的政治结构？发生内战的一切可能性都能够避免吗？

阴谋造反或许不是很困难的事。完成一次革命，则最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在胜利的时刻，那些真诚的革命者感到苦恼的主要问题，乃是如何建立事物的新秩序。共和主义者（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其组成人员的来历是极不相同的：有长期以来高唱1870年宣言的纯理论家，有最近才开始与帝国断绝关系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受实证主义思想驱使的军人）除了关于联邦的观念之外，并没有制定一个明确的重新建设国家的纲领。11月15日胜利者的主要力量源泉乃是德奥多罗个人的威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赢得军队各阶层的忠顺了。

11月15日黎明，奥罗·普雷托发了一封电报到皮特罗普利斯城，当时皇帝正在那里避暑。电报说，第一、第九骑兵团和第二炮兵营已经叛变，奥罗·普雷托为了"教训他们尊重法律和秩序"，打算进行镇压。这封电报，不是没有交给皇帝本人（或许是被侍从医官给中途扣留了），就是未能使他摆脱那种病态的漠不关心态度。皇帝在上午11点钟收到了奥罗·普雷托发去的第二封电报，报

告说叛军取得了胜利，陆军司令部不战而降，集中在那里的大臣们度过了一个焦灼不安的夜晚。佩德罗陛下接到第二封电报之后，才决定由皇后、御医和其它一些宫廷侍卫官陪同，乘专车返回里约城。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天开始的冒险行动，乃是巴西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这一发展的进程中，君主制度只不过是一段插曲罢了。即使如此，这次冒险行动仍然令人感到极大的震惊，甚至连那些共和主义的领袖们，可能也不例外。他们很难相信他们自己能够这样快地取得胜利。11月15日清晨，结束了游行般的进军之后，他们也和里约城的和平居民一样，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当天的态度，表明了他们茫然不知所措。皇帝畅通无阻地从[52]皮特罗普利斯回到里约城，他在皇宫与顾问们和政治领袖们会面，仍然设想有可能组织一个新的自由党内阁。那些被清晨的事件推到最前线的人们当中，也许并没有一个人确切地了解全部事实，或者看清了它们的直接后果。

关于这一点，人们会想起阿里斯蒂德斯·洛博所做的那种不大公正的（然而却是著名而生动

的)叙述:“全国在迷惘的状态中接受了共和国。”甚至在国家的首都，人民也都以一种惊讶或者冷漠的态度，倾听公告的发表。他们对于帝国的消亡并无强烈的感情，而对新生的政权，也没有流露出欢欣鼓舞的热烈情绪。这种异常漫不经心的态度，当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要归因于巴西民众一贯的冷漠无情。他们太缺乏公民的教养了。不过，这倒也可以用此次谋反的性质来解释，因为它是在军人集会，而且是在“歃血为盟”这样一种只有少数文官得知的秘密情况下进行的。

叛军的领袖们与奥罗·普雷托及其大臣们，在陆军司令部里度过了一个令人焦灼不安的夜晚，在那里，他们之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人们模糊地知道，当海军大臣拉达里奥男爵到兵营去会晤他的同僚时，他发现市中心广场已被叛军包围;而当他遭到逮捕的时候，他向逮捕他的军官开了枪，可是他反倒被那个军官所打伤，另外，军务局长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所率领的军队，人们认为是效忠于政府的，却与叛乱者亲如兄弟了。德奥多罗是正式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还是把奥罗·普雷托的内阁推翻就算完事了呢?在一大

堆互相矛盾的说法面前，要想准确地复述这些事件的全部经过，是不可能的。后来，奥罗·普雷托在向全国发表的一份声明中，亲自做了个清楚的说明，它过去从未引起过争论，而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关于当时情景的真实报道。

奥罗·普雷托虽然事先听到了军事叛乱迫在眉睫的谣言，可是他还是完全信任大部分陆军、特别是弗洛里亚诺·佩绍托的忠诚。而后者，或者是因为他已被卷入革命的阴谋，并且正在惟妙惟肖地扮演着派给他的脚色（这一点看来是很可能的），或者是因为直到最后关头，即君主制度还是共和国的命运可能由他的态度来决定的时候为止，他始终都在犹豫不决，总之，他巧妙地助长了他那位上司的幻想。只是在叛军从圣克里斯托旺毫无阻碍地挺进，并到司令部门前部署好的时候，奥罗·普雷托方才一下子明白了：他那位陆军大臣马拉卡儒子爵为什么支支吾吾，阿尔梅达·巴 53 雷托将军与里奥·阿帕男爵为什么躲躲闪闪，而尤其是明白了弗洛里亚诺·佩绍托的举措行为，原来这个人正在第一次公开展露他那种非凡的伪善才能。勇敢的首相不肯被恐吓所慑服，他命令军

务局长用步兵去制服那些正在面对着兵营的炮兵。奥罗·普雷托与弗洛里亚诺之间的对话，值得抄录如下：

> “但是”我反驳说，“炮兵是可以用步兵来制服的。从这样短的一段距离，在第一发与第二发炮弹的间隙里，步兵完全有时间冲过去攻击他们。”
>
> “这是不可能的！照大炮瞄准的情况来看，任何出击活动，都会遭到榴霰弹的扫射。”
>
> “那么，为什么让他们占据这样的阵地呢？难道当时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吗？但是，不管怎么说，除非用事实证明，我就不相信什么不可能。在巴拉圭，我们的士兵，在比这里更为恶劣的情况下，还是把大炮掳获过来了。”
>
> “是的，”弗洛里亚诺先生回答说，“不过，我们在那里是对付敌人，而在这里，我们都是巴西人。”
>
> 如果我还抱有任何幻想的话，听了这句话，它们也都烟消云散了。

奥罗·普雷托企图重新组织抵抗，但是司令部的将军们却都表示无能为力。他失败了，他在致

皇帝的紧急电报中报告了事实真象，他辞去了政府的首脑职务，并等待着这出戏的最后一幕。总司令部的大门打开了，德奥多罗以胜利者的姿态骑着马走了进去。几分钟以后，他由一大群卫队跟随着，走进大臣们被聚拢到一起的那个房间里。他经过陆军大臣身旁的时候，说了句讽刺的话，跟他打了一下招呼。奥罗·普雷托对这最后一场，描述如下：

> 在极其深沉的寂静之中，他通知我，为了向政府对陆军所施加的极端严重的侮辱进行报复，他已经自行担任了陆军的首脑。他宣布只有陆军才能为国牺牲，但是陆军却遭到了政客们的虐待，这些政客直到当时为止，一直统治着国家，而同时只为他们自己谋求私利。尽管他的健康情况不佳，他却不能拒绝领导他的战友，因为除了敬畏上帝之外，他这个人在任何事情面前都是毫不退缩的。他提到他在战场上的功绩，他回忆说，有一次他在一片沼泽里，曾为祖国奋战了三天三夜，那种艰苦的情景是我无法想象的。他宣布我的内阁被推翻了，他要根据向皇帝提出的方针，另外组织一个内阁。他说所有在场的大臣们都可以离开，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

去，只有我（“极端顽固的人，也不象我那样顽固。”——他曾用这样的话表白过自己）和司法大臣除外，我们两个人都要被扣押，直到日后放逐到欧洲为止。“至于皇帝，”他最后说，“我是忠于他的，我是他的朋友，我感谢他赐予我的恩典。他的权利将会受到尊重和保障。”

54

我静静地、毫无表情地听着他的话，我回答说：“一个人并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才能为国效劳，而且为她作出牺牲。就是在此时此地听你讲话，也并不亚于在一片沼泽中度过几天几夜。我将注意你对我所作出的决定。你是胜利者，你可以任意处置。我只好向暴力屈服。”

由于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亲自出面干涉，德奥多罗才撤销了对奥罗·普雷托和司法大臣所实行的逮捕。不过，他们结果还是被重新逮捕了，而且先前曾经扬言要进行的放逐，也在1889年12月21日付诸实施。在德奥多罗那次著名的谴责，和奥罗·普雷托庄严的答辩之后，巴西的君主制度就变成了历史的陈迹。这位军事领袖间接提到的有关佩德罗二世的话，只不过是对这位老皇上最后一次表示的尊重。德奥多罗因为已经深深卷入到

时局不可抗拒的压力之下，所以他当时即使想要倒退，也是不可能了。他的犹豫不决，甚至于他的一些文职和军队同僚所可能存在的忧虑，也不再能够阻止共和主义的胜利。

皇室的命运仍然有待于决定。皇室的成员普遍感到惊恐不安，国务会议的成员也是如此，他们被召集在一起，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设法拯救君主制度。把政府所在地迁往皮特罗普利斯等等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建议，仓卒地提出来又仓卒地被放弃了。奥罗·普雷托建议，推选与德奥多罗有私仇的西尔维拉·马丁斯组成新内阁，这件事再度表明了他对于国家的局势是多么无知。皇帝暂时放下了他那种离奇的漠不关心态度(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局势已经处于回天乏术的境地)，只用三言两语就驳回了一个让德奥多罗这个犯上作乱的军人担任陆军大臣的组阁建议。关于在萨赖瓦领导之下组织内阁的企图也失败了，因为它不会得到德奥多罗的承认。这位军事领袖说，时间已经太晚；君主国已经无法挽救。对于一切事物、尤其对于他的君权感到厌倦的皇帝，于是就从当天的艰苦局面中告退了。

第二天，德奥多罗元帅给皇帝送去一封信，通知说已经决定放逐他。同时，一面保证继续发给他生活费，一面向这位皇帝提出，派一艘巴西船只送他到国外去，而且“为了让这位已被废黜的君王和他的家族能够体面地维持其身分和生计”，还发给他5,000千度的额外津贴。洛雷托男爵代表皇帝给德奥多罗写了一封回信。据说皇帝当时讲了一句话：“这是我获得自由的特许状。”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他的思想状态。

55 德奥多罗致佩德罗二世的函件，以及后者“屈服于环境的势力”而写的回信，是两份著名的文献，它们给共和国的开端添上了一种礼让和公正的气氛，这在任何国家的政治历史中都是罕见的。但是，巴西人不久就在经久不息的革命威胁之下，被内乱弄得四分五裂，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气氛，却好象是关于远古时代的一个朦朦胧胧的梦境一样。

这位老皇帝，对于叫他在深夜上船的命令，提出了软弱无力的抗议，他说：“我又不是一个逃跑的黑人，非得要在这个时候上船不可”。接着，他就和他那个系统里的其它许多人(如查理十世以

及法国的路易·菲利普)所采取的做法一样，安然地听凭他自己的命运摆布了。他永远地离开他曾经热爱过的巴西，开始了体面的流放生活。美洲最后一个君主政权存在的可能性，也随着他一起消失了。他拒不接受5,000千度(德奥多罗关于供给他这笔款项的通知，是在他离开的那天晚上交给他的，他在航海途中显然看过这份通知)，这是他对共和国最后表示的一个姿态。对他来说，共和国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这种感受或许比其它任何一个君主主义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在一连串的事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出自模仿或出自类似的心理状态，而令人想起同一时代法国历史的生动情景。1870年9月4日，甚至在巴黎已经得到色当①的噩耗和拿破仑三世被囚禁的消息以后，共和主义者仍然不敢全力支持共和国。就连那个以甘必大②为首的极左集团，也只局

① 色当(Sedan)：法国东北部一个小城，在普法战争期间，法国军队(于1870年)在此地向普鲁士军队投降。——译者

② 甘必大(Gambetta)(1838—1922年)，法国共和主义政治家，他反对拿破仑三世，于1870年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译者

限于宣布波旁王朝的覆灭，而建议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姑息和妥协的倾向，往往由那些卷入共和主义事业最深的人显示出来。由于惧怕街头的骚乱，惧怕人民群众的压力（他们与其说是反对第二帝国，毋宁说是恼怒军事上的失败），甘必大和朱尔·法夫尔才被迫按照革命的传统，在市政厅里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

与此相似，11月15日下午，一群巴西的共和派、青年文职官员、新闻记者和居于大多数的文人学者，极力劝说民众到市政大厅集合，去听共和国成立的正式公告。同样与法国的情况相似，巴西的军事领袖与参加当天胜利起义的文职官员，也做出了决定：只有在决议被市政会表决通过之后，他们才赞成正式宣告共和国的成立。拿本雅明·康斯坦特本人来说，没有人能够怀疑他对共和主义的忠诚，可是他也象朱尔·法夫尔一样，对聚集在德奥多罗住宅前面倾听市政会表决情况的市民们所提出的问题，回答得吞吞吐吐。他只能说业已56组织起来的是一个临时政府，以后还要召集一次制宪会议，来明确地决定最好的、永久性的政体。半个世纪以来，效忠于佩德罗二世王朝的习惯势

力，足以使最热情的共和主义者也把他们的革命的暴烈行为缓和下来。

同一天晚上，在本雅明·康斯坦特的住所里，批准了共和国首届内阁的人选。第二天，公布了新政府的宣言和关于组织新政治体制的第一号法令。这两个文件都同样表现出调和和保守的精神。新政府的宣言，宣布废黜了帝国的王朝，从而，代议制君主政体也就消灭了。新政府名副其实是临时性的。它的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的完整，维护公共秩序，保证司法、行政机构行使正常的职能，履行在国内外所承担的义务，保护公务人员的既得权益等等。虽然国务委员会和终身任职的参议员所组成的参议院撤销了，但众议院却只是解散。第一道法令宣布说“兹临时宣布并规定，巴西国家政体为联邦共和国。”旧帝国——“巴西帝国”，被正式改名为“巴西合众国”，这种抉择，清楚地表明了北美洲的强大示范作用。临时政府在市政厅举行的庄严的宣誓仪式，是建立共和国的最后一个正式步骤。

全体国民保持着一种表示同情而又寄予期望的状态。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对于夸夸其谈、照常

规办事的议会制度已经感到厌倦了，因而在等待着某种比较紧张、比较轰轰烈烈的新事物。到处都十分平静。首都和其它一些大城市的生活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甘蔗和咖啡种植园，是巴西帝国巨大的有机力量集中的地方，可它们的封建主人对于推翻那个曾经解放了他们的奴隶，从而损害了他们经济利益的政权，差不多是一致地在暗中感到高兴。大部分人表示支持新政权。警备队的小规模叛乱，很容易地就被镇压下去了。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

法国记者马克斯·勒克莱尔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一个月以后，来到里约热内卢，企图寻访“传闻中的某些带有悲剧性的事件”，但是他却枉费心机了。在这个和平、巨大、风景如画、富于乡土气息的城市里，根本看不见新时代的表面迹象，而只有狭窄的街道、色彩鲜艳的门面、在大热天身穿礼服头戴礼帽而沉着自若的男人、穿着闷人的绸衣和紧身围腰的妇女、花花公子、无业游民、乞丐、行情57报告员、肮脏的饮食摊、古老的双轮马车以及小型的骡车。里约城的市民们，以一个民族由于工作习惯而纪律松弛的那种满不在乎的心情，从事着日

常的安闲工作，他们并不关心帝国的不幸，只要皇帝得到适当的待遇就好，而对于共和国的诺言，却也抱着模模糊糊的信任态度。

58

第 五 章

临 时 政 府

(1889—1891年)

年轻的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组成——美国和阿根廷的典范作用——实证主义者的挫折——对外政策——教会与共和国——鲁伊·巴尔博扎的财政改革——“恩西利亚门托”时期

最初,人们很自然地感到忧虑不安,几天过去以后,共和国不但使巴西人民,而且也使那些密切注视巴西事态发展的国家,都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其中有些国家,主要是一些美洲国家,与临时政府建立了关系。巴西正在采用极其温和的革命手段,从君主国过渡到共和国,并极力遵守她不得已放逐的下台王朝应尽的义务。

新政府和帝国算清了旧账,它自己的动乱的历程也就开始了。德奥多罗·达·丰塞卡让共和

派一些优秀的领导人物在他的首届内阁中任职，使得这个新国家有了一个兴旺可喜的开端。这些人都衷心地希望有所成就，但是他们却没有管理国家行政机构的经验。他们都是该世纪临近结束时，风靡一时的自由民主派，有点近乎政治空想家。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尤以鲁伊·巴尔博扎为最，懂得的是北美独立的先驱们所构想的、那种总统制联邦共和国的理论上的结构。金蒂诺·博卡尤瓦十分熟悉阿根廷，也曾在南北战争期间访问过美国。除了他以外，别人对于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共和制度的实际情况，都很生疏。他们对于那些已经十分习惯于强大的君主集权制，而又比较散漫的巴西群众，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种种决策，在经济上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共和国已经从空想变成现实。如何使它生存下去，如何把巴西从一个中央集权的、议会制君主政体转变成为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这就是临时 59 政府所面临的巨大任务。该政府由一位勇敢而豪爽的军人主持；他习惯于军事纪律，却又和协助他的那些有才智、诚挚而富于理想的人们一样，缺乏政治手腕和行政经验。然而，在我们分析首届共和

国政府的工作之前，还是先把组成这个政府的人物考察一下为妥。

在一些象巴西这样的国家里，公民的思想意识极不巩固，统治者品德的善恶优劣，在公务生活的格调和风尚当中，都有深刻的反映，而且也常常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因为在政治上不成熟，所以对那些作为国家化身的人物很容易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当着对于自己所处的受监护的地位感到厌倦的时候，他们便过甚其辞地表示反抗，而且往往是很激烈的。正如佩德罗二世时代，巴西人喜欢回忆他的性格和教育等细节一样，共和国时代，巴西人每隔四年，也会以或多或少的精确性，夸大他们那些总统们的道德形象，所根据的是想当然的事实，或者是经过总统的好友和僚属们所歪曲的，这些人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反正是阻止了总统，使他不能和平民百姓的思想感情发生接触。

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元帅的心理状态似属于那种最不复杂的类型，他易于冲动，勇敢而豁达，专爱采取暴烈的行动和做出偏激的反应。他因为是受感情而不是受理智支配，所以非常敏感，而

且天生的坦率。他出身于一个可能是巴西最著名的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军人，他弟兄七人也都是军人，其中三人死在巴拉圭的战场上。

德奥多罗生于1827年〔在北方的小州——阿拉戈斯州〕，二十岁跨进了陆军军官的行列。1848年他在镇压伯南布哥州“海滨人”叛乱的政府军队中服役，他参加过对乌拉圭和巴拉圭的多次战役，由于勇敢善战，而从上尉被提升为上校。共和国成立时，他和他的哥哥一样，是位陆军元帅，这在他毕生的经历中，已临近最后一步了。他的长兄过去已经取得了陆军元帅的军衔。因此，德奥多罗的家庭环境，乃是一种讲求军事纪律和效忠君主制度的环境。他那热情的外向性格，和他对本阶级极端忠诚，使得他在战友们的心目中，几乎成了一座偶像。所有的文职和军队中的阴谋叛乱者都承认，没有德奥多罗崇高的威望，11月15日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或者说，至少也要困难得多。

鲁伊·巴尔博扎在德奥多罗的首届内阁中，不久就获得了非常显要的地位。他的同事，后来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临时政府的避雷针。根据鲁伊·巴尔博扎本人多次的自述，他只是在11月15

60

日的前几天，才加入共和派。就他的性格、他的教养、乃至他的父系传统而论，他是一个古典的、十九世纪类型的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的思想并不特别投合他的口味；他也象他那个时代大部分头脑清醒的人一样，认为君主议会制是缺点最少的一种政治制度。在巴西帝国的最后阶段，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适于充当那些典型的代议制民主理论家的代表了。在他看来，英国的制度是现代人类政治天才的最巧妙的创造。

巴尔博扎不过四十岁的年纪，而他的学识却极为渊博；他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促使他向所有的思想领域探索，并博览了一切学科的书籍。他惊人的记忆力，积累了大量事实、概念以及各种回忆。他比较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善于深思熟虑，他主要是一个长于批评、雄辩有术的思想家，因而能够不费气力地运用诡辩。他缺乏对各种概念和哲学见解的鉴赏能力，这是他的天性使然，或者是他那严酷的斗争经历所造成的结果。除了法学领域之外，他很少能够综合事实，作出一种有创见的解释。

他早年苦心搜集的文化知识，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古典学者。他对拉丁文以及古代葡萄牙文

学的渊博知识，永久地确定了他的演说风格。他的声韵和谐的散文，冗长而有些单调（与西塞罗[①]的散文非常相象，他肯定是喜欢模仿这个人的；同时也和某些古代卢西塔里亚[②]人的作品很相近），用古典的范例来衡量，在技巧上是完美的。他这个人态度冷淡、严肃而且傲慢，所以他不善于使用讽刺，而且他的讥讽，主要是采取攻势的一种手法，而并不刻毒。在他的天性中似乎很难找到温情、风雅、轻松而灵巧的气味。他不仅是古典学者，而且还是律师和法学家，后来又成了爱好英美政治生活（从青年时代起他就醉心于英美的文化）的政治家。在共和国诞生的时候，别的巴西人，可能都不象他那样通晓北美的制度。他的亲英主义使人们想起基佐[③]，而他所自夸的"无所不通"，有时又使人想到梯也尔。[④] 尽管他的文学才华比梯也尔要

---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罗马的演说家、政治家。——译者

② 卢西塔里亚，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包括伊比利亚半岛西部（即现西班牙西部与葡萄牙东部）。——译者

③ 基佐（1787—1874年），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治家。他奉行顽固的保守政策，促成了1848年的革命。——译者

④ 梯也尔（1799—1877年），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治家，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译者

高明得多，然而他对于人和公共事务的直观的了解，比起1870年那位精力充沛的老机会主义者来，却更加不可靠了。

在共和国的工作中，鲁伊·巴尔博扎随机应变，进行得十分顺利。由于他的才识卓越、思想崇高以及敢作敢为等特点时常脱颖而出，他不久就得到德奥多罗元帅（他首先是通过金蒂诺·博卡尤瓦与巴尔博扎接近的）和他那些部长同事们的重视。由于他没有行政经验，因而也就没有通过亲身经历对巴西取得真正的了解，所以他便把从书本上学到的诸如美国的联邦总统制以及该国和欧洲在财政上的实验等等，改头换面，搬到实际行动中去（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但是，在他的想法以及他为政府所拟定的计划，由于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发生变化的全部过程中，人们却无法对他的诚意表示怀疑。当他遭到人们的峻拒和违抗的时候，他总是坚强有力而光明磊落地予以回击。他渴望公民自由的热情，常常激励他采取极端勇敢的立场。

在共和国首届内阁中，仅次于鲁伊·巴尔博扎而最负盛名的，还有另外三个性格完全不相同的人，他们是：金蒂诺·博卡尤瓦，坎波斯·萨莱

斯(后来当了总统)，以及本雅明·康斯坦特。

金蒂诺以长期坚信共和主义的经历，进入了内阁。他既没有非凡的才智和文化素养，又没有他的鼎鼎大名的同事鲁伊那样的热情，可是他在新闻记者的职业当中培养出来的清醒头脑，却能够很快地使他把握住一切事务。他为人风趣，文雅，不自私，天性喜欢顺应潮流。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还有点耽于空想，在临时政府的成员里，看起来好象他最易于相处。他那高尚的情操是完美无缺的，因而他的态度始终忠诚。当他提议与阿根廷签订的条约遭到人们抨击的时候，他面对着热情澎湃的街头游行示威，态度仍然保持十分镇定。

坎波斯·萨莱斯有着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所具有的那种敏锐、灵活的头脑；他在临时政府中不久就显露出是一位最有政治眼光，而且是仅次于鲁伊的一位最有才智的人。尽管有他后来在制宪会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的联邦主义的极端倾向，和他那顽固的教条主义，然而他对于国家行政问题的了解，比起他的同事来，仍然要切实得多。

本雅明·康斯坦特是一位完美的理论家。他

头脑清醒并有推理的才能，然而他在本质上却易于激动，或者说富于感情，他是个十分忠诚信实的人，其灵魂的纯洁，在许多场合都闪耀出光辉。他的童年既寒微而又不幸，虽然他勤勉刻苦地自学，但是他成年的最初时期，却并不引人注目。他开始是一名私人教师，曾多次设法进入官方任命的教师行列，未能如愿。最后，他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读完了工兵学的课程，在巴拉圭的战场上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年。

康斯坦特偏爱数学科目的倾向，使得他（大约在1857年）踌躇不决地与实证主义有了最初的接触，当时，实证主义正在一般的非军事学院和军事学院里开始模模糊糊地为人们所理解。但是，他始终未能在米格尔·德·莱莫斯和特谢拉·门德斯的正统学派之中受到训练。总之，他不过是一个同情者，因而在共和主义的组织当中，并不能代表纯粹的实证主义的思想体系。

康斯坦特在军事学院任教时，对于以后成为共和主义事业热心策划者的某些未来的军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诚挚、善良和说服别人的能力，一定是他争取胜利的最有效的武器。皇帝非常

器重他(有一段时间,他给皇帝的孙子们作过私人教师),一些最有权势的军事领袖也尊敬他。在临时政府当中,他是首任陆军部长。

海军部长爱德华多·万登科尔克,很受他的同事们的尊重,但是他既没有鲁伊·巴尔博扎和金蒂诺·博卡尤瓦那样的名望,也没有本雅明·康斯坦特对共和事业所作出的那种贡献。农业部长德梅特里奥·里贝罗也同样如此。他是南里约格朗德的共和主义者的一位代表,而且也是实证主义运动的一位真正的热情解说者。

内政部长阿里斯蒂德斯·洛博,在共和运动期间已经声誉卓著。他是一位律师兼新闻记者,并以诚挚的信念和急进的倾向而闻名于世。然而,正如邓谢·德·阿布兰谢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特点并未妨碍他在政府各部会内部发生争执时,由他多次出面斡旋商讨与和解。

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就是同这样一些正直、忠诚、热切盼望有所成就,而出身又各不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对各项事物的理解,便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人们在一起,举行了共和国政府的就职典礼。

各部都互相独立地进行工作，而德奥多罗呢，尽管他个人有极崇高的威望，但却缺乏必要的政治头脑和对各项行政问题的直接了解，以规划并实施有系统的政治纲领。因此，不久他就同意解除他个人独自承担公务的责任，而由部长会议共同分担，这在某种意义上，又返回到君主立宪制的作法了。但是，好坏先莫论，这种共和政体的内阁，并不是象帝国的各届内阁那样从议会的多数派中来取得它的权力。总而言之，独裁者的意志是由那些部长们、亦即他的助手与心腹亲信来代表的，而他的权力的合法性，也仅仅建立在共和主义革命成功的基础之上。

63 鉴于这种情况，临时政府主要在鲁伊·巴尔博扎指导之下，为建立司法制度所取得的进展，就确实是很显著的了。共和国没有进行多少工作来影响巴西的社会结构。这个共和国的确十分保守，而且坚持主张尊重旧政权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也尊重在旧政权统治下个人所取得的一切权利。但是，政体改变的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与公众有关的措施，首先是把一元化的国家变成了联邦制的国家，而且社会结构，在帝国尚未终结的十八个月

以前，就已经感受到废除奴隶制所引起的经济动乱的影响了。

新政权的头一个月，在熟悉事实情况的过程中，十分平静地度过去了。11月15日清晨，共和主义胜利的消息，已经通过电报，迅速地传遍了巴西全国。法院和政府的其它机构公开地承认了共和国，各省的省长都没有企图抵抗，而是将统治权交给了自行前来接收的共和主义者，或者交给了联邦武装部队的司令官。帝国时期的关键性人物，根据其中某一个人所举行的民意测验，大多数都投票反对任何进行复辟的企图。他们有许多人愿意与共和国合作。在当时，避免无政府状态，乃是一切人，甚至是那些失败者所关心的问题。新的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等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在此期间，那些担负新的职责而又没有经验的人们，也都乐于接受来自里约城的建议。德奥多罗独裁的权威代替了佩德罗二世；鲁伊·巴尔博扎这位新财政部长取代了奥罗·普雷托，并且与他一模一样地作着要使国家繁荣的美梦。

帝国的少数旧政客，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新政权。那些没有明确地依附新政权的人，保持了一种

谨慎的态度。而那些更务实际的人，则很精明地利用他们从前在帝国时代因占据政党与行政的高级地位而取得的信任，变成了商人、企业家、银行行长、以及公用事业特许权的持有者等等。共和国由于把君主国的一大部分代表人物，都同它的物质利益结合到一起了，所以便不知不觉地效法了路易·菲利普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榜样，使他们改变宗旨，归顺新的秩序，或者使他们不致为害。

然而，这种平静的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据说，某些陆军和海军司令部里，有君主主义者在幕后煽动骚乱。于是德奥多罗元帅的政府，也和所有那些在保卫自由、消除威胁的革命斗争中诞生的64政府一样，毫不迟疑地走向极端而进行了反击。12月21日，奥罗·普雷托子爵、他的一个兄弟和西尔维拉·马丁斯遭到流放。两天以后，由陆军部长任命的军事委员会，对那些反对共和国及其政府的阴谋叛乱者，提起公诉并进行了审问。那位强有力的警察署长桑巴约·费拉兹，消灭了由君主国的政客们所雇佣和保护的一帮帮声名狼藉的职业暴徒，这帮家伙威胁了国家的首都，并给它带来了耻辱。由于用武力巩固了地位，临时政府才得以实行

它那巨大的组织工作。

在美国的内战中，南部同盟的失败，除维护了全国的统一之外，也标志着中央政府已开始反对旧殖民地时代行之过分的自治，反对费城制宪会议所创立的那种脆弱的政治统一联系。巴西在1889年11月15日革命胜利以后，企图走相反的道路，即从中央向外分散，或者说从旧的朝廷向外边的各个新省分散。按照巴西的实际情况，各省由于地理和历史上形成的条件，彼此互相隔绝，因而她始终都很自然地倾向于保持地方主义的精神。可是巴西缺乏美国那种有可能实行民主和个人主义发展的自治习惯。对于巴西人来说，政府过去代表了、现在仍然代表着一种全知全能的天命，越过它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将是冒险。那么，由谁来提供象佩德罗二世王朝那样的旧家长式的监护呢？谁来接替他担任最高的裁决者呢？

阿根廷共和国是另一个范例，它给巴西共和国的组织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确，巴西人与阿根廷人之间在精神上的距离，似乎比巴西人与北美人之间的距离要小得多。巴西与阿根廷的种

族来源是相同的，他们信奉同一宗教，具有同样的风俗习惯，因而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刺激，也发生了同样的反应。然而（且不提巴西与阿根廷社会的高级阶层之间，也就是说，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心理差异）千百种其它的因素，主要是经济上的因素，却使得拉丁美洲这两个最大的国家分道扬镳了。

由于已经实现了拉普拉塔河口以北地区归葡萄牙人统治的旧梦，并由于长期以来就忘掉了若奥六世的妻子卡洛塔·若阿金娜那种永无止境的野心，所以巴西已经心满意足地闭居在自己辽阔国土的历史疆界之内，靠语言的统一来巩固其团结。另一方面，阿根廷却从来也没有放弃重新建立拉普拉塔河副王辖区的美梦。

阿根廷早期的社会结构比巴西民主得多。那里没有神话般的巨大矿产，所以也就没有那种容易弄到手的财富去吸引西班牙的贵族，让他们带着他们的观念、美德和恶德到拉普拉塔地区来——这种情况，举例来说，就恰好与秘鲁所发生的情况相反，那个地方，后来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变成了保皇派的反动中心。

阿根廷最初的移民，出身都很寒微，他们仅能以粗笨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温暖的气候，尤其是主要富源——畜牧业的性质，决定了没有引进大量非洲奴隶的必要。在阿根廷出生的西班牙人后裔——克里奥尔人是最有势力的阶级，在独立时期，从他们当中兴起了庄园主，在考迪罗统治的年代里，又兴起了高卓人。

在阿根廷，为结束联邦派与集权派长期斗争而进行的宪政改革，是在米特雷总统任期内(1862—1868年)、对巴拉圭作战的前夕，打下了基础，而于1880年开始进行的，当时国家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它所属的省份里被划分出来，并加入了联邦。由米特雷所造成的全国高度统一的局面，使他的继任者萨米恩托(1868—1874年)赢得了十分显著的政绩。

欧洲移民出人意外的大量流入（在1881—1890年之间大约有70万人在阿根廷定居下来），加上通过消灭或者说平定印第安人，实现对蛮荒地带的征服、铁路的迅速修建（在同一个十年中，铁路从2,516公里增加到9,423公里）以及人口与里约城相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的发展，不仅改变

了阿根廷的种族的成分①，而且也改变了国家的经济基础。

那时候，阿根廷的农业大有超过畜牧业的势头，即使在采用肉类冷藏设备之后，情况也还是如此。华雷斯·塞尔曼的阿根廷政府，对国家的繁荣估计不足，大胆地实行了一次通货膨胀的政策，结果造成了1890年那场可怕的金融灾难，财政赤字平均达到国库岁入的一半，公共债务增加，贸易的亏损达到9,000万比索。

66 然而，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具体差异也好，或者华雷斯·塞尔曼通货膨胀政策的结局也好，却都不能使巴西的共和主义者，对他们自已的新政治制度的神奇力量，降低信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分享了他们的热烈情绪，为了祝贺新共和国的成立，在那里宣布休假一天，以便为即将缔结的米西奥内斯条约，准备良好的气氛。

共和国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变得比中央集权

① 1890年的人口，是由200万欧洲人和本地白人，以及150万印欧混血种人组成。而1810年则为9,000欧洲人和本地白人，42万印欧混血种人，21万印第安人和2万黑人。——原著者

的君主国的首都里约热内卢，更有吸引力了。临时政府关于各项事业所采取的大胆、然而往往考虑不当的政策，很投合前代王朝那些贪得无厌、追求财富与地位的人们的口味，这些人的野心，在奥罗·普雷托执政期间，就已经被煽动起来了。连帝国的封建贵族，也为里约城那种富于刺激性的生活所吸引而离开了他们的古老庄园。他们希望通过该城的市场投机来补偿废除奴隶制所造成的损失。这座管理不善的城市，街衢狭窄，步道简陋，除了到处都是音乐厅和小剧院之外，没有公园或者其它公共娱乐场所。城里，投机发财的气氛，引起了漫无节制的奢侈浪费。

在那种被自己的语言迷住了心窍的、典型的革命煽动当中，很自然地流露了要把新近的往事，从记忆里勾销的愿望。一些属于过去的有形表征，都被消除了；在官场的寒暄语中，采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陈旧的、翻译得很蹩脚的词语，诸如"公民"以及"健康与友爱"之类。曾经劝告佩德罗二世主动废除议会制而代之以"直接由人民支持的共和独裁制"的那些正统的实证主义者推想，把他们的理想强加给新政府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因此，11月17日，以本雅明·康斯坦特为首的一些实证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就已经加入一个团体，宣布他们对共和国的忠顺，他们打着一面旗帜，上边第一次出现了“秩序与进步”这个奇怪的题词；新政权后来采纳了它，并把它题写在国旗上。几天以后，同一个团体，又提出了一些关于“最适合于共和国的政治组织”的紧急建议。简单说起来，这些建议包括永久保持共和主义的独裁制；将行政、立法、司法权力交给一个独裁者，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继任人；废除议会制度，废除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废除特殊权利；由公民投票决定宪法修正案；保持一个单一议院来单独控制预算；政教分离；规定宗教自由等等。由于本雅明·康斯坦特和德梅特里奥·里贝罗这两位热心支持者在临时政府里边，所以实证主义者们相信，他们的建议是可能被采纳的了。

67 但是，这两个人却使他们失望了。第一个人胆怯而感情用事，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正统的信徒；他的诚挚的自由主义倾向，很容易使他放弃为独裁制所作的辩解。另一方面，德梅特里奥·里贝罗既没有本雅明·康斯坦特那种对革命做过贡献的经

历，又没有他那种个人的威望，而生来就是一个勇敢好斗的人。但是，他缺乏必要的权威来左右已被鲁伊·巴尔博扎的超群才智和金蒂诺·博卡尤瓦与坎波斯·萨莱斯等人的政治权威所控制的国务会议。德奥多罗元帅同意把德梅特里奥收罗到政府中来，但对他这个人或他的主张，却并不很重视。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对他也很冷淡。在一本论述本雅明·康斯坦特的书中，特谢拉·门德斯自己承认，实证主义者并没有凭借德梅特里奥的势力得到任何东西，甚至所谓“精神自由”、政教分离、或“废除学术上的特权”，也都未能实现。特谢拉·门德斯认为，德梅特里奥·里贝罗过于软弱，以致连“以祖国的名义”这样的词句，也未能保证把它应用到世俗的婚礼当中去。而且，德奥多罗首届内阁之中的这两位实证主义者，彼此相处得也并不融洽。

因此，临时政府的改革工作，很少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只是后来在详细讨论宪法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有比较切实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即使如此，这种影响也还是来自在孔德以前就已成为十八世纪的一部分政治遗产的那些思想。临时政府

的行动，显然是受到了来自北美那个共和制与联邦制新典型的民主自由主义的鼓舞，而并不是受到了古老的法国和英国学说的影响，同时，这些行动，也反映了临时政府主要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政治思想。

临时政府必须处理的第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乃是与阿根廷订立米西奥内斯条约。当时，帝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外交学派，因而有可能制定出具有连贯性与重要历史意义的对外政策。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发生的关于拉普拉塔河的长期争执，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巴西只剩下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即保卫她自己在政治上的完整，因为在这方面它经常受到附近几个共和国内发生的骚乱的威胁。正是这种情况，才引起了反对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暴政的运动以及对乌拉圭和巴拉圭的战争，而巴西也在这些运动和战争当中，胜利地崭露了头角。

68 虽然如此，巴西政治制度在美洲所处的独特地位、她的语言所引起的孤立作用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往昔的竞争所留下的辛酸余味，却无一不使她在精神上与周围的共和国隔绝起来。英

国经济利益所处的优势，使该国在巴西的外交关系中居于领导地位，而后来才被克里斯蒂事件所打乱。巴西精心地培育着与智利的友谊（在与阿根廷可能发生的任何争执中，这是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因素），而且也乐于接近美国，尽管在南北战争期间发生过一些关于南部同盟的船只的微小事件。1889年巴西首次出席了在西半球召开的国际会议，那就是美国哈里森总统执政期间，由国务卿布莱恩邀请，在华盛顿举行的泛美会议。

共和国因为不忘帝国时代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所以很自然地推想到，巴西政体的改变，将会加强美洲大陆的团结，而首先是与阿根廷形成比较亲密的关系。第二王朝没能够设法解决大量存在着的边界问题，其中的一大部分，倒没有什么与眼前攸关的政治意义或者经济意义，因为这些边界的特点是距离十分遥远，而且都处于几乎难以进入的蛮荒环境之中。然而，经过若阿金·卡埃塔诺的努力（这种努力，日后将使里奥·布兰科子爵的儿子里奥·布兰科男爵受到鼓舞），政府与法属圭亚那终于达成了一项令人满意的边界协定。但是，与阿根廷在米西奥内斯地区以内的边境界线

问题，却足以引起连续不断而令人不愉快的冲突。1857年，里奥·布兰科子爵曾经干练地签订了一项条约，把乌拉圭河确定为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边界，可是这个条约并未获得阿根廷政府的批准，所以问题仍旧未能解决。后来又为达成临时协议，作过一些努力。巴西共和国的成立，使阿根廷的外交部长塞瓦略斯产生了很深的印象，认为最终解决争端的大好时机已经来到了。

共和国最初的几届政府不仅保留了前外交部的总方针，而且还留用了有经验的外交官和原来各局处的主管人员。他们这些人都不愿意妥协，有时候狭隘地维护传统，习惯于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轮流执政的议会制政府派到他们头上的那些魄力不足、而又任期短暂的部长。当金蒂诺·博卡尤瓦担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时候，他那种诚挚的和平主义与美洲主义的感情，那种要求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建立起较为紧密的关系的愿望，使得他在德奥多罗及其临时政府同事们的完全赞同之下，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提出的建议。几天以后，博卡尤瓦在阿根廷驻里约的公使陪同下，乘坐69一艘巴西的军舰，启程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在

那里签订了划分两国之间有争议的领土的条约。

报纸上掀起的一场猛烈的运动，促使里约的舆论界，对这个条约和签订这个条约的人，采取了敌对态度，而当时博卡尤瓦能依靠的，也只不过是他那些部长同事们的团结一致罢了。后来，博卡尤瓦承认，他的行动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压力之下采取的，于是他自己建议巴西国会不要批准这个条约。这和早些时候，阿根廷国会曾经拒绝批准里奥·布兰科条约的情况，完全一样。米西奥内斯这个老问题，只好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以后解决了。

在帝国临近终结的时期，实证主义的宣传大力鼓吹政教分离，而这一点正是巴西的自由主义者素来就有的愿望。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不久，由德梅特里奥·里贝罗部长代表他那些实证主义的同人，提出了一项有关的法律草案。临时政府把这个草案否决了，因为它过于急进，因而不能讨论实施。

这项法律想要规定宗教完全自由和政教绝对分离。天主教教士的地位要与公务人员的地位相同，并继续领取他们的津贴。教堂的建筑物要成为公共财产，并且毫无差别地提供给任何一个不同

的宗教派别，来举行礼拜仪式。这项拟议中的法律，还要保证教会团体当时拥有或将来接受的财产，永远归它们掌管；医院和墓地都改交民间使用，并且公布了世俗婚姻以及出生和死亡的民间登记制度。

鲁伊·巴尔博扎在1890年1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得到德梅特里奥的支持，使这项按照实证主义的方针制定的政教分离的草案定稿，顺利地获得了批准。这无疑地是共和政府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而且获得了马塞多·苏亚雷斯主教（也就是这个人，早些时候，曾与他的累西腓同事唐·维达尔阁下一起，为反对帝国时期的保皇主义而赢得了声誉）极为可贵的合作。由于政教分离，共和国就替宗教帮了个它求之不得的大忙。临时政府对教士们的态度感到非常满意，以至于它匆匆忙忙地向全世界通电声明，巴伊亚的首席大主教已经为共和国祝福。关于世俗婚姻的问题，被包括在另一项特别法律里，但对于这项法律，大部分天主教的教士们都不象对政教分离那样欣然地加以接受。

70 另一项重要的立法措施是"大归化"，即授予1889年11月15日居住在巴西、而又未明确提出反

对意见的一切外国人以公民权。此外，还有重订的抵押法、破产法、刑法和童工条例（除了废除奴隶制以外，这是巴西社会立法的首次尝试）。

在共和国最初的日子里，鲁伊·巴尔博扎好象是想得最多也干得最多，他把自己的兴趣，扩展到有可能把国家重新组织好的一切计划方面去了。部长们的决定并不是协调一致的，而且，最初的一些会议，甚至连记录都没有。共和国成立了一个半月之后，才具备了一点正式内阁的模样，有了全体会议，并且任命了一个秘书作会议记录，根据这些记录，今天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编写这个不寻常时期的巴西历史。

11月15日的胜利者之间，起初是和睦欢畅的局面，对组织新政权所抱的深刻的共同责任感，使他们可以不去理会那些细小的争执以及自尊心常常遭到的刺痛。德奥多罗那种习惯于军事纪律的僵硬观念与讲究权力服从和容易冲动的性格，往往要在部长们，特别是在那位看来非常受他重视和钦佩的鲁伊·巴尔博扎劝告之下，作出让步。这位军事独裁者对他应作的事情所表示的热忱和他强烈的爱国精神，弥补了他的经验不足。

1890年1月17日，鲁伊·巴尔博扎宣布实行的银行改革，促成了临时政府的第一次严重危机。鲁伊发布这项著名的法令时，由于他确信可以得到德奥多罗的完全支持，所以并未与他的阁僚们进行磋商，他们是在第二天看到报纸才知道此事。鲁伊的所有阁僚，特别是坎波斯·萨莱斯和德梅特里奥·里贝罗都反对他的计划。在1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上，当辩论达到紧要关头的时候，鲁伊曾提出辞职，但随后又撤销了。德奥多罗企图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于是他宣布说，银行改革法案是一个既成事实，继续辩论下去就是不遵守议事规则，并且还说，不停止辩论的话，他就要辞职。这并没有阻止出席会议的某些人声明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赞同这个措施；然而，政府的首脑，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就辞职，这个威胁在那些反对改革的人们看来，未免过于危险了，所以他们决定，在作一些微小的修改后接受这个法案。最值得注意的一项修改，是对未来发行银行钞票的限制。

在既成事实面前的这种屈服态度，用当时的一句很生动的话来说，也就是这第一次"吞刀子"，在共和国的首届部长中，很自然地激起了一股愤

懑情绪。临时政府的成员之间，由于个人性情、原则主张、思想观点以及利害关系等不可调和的差别而引起的冲突，大为增加。鲁伊・巴尔博扎的权[71]势是不会轻易得到人们宽容的。读一读内阁会议的记录，人们就会很容易地觉察到那些使部长们彼此不和的猜疑与偏见。只是因为有害怕新生的共和国遭到损害这一层顾虑，才防止了内部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也没有在舆论界引起危险的反应。

德梅特里奥・里贝罗看样子曾经是一个最不肯安静的人，他有许多没实现的最新打算，而尤其重要的是，他这个人最反对鲁伊・巴尔博扎。他不久就退出了政府，他在农业部的职务，由来自坎皮纳斯、未获得学位的律师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接替（这个职位，最初就是打算由他来担任的），这个人有过一段为共和主义宣传服务的长期经历，而且比那位南里约格朗德州实证主义者的代表，也更为灵活，更有策略。本雅明・康斯坦特表现出是个极为稳健的人。他也最热心于提倡新闻自由；当时新闻界正在猛烈地反对鲁伊・巴尔博扎的改革计划，而德奥多罗的急躁又常使新闻自由受到威胁。

在伊塔马拉蒂宫的大本营里，部长们每天都忙于讨论重要的立法改革，或一些临时的小事情。他们时常被街头流传的谣言和警察对君主派阴谋提出的怀疑，弄得惊恐不安。德奥多罗对反对派的过火行为，特别是对现役军人在报纸上讨论政治事务的自由行动，感到十分气恼；他和一切当了权的革命者一样，忘记了他自己的越轨行为。由于米西奥内斯条约而引起的反对金蒂诺·博卡尤瓦的运动，使政府认识到：最好是发表一项正式声明，公开宣布部长们的团结一致。不久，鲁伊·巴尔博扎就为发表这样一项声明作出了安排。

阿里斯蒂德斯·洛博摆脱幻想，离开了内政部。代替他的是塞萨里奥·阿尔温。他在帝国统治时期，曾任省长，在共和国统治下是第一任米纳斯吉拉斯州临时州长。当里约的警察署长，在一次取缔流氓阿飞的运动中，把金蒂诺·博卡尤瓦一个朋友的儿子给逮捕了的时候，金蒂诺·博卡尤瓦便要求退出内阁，他这位朋友是共和党《祖国报》的老板，而金蒂诺又是该报的总编辑。

暴躁而执拗的德奥多罗，和他的几位部长的作法一样，用一些往往被公众认为非常幼稚的借

口，屡次扬言要辞职。本雅明·康斯坦特从陆军部被调到特别建立的教育邮电部，在那里，他可以更多地发挥作用，而最重要的是少惹一些麻烦。政府72当时急于要维护它的实力，所以便把陆军部交给了弗洛里亚诺·佩绍托，认为他是一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而且惯于接触部队。德奥多罗与本雅明·康斯坦特个人之间的一个严重的误会，经过很大的困难才得以消除。最后，对君主主义者的《论坛报》进行的一次袭击（人们指责说，这件事是德奥多罗的一帮战友干的），曾使全体内阁有理由提出辞职。不过，内阁总辞职这件事，直到1891年1月方才真正发生，而且当时的借口，也是反对德奥多罗本人所提倡的、为南里约格朗德州托雷斯港订立的一项修建合同。

临时政府所采取的唯一最重大的行动，乃是鲁伊·巴尔博扎所倡导并在1890年1月17日未经事先做好舆论准备便公布实行的金融改革。这项改革引起的直接反应极其强烈；新闻界与商业界展开了一场猛烈的反抗运动，其中交混着敌对的情绪、真诚的忧虑和受到威胁的利害关系。这位财政部长的计划，在市场骇人听闻地突然兴隆又突

然崩溃的时期（后来被人们称为“恩西利亚门托”时期）破灭了，这件事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里，一直是个很沉重的负担。后来，人们又责难说，他的政策使国家的财源遭到了巨大的灾难。

人们认为，鲁伊·巴尔博扎醉心于攻读书本理论，而对于商业或财政毫无实际经验，他起草银行改革法案，乃是一个纯粹属于幻想的行动，它与它所要应付的实际情况，完全背道而驰。它所依靠的仅仅是少数几个业务工作人员做出的判断，而他认为他们都是银行和财政问题的专家。然而，对于这位准备战斗的财政部长所制订的财政政策，作出一个比较准确而公正的评价，还需要（除了在前一章里，对帝国财政所做的概述之外）对共和国宣告成立时的情况，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情况，作一次全面的考查。如果说鲁伊·巴尔博扎的改革，因为是从他那具有很高吸收能力的头脑创造出来的，以致有一部分不能付诸实施的话，那么，它的失败，便也可以用当时的环境来解释。把计划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它本身固有的缺陷，那也是不正确的。说得更恰当一点，这场哄动一时的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计划实施的过程当中，鲁伊被迫做

了一些更改，而他的继任者，对计划的实施，又故意地掺了假。

按照自由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的想法来治理共和国的人们认为，国家对公共财富的管理进行干预的范围，可以扩大到直接管理国库的财源和间接管理通货。把国民经济看成为国家和私人经济的一个综合体的现代概念，当时还几乎没有被人们理解。按照他们当时的思想方式，国民经济产生于私人经济活动的总和，正好象社会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总和一样。个人的自由企业，即“经济人”的自由进取心，会创造出物质财富和进步。通过扩大信贷和增发通货，国家将促进商品和服务事业的发展，国家也能从中征收它应得的捐税。所以说，鲁伊·巴尔博扎的政策是符合当时的理论的。 73

到了1889年11月底，取得胜利的革命，再也不能够满足于维持现状了。和一切要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的运动一样，这一次运动，也认为不得不在司法和财政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和革新，而对于这一点，帝国最后一届内阁所树立的榜样，起了强大的刺激作用。

鲁伊·巴尔博扎过去作为一名反对派的新闻

记者，曾经与奥罗·普雷托的计划作过顽强的斗争，但如今他作为政府的一名成员，却不得不进行某种不同的尝试了。然而，在开始的时候，他不过是继续执行了他前任的政策，并向设在里约和各州的银行授予了货币发行权，而这些银行，当时正处在一股强烈的联邦主义精神的迷惑之下。欧洲同情君主政体的集团，对共和主义革命感到不大信任，再加上别的一些情况，如过多的进口和雨后春笋般的建设计划等，引起了巴西的黄金外流，使得巴西以黄金为基础的多头发行通货制无法继续下去。

1890年1月17日，鲁伊·巴尔博扎请德奥多罗签署了一项冗长而有创见的银行改革法令。政府的公债券，将要代替黄金作为发行钞票所必须的储备。这种办法，美国在林肯时代曾由国家银行实行过，原先在帝国时期也曾有人建议予以实行。

巴西被划分为三个区域，每个区域有一个发行银行，这就是：远至巴伊亚州的北方区；从圣埃斯皮里托州到圣卡塔林纳州的中央区；以及南里约格朗德区（这个区，通过一种奇怪的地理上的借口，把马托格罗索州和戈亚斯州包括进去了）。不

久以后，北方区又分成三个分区，并将圣保罗州与戈亚斯州合并为第四个区域，但马托格罗索州仍旧与南里约格朗德州在一起。

鲁伊·巴尔博扎认为：银行负责分期逐步偿还公共债务，是既灵巧而又有独创性的一种办法。在头七年里，将使用逐年降低利率的办法，来消除利息的支付。与此同时，也将从银行历年的总利润中征收百分之十，以积累基金，这样，到五十年的末尾，就会偿清全部公共债务了。银行的钞票将享有与国库券同等的地位，并将成为所有的公共工程中优先使用的支付手段。银行将发放农业贷款，为了这个目的，政府将允许它们把贷给它们的国家公债券的利息，留作发行纸币的储备。一旦汇率达到平价，它们就应把自己的纸币和国库券，一并用黄金收回。 74

从奥罗·普雷托执政期间开始的通货膨胀的浪潮，越来越大，而且很自然地刺激了股票市场的投机。每天都有一些怀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目的而性质极端离奇的企业，变成为法人组织，其利息的支付由政府加以保证。那种要发大财的投机狂热，和在别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阿根廷这两个最邻

近的榜样)一样，也使得巴西的市场，尤其是里约的市场，变得疯狂起来了。马查多·德·阿西斯在他的小说《伊索和雅各》中，回忆某些狂热的情景说："不错，你还没有忘记它的名字叫'恩西利亚门托'，也就是各种企业和公司那个大发利市的时代。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什么也没看见的。能够赚钱、赚几百几千、成千累万千度、叫人眼花缭乱的计划、发明、和特许权，每天都源源不断地倾泻出来。"

面对着他那有创见的计划的失败，财政部长恢复了以硬币为通货基础的做法，尽管他曾经抨击过奥罗·普雷托采取同样的措施。后来，他一面承认，他所以采取多头发行制是迫于各州对他施加的压力，当时这些州被联邦的成就冲昏了头脑，一面决定通过一个单独的孔道来发行没有储备的通货，巴西共和国银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流通中的通货，已达506,992千度，其中包括285,943千度的国库券。鲁伊·巴尔博扎跟一切主张印发钞票的人一样，认为汇率所受到的决定性影响，并不是因为纸币过多，相反，汇率的下跌，乃是国际收支中的赤字所产生的后果。

巴尔博扎诚心诚意地相信，随着奴隶制的废除，特别是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巴西已经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他看来，把赌注押在未来，并不是轻率的行为。他和以前帝国时期的某些部长一样，对美国的榜样着了迷，而且也和他们一样，未能了解该国实际经济财富的无比巨大的发展， 75 已经给它带来了惊人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又反过来减少了或者说抵消了早期财政实验所造成的极端恶劣的后果。美国用银行和国库大量发行通货的办法，使得她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华雷斯·塞尔曼发行通货的狂热，促成了阿根廷的经济改造，实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现代化，促进了农村的工业，而且也加剧了欧洲移民的活动。美国与阿根廷用这种办法创造出来的财富潜力，很凑巧地证明了，它足以使这两个国家的纸币兑现。

大量资本和外国移民流入巴西南部地区，以及欧洲对私人企业投资和对政府贷款所造成的公共资金的良好情况，使得帝国末期的一些政治家，产生了一种异常繁荣的错觉。他们旧有的重农主义观念，当时正朝着工业化的巴西这一新想法逐步演变；圣保罗的咖啡和亚马孙河流域的橡胶，将

可以为期待中的改造提供资金。奥罗·普雷托的财政政策怎样引起了投机时代的出现，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

在这种安乐气氛中诞生的共和国，因为财政经济上接受了鲁伊·巴尔博扎那种大胆革新精神的指导，好象常常失掉了实事求是的现实感。鲁伊当时是在纸上设计一个神奇的巴西——一个美国的复制品，那里铁路纵横交错，而且正随着机器时代全力向前发展。由于他在各个方面都推行了帝国时期开始实施的通货膨胀政策，所以就在无意中使市场的投机更加严重，并且造成了总崩溃的前提。然而，他和德奥多罗，要比华雷斯·塞尔曼不久以前在阿根廷遇到的情况更幸运一些，因为他们两个人总还能够继续执政。鲁伊·巴尔博扎反对那种认为土地是财富唯一来源的神话，他将帝国时代的旧财政关税，改变成为保护关税。农业部改名为实业部，这一变革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观念。

尽管如此，鲁伊·巴尔博扎仍然凭着他那高超的才智和从事公务的经验，力图纠正他原来计划中一些过火的地方，并减少它们所造成的影响。

由于要求以黄金来缴纳部分关税，他得以防止汇率发生灾难性的下跌，因而也就节省了预算之中用来抵补支付差额的拨款。他尽力抑制和统一银行的货币发行，并且尽量停止以骇人听闻的高额利息和以黄金支付的保证条件，授予公共工程的合同。他降低了部分内债的利率，并把国库中的银[76]行准备金改为公债券。

在废除奴隶制以后，巴西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很不稳定，它比帝国末期和共和国初期那些当政的人们所认识到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流入圣保罗的移民确实增加了，可是这并未阻止几乎使整个农业都受到损害的长期萧条。公用事业的建设，特别是铁路（超出设计阶段以外的没有多少）的建设，造成了入超。政府虽然进入了外汇市场，以便加以支持，但是，近年以来，流入这个国家的黄金，却始终都没有就地生根，而是仓卒地外流了。在"恩西利亚门托"之后，紧接着就合乎逻辑地出现了股票市场的崩溃，而同它连结在一起的，又是贫乏的公共财源中所发生的混乱局面。

鲁伊·巴尔博扎离开财政部以后，在他所发表的几次长篇的漂亮演说中，力图为他的财政政

策进行辩护，把它的失败归咎于他那位直接继任者的行动。我们即将看到，情况确实是这样。德奥多罗第二届内阁中的阿拉里佩部长所采取的一些倒退的步骤，只不过使鲁伊·巴尔博扎所犯过的错误更加恶化罢了。

政府已经把财政经济事务搞得一塌糊涂。汇率，在鲁伊·巴尔博扎接任的时候为27辨士，经他设法维持，从未低于22辨士，此时却下跌到几乎等于零的程度。政府又求助于印刷不兑换的纸币，它和国库尚未清偿的公债加到一起，便使流通中的纸币总额，极大地膨胀起来。国民对于共和国的改造工作，曾经一度抱着真诚的希望，现在虽然还不是忍无可忍，却已被这种经济崩溃的局面所动摇，而满怀沮丧情绪了。这就为1891年11月的政变和以后的多次革命准备了基础。

第 六 章

制 定 宪 法

制宪会议——实证主义者的影响——政治骚动——德奥多罗与制宪会议的斗争——第一届共和国内阁集体辞职——卢塞纳内阁——德奥多罗与国会的冲突——11月3日政变——海军的威胁——德奥多罗辞职

在共和国宣布成立十八天以后，1889年12月3日，临时政府任命了一个由五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制定宪法草案。同月21日，它决定召开制宪会议。这个以萨尔达尼亚·马里尼奥（1870年宣言的一位签署人，共和国的一位元老）为首的委员会，提出了由阿梅里科·布拉济利恩塞、桑托斯·维尔内克、兰热尔·佩斯塔纳和J·A·马加良斯·卡斯特罗拟定的三份草案，最后又把它合并

成一份。鲁伊·巴尔博扎负责编纂，但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对这个文件的文体进行润色，在很多场合，也对其内容实质做了更动。德奥多罗对某几项条款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反对所有那些对权力、特别是对军事纪律施加限制的条款。他感到难以接受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相互独立的原则。因为他受过帝国议会法的熏陶，所以他认为不授予国家元首以解散国会的权力，那是荒谬的。

在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那天（1890年11月15日），制宪会议召开了，它按照政府提出的方针，竭尽全力地继续制定宪法。这样，在1891年2月24日，巴西便处于一个新的立宪政体的统治之下，独裁者也就此履行了他对全国所作的诺言。

如果不对巴西宪法赖以产生的一般条件也有所了解，那就根本无法理解这部宪法。左右它的是一些什么思潮？它满足了国民的哪些愿望？拟定它的制宪会议代表着什么？这次制宪会议是怎样设 78 法完成其使命的？在第二章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二位皇帝在那漫长的统治时期内，都执行了一些什么政策。我们也回顾了，在君主国的末期，对它不信任的情绪怎样变得普遍起来，以及废奴运动

怎样掩盖了共和主义者的宣传。

随着制宪会议的召开，巴西关于共和制和联邦制的理想也终于开始实现了。政府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依照美国的宪法制定的。它也受到阿根廷宪法的强大的影响和瑞士联邦宪法的些许影响。北美的政治家取代了从前英法空论家所占有的位置。1824年的人们，曾经虔诚地信仰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式，1891年的人也是如此。巴西正在被人们向北美的模型里浇铸，诚如她从前曾经被装在法国立宪制度的框子里一样。从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到最广泛的联邦制——这就是巴西行将发生的飞跃。

尽管如此，两部宪法却都灌注着政治的和经济的个人主义。1824年，这种个人主义处于上升阶段；1891年，则是它的极盛时期。无论是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或末期，也无论是欧洲型还是北美型，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百科全书派、卢梭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君主国制宪会议和共和国制宪会议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没有中央集权主义者与联邦主义者之间的激烈竞争。

根据塞萨里奥·阿尔温条例（该条例在扼杀

竞选运动中任何可能存在的真实性方面，其程度毫不次于君主国的选举法）选出的制宪会议，全体一致拥护共和制、联邦制和总统制。人们可能会说，全体国民都忘记了最近的帝国，仿佛它已经是史前时代的一部分。就连少数尚未倒向共和国的君主主义者，也情愿默默地等待共和国出差错了。

这样，这次制宪会议，因为不象1870年以后的波尔多制宪会议那样分裂成许多派别，所以也没有象它那样被迫拖延了足足五年，而临结束时才向全国提出一份妥协性的宪法。制宪会议在其主席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政治才干和道德威望的指引下，立即迅速地展开了工作。这部成品和1824年的宪法一样，符合于当时最完美的思想。尽管有某些或许是故意的夸张或含糊的词句，但这个文献却是良知和公正的一个胜利，它克服了经验不足与共和国这个新事物所引起的兴奋情绪。

79 政府的草案初稿力求保持一种能够符合联邦主义原则的民族主义观念。各州虽然被赋予了充分的自治权，但重大的主权则属于联邦。联邦保有最广泛的公共资金来源，它的权利高于各州，它能够调动各州的警察等等。

可是，在制宪会议内部，很快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极端联邦主义思潮，它甚至比美国和阿根廷的宪法走得更远，并将毫不犹豫地把巴西改变成为包括二十个小国的联邦。这样，在鲁伊·巴尔博扎看来，就有必要组织对抗，以制止他所谓的那种“病态的过分冲动”——那种对联邦主义的“疯狂而不健康的欲望”。虽然这些急进的联邦主义者，主要是南里约格朗德州的代表，他们以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为首，并且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但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去的，还有其它州的一些代表，其中包括伯南布哥州的若奥·巴尔巴略、圣保罗州的坎波斯·萨莱斯和戈亚斯州的莱奥波尔多·德·布良斯等知名人士。一位代表提出建议，不准设置常备的国民军；另一位代表希望授权给各州，使之拥有自己的海军。对于极端联邦主义者（某种程度上的杰斐逊主义者）来说，各州是实的，而联邦则是虚的，因此，它的存在，用若奥·巴尔巴略的话来说，就应以“生存的严格需要”为限。

实证主义的宣传家们，对临时政府的组织工作影响很小，而在制宪会议中，他们的活动却有较

大的成效，这主要是南里约格朗德州的那帮代表们干的。他们所提出的修正案，自然都是符合共和主义与极端联邦主义独裁制的。大部分修正案被否决了，其中包括：在宪法导言中勾掉“一个永世长存而不可分离的各州联邦”的词句；确立发行通货的完全自由；要求实行公开的、义务的以及包括乞丐和文盲在内的普遍选举；废止官方教育和科学证书；制定死刑和苦役制等。他们的修正案被纳入宪法的是：关于永远管业的法律，取消称号和勋章，允许各州有建立自治区的权力。

有关公共财源的分配和司法部门的组织等项条款，在急进的联邦派与温和派之间，引起了更广泛的冲突。正式草案把联邦的利益放在了最首要的地位，和它相对立的一份草案是南里约格朗德州代表团提出的，根据这一草案，各州除了出口税80一类的特定岁收来源以外，还保留了其它在性质上并非明确属于联邦所有的一切财源。作为两个互相对立草案的折衷方案而最后写成的文本，其含糊的措辞，在第一部宪法的全部有效期内，一直引起了税收制度方面的极大混乱。

正式草案要求实体法统一由中央制定，而程

序法（诉讼程序和法院）则将权力下放给地方。①另一方面，二十一人委员会则赞成把立法权和法律的执行权全部划归联邦控制。然而，制宪会议的全体会议却挫败了该委员会，而采纳了第一个建议。

制宪会议中，各主要派别之间激烈争论的其它各点是：未利用的公地和矿山的所有权，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方法，参议院的组成，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权限，尤其是联邦对各州的干涉问题。在联邦进行干涉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结果就造成了第六条的措辞含糊不清，而后来证明，这一条乃是许多截然相反的解释的一个永久借口，并且成为许多最严重的政治事件的一个原因。

制定宪法的委员们，还拒绝利用这个机会（早在五人委员会的草案中就附带地提出了建议）修改全国的区划。这样，在他们的默许之下，便形成

① 即，一切重大的立法权归于联邦，和帝国时期出于一个来源，以避免各州的法律互相冲突。然而，各项法律大部分是交由各州去执行的。——英译者

了一个不平衡的联邦：其中的一些州很贫穷，没有保证自治生活的最起码的资源；另一些州则很强大，不久就会控制整个共和国。这种状况助长了那些缓慢然而必然形成的未来的革命活动，也包括那次会消灭这个共和国的革命。

在共和国的第一年中，巴西的整个政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临时政府成员之间一再发生的个人冲突，引起了不可调和的对立情绪。德梅特里奥·里贝罗和阿里斯蒂德斯·洛博退出了内阁，随后本雅明·康斯坦特也退了出去，为他特别设立的部，后来也取消了。德奥多罗由于衰弱多病，呼吸困难的症状不断发作，变得愈加烦躁和易于冲动了。

几乎每一个州的政治形势都是动荡不安的，南里约格朗德州处于骚乱状态，使人们经常担心几个派别之间会爆发武装冲突。巴伊亚州州长被迫辞职。在伯南布哥州、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其它一些较小的州里，各党派的宣传鼓动愈演愈烈。新[81]近联合起来的各州，因为还没有宪政的组织，没有政治自治的习惯，也没有忠实的共和派上层人物能够加以治理，所以正在一种接近于无政府的状

态中苦苦挣扎。临时政府时常更换这些州的州长，但并未能使事态平静下来。国家的财政，经过“恩西利亚门托”时期那次强烈的颠簸，其状况之惨，已令人可悲了。

最初，制宪会议曾全体一致地批准了以德奥多罗为首的独裁政府的权力，后来却一变而为反对他。这位老军人，出任共和国实行新宪法以后第一任总统的候选资格，似乎是受到了威胁。德梅特里奥·里贝罗退出内阁之后，不断地密谋策划反对德奥多罗。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若奥·西梅奥将军（这个人过去曾被排除出伯南布哥州政府）、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海军上将（这个人正一心想要参与政治斗争）和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的帮助。

经过了大约七十年的时间，巴西又在重演佩德罗一世与1823年制宪会议之间的戏文。1891年制宪会议在许多方面都和当年的会议颇为相似，它很珍视自己作为一个民意机关的独立性，并且觉得凭着它已经制定出来的政治宪章，它应当受到国民的感激。因此，制宪会议相信，它能够与德奥多罗相对抗。德奥多罗，和佩德罗一世一样，固

执己见，恣意放纵，并且也象他一样，得到绝大多数武装部队的支持。

德奥多罗元帅与他的主要部长们相处得并不好。这些部长在被选入制宪会议以后，宁愿参加它的各次会议，而不肯同他们的首脑在一起开会商谈。他们只是等待着颁布宪法，以便放弃自己的职位。

在1891年1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危机突然爆发了。德奥多罗在主持会议开始时宣布，如果不通过并颁发托雷斯港工程的合同，他就绝不签发行政法令。过去对那么多的公共工程都已经授予了特许权（其中好多是愚蠢和可疑的），德奥多罗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一次他替自己的一位朋友争取的、而且又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特许权会遭到反对。面对着德奥多罗的最后通牒，部长们退出了会议，并且决定集体辞职。当时离开里约在山区休养的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也来电报赞同他的同事们的态度。

1月21日，德奥多罗收到了由坎波斯·萨莱斯、鲁伊·巴尔博扎、金蒂诺·博卡尤瓦、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塞萨里奥·阿尔温和万登科

尔克海军上将签字的内阁辞呈。该辞呈写道："根 82 据我们上次在17日会上提出的报告，出于我们反对向托雷斯港工程合同提供利益保证的意旨，在今日制宪会议已经通过拟议中的共和国宪法的时候，合当决定我们退出公务管理机关的日期，敬候指派我们的继任人。"德奥多罗立即作了回答："在答复诸位昨天提出的辞职信件之时，我不得不说明我同意予以接受。我感到惋惜的仅是，托雷斯港系具有重大政治与经济意义的一项最急需的公共工程，整个内阁对建设此港几无异议，而向它提供利益保证，竟成为诸位所作决定的借口。"

这些部长与德奥多罗共事已经一年多了，他们十分明白：他的性格倔强，感情脆弱，政治低能，此刻正在使他陷于一种很容易信佞听谗的境地。更糟糕的是德奥多罗这个人没有手腕，他把另外一些更普遍、更严重和不够体面的动机都推到他的部长们身上去了。他在接受这次轰动一时的内阁辞职的同一天，便组成了一个新内阁；说得更确切些，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他个人的朋友卢塞纳男爵，这种做法，与皇帝个人专权时期组织君主制内阁的情况非常相似。

卢塞纳男爵是一个老牌的君主主义者，在帝国时期，曾担任过一般的政治和行政职务。他以机灵、执拗、比较刻薄、特别是得到德奥多罗的无限信任而出了名。由于这种无边信任，他所主持的内阁便被称为他的"宫廷"，这是以前被用来指责私人内阁的一个字眼。①

卢塞纳（任农业部长，并暂时兼任司法部长）所挑选的部长，有：阿伦卡尔·阿拉里佩（财政）、若奥·巴尔巴略（内政）、法尔康·德·弗罗塔将军（陆军）、福斯特·维达尔海军上将（海军）、儒斯托·谢尔蒙特（外交）等人。其中，只有儒斯托·谢尔蒙特曾在其本州——北方的巴拉州积极参加过共和主义活动。巴尔巴略曾因其夸张的联邦主义而在制宪会议中出过名，后来他写了一本评论1891年宪法的书（以后成为一部名著），名气就更大了。

83　地方官吏阿伦卡尔·阿拉里佩出任财政部长，成为鲁伊·巴尔博扎的直接继任人。他比鲁伊

① 也叫做"卢塞纳的领事馆"。那些不肯饶过他的封号的老共和主义者，把他叫做"德奥多罗的灰衣主教"。——英译者（灰衣主教，意指法国路易十三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希留所信任的顾问。——译者）

更缺乏经验，而且极不出名。确实，他对本部的事务，始终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希望对他前任的政策进行一番改造（因为这位前任已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各种善意的或恶意的批评），然而他却极大限度地把鲁伊可能有过的错误，都给搅和起来了。他很容易地就被市场投机家、骗人钱财的投机公司发起人和荒唐的冒险企业的筹办人等巧妙地操纵了，这些人充斥于全国所有城市，特别是里约城。汇率继续下降。银行继续发行通货，甚至不屑于印刷纸币，而以国库券来代替，只不过在上面加盖自己的图章罢了。破产接连发生，证券价值下跌。公众的信心严重地动摇了。

卢塞纳这位政府的实际首脑，接管了财政部，但并未使情况有所改善。他取消了以黄金缴纳关税的办法，并把国库的黄金卖给或贷给在某种程度上无力偿付债务的银行。他在与国会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中，坚持要进行一项被认为是可耻行径而遭到否决的银行改革。这是导致11月3日德奥多罗解散国会的因素之一。巴西银行与巴西合众国银行（两者都很混乱）的合并，发行100,000干度国库债券用于“民族工业”，改组共和国银行、准

许它的发行额达到60万千度，负债30余万千度的铁路总公司的破产，这些就是卢塞纳政府执政期间的主要财政事件。这些事件使我们看到，巴西的政治和行政机关当时正在其中竭力挣扎的巨大混乱局面。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卢塞纳在11月3日政变以后不多几天便在发给罗思柴尔德财团的电报中公然声称，在巴西，既不存在政治危机也不存在财政危机。对这个声明，英国银行家在总结共和国的财政大崩溃的同时，直截了当地进行了驳斥。

德奥多罗第一届内阁的辞职，给当时正在进行的阻止他当选共和国宪政总统的运动，注入了新的生气。一批军界代表联合文职政客，提名前军务局长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为德奥多罗竞选的对手。然而，这件事不久就有了变化，而改提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为总统，弗洛里亚诺为副总统了。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以不露真相的手法，不顾坎波斯·萨莱斯和贝纳迪诺·德·坎波斯一再谋求妥协的努力，而迫使圣保罗代表团支持他，结果使危机更加严重了。到处都在公开地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如果德奥多罗被击败，军界将宣布由他实

行独裁并解散国会。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不愿意和自己的同僚对立,便建议选举德奥多罗。

1891年2月24日,"巴西人民的代表,为了创立自由而民主的施政方法,召集制宪会议,制定并明令颁布了宪法。"在宣布制宪会议闭幕时,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为这项仅用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的工作,向他的同事们表示祝贺,他说:

> 制宪会议力求把联邦共和国的一切主要原则,都写入它已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基本盟约。……我们已经完成我们的任务。闭会之后,会议在想起下述情况时,是会感到满意的,即:尽管它在开始时面对着不利的舆论和偏见,但会议进行当中,却摧毁了、至少是缩小了这种偏见,并且在公众中赢得了它现在结束工作时所得到的威望和信任。

这次制宪会议,实际上受到了国民保守舆论的冷淡待遇,他们担心它经验不足,尤其担心它那种实证主义的和急进的倾向;即使说它真能够与这样的国民调和一致的话,它也并没有保持住与德奥多罗政府的团结和协作。

2月25日，德奥多罗被制宪会议，以129票选举为共和国总统，仅比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所得的97票多32票。制宪会议本来已经表明了它对德奥多罗缺乏热情，又通过以153票(比万登科尔克海军上将所得的57票多96票；这位海军上将是政府为了讨好海军而推荐的)，选举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为副总统，把它的成见着重地表现出来了。

举行就职典礼的那一天，国会的一个人数很少的委员会，在有意表示的沉默之中，冷冷淡淡地接待了德奥多罗。而副总统弗洛里亚诺则在极热烈的欢呼声中，被簇拥到首席。政治上敏感的人，对于一场激烈的冲突是怎样地即将爆发这一点，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

一经颁布了宪法，制宪会议就变成了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一般立法机关。共和国两大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再也不是隐蔽的了，而在众议院则又比在参议院，进行得更为激烈。德奥多罗健康状况的恶化，给他的反对者增添了希望。一些老牌共和主义者企图与政府和解，他们作了一些最后的尝试，但是毫无效果。

德奥多罗与国会之间的斗争（有些象智利国

会和总统巴尔马塞达之间的悲剧性纠纷)愈演愈[85]烈。这位元帅认为国会中的反对派不仅会拒绝批准他的预算请求书，而且还会废除他那个来自总统职责法的否决权，以便日后能够对他进行弹劾。他的反对者，语言非常恶毒，这使他极为恼火。他因为已经习惯于军队的等级制度和他自己一向所受到的尊重，所以觉得这些人对他出言不逊是无法忍受的。总统选举的次日，国会就通过了由金蒂诺·博卡尤瓦签名发起的一项动议。它庄严地宣布：已逝世三日的本雅明·康斯坦特是共和国的缔造者、“完美无瑕的共和主义者”和“为共和国未来的统治者所树立的光辉的道德典范”。这件事想必深深地伤害了德奥多罗的感情。不消说，他的许多密友便敦促他解散国会。卢塞纳男爵声称，他曾尽一切可能，设法加以避免，但后来他自己坦率承认，当制宪会议变为立法机关时，他就建议过解散国会。

根据卢塞纳男爵的证词（如托比亚斯·蒙特罗所说的那样），他曾直接出面干涉，以便制止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不让他把那些以前没有批准、而有可能促使危机最后爆发的议案列入参议

院的议事日程。他还主动提出过，他要去设法说服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去主持参议院。

德奥多罗对他的部长所提建议的答复，流露出这位总统对副总统的看法。他说，“不要那样做，你们不了解弗洛里亚诺。我不愿意说他是一个胆小鬼，因为那样会冤枉了他。不过，他的态度完全是消极的。尽管他有群胆，并且胜任他的职务，但他并没有独胆。你们可以相信，如果他晓得了我们需要他的支持，他就会公开投入反对派的怀抱。”

对此，卢塞纳回答道：“我对这个国会再也不能忍受了。为了巴西的利益，它必须烟消云散。起草解散它的命令吧，不要再考虑弗洛里亚诺了。”

不管怎么说，卢塞纳还是到了弗洛里亚诺的家里，坚持要他作为法定的议长，担任起参议院议长的职务。这位踌躇满志的副总统，公认的阴谋反对德奥多罗的领袖，一开始便极力表白自己的忠诚。他解释说，如果在自己家接待阴谋者，那就是要劝导他们容忍和节制。他同意了卢塞纳的看法，即可能存在着得到海军支持的君主派的阴谋，但是他拒绝主持参议院。他用了下面的这些话来结束这次会见，从中可以叫人看到他那种非凡的欺

瞒能力："从德奥多罗元帅对我的忠诚发生怀疑的那一天起，我已经不是他的朋友了，但我是他的战友，我是一个军人，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巴西人。你可以请大元帅放心，在任何紧急的情况下，他总会发现我在他的身边。我就和军团乐队的公羊（吉祥的象征）一样，乐队走到哪里，公羊就出现在哪里。"

最后，由于确信得到了大部分陆军的支持，并确信全国人民一般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政府便于1891年11月3日颁布了两个法令：一是解散国会，一是宣布戒严。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大楼被军队包围了。大多数议员都返回他们自己所属的州，在某种程度上，对局势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态度。但是，少数比较活跃而大胆的人，其中包括圣保罗州的议员，却指望得到弗洛里亚诺·佩绍托的共谋和海军的同情，加紧进行着反叛的阴谋。

德奥多罗向全国发表了宣言，为革命的步骤进行辩护。宣言主要是扼要说明国会和政府之间各种争执。他在宣言中，指责国会热衷于派别之间的倾轧，而且企图恢复旧议会的做法。德奥多罗列举的罪状当中，主要的项目是：关于总统的职责和

内阁不称职的法律；拒绝通过预算拨款；开展反对与美国签订商务条约的运动；撤销驻梵蒂冈公使馆；以及反对卢塞纳的财政改革。坎波斯·萨莱斯以同样尖刻的、论战的语气，起草了国会的答复，它后来被秘密地刊印了。

巴西的一些与政党政治无关的社会阶层，听到国会解散的消息时，表现了它们一贯的漠不关心态度。德奥多罗只不过是和个人专权的皇帝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罢了。公众所忧虑的仅仅是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然而，政界的骚动却是巨大的。州长们都以或多或少的热情欢呼国会的解散。只有巴拉州州长、年轻的军官劳罗·索德雷（他被认为是本雅明·康斯坦特的得意门生）勇敢地加以反对。而对于未来能有一个明确看法的，倒也不乏其人。由于颁布不到一年的宪法遭到损害，巴西便开始了一个漫长的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共和国本身的命运也将悬而不决。

“恩西利亚门托”时期的出现，便利了那些性质可疑的经济上的特殊政策，人们对于这种特殊政策的怀疑，使政治气氛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当时

流传过一种说法：11月 3 日政变主要是解决股票市场问题，而不是解决政治问题。卢塞纳一参加政府，就曾经下令签订托雷斯港合同，这件事给公众留下了令人痛苦难堪的印象。其它大规模的特许权，如授予铁路总公司的特许权，则遭到了最严重的非难。巴西合众国银行的改革（在国会和报界都遭到过顽强的反对），被人们叫做后来法国所说的"巴拿马"①，即事业家、政客和有影响的议员都会被牵连进去的一桩舞弊案件。

87

在内战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南里约格朗德州，一部分联邦武装部队与反对派的成员相配合，把支持过德奥多罗政变的州长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赶下了台，并自己组成一个执政的洪达，人们形象地称它为小小的伪政府（governicho）。巴拉那州当时的形势与此相类似，其他各州都感到忧虑，尽管来自各位州长的报告是乐观的。在里约，若泽·德·梅洛海军上将站在了反抗运动的最前列，他这个人的政治野心、怨恨情绪和个人虚荣心

① 巴拿马，意为资本主义社会官商勾结的大骗局，源于1889年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大舞弊欺骗案。——译者

很容易地就被政客们利用了。他的海军战友，即陆军的那些老对手，虽已被贬到次要地位，但是并未甘心，当时也受到了鼓舞，准备行动。

11月15日，卢塞纳带着德奥多罗的请帖，再次拜访弗洛里亚诺，邀请他一同检阅庆祝共和国两周年纪念的游行。弗洛里亚诺不在家，他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对德奥多罗的邀请作出答复，他替自己剖白说："因为我的制服已经不适于穿用。"

阴谋家们在弗洛里亚诺的家里召开会议，因为他是宪法所规定的德奥多罗的继承人，也是普遍承认的尽管还不是公开地承认革命运动的领袖。起初，德奥多罗似乎要接受这一挑战。他做好了防御准备，下令逮捕职位最高的阴谋者，其中包括万登科尔克和库斯托迪奥·德·梅洛两位海军上将。后者设法逃避了逮捕，并把停泊在里约港内的战舰（其中很多艘的实力是很可怀疑的）几乎全都煽动起来参加了叛变。

11月23日清晨，叛变的舰队，把指挥官库斯托迪奥·德·梅洛的旗帜升在"小溪"号战舰上，准备一接到德奥多罗退位的消息，就开始战斗。原定的炮击，只发了一炮，而且，因为射击技术拙劣，这

一炮击中了坎德拉里亚教堂(位于里约的商业区)的圆屋顶,使全市的和平居民惊恐万状。

德奥多罗原可以指靠大多数卫戍部队的支持,但他惟恐使全国陷入内战,便牺牲了他那一贯的勇敢精神,而回避了战斗。在一些没有同意他辞职的可怜朋友包围之下,他派人请来弗洛里亚诺,交出了政权。据说他曾经讲过:"我签署了巴西最后一个奴隶的释放令。"这句话同人们认为佩德罗二世说过的那一句很相似。次日,他要求退出军队现役。仅数日之后,佩德罗二世死于巴黎。第二年8月,德奥多罗逝世。按照他自己的愿望,他被安葬时,身穿便服,没有举行军队葬礼。

88

德奥多罗在当政的两年当中,始终都充分地显示了他那勇敢、慷慨和易于冲动的性格。他既没有取得行政经验,也没有取得政治经验。他犯了大量错误,尽管他愿意接受那些知道如何对待他的人所提出的忠告。因为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无可指责的正直态度,他不知道如何掩饰欺瞒,等待时机,规避躲闪,以保护自己不受背叛行为的损害。德奥多罗和一切胸襟坦白的人一样,过去信任别人,正因为如此,当他认为是自己朋友的那些人背

叛他的时候，他就蒙受到极大的痛苦。他是一个旧式军人，对于官场生活不能适应，也没有适当的准备，也许除了靠战场之外，他并不能应付那些在生活之中反复出现的问题。

德奥多罗的直接继任人，也是一个军人，也出生在同一个小小的阿拉戈斯省。从他身上，巴西不久就会辨认出一个在品德上极端相反的人，他沉默寡言，冷酷大胆，近乎病态地麻木不仁，极端伪善和多疑，小农似地狡猾，不重视外表，在沮丧和懒惰的伪装之下，掩盖着无比的固执和顽强的毅力，并且满脑子尽是贪图权势的欲望。

第 七 章

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时代（1891—1894年）

弗洛里亚诺·佩绍托的肖像——中央和各州——对宪法的一种解释——军官们的宣言——弗洛里亚诺的反应——支持与反对——财政问题——联邦共和党。

德奥多罗辞职后，那位宪法规定的继任人、德奥多罗自巴拉圭战争以来的战友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将军，便擢升到总统的职位。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从他的前任那里继承了一些什么？他又将怎样来完成事变加在他身上的使命呢？

在巴西的历史上，一个人物所遭到的议论再多，也从来没有超过弗洛里亚诺。他不是激起了人们的疯狂热情，就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仇恨。甚至

到了目前，即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也未必能够很容易地给他作出公平的判断。要消除他所引起的这两种各走极端的感情，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与他同时代的人，甚至于从历史角度来观察他的人，都被他引起了强烈的爱和恨，他的这种才能，虽然不足以说明他的过人之处，然而却初步显示了他的独特之点。人们不会弄错，正是他那种神秘的个性，才使得评论家和传记作者们无法对他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把他的绰号——斯芬克斯①——广为流传，而企图解开他的谜语的人，却象传说中那些窥探这种秘密的人一样，都被无情地毁掉了。

弗洛里亚诺表面上一点也显示不出傲慢专横。他并不注意自己的仪表，他的面貌平常，有点缺乏表情，而且带着病容。他没有象德奥多罗那样的军人派头和生气勃勃或者容光焕发的外貌。他的语调带有北方卡博科洛人（Caboclo——农民）那种慢吞吞的拖腔，也从来没有提高过嗓音。他对

①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狮身女面而有翼的妖怪。他常出谜语给过路行人，凡不能解答者即遭其杀害。后来其谜语为人解出，乃自投岩下而死。——译者

别人的姿势或态度从来没有表示过厌烦。他这种十分冷淡的性情，和他其余的优缺点一样，使人回想起那位同样出身于美洲印第安人血统的墨西哥民族英雄贝尼托·华雷斯。

弗洛里亚诺在才智方面并不超群出众。他所受的那点不大充分的教育，几乎完全是他职业上的普通技术。他没有显露出求知识的好奇心、内心的疑惑、或者冲突。他轻视金钱，全然不关心物质 90 上的安适。他藐视众人，因而他很容易把每个人都贬低到一般水平。他很容易和街头的群众交往，但是对他们敬而远之。他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也许把他全部的感情都给占据了。

弗洛里亚诺和其他的卡博科洛人一样，猜疑心和冷漠的态度，都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虽然平易近人，却不能够随时随地同别人亲热起来，也不会说粗俗和滑稽的笑话，而德奥多罗却总是乐此不疲的。基本上说来，他是一个不愉快的人。关于他的轶事趣闻，内容都贯穿着他所进行的讽刺，而在这些讽刺之中，总有一种怨恨、愤懑性质的冷酷残暴味道。

弗洛里亚诺虽然有许多缺点，但他比其它任

何一个巴西人，都更能够激发人们强烈的、而且时常带有神秘色彩的热情。大多数巴西上层人物认为，弗洛里亚诺体现了民族精神之中最野蛮的力量，体现了一种从沿岸一带皮相的文明向后倒退的性质。这就是说，他具体地证明了：粗犷的边疆居民杰克逊，在那些认为华盛顿、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才是模范政治家的北美人心目中，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角色。然而，对于和他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他恰好体现了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民族性中最深刻、最真诚和最有泥土气的成份。不善于适应外国方式的巴西，没有顾及外表，仍然同这位卡博科洛英雄的冷酷、精于计算而不屈不挠的精神，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因此，他过去有很长时间一直是、而在某种程度上目前仍然是真实的巴西国家——拥有广大而野蛮的内陆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象征；这个国家，同帝国时期所培育的，而临时政府的“博士们”和新闻记者们又认为触碰不得的那种由城市构成的人为国家，是完全对立的。

在巴西政界人物的画廊里，弗洛里亚诺这种类型的人，到那时为止，还一直是不为人们所知的。巴西独立的初期，有几个人，譬如若泽·博尼

法西奥、费若和贝尔纳多·德·瓦斯康塞洛斯等，曾经享过盛名。他们的坚强意志，给巴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第二王朝期间，其它一些政治家，诸如巴拉那、奥林达和奥罗·普雷托等人，都以他们具有权威性的活动能力而闻名于世。在对拉普拉塔河地区和巴拉圭的战争当中，出现了高傲勇敢的军事英雄，如奥索里奥、巴罗佐、塔曼达雷、佩洛塔斯和德奥多罗等。军事才能同稳健的政治见解，在卡夏斯身上，非常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使他在南里约格朗德，解消了自相残杀的仇恨。但是，关于这些人物，都并没有任何令人迷惑不解的神秘之处，他们从最初参加当时的事件起，就都把自己暴露得一清二楚了。

91 弗洛里亚诺是一个在心理上使人感到惊奇的人物。他通过种族血统的隔代遗传，再度表现出西班牙美洲的考迪罗的特性，并可能是一个最纯粹的亚种，即：沉默寡言、不露锋芒、口是心非、轻视外表。因为他很喜欢把权势作为突出自我的一种方式，所以当他认为有用或必要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甚至使用残忍的手段。但是，他很留心地遵守某些条例和官场的礼仪；军人们往

往都是这样做的，即使在他们反抗既定秩序的时候，也是如此。

直到共和国诞生以前，在弗洛里亚诺的经历当中，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1839年，他生于阿拉戈斯州马塞约附近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中。他的普通种植者的家庭，丝毫没有东北地区大地主那种虚荣心很盛的贵族习惯。家里因为贫困，而十个孩子的负担也过分沉重，便把他交给一个生意较为兴隆的叔父去抚养，他的叔父拥有一座糖坊，并与本省剧烈的党派斗争有牵涉。他在里约的一个学校学完中学课程(当时叫做文学预科)，即到步兵营入伍。1861年，他考进军事学院。他并非以学业出名，而是以体力、敏捷以及喜好画校内小剧场的布景出名。

1861年，弗洛里亚诺第一次晋级，升为炮兵少尉。1865年，他参加了反对巴拉圭独裁者的战役，在乌拉圭阿纳指挥一支小的河上舰队，以阻止敌军的两支部队会师。他立即以沉着勇敢出了名，并且又提升了一级。他参加了几次大的战役，例如：图乌蒂、伊托罗罗、洛马斯—瓦仑蒂纳斯、安古斯图拉等战役。他那种冷静地蔑视危险的态度，经常

为他的战友们所谈论。据说，有一次，为了给他那些吓呆了的士兵树立一个勇敢的榜样，他竟泰然自若地让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直到洛佩斯逝世使战争结束以后，他才返回巴西。那时，他是一位中校，佩戴着许多军功勋章。

弗洛里亚诺同许多其它的军官一样，在和平恢复后，就转到官场中供职。他充任过各种不很重要的职务，并且时常在他叔父的甘蔗种植园中度假。他在那里，同他的一个表妹结了婚。1882年，他代表中央政府，对马塞约臭名远扬的学校考试情况，进行了调查和清洗。次年，他升任旅长（等于现在的准将）。当他在伯南布哥州和塞阿腊州任司令官的时候，他一定对解放奴隶运动颇为慎重地表示过赞同，因为他被公开宣布为“自由塞阿腊”——累西腓解放奴隶俱乐部——的名誉会员。 92

1884年，弗洛里亚诺被任命为马托格罗索省的省长兼军事司令官，同时，他也对发展马黛茶①

① 马黛茶(Herva mate)：西班牙语为 Yerba mate，英语为巴拉圭茶，是一种常青灌木或矮树(Ilex paraguayensis)，用它的叶子可以酿成一种芬芳的饮料，其中咖啡硷的含量很高。这种茶，在南美洲的南部地区很流行。——英译者

工业发生了兴趣。他并努力镇压未开化的印第安人(他们时常威胁库亚巴城)。他所采取的种种凶暴的方法，与美国拓荒者和阿根廷的考迪罗所使用过的方法是相同的。他对于政治问题也发生了兴趣，于是加入了自由党，并在解放奴隶的运动中，采取了比较积极的立场。

弗洛里亚诺在私人通信中，间接提到政治的地方，话都说得含糊不清，他是从党派斗争的观点来考虑政治的。军队方面的问题，曾经使他的许多同僚都感到非常不安，而且结果也使得德奥多罗改变宗旨，投向了共和主义革命方面，但是却并没有引起他的烦恼。尽管如此，他在1887年7月，从阿拉戈斯州写给一位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仍然简要地写道：

> 我看到了对军队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它出乎我们每个人的意料之外。仅这一事实就无可辩驳地证明，遍布于我们这个贫穷国家的腐败现象，亟需用军事独裁来加以扫除。作为一个自由党人，我不能希望用武力来统治我们的国家，但它能够洗清我们这类腐败的社会躯体里的血液，这一点是无人不晓，而且也是不乏先例的。

按照他自己后来所实行的独裁统治来看，这些话可能具有预言的意义。弗洛里亚诺是在描述他自己要走的道路。但他的这个通信写在共和国成立以前两年半的时候，从上下文看来，他所说的话，仅仅表示一时的激动，一种感情的流露。因为他继续安心地为帝国效劳。

弗洛里亚诺一度想辞掉军队的职务，去经营阿拉戈斯的甘蔗种植园。不料，当他担任驻帝国首都第二旅司令官的时候，却又被任命为陆军代理军务局长。在奥罗·普雷托内阁就职时，他第三个获得了陆军元帅这一最高军衔，并被任命为军务局的常任局长。共和国来临时，他在军队和行政中的职位都达到了顶点。

弗洛里亚诺对于新政权持什么态度呢？这也和同他有关的各种事情一样，很难作出明确的回答。在他那些早期同党人的心目中，他早就是赞成共和国的了；他还审慎地参与了推翻佩德罗二世[93]王朝的军事阴谋。但是，君主国最后一任内阁的首脑奥罗·普雷托却绝对相信他对旧制度的忠诚。他的战友，以及那些把德奥多罗争取到共和主义运动方面去的文官们，都同样不能肯定，他们会不

会受到这位军务局长的接见，他当时直接负责保卫已经被围的总司令部和聚集在它围墙之内的大臣们。

弗洛里亚诺这个人的爱憎好恶，老是容易发生矛盾，他对于政治制度，看样子基本上是漠不关心的。作为一个冷冰冰的现实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在最后一分钟到来之前，并未拿定主意，后来他才断定：不管是为了奥罗·普雷托，还是为了帝国，看来都不值得牺牲总司令部的后备队的性命，去和德奥多罗的叛军作对。他大概一点也没有象德奥多罗那样顾虑重重，便宣布他支持共和国了。

11月15日前夕，他在陆军中担任着责任最重的职位，似乎是一位非常忠诚可靠的军人。13日，他还为了某些小恩小惠，向奥罗·普雷托表示了谢意，并且补充说，政府的首脑“一定已经听到，外边正在策划某种阴谋，但是无须重视，可以信任军事首领的忠诚，他们正在戒备着。”据说弗洛里亚诺在讲出这些话的前两天，就已经同德奥多罗亲自会见了一次，当时他表示，愿意为任何和解的方案充当中间人。最后，当他看到不可能达成协议

的时候，他以一种生动而玄妙的语句宣布说："如果事态不利于大礼服（Casacas）的话，我还有我这杆老枪。"接着他就请求解除他的军务局长，或者准许他退出现役，但是他要采取的这两个步骤都被劝阻了。关于11月15日早晨的举动，以及他和奥罗·普雷托的简短对话，我们已在本书第四章里描述过了。

弗洛里亚诺在临时政府的最初阶段，仍任军务局长。他很少引起人们的谈论。君主派没有原谅他这种被他们叫做背叛帝国的行为；而共和派却称赞他和革命力量站在一边，因而阻止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1890年5月19日，弗洛里亚诺接替本雅明·康斯坦特出任陆军部长；8月19日他接替鲁伊·巴尔博扎，成为临时政府的第二号人物。

弗洛里亚诺在国务会议里的态度，一向是小心谨慎的。在同德奥多罗发生的最严重的冲突中，譬如，为袭击《论坛报》报社一事所引起的冲突当中，他和他的同事坚定地站在一起。当全体内阁辞职时，他被任命为最高军事法庭的行政代表，同时作为他本州——阿拉戈斯州——的一个参议员，而在制宪会议中占有一席。国会选举他为共和 94

国副总统之后，他仿佛要退出政治活动。他在米纳斯患过一场病，病愈后再返回里约时，他一次也没有按照宪法的规定去主持参议院。他总是以健康不佳为借口，退出不适合他要求的处境，或者避开不适合他要求的谈话。

他显然正在等待机会，同时也正在暗中坚持不懈地进行活动。德奥多罗政府在卢塞纳内阁统治下迅速瓦解的情况，他可能比任何职业政客都了解得更为清楚。国会和德奥多罗进行斗争时，弗洛里亚诺袖手旁观，因为他了解，对于决定最后的胜负，他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物，这和他在11月15日时的情况一样。德奥多罗对于弗洛里亚诺的忠诚，即使是不大相信（他对卢塞纳的谈话表明了这一点），也并不能把他当作公开挑明的敌人来对待。而另一方面，国会则认为在反对德奥多罗的斗争中，他是一个易于利用的工具。但是，国会不久就为它自己的这种天真的错误而懊悔莫及了。

德奥多罗的辞职，可能并没有使弗洛里亚诺感到意外。11月23日，他毫无热情地接见了德奥多罗的陆军部长，这位部长当时是来请求他就任共和国总统的。弗洛里亚诺在政府宫里亲眼看到了

德奥多罗元帅及其忠实朋友们的情绪，但他一刻也没有失去克制。他在人们当中，好象是一个最冷淡和最不关心的人。德奥多罗心烦意乱地说道："愿上帝保佑，你将比我更幸运，比我得到更好的谅解。"弗洛里亚诺仅仅用一句含糊不清的、赞美的话来回答他的老战友。他关心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未经战斗就取得了胜利的消息通知给造反的海军舰队司令官。然后，在一份对巴西的宣言中，他解释了自己接管政府的理由，这多少要算是对德奥多罗那份宣言的一个答复。

那位共和国创始人在为他的辞职进行辩解的时候，再一次倾诉了他的苦衷。为了挽救巴西，他曾经迫不得已地解散了国会，但是"当今国家所处的局面，我为之做出最大牺牲的那些人所表现的忘恩负义行为，以及不让我可爱的祖国爆发内战的愿望，都激励我把权力交给那位必须接替我的公务人员〔原文如此〕"。

弗洛里亚诺所签署的文件，语调就大不相同了：

海军、大部分陆军和各阶层的公民，用武力把解

> 散国会的命令所中止的宪法和各项法律重新恢复
> 95 了。历史将记载武装部队为法律——法律是不能用武力来代替的——而采取的这次公民行动。但与此同时，历史也将回忆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大元帅的克制和爱国精神……为了遵守基本法并实现这次光辉胜利的革命的目标，我认为必须宣布，本月3日解散国会的命令，已属无效，同时解除首都和尼泰罗伊的戒严，并且重新恢复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安全保障。财政的管理将是我主要关心的事务之一。

以后，他用了一个更为明确的词句，来形容他所关心的这项事务，说他自己是"国库的哨兵"。

弗洛里亚诺的第一任内阁里，集合了一些杰出的人物。其中，法学家若泽•伊吉塔•杜亚尔特担任内政与司法部长，顾问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一个君主国的遗老，他小心谨慎地承认了共和国）担任财政部长。军事部长的职位，理所当然地分给了反对德奥多罗的主谋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海军上将和若泽·西梅奥·德·奥利维拉将军。

全国国民被政变和海军叛乱搅得十分惊惧不安之后，怀着信任的心情，接受了弗洛里亚诺的就

任。法律获得了胜利；宪政制度已完全恢复正常。重新恢复起来的国会，认为它自己是巨大的胜利者。国外的反应是表示同情。

和平的气氛只不过延续了几天工夫。原来支持德奥多罗搞政变的州长们虽然很快地就改为替走红运的弗洛里亚诺捧场，却被那些同海陆军结成联盟的反对派给免了职，而使他们无法把政府交给法定的继任人。他们当中没有几个人表示过要抵抗。情况恰好相反，特别是塞阿腊州的州长，他竟然忘记了前一天向德奥多罗热烈表示过的团结一致，而热情地倒向弗洛里亚诺一边去了。在一封著名的电报（可以引为那个时期的文体标本）中，这位州长大喊大叫说："整个巴西都在欢欣鼓舞，把信心寄托在她的英勇战士，她的元首的渊博智慧之上。一切都仰赖着您，并将永远保持安谧宁静。塞阿腊州同我站在一起，因而也同您站在一起。"后来，他仍然不免被武力赶下了台。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也证明必须炫耀一下军事力量，以便迫使州长退职。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公开地准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当地在11月3日以后不久，就把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赶走了。

在伯南布哥州（卢塞纳男爵正在那里尽力加强他的政党），公众的激烈情绪达到了顶点。那位过去拚命巴结德奥多罗的州长，已把自己的职位移交给他的继任人，而在州长官邸受到一场武装袭击之后，这位继任人也被赶下了台。不久以后，当人们要求从一张三人名单中为该州挑选一位新州长的时候，弗洛里亚诺却在名单之外另提出了一位年轻的军官，即亚历山大·若泽·巴尔博扎。

其它各州所发生的事件，和伯南布哥州也相差无几，那就是：行将爆发的革命、孤立的骚动、普遍的混乱状态以及最后由联邦政府直接进行干涉。海军部长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正处于政治权势的鼎盛时期，他在副总统的身旁，充当着高级警察的角色，在保护这个初生的独裁政权。他的朋友和党徒遍布各地；或许是出于真诚的愿望，他觉得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他必须保护这些人。他在他的故乡巴伊亚州，尽力为顾问萨赖瓦取得了州长的职位。萨赖瓦这个人是第二王朝的元老，他过去曾在惊愕的状态中，亲身经历了主张共和的制宪会议。

在边远的马托格罗索州，由于党派意见分歧

而造成分裂的联邦军队，挑起了遍及各市镇的武装冲突。几乎在所有的州，地方议会和行政机关都被解散了，或者按照反对派议员埃皮塔西奥·佩索阿（嗣后任巴西总统）的说法，"一次大的政变，接着就有二十次较小的政变。"

在这种普遍的骚乱中，弗洛里亚诺到处安插他最亲信的人来掌管地方政府，这些人通常都是年轻的军官。他的部长们一个接一个辞去职务，而且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接替者。弗洛里亚诺怀疑人们的价值，他对于他们可能表现的任何特殊才干，并不很重视。他的助手们，要经常不断地跳一种方形对舞，由一个部转到另一个部，而且往往同时把持两个或更多的部。他多疑、善防，并把他自己对权力的欲望伪装起来，所以只有他自己才算得上是政府。

各州的骚乱，立即反映到全国的政治上。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过去为了搞掉德奥多罗，曾经支持弗洛里亚诺，但此刻已同他分道扬镳了。新的反对派的借口，是保卫各州的自治，或者保卫联邦的原则。海军部长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认为他自己是11月23日运动的全国性领导人物，以

为他自己的权力与弗洛里亚诺相等，因而力图干预一切政治和行政事务，而弗洛里亚诺则采取临时妥协的办法，以等待适当的时机来除掉他。

鲁伊·巴尔博扎在国会被解散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曾经猛烈地抨击了卢塞纳男爵的财政政策，这时候又通过谴责解除各州州长职务一事，恢复了他的议会活动。几天以后，他在关于放弃参议院席位的声明中，明确地说："一个独裁政权，依靠地方政府的软弱无力，解散了联邦国会；另一个独裁政权，仰仗重新恢复起来的国会的支持，解散地方政府。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改进"。鲁伊·巴尔博扎不仅在参议院中，而且在《巴西日报》(他已担任了该报的经营管理工作)上，以及在最高法院，都是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弗洛里亚诺的反对者们进行辩护。

国会和报纸，为反对这位前任副总统的独裁政治而开展的运动，甚至比反对德奥多罗的运动，还要猛烈。某些年轻的议员，诸如帕拉伊巴州的埃皮塔西奥·佩索阿、伯南布哥州的若泽·马里亚诺以及巴伊亚州的 J·J·塞亚布拉等人，都是最热忱的战士。德奥多罗在军队和文职人员当中的朋

友，以及那些感到自己的政治机器已因大规模的撤职而陷于毁灭的人，也都被他们吸引过去了。

另一方面，圣保罗的共和主义者所渴望的只是避免文官之间发生新的冲突，因而直言不讳地支持弗洛里亚诺，实证主义者的主力也是如此，他们在军界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南里约格朗德州，政治上的混乱达到了极点。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和他的支持者尽管赞同德奥多罗的政变，但他们也照样倾向于弗洛里亚诺，因为他的政府，在许多方面，都适合他们的想法。大多数文人，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更深地卷入到政治漩涡之中，他们公开地敌视这个北方的卡博科洛人，不过，其中一些人，后来却将成为他最狂热的追随者。他们尤其敌视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海军上将，这是他们最喜欢讽刺的一个对象。

政治反对派所开展的运动，在某些军人集团里得到了一些同情。1892年1月19日，在军曹西尔维诺·德·马塞多的领导下，圣克鲁斯要塞叛变了，而不久就得到了拉热要塞的支持（两者都位于瓜纳巴拉湾）。1月22日，国会自动休会，以便让弗洛里亚诺去恢复秩序。政府没有能够把罪过加在

那些最应该负责的人们身上，但是弗洛里亚诺镇压叛乱的迅速、果决和冷酷手段，却使人民第一次领略了他们这位统治者的战斗能力。然而，这次领略，还不足以吓倒他的反对者。

报界提出建议说，弗洛里亚诺应当要求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在这一点上，巴西宪法与它所借鉴的北美和阿根廷的蓝本是不相符合的。巴西宪法第42条规定，“如果总统或副总统的职位，由于任何原因出缺，而总统的任期又不满二年，则应举行一次新的选举。”由于德奥多罗在任期第一年内放弃了总统的职位，所以弗洛里亚诺有责任执行宪法的这一条款。

98

那些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使这位副总统继续控制政府的人，以及那些真正害怕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会引起危险的人，都借助于暂行处置条例来回避第42条。在永久性的文本中，制宪会议已经为人民直接投票选举未来的总统和副总统，制定了规则。暂行处置条例确定了第一次选举的规则，并进一步规定了“根据本条(即由国会)选出的总统和副总统，将在总统第一届任期当中，充任总统和副总统的职务。”据此，当时不能举行新的选举。

众议院的宪法与司法委员会和参议院一样，在人们要求之下，对这次争论提出看法。它发表的那篇冗长的意见书，就走得更远了。它说，宪法的原文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印刷错误，即使用反意连接词“或”（ou）代替了连接词“和”（e）。换句话说，只有当总统和副总统的职位，在总统任期的头二年全部出缺时，才应举行新的选举。

弗洛里亚诺凭借着一套令人怀疑的法律术语，继续把持了总统的职务，而这套法律术语，似乎主要是出自政治上的和投机性质的解释，而并不是司法上的解释（鲁伊·巴尔博扎在答复文学家帕达尔·马莱特的来信时，称之为荒谬的解释）。但是，他却坚持保留副总统的称号。军职和文职官员当中反对他的人，都加倍努力地策划他们的革命阴谋。

1892年3月31日，十三名陆、海军将领，给他送去一封简短的信件，要求他下令进行一次总统选举：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陆海军将领，不希望由于他们的缄默，而对各州目前所处的组织瓦解状态，分

担道义上的责任，特向元帅您提出呼吁，务请结束这种极其可悲的局面。各州的组织所以陷于瓦解，是因为不适当的武装干涉，非法赶走了它们的州长，而其结果又造成了无数公民的死亡，并使多少家庭内心里充满了恐怖、怀疑和悲哀。如果这种普遍的组织瓦解状态再长期地继续下去，那么1889年11月15日的功业，就将一变而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状态。签名人认为，只有根据联邦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而且在自由的、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立即举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才能恢复巴西民族的信心、安定与平静，恢复共和国在国外所得到的好评，而这种好评现已遭到严重的破坏。我们希望并且期待着您为这次选举，发布明智的命令，而您也将在过去出征作战为国家做出诸多贡献之后，当仁不让地再添上这一桩公民应有的重大贡献。

99

在这份文件上领头签名的有：阿尔梅达·巴雷托元帅（他过去曾在11月15日，参加了共和主义的革命，当时他正统率着驻在总司令部的忠于皇家的部队），德奥多罗政府的前任海军部长万登科尔克海军上将，以及陆军军医和德奥多罗的兄弟若奥·塞维里亚诺·达·丰塞卡将军。弗洛里亚

诺在伊塔马拉蒂宫，以他惯有的从容态度，接受了这个带有威胁性的宣言。当天晚上，他免去了签名者的军事职务，并使他们退了伍。

接着，弗洛里亚诺向全国发表演说，抨击了那些冒称自己有权的人，说他们自认为是：

> 宪法的最高解释人，〔而且他们〕尽管被授予了高级职位来维护并保卫国家的荣誉、领土的完整和国内的秩序，然而他们却带头助长国家的紊乱，并带头破坏它在国外的声誉，使国外有可能误认为，巴西共和国已经达到了叛乱和完全毁灭的灾难性时期。

他指出：宣言的几个签名者，曾经是11月3日政变的热烈支持者，同时他也严厉地谴责了他们的违法乱纪。

有一位将军和一位海军上将，对他们自己在宣言上签名一事，表示了懊悔；其它的人则坚持他们的决定，并对迫使他们退伍提出了抗议。两位青年军官希梅诺·德·维莱罗和塔索·弗拉戈佐提议“把宣言的签名者从俱乐部中开除出去。”军事俱乐部接受了这一建议。这样，弗洛里亚诺便再一

次向全国显示，在他那疲倦的、无精打采的外表之下，实际隐藏着一种不可遏止的精力。

国会正处于休会期间，弗洛里亚诺完全意识到，他正在迅速而有把握地走向独裁。国家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里。那些实证主义者们，过去没有能够把易于冲动的德奥多罗，改变成为共和国的一位理想的独裁者，现在又开始崇拜他的继任人了。军事和非军事学校的学生们，对这位未来的铁腕元帅，充满了最初的强烈的热情。爱国大军的数目增加了。第二王朝期间，安静沉睡的巴西，100 仿佛为了保持警惕而自行武装起来了。比较容易受感动的共和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制度的命运，要以保卫弗洛里亚诺权力的合法地位为转移。

阴谋策划者们，因为在反对弗洛里亚诺的斗争中被赶入了绝境，于是便铤而走险，企图重振德奥多罗的声威。在将领们的宣言发表十天之后，他们公开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向以前的临时政府元首致敬，他们说，他的辞职并没有得到国会的明确承认。德奥多罗当时因为生病，不能接见游行示威者，但是这个制造街头骚乱的借口，却已经被他们找定了。一批批激动的人群布满了城市；胆子

大一点儿的人，还曾经试图到达总统府。弗洛里亚诺从他在远郊区的普通住宅，沉着自若地乘火车赶来，亲自逮捕了那些他认为是最危险的人。次日，他便把他们流放到巴西北部边境上有害健康而几乎无法进入的地区。在一群群被流放到亚马孙河上游的人，以及被禁锢在碉堡里的囚犯当中，有军人、新闻记者、文学家和国会议员，尽管最后面的一种人，享有国会的豁免权。

这位副总统的独裁，对反对他的人们来说，现在已成为一种危险的现实。他们开始认识到，同这个匿影藏形、顽固不化的弗洛里亚诺较量，比起同那位易于冲动的德奥多罗较量，已经越来越困难得无边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已经没有人能够以内战的威胁迫使他辞职。据传，他曾经说过，只有法律或死亡，才能撤掉他的职务；他的政府是合法的，而且他从来也没有害怕过死亡。由于这种原因，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海军上将所领导的那场即将爆发的叛乱，就再也不会局限于用军舰在瓜纳巴拉湾上进行演习，或者向坎德拉里亚教堂的圆屋顶发射炮弹了。

里约热内卢处于不断惊恐的状态之下，每天

都有发生新叛乱的谣言。4月10日事件的策划者，刚刚得到大赦，就返回来进行新的革命阴谋。反对派报纸的自由，不曾因为戒严而被剥夺，这时公开地鼓吹革命，甚至鼓吹赶走政府首脑本人。有两份报纸，以语言刻毒而闻名：一份是帕达尔·马莱特发行的《战斗报》，一份是属于著名的废奴主义演说家若泽·多·帕特罗西尼奥的《都市报》。弗洛里亚诺的最热情而又最好冲动的拥护者，名叫劳尔·庞佩亚。他凭着高超的才智和病态的敏感性，为巴西的文学，做出了极其有趣的贡献。

差不多与南里约格朗德和米纳斯吉拉斯发生 101 颠覆活动的同时，在圣保罗也出现了阴谋推翻州长的迹象。不久以后，在米纳斯，有一个阴谋，逐渐发展到要把该州南方的一块地区分割出去，而成为联邦的一个新的单位。弗洛里亚诺政府扑灭了这次烽火，然而，他却不能防止其它类似的烽火爆发。在不流血的革命中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开始向本大陆为时已久的考迪罗主义，付出它延期未付的代价。德奥多罗解散了国会之后，已经给巴西开创了一个不安定的时期，它很象摄政时期，只是没有那个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想意识罢了。革命宣言

支配一切的时期，即弗洛里亚诺所说的可能落在国家头上的最大灾难，已经开始了。

年轻的军人，充满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并且认为，需要通过独裁来重建腐朽的社会组织，他们确信共和国的命运要依仗他们来决定。巴西政界和社交界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分子，曾经在帝国时期那种有秩序的环境中生活过，而且也曾经称赞过临时政府初期的自由主义的立法，他们觉得新的办事程序非常令人讨厌。然而，他们又没有能力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个能够发挥中产阶级潜在力量的大反对党，于是他们只好后退，而抱着只顾自己或者失败主义的态度，再不然，就转而设法聚集在武装部队代表人物的周围。

在重新恢复被解散了的国会时，弗洛里亚诺似乎变成了反对无政府状态和军阀主义的法律和秩序的化身。巴西的一些最富有的（明确说来，也是最保守的）地方，如圣保罗和米纳斯，便急忙提出保证，支持弗洛里亚诺政府，因为国会已经明确承认了该政府的合法地位。坎波斯·萨莱斯再一次以圣保罗共和主义者的名义，承担了调停的工作，以排解怨恨和自尊心所受到的损害，特别是万

登科尔克海军上将所受到的损害。

但是，以为弗洛里亚诺可能是政界书生们的工具，或供他们实现和解企图的工具，这种最后的幻想，不久就被他本人给粉碎了。由于他那种主张权力服从的性格，或者由于他确实相信，共和国宪政的严重危机，不能够用安抚或犹豫不决的自由主义等陈旧的万应药来解决，所以弗洛里亚诺便把他的独裁统治，强加在已经遍体鳞伤的宪法的躯体之上了。

经济上破产、思想上保守的全国群众，开始恐惧并沉默起来。国会为了保住它自己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威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鲁伊·巴尔博扎变成了公民自由的最勇敢的保卫者。为把北美的各项政治制度移植到巴西来，他曾是负有最大责任的政治家，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这些政治制度的最权威的理论解释者，也可以说是新共和国的首席司法秘书官。他对在报纸上和国会中进行的活动感到绝望之后，就转而求助于法律。他曾经幻想，联邦最高法院完全可以和华盛顿的最高法院相媲美，但是，联邦法院却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关于发给政治犯以人身保护令的请求。这里举

一个弗洛里亚诺冷嘲热讽的实例。据传，他在当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法院的法官向政客们授予人身保护令，那么明天轮到他们自己需要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谁再把人身保护令发给他们。"

国会在1892年5月3日的例会期，重新召开。反对派所进行的猛烈抨击是不乏理由的，如驱逐各州州长下台、对国会议员和军事人员的逮捕和流放、法院的失职以及财政的混乱状态等。

帝国时期，因为有两个人为政党之间的竞争，而它们掌权的期限又是由佩德罗裁决的，所以它曾经安享过太平。共和国没有能够即刻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平衡，来代替它在革命变革中降临时所破坏了的平衡。联邦各州的政治机构不得不交到新人物的手中，他们大部分都是年轻军人，对于政治事务没有经验，而且归根结蒂，又直接从属于中央政府。

但是，君主国的大部分政客，很快就默默地接受了共和国，并立刻开始了他们的党派政治活动。全国保守阶级都对他们抱着最殷切的愿望，这些阶级重视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经验，而尤其是把他们当成了抵制军事暴政的一面盾牌。不过因为

毫无纪律，结果就使他们分裂成许多小团体，激烈地争夺着地方上的官职。

为了生存，联邦政府感觉到必须和各州的党派和解。要经常使各种利益集团达成临时妥协和保持均衡，这种情况充分反映在国会里边；而且，完全可以理解，此事也占去了总统的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

尽管发生了革命运动，然而帝国留下来的有关公民个人权利的牢固传统，却还没有消失。公共机关对于单独一个人或者强大集团所提出的那些受法律形式保护的要求，却经常被迫作出让步。“恩西利亚门托”时期，产生了一个包括商人、冒险者以及在市场与外汇中进行投机倒把的阶级，它力图直接或者暗地，特别是利用国会的力量，干涉公众事务。这样一来，巴西便也出现一种和北美政治团体以及院外活动集团相类似的实例。

103　解散国会，增加了政治上的紊乱。总统因为不得不维持公共秩序，而且嗣后不久，又要对付重大的颠覆活动，所以他就无力去解决任何行政问题。如果说政府的日常工作已陷于一团混乱之中，那么它的财政看来就是不折不扣地崩溃了。

弗洛里亚诺政府所接受的遗产，乃是极其沉重的负担。通过外汇汇率、证券价值以及国库岁入的不断下降，财政危机已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政局的不稳定和清理“恩西利亚门托”时期的后果（它使通货贬值，而又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财富来源），使得新政府的工作，更为棘手；当时新政府的财政，已经交托给明智而又有全面判断能力的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嗣后任巴西总统）。

废除奴隶制的命令，是在经济上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颁发的，其后果正在通过农业劳动力的不足以及自由农业工人工资的提高（特别是在圣保罗）逐步表现出来：这种工资的提高，只不过增加了生产的成本，并没有使极低的购买力有所提高。北方的大制糖工业与圣保罗的咖啡工业不同，它不能使用移民来代替奴隶，所以正在走下坡路，并使已经岌岌可危的地方经济更加贫困起来。里约热内卢州这个君主国时期古老的、富裕大地主们的中心，开始迅速衰落。已经很低的国民生产总量，又显著地降低了。

因为放弃了临时政府的大胆计划，巴西发现她自己已经被投机冒险活动的恶习削弱了（她也

许并没有更加贫穷，但是已被忧虑和苦恼重重包围起来），而且陷入了政治和行政上的无政府状态。〔德奥多罗最后一个财政年度〕联邦收入为208,000干度，只比帝国最后一个财政年度多5万干度。流通中的纸币，在1889年11月15日为20万干度，已经增加到514,000干度，也就是说超过联邦的收入一倍以上。这在巴西的财政史上，显然是其它任何时候所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共和国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的贷款，因为它从上一代王朝继承下来的2,900万英镑外债，就已经够多的了。统一内债几乎达到40万干度。咖啡和天然橡胶的出口值，差不多分别稳定在1889年2,200万英镑和550万英镑的水平，勉强能够维持国民经济。创办制造工业的尝试，为时尚短，还看不出有什么成果。巴西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仍旧局限在出口少数几种农产品和原料，同时输入满足她最低需要的一切其它的东西。

104

弗洛里亚诺在接管政府时，他的注意力好象特别集中在消除遭人物议的政策上。他的财政部长的工作计划是小心谨慎的，其中包括：节约行政开支，征用发行银行的财产，以及逐步收回过剩的

纸币。有些集团信赖旧的通货膨胀政策，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使国会连连受到冲击，但国会没有什么明确的行政方针，而试图把那些赞成与反对发行纸币的人调和起来。

临时政府以信用膨胀和保护关税来促进都市工业的美梦，很快即化为乌有。以进口税为基础的赋税制度，使政府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不限制输入，则黄金外流增加；而实行限制，政府行政支出所必需的收入又得减少。财政部长们试图为财政局势建立某种秩序，但却毫无结果，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台下台，有时候从办公室走进了监狱。

弗洛里亚诺被迫把他早先要实行节约、要做“国库的哨兵”的意愿丢在一旁，而求助于一切可能想到的金钱来源。国会在财政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在卢塞纳内阁期间，国会的大多数议员，曾经毫不妥协地反对发行纸币的制度。众议院最后以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计划，规定：总发行量应以尚未兑现的数量为限；同时，各银行要重新建立它们的黄金储备，以便在五年内将它们的纸币兑现。拥护发行纸币的人刚刚以鲁伊·巴尔博扎的长篇激烈演说来反对这个计划时；11月3日的政

变就发生了。

在弗洛里亚诺政府统治下，财政政策经历了新的变化。拥护发行纸币的议员们，以参议员鲁伊·巴尔博扎和阿马罗·卡瓦尔坎蒂为领导，坚决主张维持银行旧有的特权。最有势力的政府支持者，激烈地反对他们，并且赞成财政部长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提出的关于由国库没收纸币的建议。政府从罗思柴尔德财团得到一笔100万英镑的贷款，规定在一年半内偿还。外汇率不断跌落，耗费了联邦岁收(当时约为30万干度)的三分之一以上。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关于没收各银行发行的纸币以清除“恩西利亚门托”后果的计划，并没[105]有得到弗洛里亚诺·佩绍托的完全同意，因而他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塞尔泽德洛·科雷亚接替了他。国会里提出了许多的金融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往往是和政府不相协调的，而政府又发现，它自己不能确立任何坚定的政策。以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为首的政治派系，建议把巴西银行和共和国银行合并，由这个新银行负责，在两年内，用它自己发行的纸币，代替其它银行和国库所发行的纸

币。这样就又重新回到鲁伊·巴尔博扎的政策上来了，他在临时政府时期实行的政策就是由单独一个、而不是更多的银行发行纸币。格利塞里奥的提案，尽管在〔1月22日〕国会休会之前，还没有来得及在参议院辩论，然而却同政府的愿望相反，在众议院得到了通过。在国会休会期间，塞尔泽德洛·科雷亚发布命令，把两家银行合并。这个新的巴西合众共和国银行，受权发行了两倍于其黄金储备的纸币。这个办法既使那些主张银行发行纸币的党派得到了满足，政府的法令便也满足了那些持相反的思想理论者的要求，而允许发行10万干度的国库债券，以应付工农业的需要。此外，政府还占用了米纳斯铁路公司从国外借来的400万英镑，并且把已经收回的大量纸币重新投入到流通之中。

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措施，只能使财政情况更加恶化。在民穷财尽的巴西，连最基本的经济政策也还没有开始建立，但是正当英镑与密耳瑞斯的兑换率从每密耳瑞斯27辨士下降到10辨士的时候，国内不兑换的纸币，却从1889年的192,000干度，增加到1894年的712,000干度，其中37万干度

(国库债券未计在内),是直接由政府发行的。外国银行任意对汇率进行投机,随心所欲地操纵汇率的涨落。

正因为有这样一些混乱状态,里约格朗德联邦派的革命和里约的海军叛乱,便促成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暂时重新组合,而它的实力也十分强大,足以保证政府在议会中获得多数。领导这个新政党的是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他是共和国的老宣传家,曾任德奥多罗内阁的农业部长。这个新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集合体,其中包括老牌的共和主义者、前君主主义者、温和的自由党人、老式的保守党人、联邦主义者、集权主义者、狂热的弗洛里亚诺派即"保王派"、不妥协的急进派、实证主义者、顽固的总统派,以至于库斯托迪奥·德·梅洛叛乱的同情者。

106 一位议员曾形容这个新党是"一个对各种教义兼收并蓄的大教堂",而它们所取的名称是联邦共和党。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得到了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本人的赏识,他〔身为贫苦的青年时〕曾经靠自己的努力,在圣保罗的乡村富豪政治中,精明干练地步步高升,他具有一切必需的能

力，在千万种日常困难中，去指导他所建立的那个杂凑的政党。

弗洛里亚诺因为一心一意要争取他的政府的生存，所以允许他的这位指导人在政治事务和议会事务中可以采取自由行动。就中特别要提到格利塞里奥已经变成了“21旅”（国会中二十个州和联邦区的代表）的将官，这就第一次证明了，临时政府过去把名誉将军的金绶带奖给他和其它部长，确实是有道理的。

1892年，全年都充满了恐惧而且经常是痛苦的气氛。政治上的怨恨，在一切事物中都居于极其显著的地位。没有人怀疑革命即将来临，而弗洛里亚诺则专等着这场革命爆发，好去镇压它，同时强制推行他的行政统治权力。君主主义者已经转移到欧洲一些较大的中心和拉普拉塔河地区，他们在那里进行着破坏共和国声誉的激烈活动。追随弗洛里亚诺的青年人的那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感情，变成了带有攻击性的排外情绪。政府被迫从各方面来保卫它自己，它依靠着非正式的顾问们和倏忽一现的部长们所鼓吹的权宜之计，一天天地生存下去。

107

第八章

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危机

南里约格朗德州的特殊情况——高卓人民的心理状态——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和西尔维拉·马丁斯——联邦党革命的初期警号——弗洛里亚诺的态度——内阁危机

反抗弗洛里亚诺的独裁统治这个最殷切的希望，已经转到南里约格朗德州的身上。海军是另一股几乎尚未动用的巨大力量，它曾经迫使德奥多罗于11月23日退职，所以很可能为反对这位副总统而再一次建立同样的功业，或者至少能够强迫他全面地改订国家的政策。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和海军中，有弗洛里亚诺的反对者们的两个强大支柱，即：仍然向往旧制度的君主派和切望巴西在共和国统治下继续和平发展的自由主义少数派。

南里约格朗德和巴西的其它任何地区都迥然不同。由于它的自然地理、它的种族和社会背景、它的经济活动、它作为一个边疆省份的具体情况以及它政治上的风习惯例等项原因，它一向受到巴西统治者们的特别注意。它的特点，使得它不大容易同巴西的其它地方融为一体。它那广大而单调的草原和海洋接触的地方很少，尽管它沿着大西洋有一条辽阔、平坦、低洼的海岸线，但却缺少天然港口①，这个缺点，是它那巨大的内湖——帕托斯湖所无法弥补的。南里约格朗德州在其同外国毗连的边境上，经常处于警戒状态，所以，它的发展不能不同巴西其余地区互相隔绝的情况，要比别的省份更为严重。最初到该州平原和山麓小丘上交叉来往和定居的有：圣保罗的拓荒者、勇敢地闯过丛林而侵占了耶稣会印第安人围地的人们、从北方来的冒险者、从拉普拉塔河地区来的西班牙人，以及从亚速尔群岛迁来的葡萄牙人。 108

① 该州唯一比较重要的港口——里奥格兰德港——位于帕托斯湖的南端。州的首府阿雷格里港，位于湖的北端。——英译者

南里约格朗德这个最后被引进国家生活集体的地区，没有经历过巴西其它地区所经历过的等级制度。畜牧业是在没有藩篱的平原上经营的，这种情况排除了建立大地主所有制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没有象巴西其它各地那样出现过悉心维护其本身特权和文明的乡村贵族。尽管同乌拉圭和阿根廷在商业上的密切关系，使得里约格朗德人产生一种和其它巴西人不很相同的心理状态，但是这种对外贸易，也提高了他们保卫国家的本能。

平原上的生活和放牧牲畜的工作，使南里约格朗德的高卓人① （和拉普拉塔河地区那些与他们极其相似的人们一样）养成了骑手和放牧人的习惯，因而也就养成了冒险、战斗和打游击的习惯。长期的“法拉波斯”内战，曾经把他们旧有的勇武好战的本能激发起来，然而第二王朝的安抚政策，后来又把它给压制下去了。在该省的丘陵地带，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居民点的发展，给它那原始的、单一的畜牧经济，带来了其它的财富来源，而

① 高卓人(Gaúcho)：从前指骑马牧人或者牧主，现在指南里约格朗德的土著或居民。葡萄牙语读如：嘎一乌一述。——英译者（中译名按其他拉美国家所用的西班牙语音译出。——译者）

且也多少改变了它的社会形式。外国人居民点经营的小规模的农业制度，使得南里约格朗德有别于巴西社会的主要形态。后者是由东北部的糖业大王以及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的大农场主所确定的。

同所有那些缺乏阶级社会的传统训练的民族一样，里约格朗德人始终赞成一个强大的州，或者说赞成由州来进行控制的组织。政党，无论在巴西的其它哪一个州，都没有扎下过这样深的根基，个别领导人也都没有获得过这样大的势力。因为南里约格朗德的高卓人，关于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可能比其它任何巴西人都更为强烈，所以他们同时也更具有乐于参加政党的倾向，这恐怕是从氏族或游牧部落的远古时代残留下来的一种逐渐消失的记忆罢。

在第二王朝的最后阶段，由其领导人加斯帕尔·达·西尔维拉·马丁斯顾问所控制的自由党，实际上已经独占了南里约格朗德的政治支配权。西尔维拉·马丁斯是一个最纯粹的高卓人，他除了他的人民所共有的优缺点之外，还具有许多特殊的美德，这就使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后

期，在巴西处于十分显著突出的地位。他的体力 109 (若阿金·纳布科称他为“帝国的参孙①”)、他的热情、他那惊人的知识以及口若悬河的辩才②，在这一切方面，他似乎都是出类拔萃的。这样，他似乎已经成为那类少数人当中的一员，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埋头猛干，就能够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无情地改变这些事情的和平发展过程。在这类人中，米拉博③是最高的典范，当东④和甘必大⑤是比较拙劣的模仿者，而凯末尔⑥则是当代完美的标本。

---

① 参孙是古代希伯莱的大力士，见《圣经·旧约》。——译者

② 另一位作家描写他是“巴西最有名的雄辩家，他的演说被比喻为炽烈的火光、火焰、火、火山、地震和雷霆闪电。”——英译者

③ 米拉博（1749—1791年）：法国的雄辩家和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译者

④ 当东（175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译者

⑤ 甘必大（1838—1882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善于演说。——译者

⑥ 凯末尔（1880—1938年）：土耳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译者

西尔维拉·马丁斯这个人，对帝国的谴责时常毫不留情，他的判断和他的态度往往错误。他骄傲、大胆而且为人们所畏惧。他在佩德罗二世王朝的末期，正接近于他政治生涯的顶点。当时，他任本省的省长和帝国的终身参议员。尽管他引起了人们的畏惧，但他充任参议院议长的时机业已成熟，而这个职位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里约格朗德人充任过。1889年11月15日，奥罗·普雷托认为他是能够抵抗共和国政变的唯一政客。但是，共和国在他从南里约格朗德前往里约热内卢的途中，将他逮捕，并且把他流放到欧洲。这是因为在帝国的所有的政界首领当中，西尔维拉·马丁斯是他那个久经战斗锻炼的省份里对民众具有最大号召力的人，也是唯一有胆量敢于进行一次反革命尝试的人。

由于其自由党的大头目已被流放国外，南里约格朗德便为一小帮老共和主义者接管。其中，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的权威日益增长，不久就占有了显要的地位。卡斯蒂略斯于1860年诞生在该省内地的一个牧场。因而他的童年是在俭朴而粗野的典型高卓人的环境中度过的，在那里，往昔

的内战以及联邦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愿望，一直都没有被人们忘记。从1877年到1881年，他在圣保罗的法律学校读书，也就是在这里，他对1870年宣言所开创的共和主义宣传产生了兴趣。他试做过政治新闻工作，并且受到实证主义理论的影响，这种实证主义理论在特奥菲洛·布拉加① 于葡萄牙倡导的那次哲学运动之后，已经在巴西某些知识中心急遽地传播起来。

卡斯蒂略斯返回南里约格朗德之后，同维南西奥·艾雷斯一起，组织了该省的共和主义宣传工作。共和主义的报纸《联邦报》于1884年创刊时，他担任了该报的主编。在新闻写作中，他把对于论战(时常涉及个人并具有攻击性)的爱好，同他对110 于理论的热心，紧密地溶合在一起。通过报纸，他顽强地进行了反对帝国、反对奴隶制度和反对西尔维拉·马丁斯的运动。他的实证主义倾向，使他离开了圣保罗的自由共和主义者，而同那些追随本雅明·康斯坦特的青年军官结合在一起。在共

① 特奥菲洛·布拉加（1843—1924年）：葡萄牙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任葡萄牙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译者

和国宣布成立的时候，他是提名佩洛塔斯子爵担任州长的人物之一。

佩洛塔斯是巴拉圭战争中的一位老英雄和帝国的参议员，他在“军事问题”上曾经起过主导作用。卡斯蒂略斯被任命为佩洛塔斯政府的秘书，而事实上执掌了该州政治和行政的指导工作。不久之后，他同佩洛塔斯发生了分歧，并退出了政府。这位老将军本人的任职期间也并不长久。卡斯蒂略斯被任命来接替他，但是卡斯蒂略斯没有接受，而推荐了弗罗塔将军。不久，由于不同意德奥多罗的财政政策，尤其是不同意创建南里约格朗德发行银行，弗罗塔将军和他的卡斯蒂略斯派朋友们，都辞去了职务。卡斯蒂略斯继而被任命了各种暂时的行政职务，最后(于1890年)依照宪法的规定当选为州长。

在卡斯蒂略斯任州政府首脑时，他就再也得不到那些共和主义旧伙伴们的一致支持了。德梅特里奥·里贝罗、阿西斯·布拉济尔、巴罗斯·卡萨尔以及安唐·德·法里亚等人的不满，促使正统的共和派团体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对党，并促使那些顽固而坚决地与他为敌的人，大大增多了。

结果，当1893年革命刚要爆发的时候，两个大政党正在争权夺势，一个是以卡斯蒂略斯为首的共和党，另一个是联邦党，后者在西尔维拉·马丁斯的最高领导之下，由各个反对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谓的“违反联邦宪法的实证主义独裁统治”。往昔边疆考迪罗主义的那种好战的冲动，已经蛰伏了将近六十年之久，现在又重新被激发起来，开始打巴西最残酷的内战了。

作为本州参加全国制宪会议代表团的首脑，卡斯蒂略斯自命为极端联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拥护者。他把自己未能设法加到联邦宪法里去的东西——专一在预算上起作用的一院制，由州长任命副州长，州长的改选，义务教育等——嗣后都写进了他本州的宪法。这种实证主义的宪法，在卡斯蒂略斯时代，是历次革命所利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在他的继任人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充任州长的三十年期间内，也一直是各党派激烈斗争的永久性原因。

当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就任共和国总统的时候，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已经被免除了他在南里约格朗德政府中的职务。从他没有公开反对

11月3日的政变（这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的缘故，虽然他并不赞成这次政变）来看，卡斯蒂略斯似乎是自己找着要倒霉。但事实与此相反，弗洛里亚诺针对个人所实行的全部政策，其目的都是同卡斯蒂略斯派进行和解，这派人同弗洛里亚诺周围的那些持实证主义观点的青年军官有着紧密的联系。弗洛里亚诺靠着他善于掩饰和敷衍的特殊本事，设法争取时间，并把里约格朗德政治上的混乱状态延长到一定程度，这样，将来恢复卡斯蒂略斯的坚强统治，就成为保卫共和国所必不可少的事情了。

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后来在他关于海军叛乱一书中叙述说，弗洛里亚诺假装他是站在卡斯蒂略斯的敌人（库斯托迪奥本人就是其中之一）一边，甚至当他已经为他们最后的必然失败做好准备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位机警的共和国总统，比分裂成许多党派的共和国政客们，更清楚而敏锐地预见到，那些转瞬即逝的人物和纷纭的事件，在南里约格朗德所进行的流动展览，已经预示着卡斯蒂略斯和西尔维拉·马丁斯之间将要有一次决定性的摊牌，而他们两个人，可能是里约格

朗德或者全国生活中，两种思想与感情的巨大暗流的象征。如果卡斯蒂略斯不在南里约格朗德，那里的统治权，迟早要落在西尔维拉·马丁斯强有力的手中。前自由党领袖的胜利，对弗洛里亚诺和共和国，该要有多么大的威胁啊！

西尔维拉·马丁斯在从流亡中回国后（可能是在1890年初），和大多数君主主义者一样，承认了共和国是一个既成的事实。然而，同新政权最初两年间全国到处都极其混乱的状况直接接触之后，他却相信（这和所有的保守派人物一样），共和国为了保存它自己，将不得不走另一条道路。特别是纷争不已的南里约格朗德那种倾向于内战并处于卡斯蒂略斯的实证主义宪法支配下的局面，可能又加重了他的恐惧。议会政治是有可能重整旗鼓的据点。席尔瓦·塔瓦雷斯将军所纠集起来的那帮反对派分子，于是由他担任了精神上的领导。他是一个老政治战略家，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设法把地方问题同全国性的问题分开；反对卡斯蒂略斯的实证主义，而不反对弗洛里亚诺。

112 在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领导之下，共和党人并不甘心丧失他们的权力，而这些权力，还在

11月23日以前，就已经被夺走了。接替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的洪达，为它自己的内部斗争所害，只存在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便又把州长的职务转交给巴雷托·莱特将军。圣克鲁斯的里约堡起义后数日，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自称是合法的州长）和他的朋友们，就接收了阿雷格里港的一座公共建筑物。他们把政治中心设在那里，并迫使巴雷托将军逃到“马拉若号”炮舰上去避难。叛乱扩展到该州的其它地方，法拉波斯战争以来几乎已经被遗忘的边疆时期的考迪罗主义，又在各地恢复起来，重新为交战的双方服务。在库斯托迪奥·德·梅洛的劝告下，弗洛里亚诺为了维护巴雷托将军的岌岌可危的权势，便任命他为军区的司令官，而撤掉了那个不大可靠的巴塞洛斯将军。“卡斯蒂略斯派”停止了他们的第一次革命尝试，要等到以后有了弗洛里亚诺的全力支持，才能够卷土重来。

1892年6月，在巴热召开的联邦党大会，通过了该党反对里约格朗德政权的决议：用议会制度为基础的代议制共和主义宪法，代替本州的实证主义宪法；禁止州长重新当选；建立一个立法的

(而不仅仅是通过预算的)议会；确立各自治区的自治权等。

尽管西尔维拉·马丁斯表面上是诚挚的，但是所有反对弗洛里亚诺的政治力量，不久就理解了联邦派这次行动的真实意义。弗洛里亚诺和卡斯蒂略斯的命运，开始联结在一起。议会制共和国可能仅仅是企图复辟君主制的外衣，而未来的事件也很有可能促使西尔维拉·马丁斯进行这种尝试。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弗洛里亚诺的表面上的暧昧态度，似乎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他依靠卡斯蒂略斯派的支持，并且以暴力的手段，用他所信任的人员，来接任圣卡塔林纳州的州长和副州长，都是为了加强他的政府的防御。他因为不宜在各州采取直接行动，于是便利用了一些密使，他们大体上都伪装成观察员或绥靖官，其中包括军区司令官贝尔纳多·瓦斯克斯将军。

居于统治地位的洪达，或者小伪政府，曾经罢免了卡斯蒂略斯，但却不能使它自己当权，于是把州长的职位还给了佩洛塔斯子爵。佩洛塔斯无意进行这场不可避免的斗争，他不能依靠联邦的卫

戍部队，也对他自己的警察力量缺乏信心，便又把权力授给他自己所选择的副州长席尔瓦·塔瓦雷斯将军。塔瓦雷斯是联邦党首脑中最勇敢的人，也就是他，使巴热城变成了反对派的主要势力中心。113

共和党人以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为首，迅即采取了行动，并且在1892年6月17日迫使佩洛塔斯下了台。卡斯蒂略斯再次当权之后，为使自己通过人民投票重新当选为州长，遂把他的职务让给一位精心挑选出来的副州长。席尔瓦·塔瓦雷斯将军在巴热统率着强大的部队，本来很有可能立即开始战斗行动。但是，由于尊重西尔维拉·马丁斯打来的一份恳切的电报，他退出了受到卡斯蒂略斯派威胁的城市。马丁斯的电文如下：

> 作为党的首脑我忠告你，作为同党的伙伴我请求你，作为一个里约格朗德人我乞求你：不要打内战。夺取权力和牵制联邦政府是没有必要的。对各种困难和政府固有的错误，自由的报刊和公众舆论，能够做到暴力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只因受阻于我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我不能到你那里去，向你说明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战的必要性。

重任州长的卡斯蒂略斯，想必确实感觉到，他自己的追随者和联邦党人之间，不可能进行任何和解。长期形成的、好不容易才压了下去的仇恨，开始以各种形式猛烈地爆发出来；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动乱的局势。在里约格朗德那样骄傲和勇敢的人民当中，这种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内战。

西尔维拉·马丁斯的电报中所抱的幻想不久就消失了。为共和党效劳的非正规军，在进入巴热城（塔瓦雷斯将军按照西尔维拉·马丁斯的劝告，已经撤离了该城）之后，并没有尊重放下武器的敌人按照习惯应享的权利。在该州的别的地方也发生了其它的残暴行为。

具有破坏性的兄弟自相残杀的本能被唤醒了。从边疆地带，从乌拉圭和阿根廷最远的地区，武装的考迪罗主义危险分子，那些一直准备着打仗、报复和犯罪的分子，都向这个火灾即将爆发的场所赶来。在卡斯蒂略斯重新当政以前任职的两位州长，当时已经前往里约，而且他们也无法制止共和党人和联邦党人在互相倾轧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暴行。

驻在阿雷格里港的一支小舰队，由桑托斯·

拉腊上尉指挥，并在巴罗斯·卡萨尔（已在一艘小炮艇上避难）直接煽动之下，于1892年7月举行叛乱，盲目地轰击了该城，但在几天之后归顺投降了。这件事标志着海军和陆军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并且是未来战争的一个预兆。 114

不过，在对这次革命本身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南里约格朗德的事件，对全国一般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国会中的反对派，态度更加激烈起来。塞阿腊议员儒斯蒂尼安诺·德·塞尔帕提出一个议案，要求授权政府对里约格朗德进行干涉，以防止内战，并且命令在共和国之前即已建立的各个自治区，选出临时洪达，根据联邦宪法的规定，对该州进行改组。塞尔帕的议案（在所投的128张票当中，仅以16票之差被击败）引起了一场极为激烈的辩论，并为里约格朗德的议员们所否决，因为它明显地谴责了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所赞成的那种宪政制度。德梅特里奥·里贝罗关于把大南方的事件归咎于弗洛里亚诺政府的动议，也引起了新的骚动。

几天以后，圣埃斯皮里托州的议员J·J·塞亚

布拉、雅克斯·奥里科和维森特·安东尼奥(后二者是军人),请求国会弹劾总统。他们列举的罪名有:以专横的行政命令迫使陆、海军军官退伍,解雇终身任职的教员,命令共和国银行与巴西银行合并并且控制货币的发行,强迫征兵,以及干涉南里约格朗德的内部事务。众议院否决了弹劾案,并且通过了它所属的宪法司法委员会的一个长篇报告,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圣保罗州的议员,而该州又一向是乐于维护这位总统的权威的。

联邦党的领导人在乌拉圭境内开会,决定要采取革命行动。这和被逐出政府的共和党人早先(于1891年末)在阿根廷的卡塞罗斯山召开会议所做过的决定一模一样。联邦党人在宣言中,号召南里约格朗德人民团结在他们周围,并且坚持了巴热计划,即:他们无意恢复君主政体,或者推翻联邦政府;他们只是要"从卡斯蒂略斯的苛政之下,把南里约格朗德解放出来"。在乌拉圭流亡的西尔维拉·马丁斯,不顾他打给席尔瓦·塔瓦雷斯将军的电报中已经预见到的危险,仍然接受了这场战斗在道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这些眼看就要发生的历史性事件,将要把南

里约格朗德的平原变成一个考验共和国的场所。由于里约格朗德的特殊情况，这个南方的大州，只好成为巴西新制度的战场。共和国，是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在一种漠不关心的气氛中，在一个巨大、无人管理而使人怠惰的国际都市中，宣布成立的；它将要在这里，证明它是否能够生存下去。 115

法拉波斯的戏剧性事件，将以不同的方式重演。1835年的革命者，在他们为地方自由、或者说为联邦而进行的斗争中，很有可能走到不惜分离的地步。1893年的革命者，在他们拿起武器反对卡斯蒂略斯的偏激的总统制、拥护共和议会制的斗争中，很有可能被迫恢复君主制，或者掀起一次巨大而危险的民族动乱。1845年，中央集权制君主国的胜利巩固了巴西的统一；卡斯蒂略斯的胜利将会巩固联邦共和国。虽然立宪君主国依靠其武装的胜利生存了半个世纪，1891年的宪政共和国却刚刚存在了四十年。

革命爆发之后，一直倾向于支持卡斯蒂略斯的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便不再掩饰他的这种意图。他以根据宪法条令恢复秩序和公共安宁的名义，对里约格朗德进行了直接的干涉。

在革命发生以前的南里约格朗德政治危机期间，库斯托迪奥已经成为反对卡斯蒂略斯的党派的领导人。他用来答复（卡斯蒂略斯所任命的）副州长关于宣布执掌州政府那份通知的电报，是一个很完美的范例，足以表明这位海军上将在任海军部长时所惯用的语调和所持的政治态度：

> 我已注意到，你现在是你州的副州长。请允许我告知你，我并不同意，你所说的委派你充任该项职务的权威是符合宪法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原则，我们就将破坏你所热心支持和赞美的11月23日的事业，而且也将恢复你必然认为是合法总统的德奥多罗元帅的政府。

库斯托迪奥的这些话，如果同弗洛里亚诺的答复比较一下，就更加显得突出了：

> 获悉今日来电。我希望你将光荣地获得你的各位前任所未能获得的成就：完全成功地实现共和思想，平定党派之争的激情，为里约格朗德人的家庭带来和平与安宁。为了完成这一异常高尚的事业，你可以得到我的合作，我向你保证，这是我本人主

要关心的事情之一。

这一段关于1892年政治事件的简短叙述，在于说明，巴西怎样正在迅速地走向内战。国会和司法机关是顺从的，而海军则心怀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弗洛里亚诺政府具备了西班牙美洲独裁政权的一切著名的特征。为使巴西与其邻国间的相似 116 点臻于齐全，甚至还可以举出：互相争吵的派系之间，都使用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个人仇恨，以及初期武装冲突的残暴。1893年初里约格朗德人的革命以及后来的海军叛乱——不管他们所申明的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的目标最后如何受到歪曲——大体上都反映了巴西民众的文化教养和反对一个人实行独裁的自由主义传统，而这个人，结果证明是一个连他自己的追随者也痛感意外的人物。

117

第 九 章

海 军 叛 乱

联邦党人的首次入侵——游击队的袭击——万登科尔克的冒险——海军的叛乱——两股平行的革命力量——外国舰队的干涉——海军将领在政治上与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复辟的幽灵——合法政府的胜利

革命的联邦党人的首次入侵，于1893年2月9日开始。他们在民间考迪罗古梅辛多·萨赖瓦的指挥下，从乌拉圭越过了边界。几天以后，他们就与政府的军队发生了首次武装冲突。

在两个敌对的阵营中，都有民间的考迪罗——他们全是勇猛的平原地区居民，其中很多人还是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从事游击战争的老手——出现在正规陆军以及里约格朗德的警察部队的身

边。而且和1835年的情形一样，双方的考迪罗感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团结（他们生来就有很多种姻亲关系，包括血统关系），比起他们与各自的同盟者之间的关系还要坚强得多。乌拉圭人和阿根廷人也加入了巴西的两支敌对的队伍。革命者聚集在这两个拉普拉塔河共和国的某些地方，准备着入侵巴西。当时，阿根廷的副总统佩列格里尼正致力于补救他的前任华雷斯·塞尔曼所造成的巨大财政损失，在他的领导下，全国正开始复兴。而由埃雷拉·奥维斯的红党（一个政党）所统治的乌拉圭，则正在一次严重经济危机的初期阶段竭力挣扎着，这次危机后来触发了反对伊迪阿特·博尔达总统的革命。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巴西的革命者很容易就得到了甚至是乌拉圭当局的帮助和支持。

从乌拉圭入侵的古梅辛多·萨赖瓦集团，不久就与几支较大的部队会合，并由席尔瓦·塔瓦雷斯（若奥·努内斯·达上校）执掌了联邦党人的最高指挥权。与乌拉圭接壤的整个边界迅即进入游击战争。叛军大约有三千人，都是优秀的骑士和神枪手，只不过装备恶劣而纪律又十分松弛。他们胜利地长驱直入多唐佩德利托城，该城投降之后，他们 118

随即向利夫腊门托挺进（该城与乌拉圭的里韦腊城相隔仅一街之宽）。由于保卫该城的共和国陆军部队的逼近，革命者放弃了进攻，改向阿累格雷特的郊区移动，并在那里打败了敌人。他们继续向夸赖前进，在该地得到了武器装备。奥利维拉·萨尔加多（一位陆军上校）起义，投到了革命者的队伍，并从塔瓦雷斯手里接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装备和补给都比较优越的联邦政府军队，急速迎击叛乱者，并在固安杜伊河岸上击败了他们。在这次小小的格斗当中，共和国参议员皮涅伊罗·马查多所显示的军事才能，将使他声名大著，而成为卡斯蒂略斯派最杰出的一位考迪罗。州政府把固安杜伊战役当作一次重大的胜利来庆祝。伊波利托·里贝罗将军、罗德里格斯·利马、皮涅伊罗·马查多以及费尔南多·阿博特等人，在发给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的一封洋洋自得的电报中说道："由于法拉波斯运动而驰名的固安杜伊，昨天又恢复了它的荣誉。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共和国万岁。"

这些好消息，多少有点为时尚早。大部分革命军，因为既无武器又无补给品，粮食匮乏，防寒装备很差，而且又被政府军穷追不舍，所以就逃到乌

拉圭境内。弗洛里亚诺取得卡斯蒂略斯的同意，派遣他的陆军部长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德·莫拉将军到阿雷格里港去，从那里指挥军事行动。尽管塔瓦雷斯上校和萨尔加多上校暂时停止了战斗，然而，古梅辛多却在这个州的内部，运用一系列“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到处流动，使得正规军疲于奔命。革命的希望因而也能继续保持下来。革命者的首次入侵，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卡斯蒂略斯强劲有力的抵抗和他那果断的能力，巩固了他的权威和他在大众中所树立的形象。

十三名将领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万登科尔克海军上将，由于自尊心受到损伤，从来也没有宽恕过弗洛里亚诺。1893年7月6日，万登科尔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弗洛里亚诺发出一份挑战书以后，就搭上向里约热内卢运送武器弹药的“丘皮特”号商船，并且说服船长把船开到南里约格朗德。他在里奥格兰德这个海港城市〔地处帕托斯湖的最南端〕，网罗了一些党羽，并且发表宣言，号召进行反对弗洛里亚诺和卡斯蒂略斯的叛乱。由于没有得到他所预期的海军或者古梅辛多军队的援助，他就放弃了这次冒险，而在圣卡塔林纳水域上，向

119 里约派来追捕他的“共和国”号巡洋舰的司令官投降了。因为他是共和国的参议员，所以在他被捕以后，鲁伊·巴尔博扎便从联邦最高法院替他弄到了一份人身保护令。弗洛里亚诺为了对该法院表示敬意，派去过几位卓越的法官，后来又给它任命了两个军人和一个可靠的医生。然而，陆海军之间的严重对立不断恶化，以至在后来的九月起义期间达到高峰，这并不是由于弗洛里亚诺傲慢无礼的任命，而是由于万登科尔克的叛变企图遭到挫败所造成的。

里约格朗德的革命，使全国已经长期动荡不安的局面更加严重了。在北方，伯南布哥州似乎是最危险的骚乱中心，弗洛里亚诺宣布它处于戒严状态。巴拉那州经常可以预料到会发生战争。米纳斯吉拉斯州仍然较为平静，它变成了那些已经受到或者认为自己将要受到政府镇压措施威胁的人的避难场所。圣保罗州依旧忠于弗洛里亚诺，它正忙于保卫自己的南部边界，并使该州的一位共和派领袖能够继任总统。

在圣卡塔林纳州所发生的事件更具有悲剧性。弗洛里亚诺怀疑代理州长马查多同情革命事

业，于是就撤掉了他的职务。接替他的那位副州长，随后也被一次流血的政变赶跑了。

在里约，反对派在国会里和报纸上，每天都对总统进行诽谤，这个城市中的大多数有教养的和保持中立的人士，也同样反对他。圣保罗州的议员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设法控制了国会的多数，使政府能够继续处理它的公共行政管理工作。

然而，最严重的问题还是海军。陆海军之间的对立是从帝国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帝国从来也没有设法使它消除或者减弱。佩德罗二世具有很深的文官气质，他对于军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如果他有所偏爱的话，那就可能是喜欢海军了。一位海军上将的军服，也许比陆军元帅服给他留下的印象还要深一些。

帝国时期的贵族阶级，曾经鼓励他们的青年充任海军军官，以求取功名。他们在南美洲的崇高地位、他们在与巴拉圭作战中所取得的荣誉、他们连续不断的海外航行，以及他们对物质生活的爱好，使得海军官佐添上了一定的贵族色彩。例如，出身于名门贵族、勇敢、有教养、作过广泛的游历、

为人风雅、处世有方而又极受朝廷尊敬的海军上将路易斯·菲利普·德·萨尔达尼亚·达·加马，就是海军的杰出代表。

120 共和主义的宣传，在海军中并未激发起多大的热情，它仅仅感动了海军学院的青年人。海军把共和国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是本着爱国主义和遵守纪律的精神行事的，但也夹杂着对陆军在建立新政权过程中所取得的最高权力表示不满的情绪。

陆军是比较民主的。其军官通常都出身于中下阶层，主要来自南里约格朗德州。许多军人家庭是世代相传，例如丰塞卡家族、梅纳·巴雷托家族、丰托拉家族以及卡马拉家族。这些军官薪饷微薄，没有私人财产，都在极其俭朴的经济情况下生活。因此废除奴隶制和共和主义的自由思想，在陆军中比在海军中，更能找到肥沃的土壤。

在11月15日推翻君主制的时候，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差不多得到了全体陆军的一致支持。后来，陆军因为丰塞卡和弗洛里亚诺而分成两派，但并没有破坏对共和主义的信仰。当共和国在里约格朗德平原上第一次遭到严重挑衅的时候，大

多数陆军军官都认为他们是与总统同呼吸共命运的。

而在另一方面，海军，或者至少是它的最高级将领，却成为可疑的人了。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海军上将似乎是在代表着海军，他没有那种深谋远虑，能够把海军看成是治国安邦的一种道义力量的基础，而使它置身于政治倾轧之外。塔曼达雷海军上将这个顽固的君主派，是旧时代的残渣余孽。雅塞瓜伊从现役中退休。万登科尔克被他自己的轻举妄动所毁灭。萨尔达尼亚·达·加马曾经尽力阻止德奥多罗辞职。在后者辞职以后，萨尔达尼亚在他的同僚当中享有特殊的威望，他没有参与阴谋活动，而专心致力于掌管海军学院。他对共和国的混乱状况从内心里感到愁苦，而他那等级制度和贵族阶级的人生观也受到了触犯，所以他后来就犯了严重的错误，竟然相信恢复君主制度是可能的。

弗洛里亚诺这个人，具有库斯托迪奥·万登科尔克以及萨尔达尼亚所缺乏的那种丰富的政治才能，但他处于残酷敌人的困扰之下，对消除海军的偏见并不感兴趣。由于他的政府的命运已经

和里约格朗德共和党人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由于陆军同僚们热情地支持他，所以他很可能认为，海军的支持是一件惹麻烦的事。

两个军种之间的对立情绪已经十分严重，以至经常在街上爆发出来。亲政府的报纸，毫不留情地批评“拥护君主政体”的海军。反对派的报纸，却坚决地替海军辩护，并且强调指出，政府对海军采取了敌视态度。当万登科尔克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到里奥格兰德港进行他的冒险活动时，海军俱乐部便选举他作主席。反对弗洛里亚诺的人，包括那些老牌君主主义者在内，并不掩饰他们对联邦派和海军所表示的同情，在里约的外国侨民，特别是葡萄牙人，也无不如此；这就增加了弗洛里亚诺派仇视外国人的心理。

卡斯蒂略斯派的共和党人，继续开展了一场顽强的宣传运动，谴责他们的敌人复辟君主制度的计划。人们断定这些计划受到了前君主主义者西尔维拉·马丁斯的鼓励。各个不同的反对派，虽然都仇恨弗洛里亚诺，可是他们并没有那种统一的行动计划。他们个人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对立，使得他们的努力，多半都枉费心机了。他们那些有很

大争论的目标，往往使革命与巴西其他地区隔绝开来，而只能赢得感情上的支持。

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党派争论，也反映到弗洛里亚诺自己的内阁里。尽管财政部长塞尔泽德洛·科雷亚这位具有实证主义学识的青年军人是一个热心的弗洛里亚诺派，然而他也象库斯托迪奥·德·梅洛海军上将一样，反对总统个人在南里约格朗德州所采取的政策。他以联邦国库的重大问题作为论据，坚决主张与联邦派军队的领袖席尔瓦·塔瓦雷斯将军直接缔结一项协定，以结束内战。当他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就以同弗洛里亚诺在审计厅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为借口，于1893年4月27日辞去了部长职务；与此同时，海军部长库斯托迪奥也辞去了他的职务。如果说塞尔泽德洛·科雷亚辞呈的内容还只限于替审计官的财政特权辩护的话，那么，库斯托迪奥则走得更远。他严厉地批评弗洛里亚诺，谴责他挑起并坚持了南里约格朗德的内战，而且是通过他的陆军部长这样做的。

总统欣然接受了这两个讨嫌的部长的辞职，他们两人已成为国会和报纸的主要反对目标。但是，如果他发现，调换他的财政部长还算容易的

话，那么，任命他的海军部长的继承人，就要牵涉到全国两个军种对立这一大伤脑筋的问题。海军最高级的军官，包括萨尔达尼亚·达·加马海军上将在内，都拒绝担任这个职位。弗洛里亚诺因为不信任政客和海军军官，正在青年陆军士兵的热烈献身精神和平民百姓的极端急进主义当中，为他那个遭到强大压力的政府，寻求安全的保障。

库斯托迪奥·德·梅洛、万登科尔克以及萨尔达尼亚·达·加马这三位最杰出的将领当时所持的态度，很自然地增加了弗洛里亚诺的忧虑。如果说，萨尔达尼亚·达·加马当时抱着蔑视一切 122 的超然态度，万登科尔克又在中途失败的冒险行动中降低了他自己的威望，那么，越来越专横的库斯托迪奥·德·梅洛，则被人们认为享有与总统相等的权力。

在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海军叛变当中，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似乎无意与联邦党人的游击队结成同盟，而且也似乎并没有什么政治纲领。里约格朗德的革命和海军叛变，成了反对弗洛里亚诺政府的两项并行不悖的运动。只是到了最后时刻，当萨尔达尼亚·达·加马掌握了海军的作战

指挥权以后，库斯托迪奥才企图与联邦党人在道义上和战术上建立较为紧密的接触，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又遭到忠实的共和主义者的严重怀疑。当然，弗洛里亚诺与卡斯蒂略斯，全靠他们共同敌人的力量的分散，才能得到好处。

库斯托迪奥吵吵嚷嚷地辞去了海军部长的职务以后，他没有能够默然顺从地回去担任他原来的本职工作。他和万登科尔克一样，既不能忘掉他的满腹牢骚，也不能接受弗洛里亚诺用计谋给他在政治事务中安排的次要地位。海军那种带有恒久性的愤懑状态、当时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以及南里约格朗德的革命，都为一次新的海军叛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年只用里约港内的几艘船炫耀一下武力，就足以叫德奥多罗辞职，而轻易地赢得了1891年11月23日的胜利，这件事使德·梅洛海军上将对他自己、对他认为注定要由他来完成的使命增加了信心。他是一个不高明的心理学家，没有看出德奥多罗与弗洛里亚诺在性格上有多么大的差异；而比较善于鉴别人物的萨尔达尼亚海军上将，在谈到弗洛里亚诺时，却常常说，“这场比赛，是不那么好对付的。”

库斯托迪奥在率先发动叛乱之前，犹豫了很长时间，不过，当雅塞瓜伊和萨尔达尼亚拒绝带头发动之后，他到底还是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即使在这时，虽然他已经在指挥着海军叛变，他对于自己究竟要求什么，好象也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他的宣言，满篇都是同类文件所常见的那种废话。他建议"恢复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弗洛里亚诺却在赞美宪法的同时，曾经多次把它撕得粉碎。

1893年9月6日，库斯托迪奥在"阿基达巴"号① 战舰上升起了叛乱的白旗，他是在头一天夜晚率领几名海军军官和联邦的议员登上这只战舰的。不久，其它所有停泊在里约热内卢海湾的巴西船只也参加了这次叛变。叛变的舰队，包括十六艘军舰以及十八艘商船和拖船。在军事上，连这些军123舰也并不能发挥效能，大多数都是陈旧不堪、实际上无用的废物。这些舰只包括有铁甲军舰、木制巡洋舰、装甲驳船，以及在巴拉圭战争中留下来的古老明轮轮船，仅有五艘船能靠自己的动力行驶；其

① 这是用来纪念阿基达巴（巴拉圭北部的一条小河）战役的，在这次战役中，巴拉圭的独裁者索拉诺·洛佩斯阵亡，从而在1870年3月结束了这次战争。——英译者

它船只，有的装配有良好的现代化大炮，却必须由其它船只拖带。

弗洛里亚诺并未感到猝不及防。他事先已经很细心地把他最好的船只“里亚舒埃洛”号，假说是为了修理，送往欧洲。他还把“阿基达巴”号的一些主要零件也给拆走了；于是只好用一些临时凑集的零件来代替它们。出乎库斯托迪奥的意料，海湾的要塞竟然仍旧效忠于政府，不过它们的具体情况，也并不比叛变的海军船只好多少，因而这些船只能够完全地控制了海港。

因为库斯托迪奥处在海上与外界无法接触，人们以为他关心的头一件事，便是在陆地上夺取一个立足点，例如，夺取首都海湾对面完全没有设防的尼泰罗伊城。可是，他幻想叛变会得到里约市内的直接支持，因而没有这样做。与此相反，他的战略却是去攻打圣多斯港〔沿里约海岸南下，大约二百哩〕，侵入圣保罗，并在那里建立叛乱政府的大本营。这个战略，无疑是既明智而又合乎逻辑的。当时已经在圣卡塔林纳州的联邦党人，将会成为他最可贵的同盟者。这样一来，海军的叛变，最终就会与里约格朗德的革命合并，后者尽管地方

性较强，却具有更为明确的政治目标。

但是，库斯托迪奥没有实施这个计划。他本来可以带领他的大部分舰队冲出海去（象其中某些船只后来单独所做的那样），他却决定继续留在港内。四面八方都传来了令人极为沮丧的消息。北方地区，其中包括巴伊亚州和伯南布哥州，依然相当平静，而库斯托迪奥对于这两个州的州长，看来是曾经有所指望的。他并没有设法与里约格朗德的革命者联合起来，虽然西尔维拉·马丁斯曾经提出过呼吁。圣保罗州，在贝纳迪诺·德·坎波斯州长的统治之下，正在准备它自己的防务。

弗洛里亚诺因为确实可以得到陆军的支持，所以他一刻也没有失去镇静，或者失去战斗的决心。海军的叛变，在某种意义上，替他帮了很大的忙。他的政府，对于那些比较有教养而保持中立的阶层来说，原来是不受欢迎，或者至少也是不大合乎他们口味的，现在却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好评，而弗洛里亚诺及其追随者们，并没有为争取这种好评花费心血。他向国会报告海军叛变的咨文，是一个简练文体的典型："我必须向您和众议院其它议员报告，今天凌晨，海军部长通知我，一部分海

军对合法政府采取了叛变和公开敌对的立场。政 124
府认为有责任把这个事实通知您，并向您保证，政府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持公共秩序。敬祝健康与友爱。”城里仍然很平静。弗洛里亚诺保持着警戒，但未采取任何镇压措施。

为了满足弗洛里亚诺的愿望，国会授权他可以把戒严状态在巴西扩大到他认为必要的地方，并且延长到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军事学校以及非军事学校的青年，热烈地自愿要求服役，并组成了爱国大军。由于怀疑这次叛变是企图复辟（后来，萨尔达尼亚·达·加马加入叛变队伍，更加深了这种怀疑），共和主义者，包括反对弗洛里亚诺的人在内，便又重新集合在他的周围。

弗洛里亚诺耐心地有条不紊地加强了这个城市的防御力量，他在周围的山上配置大炮，在海岸上建立据点，并且派兵去增援尼泰罗伊城的警备队。除了维莱加农要塞① 自己宣布中立以外，其它

① 这个要塞坐落在海港深处的一个岛屿上，离城市很近。现在填起了一条狭长的地段，与大陆相联接，地段上面建起了圣多斯—杜蒙特飞机场。这个岛是因法国海军上将尼古拉·迪朗·德·维莱加农而得名的，1555年他曾在这里建立过一个时间很短的殖民地。——英译者

所有的要塞仍然效忠于弗洛里亚诺。萨尔达尼亚·达·加马并未参与叛变的准备工作，并曾经徒劳无益地试图阻止过这次叛变，当时也宣布了中立。他关心的是保卫他所掌管的海军学院，他把它当作重建海军的核心。

海军在里约热内卢这个门户开放、大部分商业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城市发动叛乱，不可避免地会惹起一些很伤脑筋的外交事件。巴西在佩德罗二世当政期间，曾经能够在列强当中逐渐地引起了一定的敬重，因为他们看到巴西表面上的秩序和安宁，就认为她永远不会受到拉丁美洲惯常的政治骚乱的牵连。临时政府统治下的财政崩溃，因解散国会而达于顶点的党派骚乱，以及南里约格朗德的革命，使他们改变了这种看法。讲葡萄牙语和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各共和国，毕竟没有多大区别：反正都是热衷于财政冒险、叛乱、暴君以及考迪罗的半野蛮的国度。

所以，海军的叛乱，并没有使欧洲列强或者美国感到很大的意外。它们所关心的，仅仅是要在这个偏远的、被内战所扰乱的热带地区，保护它们的商业利益。唯独葡萄牙不同，它和巴西有精神上的

亲密关系，有共同的语言，在里约住着与该城的生活完全融为一体的大量葡萄牙侨民，所以，除了对 125 自己的直接利益的威胁之外，它能够多少感到一些巴西的悲剧。对于美国来说，巴西的叛乱，只是当它明显地企图要在南美洲一部分地区复辟君主政体，也就是要恢复欧洲霸权的时候，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这一部分地区，它根据那个原始的、单方面的、漠然藐视旁人的门罗主义，已经自己承担了保护的责任。

库斯托迪奥所面临的各种麻烦问题，现在又增加了一项，即停泊在海港内的外国军舰作出决定，要向他们的侨民提供一切必要的保护。这次叛变一经公开宣布，在那里的英、法、意、葡以及美国的海军部队，立即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宣称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不能使这场斗争损害外国商业或者发展到炮击该城市的地步。他们于10月5日宣布里约为“不设防城市”。惟独德国海军部队的司令官，拒绝参加任何集体行动，而只以保护他本国的特殊利益为限。外国海军司令官正式缔结的这个协议（弗洛里亚诺本人曾通过他的海军参谋长请求缔结这一协议），对于最初无力镇压叛乱的

弗洛里亚诺政府，是特别有利的。

由于受到阻碍，不能对这个城市采用任何暴力的行动（外国司令官的友善建议，有时变成侮辱和威胁），库斯托迪奥便坚持留在海港里，在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逐日对忠于政府的要塞进行徒劳无益的炮战，进行屡遭挫折的在尼泰罗伊登陆的尝试。一些比较严重的威胁，或者是一些流弹，经常在城内造成恐怖，而突然引起向郊区或者内地狂奔的热潮。但是一般老百姓，通常都乐于观看要塞与叛军舰只之间逐日进行的那种令人悲哀而实效不大的炮战情景。

外国船只、叛变的舰队以及政府当局之间，经常发生争吵。支持政府的报纸，没有注意到这些船只在海湾，可以间接地提供一些好处，反而认为，它们的行动有利于叛变者，于是对它们表示了敌对的情绪。最初，合法政府和叛变的海军上将，对外国舰队所采取的态度，都心甘情愿地表示默认，现在他们却开始感觉到这些态度傲慢无礼了。叛变者对强加给他们的障碍，感到不满；弗洛里亚诺政府，则认为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正在帮助叛乱者。双方的爱国自尊心，都因为外国对他们内部

纠纷的干涉，而遭到了损害。不过，叛乱者把他们 126
的情绪都掩藏在心里，而效忠于政府的人，却把他们的情绪日益强烈地发泄出来。

葡萄牙的司令官奥古斯托·德·卡斯蒂略斯，是仇外主义者的最好目标，他的那两艘几乎不堪使用的轻巡洋舰——“米德洛”号和“阿丰索·阿尔布克尔克”号——是巴西从前殖民地地位的一种永久性纪念物。他实际上已经被逃到皮特罗普利斯的葡萄牙外交使团给抛弃了。这位勇敢而沉着的人，当时正在竭尽全力执行他的艰巨任务；巴西人在对他进行的攻击当中，好象要把对外国人的仇恨，都集中倾泻在同他们最亲近的那些人们身上。君主政体的葡萄牙，因为与巴西从前的统治者有着皇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共和主义者进行攻击的主要对象，在里约的葡萄牙侨民，也遭到了借故生端的仇外主义者们的猜疑。

弗洛里亚诺赢得了南美洲外交使团某些成员的公开支持，因为早些时候，他曾经强烈抗议英法使馆要从军舰上派水兵登陆以保护城内侨民（他们说这些侨民遭到了无政府状态的威胁）的傲慢无礼的决定（且不论是真是假，据说，弗洛里亚诺

当时曾扬言，要枪杀登陆的任何外国士兵)。已经是巴西共和主义化身的弗洛里亚诺，现在又使他自己，在时刻提防着欧洲扩张主义政策的本大陆其余地区，成为共和主义的伟大象征了。

由于在港口内无法行动，而且又没得到公众舆论的任何有力支持，叛变者很自然地要为他们自己所策划的这种局面自食其士气消沉的后果。他们开始感到缺乏继续作战所必备的条件。10月初，维莱加农要塞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是，外国舰队把关于保护这个城市的协议应用到这座要塞而进行了干涉，因之大大地削弱了它的军事潜力。

在这场使海军濒于毁灭的较大的戏剧性事件中，萨尔达尼亚·达·加马却一直生活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他那种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荒唐可笑的中立，已经忍耐不下去了。他不能声明自己拥护弗洛里亚诺与合法政府。支持政府的报纸，每天都在诋毁他。他感到他必须参加到叛乱的队伍中去，但却是为了使叛乱转到另一方向，使其具有另一种意义。

库斯托迪奥和萨尔达尼亚虽然出身相同，却彼此并不了解，或者说谁也不喜欢谁。俩人都是对

巴拉圭作战的英雄，他们都有才智，有教养，而且他们的勇敢也都达到了愚蠢的程度。他们在同僚当中，同样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两个人还都曾经是帝国的忠实臣仆。库斯托迪奥好象曾经获得伊萨贝尔公主小朝廷的特殊信任。当共和国成立时，127 他正把这位公主的一个小儿子，作为他自己的部下带在身边，进行着环绕亚洲的巡航。因为他闲不住，而且又满怀着政治野心，所以很容易地就接受了共和国。作为11月23日反政变的主要发起人，他从来也没有甘心充当一名次要的角色。他的敌人断言，他之所以叛变，只不过是为了用自己的独裁来代替弗洛里亚诺的独裁。

另一方面，萨尔达尼亚可能更为佩德罗二世所器重。他认为共和国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因而顺从了它，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放弃对君主国的忠诚。仅仅因为他尊重并且信任德奥多罗，德奥多罗才能把他争取过来。1891年11月23日那一次，萨尔达尼亚曾想挫败库斯托迪奥的首次叛变，并且对德奥多罗提出过由他们来进行回击的坚决主张。当时，弗洛里亚诺引起了他本能的厌恶，而且使他充满了某种恐惧，他也摒弃了库斯托迪奥，认为他是

一个轻率、头脑发热和前后矛盾的“合法政府的临时同路人”。

当萨尔达尼亚这一次决定参加库斯托迪奥的叛变时，他深信他正在与一项失败的事业共命运。唯有与南里约格朗德州的革命者结成直接的联盟，叛变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机会，而且这个成功也是很遥远的。从1893年12月7日他向全国发表的声明中，人们可以察觉到其中有一种感伤的宿命论的调子：

> 我接受了爱国主义迫使我采取的立场（叛变），与我的兄弟们重新聚合在一起。他们，一年多来在南里约格朗德平原上，三个月来在本国首都的海湾里，为了从军国主义、宗派主义的姬妾〔即实证主义〕以及肆无忌惮的急进主义统治之下解放巴西人的祖国，一直在进行英勇的战斗。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没有阴谋，也意识到应负的责任。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我要用我的剑，同我毕生所谴责的军国主义进行战斗。作为一个巴西人，我要贡献我的力量，来结束这个可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家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蒙受了羞辱，而且她的一切自由都被窒息了……这个事业的理性和正义，使我

有权用武力去恢复政府在1889年11月15日所占据的地位，当时它在猝不及防与举国茫然之中被一次军事叛变所征服，而现政府也只不过是那一次军事叛变的继续而已。

萨尔达尼亚出于他本人的真心诚意，或者是由于他对大部分巴西人的感情理解错误，竟公然梦想复辟君主制度。他与里约格朗德的革命首领西尔维拉·马丁斯，号召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这样的办法，曾经两次巩固了波拿巴的君主国），并且同意把他们的部队联合起来。不过，这两个颠覆运动的汇合，已经为时过晚。他们拥护君主制度的明显意图注定了他们的失败，因而他们的运动没有得到支持，并且可能是在不抱任何幻想的情况下，落到了战败的地步。

这两位老牌君主主义者之间的协议，并没有把所有反对弗洛里亚诺的势力都联合起来。库斯 128 托迪奥的一些早期的同谋者，在看到他们的事业明显地转向复辟时，就公开放弃了它。流亡在外的皇室，似乎完全没有介入；他们也没有与一些反对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鲁伊·巴尔博扎（他害怕弗洛

里亚诺对他进行报复，起先逃到阿根廷，随后又逃到欧洲)等，进行磋商。当陆军中的君主主义者探询萨尔达尼亚的意向时，他拒绝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库斯托迪奥本人，也只是在他这位新盟友的宣言发表几天以后，才得到消息。

库斯托迪奥发动这次叛乱，本来是为了保护宪法，难道他能够同意萨尔达尼亚把它引到这个新的方向吗？公民投票不是一种间接的复辟方式吗？难道萨尔达尼亚不会毅然充当蒙克① 式树王者的角色吗？各国和历代的君主主义者，当他们被共和主义的革命击败的时候，不是总要指派一些叛变的将领来充当这种角色吗？在举国混乱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在这个新的阶段中，革命仍然是一种毫无把握的、反对日益强大的政府的冒险行动，因为这个政府已经打消了早先的顾忌，正在用一切合法的、非法的、人道的和不人道的手段，进行着回击。

1893年11月，叛变的舰队损失了“雅法里”号

① 蒙克是克伦威尔的一位前陆军中将，对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负有很大的责任。——英译者

装甲舰，它是由效忠于政府的要塞用炮火击沉的。总督岛上的火药库炸毁了，夺取尼泰罗伊补给仓库的企图也遭到了挫折。库斯托迪奥决定将海军分成两组：一组在南方作战，与里约格朗德的革命者取得直接联系，另一组在里约的海港内继续战斗。12月1日，库斯托迪奥所搭乘的“阿基达巴”号，在亚历山德里诺·德·阿伦卡尔的指挥下，冒着要塞的炮火开到海上，并向圣卡塔林纳州驶去。

萨尔达尼亚控制了停泊在海湾内的船只，并企图扩大这次战役，但是除了恶运之外，一无所得。效忠于政府的军队，攻占了叛军舰队设在海湾中部戈费尔纳多尔岛上的补给中心，还攻占了大陆上的马基城〔在海湾北端〕和莫卡瓜格朗德小岛〔在里约海湾的对面〕。

外国船只的态度，变得更加令人气恼。起初，叛乱曾经引起欧洲各强国的一些同情，但是当它们确信叛乱已经失败时，就削减驻里约的部队，而听任增加了兵力的美国来作主要的观战者。可能发生的君主制度的复辟，使克利夫兰① 政府有些 129

① 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1837—1908年），美国第22任及24任总统。——译者

感到震惊，五艘美国的大型军舰严密注视着叛乱的发展，决定在必要时，直接进行干涉。

“纽瓦克”号的司令官在进入海湾的时候，曾经下令向库斯托迪奥的旗舰致敬，他被撤销职务，由贝纳姆海军少将接替。纽约报界说，这个行动证明美国对弗洛里亚诺忠于共和国，表示了毫不含糊的同情。当美国的商船与叛军舰队之间发生了一次小的事件时，贝纳姆将军调动他的军舰进入战争状态，因而使弱小的巴西船只遭到了被击沉的威胁。

萨尔达尼亚（同在他以前的库斯托迪奥一样）迫于无法行动，不惜铤而走险，曾在1894年2月9日企图攻占尼泰罗伊。入侵部队约有500人，由萨尔达尼亚亲自率领，并有舰队上的部队进行掩护。在靠近尼泰罗伊的海滩上，叛军在最初几次交锋中都获得了胜利。他们向城市中心挺进，防守该城的是丰塞卡·拉莫斯和阿尔戈洛两位上校指挥的陆军正规部队、宪兵和爱国者大军。叛军被击退后，到阿尔马桑角上防守，该地随即又遭到忠于政府的军队的攻击。经过激烈的浴血战斗，双方都打得很勇敢，萨尔达尼亚负了伤，叛军便放弃了这次冒

险行动。几天之后，在亚历山德里诺·德·阿伦卡尔指挥下的“阿基达巴”号〔将其他船只和库斯托迪奥送往圣卡塔林纳州以后，又回到了里约〕，冒着要塞守军的密集炮火，再一次冲出了海湾〔回到德斯特罗〕。

里约热内卢海湾内的叛乱正在临近尾声。由于国库的财力和国家的信誉（尽管它们是靠不住的），都置于弗洛里亚诺的支配之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所以他已经在各个方面加强了保卫政府的工作。他使用从欧美获得的船只，逐步组成一支小型混合舰队。该舰队以伯南布哥为基地，由退休的巴拉圭战争中的老将热罗尼莫·贡萨尔维斯海军上将指挥。

这支忠于政府的舰队预定于3月11日到达里约。在此之前不久，政府通知所有的外交使团说，在四十八小时内（在外交使团的要求下，又临时延期两次），即将开始在陆地和海上对叛变的船只采取最后的军事行动。但是，在限期未满、城内的恐慌也未达到顶点之前，萨尔达尼亚·达·加马及其追随者，便已登上两艘葡萄牙的船只，避难去了；按照若阿金·纳布科的公正评论，当时也许只

130 有这两艘船肯于作出必要的牺牲来掩护这些失败的巴西人。3月13日，热罗尼莫·贡萨尔维斯海军上将的忠于政府的舰队，开进了里约海港，当时，革命者已经离开那里，共和国的旗帜正飘扬在古老的要塞和叛军船只的上空。

由于受了急进民主主义的激情和复仇叫嚣的毒害，弗洛里亚诺政府不能理解卡斯蒂略斯司令官所表示的那种宽宏大量的姿态。政府拒绝了叛变者提出的投降条件，而要求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坚持认为他们并非政治犯而是逃兵，并且犯有一般罪行。葡萄牙政府拒绝了这种要求。随即反复交换了外交照会。英国政府也被要求来干预这次争端，但是它拒绝了，因为它赞同葡萄牙人的立场。最后，在谈判终止的前一天，“米德洛”号与“阿丰索·阿尔布克尔克”号载着大约500名战败的巴西人，从瓜纳巴拉海湾开到海上去了。

这两艘船都不适宜于航海，它们没有起码的膳宿设备，卫生设备也令人担心。由于害怕在船员与避难者当中发生黄热病，加上这两艘小船又不适宜作横渡大西洋的尝试，司令官卡斯蒂略斯便被迫转向南方，驶往拉普拉塔河。他的这个决

定，被弗洛里亚诺政府看成是一种不可原谅的侮辱，它通过与葡萄牙断绝外交关系进行了报复。弗洛里亚诺除了谴责葡萄牙不交出避难者之外，还谴责它的大使馆答应把他们运往拉普拉塔河，因为从那里他们很容易与南里约格朗德的革命者联合起来。事实上，这两艘船上的大约一半避难者，包括萨尔达尼亚海军上将在内，也的确避开了船上那种马马虎虎的警戒，而在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逃走，以便重新进行对弗洛里亚诺的斗争。

但是，尽管如此，里约海港内的海军叛乱却已经结束了。政府及其热心的追随者们，大肆庆祝这次成功，而这也是共和国的一次胜利。巴西海军经过这次严峻的考验，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并且为它的英勇果敢未能防止失败而深感痛苦。

131

第 十 章

内 战

圣卡塔林纳的小伪政府——两股平行的革命力量汇合起来——联邦派的第二次入侵——对巴拉那州的进犯——库斯托迪奥对里奥格兰德的进攻——古梅辛多的死亡——镇压——急进民主主义者的狂暴——文官继任——弗洛里亚诺的态度

1893年9月17日(海军叛乱开始以后数日),库斯托迪奥·德·梅洛海军上将下令,让指挥巡洋舰"共和国"号的弗雷德里科·德·洛雷纳海军上校,带着叛军舰队中的一艘鱼雷艇前往圣卡塔林纳州。洛雷纳将要把叛乱政府的中心地,设在圣卡塔林纳州的首府德斯特罗。不过,库斯托迪奥却并不打算与那些联邦党人的军队采取一致行动(联

邦党人只企图赶走卡斯蒂略斯〕。

在德斯特罗①建立政府的目的，是要在外国列强面前证明，叛乱者所提出的关于战争状态的要求是正当的，这样就会使它们保持中立，从而阻止它们向弗洛里亚诺政府提供武器和船只。由许多次要人物所组成的叛乱政府，不久就被个人之间的争吵搞得四分五裂。南里约格朗德持不同意见的实证主义者，在叛乱政府中占据了显要地位，这就使得联邦党的革命者，对这个政府深恶痛绝。西尔维拉·马丁斯拒绝充当该政府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代表。

古梅辛多·萨赖瓦一直留在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内地，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零星战斗，对许多新的叛乱中心，进行着鼓励。过去逃亡到乌拉圭的萨尔加多上校，也于1893年8月，越过边界返回来了。这两个联邦党的头目把军队联合起来，在并无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同苦苦追击他们的政府军队和

① 革命以后，为了向弗洛里亚诺·佩绍托表示敬意，把这个城市重新命名为佛罗里安诺波立斯。该城位于一个小岛上，现在已经用一个工程界比较有名的现代化吊桥与大陆联接起来了。——英译者

共和党的考迪罗进行战斗。各种骚乱、袭击以及犯132罪行为，都增加起来。里约格朗德遭到了残酷的游击战的蹂躏。经常陷于恐慌之中的和平居民，当他们无法迁移到邻近的共和国时，就逃往丘陵和丛林地带。那种有历史渊源的南美洲内战的情景，又在巴西重新出现：英勇的事迹和残暴的行为，枪骑兵的勇敢冲杀，对俘虏、敌人、甚至稍有嫌疑的人实行野蛮的斩首。有增无已的兄弟间自相残杀的仇恨以及由武装战斗所引起的酷嗜杀戮，把仁爱的感情一扫而空。正如所有的内战一样，这次内战已经无法和解了。

在里约格朗德北部的外国移民区（该地区的普遍状况，在某些方面，与边境上典型的高卓人地区是不相同的），在丘陵地带，在四季常青的坡地和平坦的平原，使人饱经苦难的内战，与该州南部地区并无差别，只不过不那么激烈罢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不得不到处进行防御，来抵抗同样的流窜着的游击队，同样的骑兵袭击以及同样的突然爆发的叛乱。

革命者把作战范围，逐渐扩展到夸赖河与乌拉圭河之间的旧耶稣会布道区和北方的丘陵地

带，并且在圣加布列尔市的塞尔罗德奥罗打了一场胜仗。他们夺得了阿累格雷特和伊塔基等城镇（后者位于乌拉圭河的东岸），那里的一个联邦政府的小舰队自行宣布了中立。

政府军北方师团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在这支军队中，皮涅伊罗·马查多表现出卓越的战斗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萨尔加多和古梅辛多，开始进行了那次不寻常的大约二百里格〔750哩〕的长征，前往圣卡塔林纳，他们以为该地已经被海军的叛乱者所控制。这两个考迪罗穿越森林，翻山涉水，在不断的零星战斗中，夺取又失掉了若干个城镇和乡村。他们穿过了这个州的整个北部地区，从阿根廷边界的乌拉圭河起，几乎一直达到大西洋。11月初，他们渡过了里约格朗德州与圣卡塔林纳州分界的佩洛塔斯河。

萨尔加多向沿海的铁路中心拉古纳挺进，并占领了该地。然而，萨尔加多害怕与阿图尔·奥斯卡将军所统率的已经开到海岸并进入圣卡塔林纳的中央师团交锋，便乘火车到德斯特罗去了。同一时间，古梅辛多朝着北方的拉热斯移动，由于没有遇到抵抗，他随即开往圣卡塔林纳州的德国移民

区；当时，来自里约热内卢的叛军正在该地作战。133 内战的主要锋芒，已经由南里约格朗德州转移到圣卡塔林纳州，从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席尔瓦·塔瓦雷斯上校，由于受到海军叛乱的鼓舞，便越过南里约格朗德的边界返回来了。他手下的一个考迪罗攻占了夸赖以后，他又在里约内格罗打了胜仗，俘虏了效忠于政府的司令官。在里约内格罗将俘虏斩首的野蛮行为，乃是内战中最残忍的事件。革命者干了这桩可怕的暴行之后，即向巴热挺进，并把它包围起来。该城警备队在卡洛斯·特莱斯将军指挥之下，从1893年11月24日一直坚守到1894年1月8日，当时，联邦党人放弃了围攻，并且分散成若干个纵队，而这些纵队遂即遭到政府军队的追击，并被打败了。

德斯特罗的小伪政府、联邦党的政客以及考迪罗的军队，这三者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可是，库斯托迪奥于1893年11月〔从里约〕带到圣卡塔林纳的海军部队，却加强了本州土生土长的高卓游击队。里约格朗德叛乱者通过海上运输可以比较容易地调动军队，所以他们在圣卡塔林纳州的侨民居住地区或沿海地区，进行了接连不断的零星战

斗。效忠于政府的北方师团，从南里约格朗德一直追赶着他们，并在伊塔雅伊把他们击败了。席尔瓦·皮拉吉贝上校接管了革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由于领袖们之间的个人倾轧，这些军队已经削弱了。他把司令部设在巴拉那州的里约内格罗城。古梅辛多·萨赖瓦坚持向巴拉那州和圣保罗挺进，因为他们从那里能够更直接地威胁联邦政府。

叛军舰队攻占巴拉那瓜港口以后，革命者〔大概也包括古梅辛多在内〕感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一次攻势，结果使他们挺进到库里提巴〔巴拉那州的首府〕。库斯托迪奥在那里建立了由他的追随者组成的州政府，并且再一次命令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交出政权，这项要求当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拉帕城抵抗叛乱者达二十六天之久，直到那位勇敢的城防司令官戈麦斯·卡尔内罗上校在战斗中负伤阵亡以后，它才投降。拉帕战役，在巴西的军事历史以及在巩固共和国的历史中，都成为引人注目的篇章。

革命者对巴拉那州的控制，为时十分暂短。联邦政府已经粉碎了海军在里约的叛乱，所以它能够腾出手来追击敌人。陆军、地方警察、义勇大军、

134 国民警卫队，总之，一切可以调用的兵力，都作好了参加战斗的准备。古梅辛多·萨赖瓦放弃了进攻圣保罗的计划（因为那里的贝纳迪诺·德·坎波斯政府经常保持着警戒），而开始了回师南里约格朗德州的英勇进军。

萨尔达尼亚·德·加马在里约热内卢投降所造成的损失，必须由海军创立一项能够使叛乱重振声威的巨大功绩来弥补。1894年3月28日，库斯托迪奥·德·梅洛海军上将，率领叛军的若干分遣舰队，从巴拉那瓜乘船开拔了。他的舰队，包括巡洋舰“共和国”号和四艘武装的商船，在德斯特罗，把萨尔加多上校的军队接到了船上；萨尔加多原来打算从陆路返回南里约格朗德州，然而却遭到了联邦政府军队的阻挠。这支舰队总共运载了2,000名登陆部队，一直向里奥格兰德进发。与此同时，古梅辛多也开始从巴拉那州往回撤退。

叛军在一些陆地炮台的变化不定的炮火袭击之下，越过港口入口处的险滩以后，准备袭击里奥格兰德城。① 可是联邦政府和卡斯蒂略斯的政府，

① 他们当时本来能够驶入帕托斯湖，直驱阿雷格里港。——英译者

却不是叫人乘于不备，而是做好了防御在等待着他们。入侵部队是由海军分遣队与民间游击队混合组成的，其首领们长期意见不合，这就使得效忠于政府的军队更加易于应付了。

与此同时，那支由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临时组成并已交热罗尼莫·贡萨尔维斯海军上将指挥的舰队，也〔在1894年4月16日〕抵达圣卡塔林纳海湾，并用鱼雷炸沉了装甲舰“阿基达巴”号。该舰司令官亚历山德里诺·德·阿伦卡尔好歹保全了他自己和他的部下，并且设法登上大陆，与革命军的残部汇合。

入侵部队在里奥格兰德被击败之后，因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便撤退了。库斯托迪奥为了保全最后的那点残余部队，同时也为了避免与贡萨尔维斯海军上将进行决战，决定在乌拉圭海岸登陆。当乌拉圭当局制止他们登陆（登陆已经开始）的时候，库斯托迪奥逃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避难，请求阿根廷收容他，并将他的残余舰队移交给阿根廷。

那些逃入乌拉圭河西岸、阿根廷所属米西奥内斯地区的里约格朗德联邦党人，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他们几次渡过河去，进行了一些徒劳的零

星战斗。他们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圣博尔雅城，又同
135 样轻易地失掉了它。他们使得整个布道区经常处于惊恐不安之中，直到他们加入古梅辛多和普列斯特斯·吉马良斯的军队为止，这两支军队以极大勇气完成了从巴拉那州回师路上的行军。古梅辛多以人数不多、补给又十分匮乏的军队、一面施展计谋，一面进行战斗。在1894年8月10日的一次遭遇战中，他受到了致命的重伤。

古梅辛多死后，敌人对他的尸体进行了侮辱，对他的名声进行了诽谤。第二次入侵南里约格朗德州，实际上也就宣告结束。罗德里格斯·利马将军、皮涅伊罗·马查多以及曼努埃尔·达·纳西门托·瓦加斯等人的军队，击败了一向在南方枉自进行袭击的阿帕里西奥·萨赖瓦、普列斯特斯·吉马良斯以及迪纳尔特等革命者最后的残部，并迫使他们到邻近的国家去避难。这样，南方三个州，现在已经没有使它们长期遭受蹂躏的游击队了。当着约2,000名革命者被拘留在拉普拉塔河地区两个共和国以后，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政府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反对弗洛里亚诺的人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接二连三地犯错误，他们纪律松弛，不

能协调一致，因而只不过是替他这个共和国巩固者的光荣称号奔波效劳而已。

库斯托迪奥·若泽·德·梅洛象所有的失败者一样，并不会轻易地得到人们的宽恕。很多与他有关的明显事实，至今仍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对于他的功过也就很难作出公正的判断。他把大部分巴西海军带到叛乱中去，而这次叛乱之所以失败，似乎是由于他缺乏明确的目标，没有远大的抱负以及他个人的虚荣过甚。可是，他那明显的聪明才智，却使我们对他政治上的不坚定和战略上的错误难以立即作出最终的评价。他很可能是他那些同僚们不可救药地互相倾轧的一个受害者。在这次叛乱中，许多极不相同的集团，好容易才彼此相处在一起，库斯托迪奥这个首领便不能象弗洛里亚诺和卡斯蒂略斯那样握有什么最高的权力。

弗洛里亚诺在斗争中表明，他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可是在胜利之后，他却不懂得怎样做到宽宏大量，或者说，他不懂得如何表明他本人是这样的。林肯在取得胜利的当天，就把过去使他的国家长期陷入内战灾祸的那些意见分歧扔在一旁，可是在巴西，却没有人效法他这个伟大的榜样。南

里约格朗德的革命和海军的叛乱，只不过益发加深了全国统治阶级之间的纷争。

关于共和国曾经处于危险境地的回忆，以及对于某些人可能仍在威胁着共和国安全的担心，136 使那些极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特别是军事学院和非军事学院的年轻人，更加激奋起来。和一切胜利之后的情况一样，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即那些大概在战争中曾经逃避一切个人风险的人，也都云集在这些忠诚分子的身旁了。

总统关于结束叛乱致国会的咨文，尽管措辞平淡，却帮助加深了那些流行的偏见：

> 起初，我担心那种融合在国民灵魂中的世界主义，已经削弱了民族团结和公民的道德。但是，不久我就查明，情况恰恰相反，因为从南到北，在巴西各地，爱国精神都显示了绰绰有余的强大威力足以保卫受到严重威胁的共和国。从学校到工厂，从农业到商业，总之，社会各阶级的人们都迅速地拿起武器，这就增强了全体国民支持政府和维护法律的决心。

某些代表政府行使职权的人，如巴拉那州的

夸德罗斯将军、圣卡塔林纳州的莫雷拉·塞萨尔上校，采取了镇压的手段，其方式都很残酷，毫无必要地玷污了共和主义的胜利。洛雷纳司令官、他在圣卡塔林纳叛乱政府中的一些同僚，以及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与叛乱并无多大牵连的巴托维和塞罗·阿祖尔男爵等人，都被就地正法，这便造成了一种逮捕、镇压和使人噤若寒蝉的恐怖气氛。弗洛里亚诺也不得不直接进行了数次干预，以阻止新的暴行。在法拉波斯战争期间，有一项旧的法律，规定要把军人或平民革命者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并且处以死刑。这项已经被联邦宪法废除的法律，如今正在重新加以恢复。

激进民主主义盛行一时。人们对这位铁腕元帅的仰慕，达到了狂热的程度。通过粉碎这次叛乱，弗洛里亚诺实际上已经消除了反对政府的行为，使共和国得到了巩固。他象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的时候一样，证明了新政权完全有能力强制推行有形的秩序。但是，新政权却不能再前进一步去强制推行无形的秩序，也就是说，不能使激动的情绪平息下来。那些为胜利所陶醉的狂热派，认为到处都有君主主义的阴谋家。一股猛烈的决不妥协

让步的情绪，使国民受到痛苦的折磨。弗洛里亚诺派和急进派都认为，唯独他们自己才是共和主义者，才是爱国者。

弗洛里亚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他的军官和政客同僚，一直是冷酷无情的，但对于他的那些党徒们的目无法纪和狂暴的行为，却似乎是一无所知。一切都被宽恕了，甚至连政府可以信赖的朋友们提出一个想要把实证主义的题词——“秩序与进步”从国旗上抹掉的计划，竟然遭到他们反抗这样的事情，也得到了宽恕。

137 弗洛里亚诺获得了胜利，但最重要的，还是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不屈不挠的意志获得了胜利。弗洛里亚诺的任期已临近终结。海军叛乱已经平定。尽管在财政上和行政上极度混乱，然而共和国却已巩固起来。但是怨恨并没有消除。联邦党人和萨尔达尼亚·达·加马，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总统执政期间，还将努力进行第三次入侵南里约格朗德的尝试。

早在海军叛乱爆发之前，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就已经设法团结足够的政治力量，以便能够和平地推选出弗洛里亚诺的继任者，弗洛里亚

诺本人显然是不愿插手这件事的。在批准提名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政治会议前夕，格利塞里奥再一次向总统提出恳请，并且解释了挑选普鲁登特的动机。

弗洛里亚诺再一次拒绝发表一项直接声明。据说，他也讲了话。他在强调了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品质和贡献以后，曾经说："我料定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统治下，我的朋友将会受到迫害。甚至你也将大吃苦头，而不会幸免。日后，你会告诉我，究竟我是对了还是错了。不过，有一件事可以相信：我一定让国会选出和宣布的人就任。"

然而，弗洛里亚诺的诚恳，甚至到今天，也还是令人怀疑的。据说，他曾和里约郊区的一位政治首领就延长他的任期问题进行过密谈。这个谣言被阿拉戈斯州长加比诺·贝佐罗上校公开否认了。弗洛里亚诺想必也知道，他的一个私人秘书曾发起倡议，要提名劳罗·索德雷为候选人。海军叛变被粉碎之后，又传出谣言，说当时正在精心策划一场政变，使弗洛里亚诺成为独裁者，但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而且他的一些急进党徒又遭到了人们的反对，这个计划便彻底失败了。

在战胜海军和联邦党人革命者之后，弗洛里亚诺在陆军中享有特殊的威望，并且受到了急进共和主义者的盲目崇拜，而这些人是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的。甚至在权力已经移交给他的继任人的那一天，若不是他宁愿顽强地抵抗，而不肯大胆冒险的话，他也有可能把这场可怕的政变试着搞一下，并且很有可能获得成功。已经万分惊惧不安的国民是没有力量抗拒他的。尽管他有可能很顺利地迫使那些拥护他的人支持一位早期的圣保罗共和派人士（例如劳罗·索德雷）作候选人，或者支持随便哪一个他最信任最赞成的人（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还没有达到宪法所规定的35岁的年龄），他却听任他所不喜欢的普鲁登特·德·莫赖斯被提名为候选人。此外，关于他对于继任问题138所持的态度，人们虽然作了种种猜测，但历史事实表明，这次继任是在和平安静之中，根据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举行的。

弗洛里亚诺为了再一次着重显示出他那种奇特的有些傲慢的漠不关心态度，他在本国第一任文官总统就职的那一天〔1894年11月15日〕，便离开政府宫，退居到他那座幽静的资产阶级的住宅。

当新任总统进入伊塔马拉蒂宫的时候，他发现弗洛里亚诺的部长当中，只有一位出席了移交政权的仪式。

几天以后，弗洛里亚诺一向不稳定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他移居到坎布克拉的一个矿泉疗养所，随后又移居到里约热内卢州巴拉曼萨自治区内的一个种植园。1895年6月29日，他的艰苦奋斗的一生结束了。共和国为他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葬礼。

弗洛里亚诺心理上的谜，将继续要求他的朋友、他的敌人以及所有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打算阐明他的意图的人，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的名字，对于那些狂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来说，变成了一种警戒的信号。弗洛里亚诺在对一群去拜访他的青年人谈话时，曾经劝告他们要经常注意保卫共和国，他讲道：“人们口口声声说共和国巩固了，没有危险了。你们不要相信这种话，不要让你们遭到突然袭击。复辟的骚乱在悄悄地然而也是不断地冷酷无情地进行着。所以你们必须小心提防。”这个政治遗言，说明了急进民主主义复活，人民从而遭受苦难的原因。

139

第 十 一 章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
(1894—1898年)

政治上的平静局面——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传略——联邦共和党与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联邦党人最后一次入侵——萨尔达尼亚·达·加马之死——南里约格朗德的和解——行政的紊乱——外交事件

随着第一任文官总统的就职，共和国便可以带着一种普遍欣慰的心情，暂时松一口气，把它五年来的历史评定一下了。在建国之初那个非常短暂的和平、忍让与秩序井然的时期以后，那些曾经震撼了两届军人政府的斗争，已经在循规蹈矩的各个社会阶层当中，引起了身心上的疲倦，偶尔也引起了沮丧和绝望的情绪。自从失掉了第二王朝

的和平传统以后，巴西便永久地沾染了拉丁美洲其它地区的那种病态的革命倾向。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保住了他那个引起很大争论的合法地位，这就证明，新政权能够用武力使它自己的权力得到确认。弗洛里亚诺未能完成的那部分巩固新政权的任务，自然而然地移交给那位和平当选的继任者了。

一向在拉普拉塔地区两个共和国避难的最后一批联邦派革命者，当然愿意接受这第一次体面的机会来放下他们的武器。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拼凑起来的政党，尽管抱着各种不同性质的机会主义观点，却在各州和国会里拥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证联邦政府得到大多数的支持。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竞选获胜，使他得到了不同寻常的威望。所以，既然和平与繁荣已经恢复，而且革命的考验也可以置诸脑后，那些自认为对于共和国的创建负过主要责任的诚挚的共和党人，便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它在公众中的声誉。

然而，在那些预示着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可以获得完全成功的表面现象之下，由内战所引起的激烈情绪却仍然沸腾不已。猜忌使政客

们彼此意见不和，而那帮狂热的弗洛里亚诺派又不愿降低自己的要求。财政困难和经济萧条，使国家濒于破产。行政极端混乱。弗洛里亚诺的朋友们把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推在联邦共和党身上，因为该党曾赞成提他为候选人。在另一方面，反对派的各类分子，在大赦以后，也觉得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要求完全恢复他们在政治事务中的地位。他们说，文官出任总统这个胜利，主要是他们的功劳，如果没有联邦党人和海军的武装反抗，共和国恐怕就已经走上军人独裁的道路了。

联邦共和党的内部，正在形成三个流派：一是弗洛里亚诺的狂热崇拜者，他们不肯也不能表示宽恕，而且遵照他们所崇拜的那位偶像的政治遗言，还认为共和国永远处于危险之中；二是反动分子，他们总想一劳永逸地把不肯妥协而又骚扰成性的急进民主主义除掉；三是温和派，他们企图在各走极端的集团之间，保持平衡。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是否具有必要的才能来治理和平定处于这种气氛中的国家，并且恢复财政和行政的秩序呢？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于1841年出生在圣保

罗的一个农场。他从学校毕业得到律师资格后，就加入了自由党，并当上皮拉西卡巴自治区议会的议长和议会的议员。不久，他由于对君主政体感到失望，便参加了1870年宣言所掀起的共和运动，1873年，他与圣保罗另外一些著名人物，如阿梅里科·德·坎波斯、贝纳迪诺·德·坎波斯、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以及塞萨里奥·莫塔等（这些人物后来在共和国中都享有盛名），一同出席了在伊图召开的共和党大会。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自开始公务生涯之日起，就以意志坚强、聪明和严肃而闻名。他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出色人物：主张权力服从，性格沉默，对人冷淡，并具有罕见的坚持正义的勇气。共和国的公务人员当中，象他这样与佩德罗二世当政期间出现的那种杰出的政客不相上下的人寥寥无几；那种政客的特点是才智全面而不锋芒外露，非常正直，外表上有些严肃，富于自尊心，具有平民思想，对军阀主义的任何一点兆头都表示不可遏止的厌恶。然而冷静而谨慎的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却一直缺少雄辩的才能以及个人的热情。

1885年，圣保罗的共和党把普鲁登特·德·

莫赖斯和坎波斯·萨莱斯选进了君主国的议会，这是君主国首次接纳共和党的议员。米纳斯吉拉141斯州把另外一个共和党人阿尔瓦罗·博特略选进了议会。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当时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丹塔斯内阁的某些措施。

当共和国宣布成立的时候，他与穆尔塔将军以及兰热尔·佩斯塔纳，组成了圣保罗的执政洪达。过了几天，他那两位同事辞职了，于是他就担任了这个州的临时州长，在这个困难的过渡时期，他尽力维持秩序，并为共和党的组织建立基础。他靠着这些努力，赢得了普遍的赞扬，其中也包括君主主义者的赞扬。

普鲁登特为行使制宪会议代表的权力，辞去了圣保罗州长的职务。他战胜了那位曾经首先签署1870年宣言的老共和党人萨尔达尼亚·马里尼奥，而当选为制宪会议的主席。由于他忠于职守、心地公平而严于律己，他很快就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坎波斯·萨莱斯用加布里埃尔·阿诺托①评

① 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ël Hanotaux，1853—1944年)，法国政治家，著作家。——译者

论米尔·格雷维（波尔多国民大会主席，后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话来评论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他那冷静、不动感情、明智而又不偏不倚的态度，赢得了一切人的好感，而且很快就为实现他那深深隐藏着的十分顽强的野心铺平了道路。"

在一帮没有经验、被共和国的胜利弄得有些头晕眼花又闹不清当前工作性质的人们当中，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才干，确是非常宝贵的。那些怨恨德奥多罗·达·丰塞卡或者确实害怕他好冲动的脾气的人，思谋着要提出一位文官来反对这位元帅充当共和国首任立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考虑过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他的敌人后来认为：他同德奥多罗竞选是出于虚荣心。为了总统的职位，他同意向德奥多罗提出挑战，这或许是他反对延长军人政府而采取的行动，因为据他判断，这个政府很容易转向独裁。他在制宪会议中所得的选票，也许是反映了国内文官与保守派的舆论倾向。不过，除此之外，这些选票也是对那条在不到四年以后引导他登上国家最高职位的道路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侦察。在这第一次竞争中产生的许多事件，导致了国会的解散，也引起了共和国后

来的一系列的斗争。

普鲁登特当选为参议院副议长，在共和国副总统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故意缺席期间，他主持了参议院，并继续保持了他一贯所有的威信；对这一美德，金蒂诺·博卡尤瓦，作为一帮聚集起来向142他表示敬意的参议员的发言人，曾经着重地指出过。在公务生活中，没有任何人获得过高于普鲁登特的个人威望。

巴西是在帝国时期家长式的监护之下成长起来的，她不能适应新的宪法形式，新宪法在文字上写得非常巧妙，而对她的长期习惯却是非常不适合。尽管这个年轻共和国的上层统治人物有辞藻华丽的宣言，而且他们也诚挚地希望与新的政治秩序协调一致，但是他们却不能使自己从中央集权制政府与议会统治的旧倾向中解放出来。各州的政务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组织好，未来的政治寡头们也还没有掌握政权，所以一切都以联邦的爱憎好恶为转移。国会是一股独立的而且常常是敌对的势力，如果没有它的真诚合作，政府便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不顾弗洛里亚诺当

时怎样漠不关心，也还是组成了一个成份混杂的庞大政党〔联邦共和党〕，因此共和国的新总统，便把他看成是国会最高权力的化身。为了使这个已被傲慢的胜利者与不甘心的失败者所分裂的国家安定下来，并使公共事务走上轨道，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不得不依靠在国会之中占多数的联邦共和党。普鲁登特与热心支持他作候选人的格利塞里奥之间，私人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好象就使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更易于形成紧密与和谐的关系了。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最初似乎是采取了过分的不干涉主义的立场。他对当时的立法不肯发表意见，把自己严格地限制在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事务之内，牺牲了他本人与国会之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却是国家必不可少地需要的。联邦共和党的首领格利塞里奥在指挥国会中的“21个旅”时，是独立自主的，因而变成了共和国的一种保安长官。他的朋友和敌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和目的，都夸大了他对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影响。然而，联邦共和党内部的那种松弛的纪律，以及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都使得它的领袖所享有的崇

高声望，好象远远不是他的工作效力所应得的。格利塞里奥虽然能够把很多人召集到一起，并且善于处理他们的虚荣心和微小的个人利益，但是他这个领袖却不能在关键时刻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他们。

构成联邦共和党急进派核心的弗洛里亚诺派，带着掩饰不住的疑惑心情来迎接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这个政府会不会满足他们狂热的欲望呢？这种态度自然而然地迫使从前的革命者和反对急进主义的人，都倒向了政府。国会变成了两大集团为了控制政府而进行斗争的战场。

143 虽然普鲁登特·德·莫赖斯避免干涉国会的任何决定，但是他却要求自由地处理各州的政治问题。因此，议会藐视行政部门的倾向，和后者完全控制各州政治和行政管理的倾向，显然都是帝国时期那些议会政治与中央集权习惯的补充表现。这些习惯与新政权的精神是不可能协调起来的，特别是在内战的激烈情绪尚未消失的情况下。纠纷愈演愈烈。它们将使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四年任期始终扰攘不安，并且使他企图改革财政与行政的努力，大部分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为了结束这个革命的阶段，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必须进行两项巨大的准备工作：逐步恢复军队的正常职能，从而使他们断然脱离激烈的党派斗争；安定南里约格朗德，这是海军叛乱使得弗洛里亚诺未能进行的一项工作。总统的刚直性格，也许并不能很理想地适于做第一项工作。军队的领袖们领会了总统的动机，便忠诚地与他合作，共同恢复了军纪，并且从政治活动中撤回了他们的战友。另一方面，盲目效忠于弗洛里亚诺的青年军官却发现，政府的每一项行动中，都有存心刁难的意味。在他们看来，尽管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对共和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但他却正在使他自己成为反动派的一个工具。

反政府派在报纸上和议会中进行的攻击，甚至比他们在德奥多罗和弗洛里亚诺两届政府的斗争最激烈时期所进行的攻击，还要狠毒。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在联邦共和党内的朋友们的献身精神，根本抵不过总统的对手们的激烈情绪。普鲁登特·德·莫赖斯非但不能取悦于激进分子，而且也不能激起里约格朗德联邦党人对他的完全信任。

这些革命者，虽然在第二次入侵南方后被击败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放下武器。在这个州内，以及在沿乌拉圭和阿根廷的边界上，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着新的集合号令。萨尔达尼亚·达·加马正在拉普拉塔河岸筹备一次新的入侵，因为当时，西尔维拉·马丁斯已把革命的领导权移交给他了。他在写给君主派首脑安德拉德·菲格拉的信件中，说明了他的观点："如果弗洛里亚诺通过另一次政变而留任总统的话，革命就会加倍活跃起来，并将以完全胜利而告终。如果把政府移交给普鲁登特，而他又不能保住自己职位的话，上述情况也同样会发生。如果普鲁登特能够巩固他的权势，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局面，而对于武装斗争和革命本身，都将发生强烈的政治影响。"过了几个月，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就职以后，萨尔达尼亚·达·加马写信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闻报》说：

144

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最终不得不放弃他的职位，而听任革命势力强劲如前。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由于它依旧对我们表示一种蓄意进攻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革命者

并非不愿意在祖国的圣坛面前放下他们的武器，提出他们正当的控诉和崇高的目标；但是，不应该由他们首先伸出橄榄枝来。

倡议和解，恰恰是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最关心的事情。但是要做到这一步，他必须有时间让激烈的情绪冷静下来。他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和解将取决于革命者是否首先解除武装，但是，说到这里，事情就很清楚了，他所以要提这条限制，就是企图赢得时间，而不必公开反对那些不妥协的分子。

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尽管怀着急切的愿望要结束这场正在摧毁他本州的斗争，但是他对于那些在巴西其余地区进行过煽动的宿敌，却并不可能怀有同样的慈悲心肠。高卓的共和党人，并未参加格利塞里奥的联邦共和党，因而在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他们最重要的是热衷于保卫本州的自治和他们的政治原则。对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他遭到了弗洛里亚诺派的攻击，且不论其是否公正）所持的不偏不倚态度，他们甚至比联邦党人，还更加表示怀疑。

为了处理和解问题，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派遣弗朗西斯科·莫拉将军前往南里约格朗德，并命令他把军区司令部迁出该州首府，因为在那里，他可能受到当地政府的影响。当这位将军坚持留在阿雷格里港时，他的职位就被因诺森西奥·加尔旺·德·克罗斯将军所取代了。加尔旺将军在离开里约之前，写信给席尔瓦·塔瓦雷斯上校，说明了他所担负的使命，并邀请他到他未来的司令部去，以便讨论和平条件。

席尔瓦·塔瓦雷斯上校甚至没有与西尔维拉·马丁斯和萨尔达尼亚·达·加马(人们怀疑他两个人正在阴谋复辟)进行磋商，就同意了与加尔旺将军的约会。加尔旺将军于6月8日抵达南里约格朗德州，并在佩洛塔斯建立了他的司令部。他打算不经过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政府的同意和批准就进行和解，事实上，是打算超越联邦政府授予他的权力。

145 可是在加尔旺将军尚未能采取和谈的步骤之前，联邦党人就对南里约格朗德州发动了第三次入侵。萨尔达尼亚·达·加马得到乌拉圭某些地方当局的支持，为了进行一次最后的挣扎，已经顺

利地把叛乱活动又重新发动起来。一批批联邦党人越过边界，在里约格朗德重新展开了游击战。但是他们的战斗精神已经衰落，而确信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政府军队，则比较巧妙地进行了战斗。

那些到处挨打、丧失了公众的同情、而没有逃到国外去避难的人，便在一些战略地点，挖壕据守，等待着预期的停战。乌拉圭政府迫使被围攻的军队开拔，而且在巴西的坚持下，下令把他们拘留起来。萨尔达尼亚率领大约700人，其中包括150名来福枪手，渡过夸赖河，在奥索里奥附近设了营。这个小分队因为派出了几排人去支援阿帕里西奥·萨赖瓦，力量就更进一步减弱了。

1895年6月24日，叛乱者遭到了伊波利托·里贝罗那支较他们远为强大的部队的攻击，他们勇敢地进行了战斗，直到萨尔达尼亚被长矛刺死为止。后来，官方的检验证实他的尸体曾被胜利者所肢解。萨尔达尼亚为了一项失败的事业，竟在和平谈判进行的过程中，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好象是壮烈地自杀了，这次自杀将提高他死后的声誉，也为他的战友们带来了光荣的和平。

席尔瓦·塔瓦雷斯上校在与西尔维拉·马丁

斯达成充分谅解之后，于1895年7月1日，磋商了停战问题。7月10日，他又在距离佩洛塔斯不远的皮拉蒂尼姆，会见了加尔旺将军。在他们会谈的备忘录草案中，席尔瓦·塔瓦雷斯宣称，他从来也没有与共和国和联邦政府为敌，而仅仅是反对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的政府。只要联邦政府愿意保证他们的一切权利，而且愿意依照联邦宪法着手重新组织南里约格朗德州，叛乱者就同意向联邦政府交出他们的武器。

由于加尔旺承认了这项最后条件，他就大大地越出了赋予他的权力范围。陆军部长贝尔纳多·瓦斯克斯将军通知他，关于修改南里约格朗德州宪法的条款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问题只能由国会来决定。然而，在删去了这项条款的最后协定草案中，加尔旺答应，由他负责向联邦政府提出一项请求，“请求对南里约格朗德州宪法进行研究，146 因为它违反联邦的法律。”共和国总统和陆军部长打电报给加尔旺，批准了协定的最后草案。这位效忠政府的将军以及这位叛变的上校，立即向国会提出了请求，但是国会却通过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驳回了这项建议。

儒利奥·卡斯蒂略斯曾经祝贺加尔旺将军在调解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当他获悉协定的详细内容时，就与他断绝了公务上的联系。卡斯蒂略斯根据他自己的意见，并在与他自己党内的急进派意见相反的情况下，重新恢复了公共秩序，同时将南里约格朗德州的领土，向他以前的敌人重新开放了。西尔维拉·马丁斯和其它的革命领袖，都不受约束地回到这个州，在报纸上重新展开宣传战，来反对该州的政府。

1895年3月，座落在离里约中心区不远的军事学院的学生，曾经起来反对该院院长，因为他们怀疑此人反对弗洛里亚诺派。政府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它逮捕了这些犯上作乱的学生，并且开除了他们的军籍。但是，它在强使人们无条件地尊重它的权威和在消灭违法乱纪的骚乱这两个方面，却并没有成功。从那时起，一直到1895年7月签订南里约格朗德和平条约为止，出现了一个党派运动中的平静时期。

在坎波斯·萨莱斯的倡议之下，经历了一系列的风波之后，国会于10月11日通过了大赦令。这样一来，里约格朗德革命的漫长而痛苦的一页最

后宣告结束了。这次革命曾经蹂躏巴西南部地区达两年之久，使得全国贫困不堪，而且激起了无限的怨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已经达到了他的最高目标，他已经终止了武装斗争。可是，他还必须建立起平静的局面，恢复财政和行政的秩序。这两项工作后来证明是更为艰巨的。

政府结束内战的条件，并未使急进分子感到满意。关于大赦问题的讨论，在国会中激起了强烈的情绪和反对的意见。在联邦共和党内部，发展起一个持强烈不同意见的“温和派”，其成员大部分是保守分子和以前的君主派，纯正的弗洛里亚诺派“忠诚拥护者”把他们统统称为“反动派”。这些温和分子利用急进分子对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偏见，更紧密地向政府靠拢，这样就为政府将来同联邦共和党展开的对抗，准备了必要的核心力量。

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通过他长期而顽强的反联邦党人的运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他在政治上的威信。不管他是否愿意，他已经成为那些与 147 总统为敌的人所乐意投靠的人物。卡斯蒂略斯在他致本州议会的通信中，也没有饶过这位总统。狂

热的弗洛里亚诺派、实证主义者、各种不妥协分子和急进分子，都把他推崇为弗洛里亚诺的继承人。

1895年与1896年，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的，其中充满愤懑不平，隐蔽的威胁和犹豫不决的政治阴谋。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是一位不寻常的妥协派和策略家，尽管他这个人对总统力求摆脱联邦共和党监护的情况最为了解，可是他还是尽量避免与政府决裂。普鲁登特在圣保罗继续得到他那些忠诚的朋友们的支持，而且在马腊尼昂和伯南布哥等其它州也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在这些地方，亲政府党的领导权已经交给了一个先前的君主主义者罗沙一席尔瓦顾问，这样，普鲁登特就为他将来与联邦共和党的分裂铺平了道路。

鲁伊·巴尔博扎虽然不依附联邦政府而保持着独立，他却是急进民主主义派的一个冷酷的敌人。从1896年5月担任圣保罗州长的坎波斯·萨莱斯，认为他自己不受联邦共和党纪律的约束。共和国副总统、巴伊亚州的曼努埃尔·维托里诺逐渐脱离了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后来又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

1895年3月，巴西与葡萄牙恢复了外交关系，这是在葡萄牙的轻巡洋舰收容了海军叛乱者的时候由弗洛里亚诺断绝的。英国政府当时是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的友好仲裁人。不久，英国政府就引起了巴西的严重不满，因为它于1895年7月占领了自古以来属于巴西的特里尼达德岛。① 尽管这个大西洋上的荒岛，对巴西来说，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重要意义，然而这次占领就是藐视巴西的主权，而且它也很可能意味着在距离她海岸线相当近的地方，要设置一个战略基地。外交部长卡洛斯·德·卡瓦略对英国索尔兹伯里内阁（当时，正走向约瑟夫·张伯伦的帝国主义）的态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且拒绝了仲裁。这个岛，在它被无理占领一年以后，通过葡萄牙政府的斡旋，又和平地交还给巴西。对于普鲁登特政府来说，这次与英国发生的事件，引起了国内的一些新的困难局面，而且再一次煽起了民族主义的激烈情绪。但是，正148在这时，两次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却增强了总统的

① 这个小岛位于巴西海岸数百哩外，与维多利亚相对；请不要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中同名的前皇家殖民地相混。——英译者

势力，而且也标志着里奥·布兰科男爵（鲁伊·巴尔博扎称他为“巴西边界之神”）毕生事业如意的开始。

由于金蒂诺·博卡尤瓦在临时政府的初期与阿根廷签订的协定一直未获批准，关于米西奥内斯地区的老问题，便被提交给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了。巴西的辩护士里奥·布兰科所提出的著名答辩，不久就使巴西的要求完全得到了承认。法国人与巴西人在法属圭亚那边界上的阿马帕地区发生了几次冲突之后，两国把这个问题提交给瑞士总统进行仲裁。殖民时期以来这个地区一直令人气恼的边界问题，由里奥·布兰科以新的辉煌的胜利给解决了。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由于身体日益衰弱，1896年11月便告假到山区的休养胜地去旅行。副总统曼努埃尔·维托里诺暂时担任总统的职务后，并未局限于处理一般日常事务。他有他自己的政策和关于政府的打算。维托里诺虽然在表面上与普鲁登特是意见一致的，可是他却一开始就改组了内阁。贝纳迪诺·德·坎波斯放弃了圣保罗州长的职位，接替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出任财

政部长。若阿金·穆尔蒂尼奥任运输部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也都更换了。那些老的弗洛里亚诺分子和所有反对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不满分子，很自然地都聚集到副总统的周围，人们可以想象，他在四年任期的下余时间里，将会变成实际上的总统。

曼努埃尔·维托里诺是11月15日的共和主义者，著名的医生，有才华的演说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但他却不能运用必要的冷静的判断，去抵制来自急进分子以及这个政府的极端主义拥护者的压力。他自己也被卷入他们之中，结果使他与总统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不管他愿意与否，他也象儒利奥·卡斯蒂略斯一样，正在变成共和主义者抬头的一个象征，而同那些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卵翼下的各种反动派形成了对抗。卡努杜斯事件的爆发，对于全国是一次痛苦的意外事件，并使已经炽热的激情变得更加沸腾起来，而发展成为对共和国的另一次严峻考验。

第十二章

149

卡努杜斯事件及其后果

卡努杜斯事件——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的《腹地》——共和国的"旺代"——联邦共和党的分裂——政府军的胜利——谋害总统——比登科尔特元帅的牺牲——对急进民主主义者的反击——莫赖斯总统的继任人——破产与偿债基金贷款

在卡努杜斯暴动已被扑灭，这一事件所引起的激情也已经平息之后，巴西人很容易看清，这是一次悲剧性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所著《腹地》①一书，表述得十分清楚。

① 塞缪尔·普特南译为《内地人的叛乱》，1944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者

这本书尽管采用了富于戏剧性的结构，文体极尽夸张之能事，而且所做的人种学和社会学上的结论也过于武断，但仍然是一部杰作。在卡努杜斯事件爆发前后，在巴西那些愚昧的内地人当中，甚至在德国移民当中，都发生过类似的盲信者的暴动。① 可是，正当巴西仍然被内战搅得惊惶失措的时候，卡努杜斯事件却具有一种预想不到的危险性。

卡努杜斯宿营地是若干年以前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以北约 200 哩处、一个位于铁路与圣弗兰西斯科河之间的地方建立起来的。如果这个地区，象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所说的那样，具体而微地描画出东北内地那种土地干裂的一般自然地理现象，那么，住在卡努杜斯的人民，便具备着东北内地人（Sertanejos）的典型特征，他们与大西洋海岸隔绝，而且比那里的当代文明落后了好几个世纪。

卡努杜斯是由一个贫苦而守旧的神秘主义者

①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南里约格朗德的一个名叫穆克尔斯的教派，就是用武力才扑灭掉的。——英译者

——安东尼奥·康塞利罗建立起来的。他来自塞阿腊州，曾经在一个地区屡屡遭到教派观念的迫害，苦不堪言；而那个地区，到后来，西塞罗神甫的“养子们”的宗教狂热十分盛行。他到来不久，大量的信徒就聚集在这个奇怪而半疯的六十岁的苦行僧周围。卡努杜斯四野荒凉，它紧靠着一条到雨季才有水流的河。它毫无计划也毫无秩序地逐渐盖起了向四面延伸的一大片破烂不堪的小草屋，而以许多教堂作为这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的中心。它外形奇特而于人民无害，这是顽固迷信的卡博科洛人的一种表现，也是内地禁欲主义、落后和贫穷的表现；它一点点地发展，并且很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直到海岸一带的文明浪潮袭来，才使那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变了样。 150

康塞利罗的那些鲁钝的信徒们，对于全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而且也很少关心。关于巴西，他们模模糊糊地知道它是一个共济会员和无神论者的共和国，这些人赶走了老皇帝，而且还确定了不举行宗教仪式的世俗婚姻制度，他们感到这是难以原谅的不敬行为。他们在没有远大抱负和超脱尘世的生活之中，关心的只是他们那种单纯的、空

幻的宗教，而这种宗教乃是天主教的仪式、非洲的巫术与印第安人的迷信的一种粗糙的混合物。

卡努杜斯的“先知”们与官方当局之间的首次冲突，是由于把若干廉价建筑材料给了一座教堂而引起的。巴伊亚州长决定惩罚那些胆敢反抗政府法令的宗教狂，并且派出了一支小的警察部队。用古老的大口径短枪、粗笨的工具以及念珠和护身符（这二者是他们的信仰的外部标志）武装起来的康塞利罗的信徒们，对州长派出的这支远征军，进行了突然袭击，并且轻而易举地把他们击溃了。处在当地那种久已剑拔弩张的环境下，对维持内地治安当中的这桩小事件进行大量宣传，只能把它夸大到完全不相称的程度。路易斯·维亚纳州长无法肯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也不了解卡努杜斯潜在的重要性，于是便向当时由副总统曼努埃尔·维托里诺暂时主持的联邦政府求援。陆军少校费布隆尼奥·德·布里托奉命率领一支 543 人的远征军，其中包括联邦和州的军队，前往卡努杜斯。在他们尚未到达那个城镇以前，那帮宗教狂就开始向他们进攻，并且打得他们溃不成军。对第二次远征军失败表示愤怒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

刚刚由于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合法政府的胜利而得到拯救的共和国，再一次意识到它已陷于危急之中。奥维多尔大街是里约热内卢的缩影，也是巴西的一个华丽的、即使是虚假的肖像。在这条街上，急进民主主义者再度发出了他们那种充满仇恨和爱国主义的威胁声音。他们把这次暴动归咎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说是由于他促成了南里约格朗德的和解，所以他已经为反动派的新的袭击打开了方便之门。康塞利罗的狂热信徒们大喊大叫地反对共和国，反对无神论者和共济会员；急进民主主义者宣称，这些叛乱者一定有君主派在幕后指挥；爱国大军象在弗洛里亚诺的时代一样，纷纷出现。151

正如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嗣后所说的那样，卡努杜斯乃是共和国的旺代。① 在巴伊亚州内地深处、安东尼奥·康塞利罗那个由简陋小木屋组成的城镇中，德奥多罗所缔造、弗洛里亚诺所巩固的共和国，正在对反动派的拚死反抗进行战斗，

① 旺代是法国西部一个省，在1793—1796年，它是保皇派发动叛乱反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中心。——译者

这正象当年在欧洲各条战线上获胜的法国革命武装部队向布列塔尼①的朱安党②人发动猛烈进攻一样。其实，卡努杜斯事件的性质要温和得多，只不过那个时期的人们并不这样认识罢了。信奉天主教的、现实主义的朱安党人与康塞利罗的狂热信徒之间的差异，和旺代与巴西东北内陆在自然地理上的差异，是同样地巨大的。

副总统派出的一支新的远征军，在莫雷拉·塞萨尔上校指挥下，前往卡努杜斯；这一次，除了1,000名士兵，还有一个骑兵营和一个炮兵中队。1897年2月21日，这支军队被击溃，司令官也被击毙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或者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次灾难。这支未经训练或者仅仅习惯于南方平原的部队，由于后方勤务极端恶劣，又在他们所不熟悉的那种土地乾裂、荆棘丛生而气候酷热的内陆地带作战，它实际上变成了自己愚蠢行动的牺牲品。

① 布列塔尼：指法国现在的西北部地区。——译者

② 朱安党：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以后，在法国西部组织保王叛乱的党派。——译者

当这次灾难的消息于3月7日传到里约的时候，急进民主主义者立即大发疯狂。君主派将要用他们的生命，来补偿政府军的失败。三家君主派的报馆遭到袭击，被捣毁了，当时警察却在那里袖手旁观，他们如果不是故意纵容，也是无可奈何。第二天，资本家仁蒂尔·德·卡斯特罗在里约一皮特罗普利斯铁路线的车站上，遭到暴徒的暗杀，他是两家君主派报纸的主要业主和奥罗·普雷托子爵的亲密朋友。当时与仁蒂尔·德·卡斯特罗在一起的子爵和他的一个儿子阿丰索·塞尔索仅以身免。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已经在三天以前，突然从特雷索波立斯返回，而且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在卡特台宫重新执行了总统职务。由于副总统当晚未在宫里过夜，总统只好（象弗洛里亚诺可能做过的那样）给他送去一份书面通知，说他的临时总统职务业已终止。在普鲁登特的统治下，卡努杜斯这场戏剧性的事件，也行将宣告结束。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复职以后，是极其不得人心的，其严重程度，或许是巴西任何政治家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他在卡特台宫处境十分孤立，

152

甚至连他自己的安全也都没有保证。从激进民主派那种日益嚣张的情况来看，随时都有对他进行暗杀的可能性。人人都会说，警察已经无法控制这个城市，政府也是名存实亡了。

对君主派报馆进行的野蛮袭击，并未受到惩罚，刺杀仁蒂尔·德·卡斯特罗一案所牵涉到的人，也是如此。君主派，过去曾由奥罗·普雷托于1896年组成一个政党，这时却都吓得躲起来，或者逃到欧洲去。煽动性的公众集会，每天都在市中心的圣弗朗西斯科广场这个供民众示威的传统集合地点举行。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领袖们和爱国大军，将今比古地仿效法国大革命，任意藐视合法当局，并且也使用了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具有煽动性的言辞。

几个月以后，鲁伊·巴尔博扎在向参议院作的一次演说中，对阴郁的1897年间笼罩着里约的白色恐怖进行了分析，他说："由于总统的行动谨慎，由于他的脾性温和而又态度缄默，在他的周围已经产生了一种软弱的气氛，它鼓励了某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某些大胆的寻衅闹事，而当这种行为预料不会遭到坚决反抗的时候，它就总要肆意泛

滥。”

在国会中，急进派、急进民主派以及狂热派，受到了热烈的欢呼。共和国的立法者们，仍然处于帝国时期的议会传统的影响之下，他们要求在政治事务中占据优势，而这是与政体的性质相矛盾的。从基本上看来，这就是法国议会与麦克马洪①之间曾经发生过而且在第三共和国的其它历史时期一再重演过的那种同样的斗争。

总统与国会各自掌握的权力，只有在宪法的条文中才是协调一致的；而在实际当中，它们却绝不会协调。尽管有格利塞里奥所掌握的那个政治机器〔联邦共和党〕，而它按理也应该使国会中的多数采取一致行动，但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这个天天遭到反对派侮辱的目标，却仍然感到自己缺乏足够的支持。可是，总统一点一点地做工作来扶植他自己的权威，办法是用痛苦的让步，使他赢得了少数军队领袖的效忠和许多保守分子的同情。他任命一个精力更为充沛的人物接替了首

① 麦克马洪（1808—1893年），法国保皇派政治家，曾任法国总统（1873—1879年）。——译者

都警察署长。内政部长阿马罗·卡瓦尔坎蒂，亲自到街上指导那些为反对新的袭击和抢劫威胁而采取的措施。但总统最大的政治成就，还是使自己从联邦共和党的监护之下解脱出来。

153 里约军事学院的学生，由于受到时代激情的煽动，并被历届共和国政府的默许所娇纵，在1897年5月26日宣布哗变——不用说，他们认为其他军队和政客也肯定会支持他们。政府用陆地上和海上的军队包围了军事学院，未经战斗就迫使它投降了。犯上作乱的学生被开除了。政府抓住这个机会，对塞阿腊的军事学院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同时解散了平民组成的爱国大军。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里约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众议员 J·J· 塞亚布拉（他曾一度被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剥夺了人权）建议众议院，任命一个委员会去祝贺总统“保卫了文官共和国的秩序和威信”。这个计策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故意要把不受总统信任的那位政府的议会领袖，搞得声名狼藉。

格利塞里奥企图躲开这次打击。他说：“军事学院是维护巴西荣誉的堡垒。共和国总统并不知

道塞亚布拉的建议①，而他的建议的唯一目的是要分裂过去支持政府的政治力量”。众议院以86票对60票否决了塞亚布拉的建议。第二天，《商业日报》发表了一篇由政府授意的声明，宣布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并不是政府意见的解释者。于是长期以来潜藏着的裂痕，扩大起来了。

巴伊亚州的议员阿图尔·里奥斯辞去了众议院议长的职务，因为他曾与来自该州的同僚一起投票赞成了塞亚布拉的建议。四天以后，格利塞里奥自动表示愿意填补这个空缺，却被阿图尔·里奥斯以88票对66票击败了。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在反对这位共和运动时期的老搭当时，主要是得到了巴伊亚、伯南布哥、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等州议员的支持。站在格利塞里奥一边的，有斗志旺盛的卡斯蒂略斯派的共和党人。

在曼努埃尔·维托里诺担任临时总统期间，在“红色弗洛里亚诺派”阿图尔·奥斯卡将军指挥下，组织了对卡努杜斯的另一次军事远征；这位将

① 与此相反，塞亚布拉曾亲自将他的建议通知总统。——原著者

军是在反对里约格朗德叛乱者的战役中出 的 名。远征军大约有6,000人,分成由州警察大队和陆军营所组成的五个旅。尽管有过以前那些灾难性的经验,可是后方勤务却并未得到改进。

154 曾经在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作为圣保罗一家报纸的记者,随这次新的远征军一同前往。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远征军的缺点。对巴伊亚内地粗鲁的狂热信徒进行的这场性质可疑的斗争, 并不能激起人们的热情。然而,怀疑这次宗教狂的起义是受到了君主派的 鼓 励、帮助和唆使(连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本人也在很久以后, 方才解除这种猜疑),却起到了消除沮丧情绪的作用, 在共和国的青年军官当中尤其如此。如果说最高级的军官都托词逃避这次远路出征的话,那么最低层的军官,则在他们认为是保卫共和国的事业中,勇敢地作出了自我牺牲。

阿图尔·奥斯卡将军对卡努杜斯的防御力量,似乎也抱着和前几次远征军司令官相 同 的 错 误见解。他一点都不了解与狂信宗教的内地人作战时有关的地形地势或者心理方面的因素, 而认为仍然可以使用里约格朗德游击战中的战术。在与

这些狂热的宗教信徒首次接火之后，他突然发觉了自己的错误。

在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袭击叛乱者的营寨时，他立即遭到了全面包围，而且几乎损失了所有的储备补给品。萨瓦热特将军的部队，从另一个方向来援救他，这才使他摆脱了与莫雷拉·塞萨尔上校的部队同样的命运。可是，奥斯卡将军的部队，由于没有食物和饮水，甚至无法保持他们设在桑多山的补给基地。

那些宗教狂善于作战，而且他们当时又用从先前几次远征军掳获的军火武装起来，所以他们在大胆突击时，打得很漂亮，使正规军疲于奔命，大量伤亡。政府又派遣了一个旅去救援，但是他们由于粗心大意，竟暴露在内地人的炮火之下，结果被迫在混乱之中，扔下辎重队撤退了。饥饿、炎热以及由于无力攻陷宗教狂的简陋据点而产生的愤懑情绪，在政府军中引起了极端紧张的气氛。

奥斯卡将军对总统的敌人所策划的政治阴谋非常敏感，这样，他就促使卡努杜斯事件增添了一种它本来不可能具有的意义。他毫不犹豫地断定说，内地人是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这些武器

可能是由君主派从欧洲买来，再越过沙漠运去的，等等。在情绪激昂的气氛中，任何谎言都可以不成问题地到处传播。这位司令官越过政府首脑，自己直接向里约的反对派政客和新闻界发表谈话，叙述战争中发生的事件，并从政治上对这些事件作155出他个人的解释。那些更为狂热的急进民主派，说不定也许发现了这位远征卡努杜斯的将军，正好是弗洛里亚诺的继承人。与此同时，这位将军没有避免或者说未能避免的一些灾难，却使他的威望降低了。

总统撤换了陆军部长，认为他过于自满，不能应付反对派的政治策略。新部长马查多·比登科尔特元帅（巴拉圭战争中的一员老将，为人勇敢而严肃），又率领着生力军前往巴伊亚州。他决定要首先组织运输和补给工作。

这次战役出现了新的变化。卡努杜斯由于遭到了正规军的攻打和野战炮兵的轰击，没有能够坚持多久。那些宗教狂逐屋、逐步地保卫他们的阵地，表现出一种不但勇敢而且稀有的反抗精神。饥饿口渴、衣衫褴褛的宗教狂的火力，摧毁了政府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1897年10月5日，最后

几幢还在冒烟的茅屋终于被占领了。

听不到一点音响、一声呼叫，也看不到任何一点有生命的迹象。安东尼奥·康塞利罗和他的主要参谋人员，早已经死去。这个奇怪的城堡变成了一个屠场。政府军抓不到一个活的俘虏；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宣称“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事例”。即使有些伤员原先还活着的话，他们也被胜利者点起的大火给烧死了，因为胜利者认为：这样做就会永远消除卡努杜斯这个污点。陆军与州的警察部队，在这次长达一年的战争中，损失了将近5,000人。

在急进派的眼目中，政府军战胜卡努杜斯的宗教狂，并未增加政府的威望。反对总统的运动变得更加剧烈起来。它产生于联邦共和党内部，并受到立法部门少数派的支持。当时已经和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分道扬镳的副总统曼努埃尔·维托里诺，在形势的推动下，成为这个运动的当然领袖。一群年轻的立法者和共和派新闻记者，构成了这次政治斗争的先锋队，而这次斗争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叫政府在辞职和采取某种暴力行动之间，作出极其痛苦的抉择。11月 5 日谋杀总统的事件，保

全了他的声望，而且预想不到地维护了他的权威。

在1897年的那一天，一些从卡努杜斯回来的军队，正在里约的旧军械库登陆。总统和他的陆军部长马查多·比登科尔特登上将要送他们回来的船只，进行了短暂的巡视。他们不顾群情激奋的情况和反对这样做的警告，又走到军械库的院子里去等候归来的老兵。除了向他发出的欢呼，还可以156听到愤怒的喊叫和怀念弗洛里亚诺·佩绍托的祈祷声。据鲁伊·巴尔博扎在参议院发言说，船上的一名军队代表，曾经煽动士兵对总统采取无礼的行动。

当总统夹在他的侍从武官与陆军部长之间，穿过军械库院子的时候，一个混血种的北方青年士兵马塞利诺·比斯波用手枪瞄准他进行了袭击。枪未打响，总统本能地用他手里拿着的礼帽把手枪打到一旁。总统的侍从武官门德斯·德·莫赖斯上校、比登科尔特元帅以及其它一些人抓住这个竭力挣扎的罪犯，打算制服他。总统和陆军部长高喊着告诉他们不要伤害他的生命。马塞利诺刚从捕捉他的人手里挣脱出来，就刺了比登科尔特元帅好几刀，还刺伤了门德斯·德·莫赖斯上校和

另外一位军官。总统已经被人领出了军械库。这位部长不久之后就牺牲了，为了保卫他的首长，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件事在首都和全国引起了极其巨大的震动。巴西并没有用暗杀来解决政治纠纷的习惯。这个悲剧的后果是，普鲁登特·德·莫赖斯获得了他从前所缺少的那种深得人心的威望。亲政府的报纸指责这种罪行是卑鄙的，而且说它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反对派的报纸也谴责这次罪行，但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疯人的行动而已。

国会十分激动。鲁伊·巴尔博扎在向参议院作的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中，分析了这次犯罪行为的来历，并且要求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尽管金蒂诺·博卡尤瓦的党与反对派有联系，但他赞成把马塞利诺·比斯波的罪行定为政治罪。

比登科尔特的葬礼是一次把他尊为神明的活动；总统亲自参加，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呼。11月6日，《官方日报》向全国发表了一篇简单的声明。这项声明是由共和国总统签署的，他在赞扬比登科尔特元帅的牺牲之后，宣布说，他要依靠巴西人民的支持来维护他们通过自由和自发的投票所赋

予他的权力。他在结束语中说道："法律将受到尊重，因为这是共和国荣誉所要求的。"

国会最后允许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宣布戒严，这加强了他的地位，他于是发动了一场往往超越合法范围的反击。街道的控制权，从急进民主派转到了保守分子的手里。反对派的报纸吓得沉默起来。警察的调查报告开列了这次政治罪行的同157谋者，其中包括一些比较激烈的国会议员，如在一艘军舰上被逮捕的皮涅伊罗·马查多、前伯南布哥州长巴尔博扎·利马以及不久以后随其它囚犯一起被流放到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岛①的新闻记者阿尔辛多·吉马良斯等。国会的豁免权和在弗洛里亚诺时代一样不顶用。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到圣保罗去避难。副总统曼努埃尔·维托里诺也遭到了指摘，但是这种指摘后来又被撤销了。政府封闭了军事俱乐部。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在对激烈的弗洛里亚诺派、激进民主派的煽动者以及国会中的政客

① 这是位于巴西东北海岸数百哩以外的五个小火山岛之一，长期以来用作流放地，现在是一个军事基地，而且是国家的一个设有立法机关的地区。——英译者

们进行了三年斗争之后，终于把他的政府机关的最高权威成功地树立起来。过去他曾经多次努力设法给联邦在各州的干涉行动定出切实的限度，并使他自己摆脱掉对国会多数党(联邦共和党)的从属地位，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11月5日的袭击给他奠定了他一直未能奠定的基础。1889年11月15日所采取的总统制，正在显示着宪法允许交给总统的那些巨大的权力，他的继任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经验，并将最充分地加以利用。

许多委身于联邦共和党的政客，利用11月5日的罪行所提供的机会，进一步向政府靠拢。由于制止了激进民主派的公共集会和不断发生骚乱的威胁，这个城市逐渐平静下来了。暗杀比登科尔特元帅的事件，已促使陆军设法躲避党派政治的污染，同时加强了它本身的纪律。因此，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在它任期中的最后一年里，就能够专心致力于处理行政问题了。

联邦共和党内部分裂后不久，站在政府一边的党员组成了某种联盟，并着手处理总统的继任人选问题。财政部长贝纳迪诺·坎波斯和圣保罗州长坎波斯·萨莱斯，在共和党人当中，是最有希

望被提名的人。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本人可能更愿意让他的部长作候选人，然而他并未干预这件事，而是和颜悦色地接受了坎波斯·萨莱斯。坎波斯是首先由巴伊亚州长路易斯·维亚纳公开提名的，并得到了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以及伯南布哥等州亲政府政党的支持。伯南布哥的首脑罗莎—席尔瓦被提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列入了正式候选人名单。

由卡斯蒂略斯的南里约格朗德共和党人领导的忠于旧联邦共和党的反对派，提名前巴拉州长 158 劳罗·索德雷和米纳斯吉拉斯的政客、弗洛里亚诺的外交部长费尔南多·洛博为候选人。1898年2月1日，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在一份声明中，为他的党所以要反对坎波斯·萨莱斯作候选人进行了辩护，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其理由在于总统已经给它加上了一种官方的色彩。

作为总统候选人，坎波斯·萨莱斯急切地希望避免那种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相类似的处境，并决心在事先就斩断任何可能使他屈从于一个政党的联系。1897年10月31日，在里约为他举行的一次政治性的宴会上，他在结束关于他未来施

政纲领的概述时说，他是创始于君主国时期、具有历史传统的“共和党”的候选人，所以他超然于当时的一切党派之上。坎波斯·萨莱斯摆脱了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执政期间争夺巴西政治支配权的两个集团而保持了独立地位，所以他才能够这样毫无拘束地表明他自己的态度。

他的话立即产生了效果。联邦共和党和聚集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周围的新联盟（这两者在理论主张或者选举问题上，都不是始终一贯的）中所有残留下来的人员，都开始迅速地解散了。从那时起，反对派的候选人劳罗·索德雷和费尔南多·洛博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只是为了对他们两个人表示礼貌，才使他们的权利得以继续保留。

九年间的政治争吵、阴谋、军事起义和内战，震撼了共和国，并使国库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除了因为实施一项临时财政经济政策而引起的一般困难之外，还有因为清理恩西利亚门托时期投机的债务和因为内战而引起的许多特殊困难。尽管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对这些财政经济以及行政混乱所造成的困难十分了解，然而它却没有什么办法来克服它们。由曼努埃尔·维托里诺任

命接替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出任财政部长的贝纳迪诺·德·坎波斯，对国库的严重问题作过详细的报告，并且提出过几项相应的措施，但是未获批准。这些措施当中有：重新恢复在关税当中征收一部分黄金的规定，一项所得税①，人头税，增加消费税，而主要是将某些国家财产，首先是巴西的中央铁路，转让和出租。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由于受到扰乱全国的政治运动的阻挠，无法贯彻执行任何行政计划，所以，他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只能采取一些权宜的措施，如举借 6 万千度的内债和100万英镑国库券的外债。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咖啡一直保持高昂价格，由此而产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贸易差额，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巴西的经济。在他执政的后半期，咖啡的价格几乎直线下降。一袋60公斤的咖啡，1889年的平均价格是4英镑，到1897年就跌到每袋10先令，不过，同一时期，在世界总产量 1,200 万袋当中，巴西的年产量已从400万袋增加到800

---

① 这项建议最初是由鲁伊·巴尔博扎提出的。假如他早先曾于所著《英国信札》一书中，对美国的所得税还进行过严厉的批评，那么这件事就很有趣味了。——原著者

万袋。

1897 年贸易顺差为 500 万英镑（即从出口2,675万英镑中减去进口2,150万英镑而获得的），按平均7.5辨士兑换一个密耳瑞斯的比率计算，得出约16万干度的贷方余额，但用黄金偿付政府在海外的开支，偿付外国商行和私人从巴西向国外的汇款之后，这个贷方余额就一变而为10万多干度的赤字了。既然经济状况是如此疲弱无力，银行和国库所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到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政府的末期，已达70万干度以上），对于那些受过自由主义经济熏陶的财政部长们来说，就成为一场永久不能摆脱的恶梦了。

联邦的国库岁入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果按英镑汇率折合黄金来计算，实际上是已经下降了。岁入已从君主国最后一个财政年度的17万干度（当时每一个密耳瑞斯值27辨士），增加到1894年的27万干度，1897年的33万干度，但当时每一个密耳瑞斯已跌到7或8辨士。由于内战所造成的货币贬值和额外开支，预算赤字证明要比预期的数额高出四、五倍。在里约的八家本国银行和五家外国银行，分别拥有80万干度和30万干度的资产，它们

合并在一起的资本额为 317,000 千度，其中只有26,000千度属于外国银行所有。

由国会通过的 1898 年度预算，估计赤字有5,408,000英镑，或者折合为 48,606 千度的黄金。向美国（当时正为解放古巴而与西班牙作战）出售战舰，和将年息 4 厘的国内黄金公债换成年息 5 厘的纸币公债，使预算赤字减少了大约100万英镑。政府不得不到当时被外国银行操纵的公开外汇市场上去取得余下的 400 万英镑。国会过去曾按 1897 年平均 8 个辨士换一个密耳瑞斯的汇率，计算纸币兑成黄金所需要的费用，但是从那时起，汇率已跌到5辨士。因此用以满足兑换黄金所需求的纸币总额，其中包括本年到期的100万英镑的国160 库券，就把粗略估计的343,000千度的总岁入，占去了24万千度。

这种情况，实际上意味着破产：国库将不能够偿还它的债务，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政府与巴西的旧传统完全一样，它除了举借另一笔外债，就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但是巴西在欧洲金融市场上的信用很坏，因而这种解决办法，也是行不通的。就是在这时，兴起了关于偿债基金贷款的念

头(尽管它并不是首创)，这将是一种延期偿付的贷款。新近在南美洲境内就曾经出现过采用这种办法的一个先例。

阿根廷在华雷斯·塞尔曼总统任职期间滥发纸币以后，佩列格里尼政府同该国的外国债权人签订了一项协定，以便取得一笔新的贷款来支付过期未付的利息。萨恩斯·佩纳总统对国民经济的生命力，具有较大的信心，他废除了这项协定，并且使这笔新贷款的利率降低了。

坎波斯·萨莱斯被经济破产的威胁吓坏了，因为这有可能使他丧失政权，所以他便打算到欧洲去同伦敦的债权人达成一项直接谅解。同一时间，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和他的财政部长贝纳迪诺·德·坎波斯，业已邀请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去执行这一项任务。这位谨慎的政治家赞成这种意见，可是他自己却拒绝承担这项任务，而建议由别人代替他。所以坎波斯·萨莱斯便趁此大好时机，毛遂自荐了。他作为当选总统(不管对什么样的计划达成协议，他都是未来的执行者)的特殊地位，使得他获得了特殊的权威。

1898年4月，坎波斯·萨莱斯起程前往欧洲。

他在去伦敦的途中，一到巴黎，便发现有一份关于偿债基金贷款的正式建议草案正在等待着他。他从里约动身以后，伦敦—拉普拉塔河银行的经理就从伦敦一些银行家那里，带来了一份延期偿付的贷款的建议，这种贷款方式正是行将卸任和行将接任的两个政府所寻求的。从巴西获得政治独立以来就与她的财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罗思柴尔德财团，看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英国资本在巴西的投资总额超过8,000万英镑），便赶紧前来援救这个面临破产的债务人，因而提出了第一个和解的办法。

他们建议提供1,000万英镑的贷款，以巴西全部关税与巴西中央铁路和里约热内卢的自来水的收入作为担保。在巴西方面，政府要按12个辨士兑换一个密耳瑞斯的汇率计算，从流通中收回与每161 次分期交付的贷款价值相等的纸币。收回的纸币应交给外国银行保管，并将当众焚毁。政府还要同意在延期付款期间，不再举借任何新的贷款。

在伦敦，坎波斯·萨莱斯使罗思柴尔德财团对他们原来提出的建议作了某些更改。从流通中收回的纸币，其汇率由12辨士改为18辨士；偿付利

息的宽限增加到三年，分期偿还债款的宽限增加到十年；对贷款的特殊担保品，被限定为在里约热内卢所征收的关税，其它的海关则是辅助性的。尽管政府打算焚毁纸币，然而它还是可以把它储存起来，以便将来用于购买汇票。

毫无疑问，这样一项协定乃是无力偿付债务的自白书，而且也没有十分尊重巴西国库严守时间的传统。然而，正当英国的银行家们掌握着那些贫穷的、或者不知撙节的国家在财政上的最高统治权，而这些国家对于英帝国在外交上以及必要时在军事上的支持又始终抱着信心的时候，这项协定却是符合时代的逻辑的。

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在任期届满并已选出继任人的情况下，平安地结束了。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当初就任的时候，人们就曾对他怀抱过偏见，在那动荡不安的执政期间，他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并且在行政方面也未能取得多少成就，但是在他移交政权的那一天，他却在首都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呼。巴西人终于开始认识到，这位严肃的共和主义宣传家，在恢复国内秩序方面，曾为国家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第 十 三 章

坎波斯·萨莱斯
(1898—1902年)

坎波斯·萨莱斯简历——若阿金·穆尔蒂尼奥的财政达尔文主义——国库充实而国家空虚——货币数量论——政党的重新分裂——坎波斯·萨莱斯的坚定性和他的政府的不得人心

新总统曼努埃尔·费拉兹·德·坎波斯·萨莱斯，1841年生于圣保罗州的坎皮纳斯，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同年，两人都是设在该州首府的法律学院的学生。当他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进行了撰写政治新闻的尝试，向当时的自由派报纸《公理报》和《圣保罗省报》投过稿。毕业后，他在坎皮纳斯开始了律师的生涯。政治斗争把他给迷住了。1867年，他被老牌自由党人选为圣保罗省议员。因

为他反对进步的自由党人，他很快就发现，处在激进党的“先进”分子们当中，才是适得其所。

坎波斯·萨莱斯并不是1870年宣言的签名人；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也同样不是。但到第二年坎波斯·萨莱斯成为圣保罗共和党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在1873年伊图会议之后，又成为共和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共和党执行委员会里的圣保罗成员（坎波斯·萨莱斯是其中之一），在他们那份未来共和国的“圣保罗州宪法”纲要中，提出了他们的联邦纲领要点。1881年，坎波斯·萨莱斯以共和党议员的身分回到了省议会。1885年，他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一同被选入国民议会。

坎波斯·萨莱斯是一个远比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更喜欢空谈理论的人。他的性情和政治素养，使他在才智方面，与那些曾经是拿破仑三世的“忠实反对党”的法国共和党人并驾齐驱。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为人缄默、冷淡，以头脑冷静和德行严谨知名于世，而坎波斯·萨莱斯却胸襟宽阔，风流倜傥，自视很高，喜欢夸耀，是一位行文流畅的作家和雄辩的演说家。他所受的律师和新闻工作者的教育，扩大了他的思想境界，并使他在政治

163

活动中易于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他象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一样诚实、勇敢和正直，而且也日益具备了在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中就任最高职位的条件。

坎波斯·萨莱斯任德奥多罗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时，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行政职责。为了建立新政权的司法结构，他提出过无数的法案，如刑事法典，世俗婚姻法，法庭组织法等。在处理共和派同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误解时，他所表现的那种宽宏和热心的态度，使他在政界出了名。

因此，他便打算阻止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不让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去和德奥多罗竞选。在制宪会议中，他和急进的联邦派密切合作。因而他的主张非常接近于卡斯蒂略斯的共和党人。在弗洛里亚诺当政期间，他几乎和所有的圣保罗共和党人一样，支持合法政府，而反对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叛乱和海军的叛乱。当联邦共和党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坎波斯·萨莱斯曾竭尽全力进行调解。当双方发生分裂时，他任圣保罗州长，站在支持联邦政府的一边。

所以，坎波斯·萨莱斯先前采取的一贯立场，

就使得他所获得的声望，足以允许他超然于政党之上。当他和选民见面时，他所提出的纲领完全是他自己的。他说，政府的首脑决不可以是政党的首脑。因此，政府首脑的职能和审判长的职能一样，必须与党派政治分开。

坎波斯·萨莱斯也并没有否认他长期主张的联邦主义。他反对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妄图确立的干涉主义政策，重申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关于主权联邦之内的主权州这一原则："除非是涉及到与联邦利益有关的事务，联邦当局不得在各州的领域内行使其权力；而且即使在那种时刻，也要通过双方各自的官员采取行动，因为在地方政府官员与联邦官员之间，不应存在任何等级关系和从属关系。"

他认为，严格尊重各州的自治权，是共和制的基础。正如他后来着重申明的那样，第六条乃是"共和国的灵魂"，因为该条在某种程度上，笼统地规定了联邦对各州事务进行干涉的准则。他对议会制的态度，同样是急进的；主张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应该为了国家最大的利益，把它们的职能协 164 调起来，在不同的领域内执行任务。政府的权力要

集中在它唯一的受托人——总统的手里，总统在其它国家面前，也是政府的唯一代表。我们即将看到，坎波斯·萨莱斯的联邦制和总统制后来怎样导致了各州寡头政治的形成和国会的一蹶不振，并且使国会不可能利用全国性的大政党来控制共和国的政治事务。

其间，党派斗争已使国家极端贫穷和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坎波斯·萨莱斯的政治倾向性，使得他甚至在当选总统之前，就有可能以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所谈判的偿债基金贷款为基础，开始执行他的财政计划。对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来说，偿债基金贷款防止了破产；对于坎波斯·萨莱斯政府来说，它为通货紧缩奠定了基础。在临时政府期间，坎波斯·萨莱斯不论是作为德奥多罗内阁的成员，还是作为制宪会议的成员，都始终反对通货膨胀政策。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财政问题的专家，但他却一直坚决支持那些反对超额发行不兑换纸币的人。共和国历届政府的财政混乱，可能使坎波斯·萨莱斯认识到，恢复帝国的传统政策乃是刻不容缓的需要。他作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曾多次声明，他把财政上的重新建设，放

在比其它一切问题都更为优先的地位上。

几乎所有列强的代表都参加了坎波斯·萨莱斯的就职典礼，这种令人惊叹的场面很投合巴西人的虚荣心，因为他们过去通常都被认为是一群不可救药的革命者。坎波斯·萨莱斯就任总统之后，立即发现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疲惫。共和国的首届文官政府并没有能够恢复国内的和谐。一向使国家四分五裂的内讧，阻碍了政府的改造。这位新总统还能抱什么样的希望？他的财政计划对于这个衰弱的国家，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在共和国的最初十年间，巴西的状况与帝国末期相差无几。在“恩西利亚门托”时期的暂时繁荣消逝之后，巴西的特权阶级又恢复了他们从前的生活方式。农村中产阶级大发横财的梦想破灭了，他们又回到已经放弃的大庄园，在那里，他们至少可以享受到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生活。甚至连从前的大批奴隶，过去曾经陶醉于他们意外获得的自由而离开了古老的封建领地，现在也重新到庄园主的“大房子”去寻求安身之所。

然而，大庄园已不象从前那样丰裕富足了。蔗糖业的衰落（缩小到只能满足国内市场数量不大

的需要)，已使东北部的蔗糖大王纷纷破产，并且挫伤了他们的进取心。咖啡价格的危机也使南方的大庄园主们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亚马孙州橡胶业的意外繁荣，使虚弱的国民经济稍微得到了一点支持，而实际证明，它也拯救了那些北方人——他们过去一直鲁莽灭裂地到疟疾流行的丛林沼泽去冒生命的危险，并把他们的灵魂出卖给贪婪的橡胶采割业主。

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政府的初期，若阿金·穆尔蒂尼奥以运输部长身分所做的报告的头几句话，毫无疑问乃是坎波斯·萨莱斯的行动指南。若阿金·穆尔蒂尼奥在分析巴西经济和财政的总形势时，并没有单单批评共和国所一直沿用的政策。他还依据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形式逻辑，草拟了一份政府计划。穆尔蒂尼奥认为，共和国的政策，具体表现了两种危险的幻想，即：相信巴西的异常富有和信赖不兑换纸币的推动力，归根结蒂，它们也只不过是同一个错误的不同方面而已。

从前一种思想出发，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曾经相信有可能使全国迅速工业化。增加关税和由国

库及银行稳步发行不兑换纸币，自然就成为政府能够用以推动物质进步的手段。因为巴西人没有北美人那样的进取心和工作习惯，而且穆尔蒂尼奥又没有提到在美国所发现的煤和铁等发展重工业的基本要素，所以工业化的一切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新的工业还没有超出计划阶段。它们仅仅使部分的流动资金固定下来，它们鼓励了都市化，增加了进口，这一切都有损于巴西国家财富的真正源泉——农业的发展。

通货膨胀政策助长了投机倒把，而最糟糕的是引起了汇率的降低，因为在穆尔蒂尼奥和所有主张货币数量论的人看来，汇率几乎完全是和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实行保护贸易和工业化政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时出现了一股热衷于公共事业和政府统制的风。而这股风，又在把政府改变成为经营公共工程和服务事业的企业家，这样一来〔据穆尔蒂尼奥的说法〕，也就是在给现代社会的最大祸患——社会主义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穆尔蒂尼奥提出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在任何一本政治经济学手册中都可以找到，而且

166 它也和十九世纪哲学家的个人主义概念完全一致。若阿金·穆尔蒂尼奥是一个冷静的、持怀疑论的事业家，从他的本性和所受的教育来看，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在共和国的许多部长当中，是一个最能坚持自己一贯主张的人。他一面为巴西的生活进行诊断，一面也开了药方；不过他好象是一个习惯于对症治疗、采用顺势疗法的医生一样，把该项医疗技术也用在处理巴西的财政问题上面了。

巴西的主要问题是平衡国库的财政收支，因此，绝对需要收缩通货，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停办公共工程，重新回到农业上去，并使政府退出工业活动，因为工业只有在自由的个人企业之中才能够繁荣起来。由于穆尔蒂尼奥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解非常生硬，所以他把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截然分离开了。一旦政府能够恢复它的通货的稳定性（这会提高汇率并使预算平衡），经济力便会自动地复兴，而不需要官方冒着风险的干涉。那些最不能适应的弱者，将在生存竞争中灭亡。达尔文的天然淘汰论，在当时被认为是几乎绝对没有错误的科学信条。国家仅仅是社会上层组织的法律

上的表现形式，不应该被种种感情用事的考虑所左右。

最初，坎波斯·萨莱斯倒容易严格遵守他的行政计划，并且执行偿债基金贷款的各项约定。从1899年1月起，政府就将根据偿债基金贷款的条款，把从流通中收回的纸币委托给在里约的英国和德国银行（由它们充当受托人）保管。议会同意政府的意见，主张将纸币焚毁而不把它们储存起来，以防止它们有可能被用于银行的业务往来，从而刺激外汇方面的投机活动。

给尚未兑现的纸币设立了一项黄金储备基金，这笔黄金将从关税当中积累。赎回国库券的基金也设立起来了。这项基金预定由联邦出租铁路的收入、预算结余及任何其它可以利用的财源来维持。政府计划的最后一项是增加税收。

关税当中必须用黄金缴纳的比率，从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十五，第二年又对关税做了彻底的修改。政府以前曾极端反对保护主义政策，现在在维护这种政策方面，却比任何一届前任政府，都走得更远，尽管它宣布说这次提高关税，只是作为增加岁收的措施。政府也开始征收国内商品的印

花税和消费税以及直接所得税的印花税。联邦的财政网遍及全国各地；它包括了一切有形的岁收来源，并征收了多种多样的附加税。各州也仿效联邦的做法，特别是对那些根据宪法划归它们支配的输出品，加重了课税。已经非常虚弱而全靠圣保罗的咖啡和亚马孙流域的橡胶勉强维持的巴西经济，还必须把它微薄的盈余，缴纳给互相重叠的三级财政系统——联邦、州和自治区。

若阿金·穆尔蒂尼奥的通货收缩政策，首先对尚未充分巩固的商业及银行信用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破产连续发生，并随着共和国银行（由巴西银行和巴西合众国银行合并而成）的破产而达到了顶点。1900年9月，这家半官方银行停止了付款，从而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这位财政部长恪守他那种适者生存的理论，听任这家银行破产了。

国外信用的恢复和汇率的提高，足以抵销国内的困难。货币数量论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1898年到1902年的四年当中，密耳瑞斯的汇率从8.5辨士上升到12.5辨士，与此同时，不兑换纸币总额从78万千度下降到679,000千度。国家预算出现盈余，政府也正在伦敦的一些银行积蓄着

黄金。

到了这四年的末尾，已经收回了116,000千度的国库券。1901年，政府就能够重新用黄金偿付外债的利息了。政府偿还了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欠下的112万英镑的国库贷款。国库没有债务，它的账簿上还出现了盈余。政府的对外和对内公债的市场价格在提升，国库岁入也增加了。坎波斯·萨莱斯和若阿金·穆尔蒂尼奥可以宣称他们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然而，巴西却已变得更加穷困。东北部的蔗糖大王已经破产；他们的土地已转到了城市放债人手里。类似的命运也正在威胁着南方的咖啡种植者。旧有的关于城市工业化的希望已经日益渺茫，经济被紧紧束缚在单一种植和输出品上面。穆尔蒂尼奥曾经答应要降低生活费用，可是课税的增加反而使它提高了。然而，靠着人民日益贫穷而得救的国库，却再度充实起来。欧洲的银行家们对巴西又有了信心，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了。

罗思柴尔德财团在坎波斯·萨莱斯任期届满 168
时，诚心诚意地赞扬了他。巴西既然已经幸免于破

产，欧洲资本便重新开始流入这个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竞争在巴西的舞台上出现为止。国库财源的恢复，将使坎波斯·萨莱斯的继任者——精明而目光敏锐的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得以开创一个全国大发展的时期。

坎波斯·萨莱斯政府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执行财政计划。但是，为此目的，坎波斯·萨莱斯首先必须缓和党派冲突，减少国会关于争取更大独立性的欲望，并阻止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出现分歧。在通过1891年宪法期间，开始出现而在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的保守倒退倾向曾经表明，即使不实行军事独裁，总统也能够管理国家，而不会遇到任何大的阻碍。坎波斯·萨莱斯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也可以达到类似的境地。

财政问题所处的绝顶优先地位，使得财政部长若阿金·穆尔蒂尼奥自然而然地成为内阁中的首要人物。埃皮塔西奥·佩索阿被任命为内政司法部长，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便在制宪会议中出了名，而且一向都是弗洛里亚诺·佩绍托的死对头。巴伊亚州的政客塞维里诺·维埃拉任运输与公共工程部长。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奥林托·马加良

斯任外交部长。梅德罗斯·马莱特将军和平托·达·卢斯海军上将分别担任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由于坎波斯·萨莱斯从共和主义各个派别中挑选了他的内阁成员，而且他自己也摆脱了受党派控制的任何可能性，他就促使联邦共和党的残部和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追随者们所组织的共和党的残部迅速地解体，尽管他没有能够消除那些造成他们意见分歧的怨恨。

即将举行的1900年度新的众议院选举和三分之一参议员的选举，对政客们起了约束的作用，他们都渴望继续得到政府的宠信。联邦共和党分裂后所形成的两个分崩离析的大集团，都想赢得政府的好感，以确保自己的成员再度当选。各州政党都提出了它们的全部候选人名单，希望在第三次和最后一次对候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时能够当选，所说的这次审查，是在计票委员会进行检查以后，由国会负责进行。甚至考虑要选出两个众议院，以迫使政府从对立的派别中进行选择。

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混乱，政府设法对众议院的条例进行了修改，规定：实际的当选者，应从各选区市议会大多数议员所签署的最后选票 169

计算结果当中产生。它还建议，新选出的众议院的临时议长，不应按照当时的惯例由上一届众议院最老的议员担任，而应由前任议长担任，当然，这是以他再度当选为条件。新议长将指定一个五人委员会来判定当选证书是否有效。对有争议的选举进行调查的委员会，将用抽签方法选出。这样，政府便能利用这个强有力的五人委员会，武断地承认或者拒绝承认那些大概是来自人民的当选证书。

作为他那个政治计划的一项扩充内容，坎波斯·萨莱斯取得了一些大州的支持，其中主要是米纳斯吉拉斯州，该州州长宣布无条件支持他。交换条件是，在承认新众议院和部分改选的参议员的当选证书时，对那些支持政府的地方党派给以照顾。坎波斯·萨莱斯靠着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赢得了他们对他执行财政计划的支持。这样，各州反对派在竞选中获胜的一切迹象，在事前就都被人们置之度外，地方政府所推荐的候选人，都自然而然地当选了。巴西民主选举的古老喜剧得到了正式的承认。

然而，坎波斯·萨莱斯与州长们的幕后交易

的最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巩固了各州的寡头政治。在各州取得控制权的集团，主要是由先前的君主主义政党的成员所组成。他们悄悄地四处奔走，建立专门从事贪污、贿赂和暴力的强大的政治核心组织。尽管1900年的国会和以前的历届国会（其中包括帝国议会在内）一样，其来历颇为丑恶，然而正是这一届国会，才把它那自由政治权力的最后一层伪装给抛弃了。

联邦被分裂成相互仇视的大大小小的集团，它们更为关注的是本地区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在人口和经济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取得了左右政治的领导地位。当时，南里约格朗德州是另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的首脑是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但该州仍然处于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那套严格纪律的控制之下。在联邦一级，它由威望不断提高的皮涅伊罗·马查多来代表。伯南布哥州、巴伊亚州和里约热内卢州，是另一些在立法部门里有很多代表的"大州"。小州被吸引到大州的轨道上，这就好象是在仿效国际间力量均衡的把戏一般。

坎波斯·萨莱斯对财政问题的优先考虑，以 170

及他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没有使他摆脱掉那种曾经使他的前任备受折磨的政治困境。他那个通过州长来控制政治的办法，显然使他得到了国会几乎全体一致的支持，然而，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党派斗争的情绪，正在待机爆发。报纸的攻击日甚一日，它们指责横征暴敛的税收条例和臭名昭彰的当选证书的承认办法。某些尚未甘心服从共和国的原君主国的领导人，企图利用日渐高涨的不满情绪，伺机进行革命和复辟，可是，政府没有依靠宣布戒严的手段，就轻而易举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更为严重的是副总统罗莎—席尔瓦领导的反对派的政治运动。它又一次造成了曾经存在于德奥多罗和弗洛里亚诺之间，以及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和曼努埃尔·维托里诺之间的那种形势。伯南布哥州和马腊尼昂州的国会集团，在罗莎—席尔瓦的领导下，联合了一些州的反对派，站出来反对政府的财政政策，特别是反对租借铁路〔给外国人〕。

1901年9月，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带头挑动的政治纠纷在圣保罗爆发了，该州的一些著名而

活跃的议员都开始支持国会的反对派。若干年来，在坎波斯·萨莱斯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之间，好象就存在着产生误解的一些深刻的、没有说出口的理由。在纠纷已经公诸于世之后，某些集团自然乐于在选举圣保罗州长的问题上进行煽动。不管当选的州长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怎样尽力调停，坎波斯·萨莱斯那套由国会承认当选证书的严格标准，还是被一些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关系密切的圣保罗议员立即否决了。不久之后，圣保罗派在一项声明中说明了他们不同意的理由，他们坚持主张必须修改宪法，以节制共和国总统超过应有限度的权力，并把这一点作为原则问题提出来。

全国舆论（如果这个名词能够适用于巴西四分五裂的广大幅员的话），并不推崇坎波斯·萨莱斯所实行的那种严苛的财政管理办法。公众对反对派报纸的猛烈宣传很感兴味，对众议院的热烈辩论也十分欣赏，特别是在新当选或再次当选的议员就任议席而引起群情激奋的时刻，情况更属如此，但是政客们的游说，却并未唤起公众的热情，因为不管怎样说，公众对于这些人的诚意也都

怀疑惯了。保守的中、下层阶级，是不会原谅高额171捐税的，但他们主要是希望政府的任期能够平静地结束，盼望新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开始推行一种不太严酷的政策。共和国在它的一帮拯救者的手下，苦头已经吃得够多的了。

1902年11月15日，当坎波斯·萨莱斯总统下台时，他亲自目睹了人民群众反政府情绪的最后一次爆发，这是由反对派报纸以巧妙的手法精心策动起来的。当他从总统府去火车站，准备从那里乘船前往圣保罗时，一路上都听到街道两旁的人群向他长时间发出嘲笑声和嘘声。公众的敌视态度想必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这种情况与四年前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所受到的欢呼，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然而，作为一个执政者，坎波斯·萨莱斯一定是问心无愧的。在他作出了巴西人民所要求的牺牲之后，他给他的继任者留下的是秩序井然、收支平衡的国家。

由于他采取了通过州长实行统治的办法，共和国的政治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蜕化。国会的民主意味大大降低了。在代议机关之间，关于活动自由的最后希望正在逐渐消失。人们公认的

他收买报界有影响人物这件事，使新闻界的腐化堕落公然成风。他那种走极端的通货收缩政策，给国内外的银行家和投机家，提供了一个屏障，使他们攫取了优厚的利润。尽管如此，坎波斯·萨莱斯在对待他的政府所承担的义务方面，他本人表现的那种十足的正直、耐性和坚定，仍然是他的光荣。假若没有他那四年强有力的财政管理，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恐怕就很难实行那份庞大的公共工程计划了。

给坎波斯·萨莱斯政府进一步增添光彩的，是它对于发展民法法典的工作采取了最初的决定性步骤，该法典原来是由克洛维斯·贝维拉夸以法案草案的形式提交给国会的。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曾力图使南美洲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而这是共和国最初几任统治者所极为关心的事情。对于米西奥内斯这个老的冲突所进行的仲裁，并未曾损害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友谊。1899年8月，阿根廷总统胡利奥·罗加正式访问了巴西首都。次年，坎波斯·萨莱斯进行了回访。在阿马帕争议中，里奥·布兰科男爵又获得了另一次外交胜利。若阿金·纳布科在与英国就英属圭亚那问题进行的争

论中，却并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就，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不过，1902年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乃是共和国在回顾以往的国内混乱和财政冒险时，已经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业已宣告结束的一章，同时她也已经作好准备，去迎接一个有秩序的和进行建设的新时代了。



172

第 十 四 章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 (1902—1906年)

圣保罗人第三次主持政府——提名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为候选人的经济意义——经济状况与国家的干预——公共工程——里约热内卢的社会环境——里约热内卢的改造——卫生运动——奥斯瓦尔多·克鲁斯——防治黄热病和天花的斗争——街头骚乱——国内的骚动——里约的"文明化"——国民所受到的激励

提名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来接替坎波斯·萨莱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他在政客当中所赢得的信任和他所担任的圣保罗州州长这一职务，几乎使得他的名字会自动地浮现于人们的心目之

中。副总统罗莎一席尔瓦曾经反对过坎波斯·萨莱斯。在他领导下的政客们，又掀起了一个反对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运动，更确切些说，是反对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有可能成为官方的候选人。不过这个运动是短命的。早期的共和党人、当时任里约热内卢州长的金蒂诺·博卡尤瓦也被提名了，但是投票赞成他的只是他所属的那一个州，他把该州说成是一个已经破产的公司，而他本人则是这个破产公司的管理人。伯南布哥州和马腊尼昂州的当权人物的反对活动是有限度的，只提名巴拉州的政客儒斯托·谢尔蒙特为候选人，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西尔维亚诺·布兰当竞选副总统。

这样一来，圣保罗人便连续三次被提到共和国的最高职位。然而，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却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和坎波斯·萨莱斯这两个人不同，他并不是一个早期的共和党人，相反，他曾经进身为官，效忠帝政。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1848年生于圣保罗州北部的瓜腊廷吉塔；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就以勤勉和才智过人而闻名了。若阿金·纳布科

说，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每年都得头奖。① 他在圣保罗法律学院时，也十分超群出众，在那里，他编辑过各种小型政治刊物，并曾一度编辑保守党的报纸。他加入政党以后，就立即放弃法律生涯，173 而从事政治活动了。

1872年，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任省议员时，因他的教育观点而出了名，他坚决主张，教育既应该免费，又应该强迫，这在当时，多少是一种革命的思想。1887年，他作为下院议员，被科特吉佩男爵的保守内阁任命为圣保罗省省长。当时，废奴问题正在激荡着全省，并分裂着保守党的成员。内阁企图阻止奴隶解放的浪潮，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作为内阁的代表，对一些在他看来似属过分的废奴主义政治示威活动，进行了镇压。这样一来，他被贴上了一个蓄奴主义者的标签。他在一份官方文件中提出了自己的信念，认为废奴主义者的事业是正义的，但是有必要让国民经济对使用自由劳动有所准备，也有必要加速吸引欧洲的佃农。

当科特吉佩内阁被若奥·阿尔弗雷多内阁所

① 在佩德罗二世学院〔位于里约〕时，他们是同学。纳布科在他的自传《我的成长》里，提到了这种奖赏。——原著者

取代的时候，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辞去圣保罗省长的职务，回到了议会。他投票支持5月13日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法律，不久之后，他参加了国会举行的、关于废止奴隶劳动所产生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伊莎贝尔公主摄政时，曾赐予他顾问头衔，这个头衔将永远附加在他的名字上。

当自由党人奥罗·普雷托内阁开始执政时，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所属的保守党议院解散了。他没有再度当选。于是，在共和国诞生时，他就已经下野。他和大多数君主主义者一样，认为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与之斗争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决定放弃公务生活，一心一意地去经营他的咖啡种植园。可是，他最终还是和其他著名的君主主义者一道，同意参加了共和国的制宪会议。他在制宪会议中，表现得极其慎重、温和和镇静。

在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执政时，他任财政部长。"恩西利亚门托"时期的灾难过去以后，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负责共和国的财政，他企图恢复传统的慎重政策：节省公共开支；将银行发行国有化；压缩不兑换纸币的数量。当他没有得到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全心全意的支持时，他便辞去职务；

他原来就认为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接替德奥多罗是违反宪法的。嗣后，他被选入参议院。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对所有的人都怀疑，而且无意尊重别人，但他却好象还是尊重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执政时，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再一次出任财政部长，直至曼努埃尔·维托里诺临时担任总统职务，他才被贝纳迪诺·德·坎波斯所代替。174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是当时最好的政治统治者的一个典型，他谨慎、沉着、磊落、诚恳，注重事实甚于理论，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党派或私人政治之上。急进的共和党人大概从来也没有宽恕他那个君主主义者的出身，但是那些希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使巴西恢复秩序与安宁的大多数人，却都十分倚重他的常识和执政经验。他既没有普鲁登特·德·莫赖斯那种极端超然的态度，也没有坎波斯·萨莱斯那种对教条的热爱。

1900年，他被选为圣保罗州州长。他尽力限制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与坎波斯·萨莱斯之间的纷争在他本州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他改造了公益事业。可以看出，他对地方经济问题有清晰的理

解。这位圣保罗州州长、从前帝国时期的顾问，已经爬上通往总统宝座这架梯子的倒数第二级。现在，新政体似乎感觉到它自己已经十分强大，可以在传统的共和主义者之外，接受其他人的帮助了。不过，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取得候选资格的重要性，却主要是在经济方面。

从里约热内卢州的帕拉伊巴流域，向圣保罗高原移植咖啡的工作，当时业已完成。巴西的出口总值，在二十世纪初，估计为70万千度。在出口物资中，三分之二是咖啡，而绝大部分来自圣保罗州。因此，巴西的经济是靠着该州肥沃的红土壤来维持的。米纳斯吉拉斯州，凭着它人口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在资助国家方面，是巴西另一个能与圣保罗媲美的州，它也和咖啡工业有着密切的关联。

确切地说，第一王朝和摄政时期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经济意义。那时，巴西正在初步进行自由主义的实验。第二王朝是在蔗糖周期结束后开始的，因此，它主要是得到了里约热内卢的种植园主、维护奴隶制的大亨和帕拉伊巴流域的极端保守分子们的支持。在第二王朝的临终阶段，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再也不能忽视了，该王朝就象奥利维拉·维

亚纳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便求助于北方伯南布哥和巴伊亚的政治家了；这些北方人较南方人更容易被拢络收买，而且他们也不大受那种依靠奴隶劳动的经济的约束。

和帝国一样，共和国是在一帮缺乏公务经验的文人们所制造的那种侈谈理论、想入非非的气氛中开创的。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和弗洛里亚诺·佩绍托代表了军方势力，当时，也许只有这股 175 势力才能够维护新政体。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和坎波斯·萨莱斯当选为总统，并不反映联邦内部经济最强大的州对政治霸权所抱的渴望，而只是表明了这两个组织者的个人事业所达到的自然发展阶段，在他们所属的地区里，最大的党派组织已经受到了共和主义理想的鼓舞。

然而，第三个圣保罗政客成为总统的原因就截然不同了。共和国正从学理阶段走向建设阶段，即从建立制度走向发展经济。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已恢复了国内秩序。坎波斯·萨莱斯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已结束了“恩西利亚门托”时期那种有勇无谋的金融冒险，整顿了国库，恢复了公共信誉。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是作为新政策的象征

而就任总统的，尽管他或者当时的其他领导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巴西人已经十分厌烦党派斗争、国会的巧辩和街头的骚乱，并且已被横征暴敛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希望这个谨慎的人是一个稳健的执政者，能够胜任愉快地治理他们。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挑选了一些最称职和最有公务经验的人来充实他的内阁。J·J·塞亚布拉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具有独特的非军事经历的陆军上校劳罗·穆莱尔任运输和公共工程部长。在制宪会议中，曾以极端的联邦主义观点和对财政问题的偏执态度而闻名的莱奥波尔多·德·布良斯，被选拔为财政部的首脑。保罗·阿尔戈洛元帅和儒利奥·德·诺罗尼亚海军上将分别担任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里奥·布兰科男爵主管外交部，他早就因为米西奥内斯和阿马帕两次外交上的巨大胜利，而大大出名了。

所谓的大州，在内阁中都没有代表。新总统抛开区域性的政治（它后来就几乎不再作为选择内阁成员的标准），而选用了他认为最有才干的人做助手，让他们在他的总纲领的范围之内自由行动。据传他说过这样的话："除了我不希望他们做的事

情以外，我的部长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在他就任圣保罗州州长时向圣保罗议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他曾经概述的是相当于一份全国的施政纲领。在由当选总统宣读政府纲领（通常都有点含糊其词，而且是与人无伤的）的例行宴会上，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把他先前曾经阐明过、而且将要在他向1903年立法会议发表的就任演说中再次加以阐明的思想，做了一番简略的叙述。在政治方面，他不赞成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圣保罗政客们关于修改宪法的要求，因为1891年的宪法体制，已经给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协调，提供了充分的回旋余地。可是，他坚持要通过民法法典，并坚持要实行能够确保选举活动更加公正诚实的新法规。 176

虽然他建议继续执行前届政府的财政政策，可是他也注意到国民经济需要复兴。巴西需要装备港口，发展国内交通，并从首都入手，改善大城市的卫生状况。尽管他对经济自由主义有长期的偏爱，但他仍然认为，象巴西这样贫穷而年轻的国家，不能节省对各州的补助。单独一个州的主动精神，太不可靠，也过于怯弱，不足以促进自身的发

展。搞好里约的清洁卫生并使之现代化，应是一切建设政策的起点。

一般说来，巴西人不轻易听信即将上台的政客们所作的诺言。可是，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所许的愿，却给他们留下了真诚的印象。他没有说什么废话，就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政客们只希望更加靠近政府。而国会因为要在新总统的主持下重新进行选举，所以也不想打扰他。

在坎波斯·萨莱斯当政的四年中，联邦的财政已整顿就绪。巴西的信誉，已在欧洲的金融市场上恢复起来，这就给求借大笔外债提供了方便。因此，1902年10月，甚至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就职之前，就通过了一项法律，核准发行黄金或纸币债券，用以改善共和国的港口，而拨给每个港口的金额，应使该港口预计可能征收的费用，足以抵补其应摊利息和分期还本的份额。1903年5月，签订了一笔850万英镑的贷款合同，贷款按五厘行息，打九折支付，作为担保的是，对全部进口物资所应缴的2%的特别税(以黄金缴纳)和各港口码头的其它收入，享有最先的要求权。

同时，政府也发行了国内公债券，用以收回各

种港口和铁路的特许权。里约热内卢的港口工程包给了比卡利奥工程师。这标志着新的建设政策的开始。这项新工程要求铺设一条穿过该城市中心的宽马路〔今天的里奥·布兰科马路〕。为此目的，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保罗·德·弗隆廷工程师领导，他办事的非凡才能，在君主制度的最后数年间，便已经被他给该城建立供水系统的非凡成就所证明了。联邦区的长官着手执行了一项城市更新的计划，由另一个能力非凡的工程师佩雷拉·帕索斯负责指导。

177

在共和国发表成立宣言时的首都，是一个广大的很土气的城镇。它位于群山与海滨之间，极富自然之美，但是没人经管而破烂不堪。从很多方面来看，它都好象是一群群摈弃了物质生活享受的人所聚居的庞大临时营地。街道狭窄，广场小得可怜，很少有什么树木或花园，零落颓败的建筑，也是非常粗鄙、俗气而形状可笑；那种传统的宽敞而坚实的殖民地式房屋已经不见了。城里唯一的一条铺砌得很糟糕的中央大马路——奥维多尔路，是当地政治名流日常聚会的地点；沿街之上，商人、官僚与冒险家、妓女摩肩接踵，往来不绝。当

时的里约，和曾被佩德罗一世定为帝都的那个丑陋而肮脏的城镇，并没有多大的不同。第二王朝对安逸和风雅毫无兴趣，所以，对于里约热内卢古老而庄严的市容，已经安之若素，而它也和巴西以及世界其它各地的大城市一模一样。第二王朝看不见，它那些身着大礼服、头戴大礼帽的臣民，在大街上那种往往不大文雅的场面里出现，是多么的不协调！

旧的乡土风俗仍旧很盛行。英国人首先在欧洲建立的当时正向其它各国传播的那种新的卫生习惯、家庭的舒适设备和户外生活，在里约尚不为人所知。里约热内卢人在简陋的房子里过活，对命运漠不关心或者任其摆布；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来年狂欢节的筹划，或者是使全体居民入迷的彩票和"若果·达彼科"。① 男人还是穿着素净的正

① 仍然流行于巴西的一种不合法但很普遍的赌博游戏。它是以官方彩票的中奖号码为基础而进行的。奖金分配方法与起源于哈雷姆（纽约的黑人区——中译者）的号码游戏相似。这种游戏叫做"若果·达彼科"（即动物游戏之意），因为中奖号码的最后两个数字，规定要与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二十五种不同动物的号码之一相符。这样，一个人把赌注押在一种动物上，一百次之中就有四次中奖的机会。中奖的动物是靠做梦、预感或联想来预测的。——英译者

式礼服，而妇女则几乎打扮得和阿拉伯女人一样。

最流行的娱乐方式是到小戏院和音乐厅去。“利里科剧场”在冬季开放，由意大利歌剧团和法国喜剧团演出。“恩西利亚门托”时期，中断了从阿根廷进口驾车用的好马。大多数戏迷要乘骡子拉 178 的街车或新式的“邦德”① 电车去戏院，在“邦德”车的长椅上，铺着白布，以保护乘客们的奇装异服。弗卢米南斯夜总会及其附近的俱乐部，偶尔举办舞会。在私人家庭里，举行跳舞晚会是常有的事。

放荡不羁的文学团体，在熟菜馆和咖啡馆里，一边大喝开胃酒，一边讨论文学和政治，说一些双关语的俏皮话，这是当时的一种最通俗的智力活动形式。《商业日报》仍保持着它的威望；其它空谈理论的报纸也极为活跃。《纪事报》却更为活跃，更有文学气味，更富于讽刺性，并且提供了最好的新闻报道。巴西文学院也建立起来，完全效法着法国的榜样。

---

① 一家加拿大公司出售债券经营一种新式电车，这种新式电车便由“债券”(bonds)一词的谐音而得名，叫做“邦德”(bondes)。——英译者

文艺思潮仍旧和帝国时期一样。西尔维奥·罗梅罗这位托比亚斯·巴雷托的热心辩护士、“累西腓派”哲学的创始人，著有别具一格的《巴西文学史》。马查多·德·阿西斯不受任何学派的束缚，写出了他晚年的代表著作，这些作品均带有他周围的那种消极哲学的极端悲观主义色彩。虽然如此，他的最后几部作品，尤其是他在妻子死后所写的那些作品，却流露出温柔的情调，对于这一点，他恐怕不会没有察觉。他具有内向的性格，容易愤愤不平，令人不可捉摸，他是文学院的终身院长，而且无可争议地，也是巴西文学的大师。奥拉沃·比拉克、赖蒙多·克雷亚和阿尔贝托·德·奥利维拉等人擅长高蹈派的诗歌。阿卢伊济奥·德·阿泽维多是左拉现实主义的最著名的追随者。劳尔·庞佩亚是狂热的弗洛里亚诺分子，著有《雅典圣堂》(Ateneu)一书，其中暴露出他那种冷酷无情的、几乎是病态的性格。第一批象征主义者出场了，不过并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埃萨·德·克罗斯是葡萄牙文学上不容分辩的宠儿、优雅和讽刺的典范，他那生动的文体和活泼的语言，似将赋予葡萄牙语以新的表现形式。

那些较知名的作家和政论家，为了避免第二王朝作家们的语法错误，尽力墨守葡萄牙语的古典规范，而达到了行之过分的程度。他们认为，正确地掌握代词、词形变化、法国语风和正确的缀字法，乃是头等重要的问题。鲁伊·巴尔博扎，就他那洗练文字的爱好、妙语如珠的长句和修饰古朴的短语而论，可称是大作家的杰出典范，而且他是对纯正语言的重新提炼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一个人，某种程度上很象西塞罗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影响。179

国会中的政客们，正在逐步摈弃那种为帝国政治家所易于接受的英国方式，而开始仿效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榜样。甘必大是急进共和主义者的象征。基佐和梯也尔尚未失去他们的崇高声望。秦恩和勒南的决定论，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开始超过了康德和斯宾塞的理论。鲁伊·巴尔博扎已唤起人们对美国公法的兴趣，这对于1891年巴西宪法的解释者、立法者、法律学家和政府官员来说，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1897年，若阿金·纳布科·德·阿劳若发表了论第二王朝政治演变的巨作《帝国的政治家》。

公共教育仍无进展；为数不多的学者名流，一向与巴西现实严重隔绝，在一切文化活动中，都不能摆脱欧洲的影响。巴西的文学缺乏民族风味，与民族情感并无一致之处。在这方面，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以卡努杜斯事件的悲剧为题材而写成的《腹地》，是巴西第一部伟大的作品。该书的惊人的成功，由于某种原因，唤醒了巴西人去研究自己国家的事物。格拉萨·阿拉尼亚的小说《乐土》（描写热带地方北欧人移民的戏剧性事件），也很可能是即将到来的美学复兴的信号，到那时，巴西的知识分子，将致力于自身的解放，而不再屈从于武断的法国规则。

在巴西的历史上，不曾有过象美国那样的英雄时代。这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连最优秀的巴西著作中的性格描写也是那样贫乏无力，以及为什么它们的内容没有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年轻国家的动荡和不安。巴西的艺术家和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欧洲的而不是巴西的氛围中生活。要一直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情感高涨起来的时候，巴西的文学才会开始它自身的解放。

共和国的最初几届政府，或者是没有打算，或

者是没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来美化首都。在这座没有很好地加以照管、让许多肮脏的摊亭阻塞着街道和广场的城市中，经常发生黄热病、黑死病、霍乱、天花和疟疾。巴西人对于这座城市以多病闻名(这些疾病又常常被人们故意渲染)，深深感到羞耻，但他们对于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却是毫无所知。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计划为首都展开了一派新的生活前景，然而，这些前景却与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冲突，而这是不能够原谅的。每逢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工程时，公众舆论差不多总要普遍 180 地起来反对他。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总统正在把他前任所积蓄的金钱，浪费在豪华的建筑上，并使"恩西利亚门托"时期的幻影再次浮现。没有几个人相信这些工程能够成功。

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商人，他们几乎都是粗俗和顽固的葡萄牙人。他们得到了报界的支持，因为报界渴望他们登广告。但是，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沉着冷静地继续执行他自己的计划。劳罗·穆莱尔部长和弗隆廷、帕索斯两位工程师，辟设新的道路，扩大公共广场，把整个城市搅得

天翻地覆，根本没有理会那种出于私利的叫嚷以及国会和报界的恶意宣传。比改造城市更为困难的，是改善它的清洁卫生状况，特别是根治黄热病和天花。政府不仅要战胜城市不动产所有者的反抗和贪心（不少人依靠其财产的巨额收入在国外生活），还要战胜人们的陈腐观念、偏见、迷信、嫉妒、怨恨、学究式的妄自尊大和对教义的狂热信仰。

黄热病可能是从非洲传入巴西的，1849年末首次出现于里约热内卢。这种疾病是怎样引起和传播的，当时的科学毫无所知；对其治疗方法，也差不多同样地不甚了解。医生们应用防治传染病的办法，临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可是都没有奏效。1850年最初几个炎热的月份里，在20万多一点的人口当中，有四千多人作了新瘟疫的牺牲品。不久，这种瘟疫便在这个肮脏的、没有预防措施的热带城市，变成了地方病。每年夏季，里约热内卢人都听天由命地等待瘟疫的发生，这种病，对于那些尚未具有免疫力、或者还没有服水土的外国人和外省人，为害尤甚。

共和国还在沿用君主国时期的那一套卫生方

法。然而，美国人却相信芬莱① 的理论，认为黄热病是由某种蚊子传播的，并且把这个观点应用到古巴，取得了优异的效果。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任圣保罗州州长时，曾经对两个圣保罗医生根据“蚊子理论”所做的实验，很有兴趣地进行了跟踪了解。这样，总统才明白了有步骤地消灭带菌的蚊子可以根治黄热病的想法。里约公共卫生部门的前几任指导者，本已决定掀起这样一个运动，可是后来却都不了了之。

内务部长J·J·塞亚布拉邀请萨莱斯·格拉博士负责主持公共卫生部。他谢绝了这一邀请，而推荐了曾在巴黎帕斯特学院受过训练的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博士。1899年，克鲁斯博士回到里约后，在曼吉尼奥斯血清治疗研究所工作，并以杰出的细菌学家，称名于世。联邦区公共卫生部长希望扩大曼吉尼奥斯的研究工作，于是请求帕斯特学院院长鲁博士，为此项工作推荐一些专家。鲁博士便提名奥斯瓦尔多·克鲁斯。

181

① 芬莱(Carlos Juan Finlay, 1833—1915年)，古巴医生及生物学家。——译者

奥斯瓦尔多·克鲁斯被提到曼吉尼奥斯的领导岗位后，对该所进行了扩大和整顿，使之成为一个积极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心。这样，政府就物色到一个已经被公认具有科学权威和管理才能的人来管理联邦的卫生事业。因为他相信芬莱的理论和美国人预防黄热病的方法是正确的，他便把消灭蚊子作为自己工作计划的基点。他在呈交内务部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在种种即需着手处理的卫生问题之中，至关重要的乃是黄热病，而对于此症，则已经有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效仿美国人，他们已在哈瓦那着手处理并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奥斯瓦尔多·克鲁斯相信总统是支持他的，所以，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工作只局限于修改卫生条例。他在一个象美国人于古巴、中美和菲律宾已经开展过的那种宣传运动中，直接到人民群众中去解释瘟疫的预防方法。热衷于诽谤的新闻界，煽动起公众的偏见来反对他和他的助手，并给他们起了个"蚊子拍"的绰号。医生和卫生学家否认芬莱理论，至少也怀疑美国方法的效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们，天天都在嘲笑他，国会里的一些煽

动家也跟着他们随声附和。法院发布了保护“私人住宅不可侵犯权”的人身保护令，以抵制公务人员在清扫住房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奥斯瓦尔多·克鲁斯顽强而冷静地继续战斗，甚至还改进了美国人的技术方法。他受到美国和欧洲科学家们的赞扬，而且扬名四海了。

1903年，当预防运动开始时，有584人死于黄热病。1904年，死亡人数下降到53人。在已经宣布过去的六十年中死了约6万人之后，到1906年，这种古代的瘟疫，实际上就绝迹了。同黄热病和经常发生的黑死病进行的战斗一经获得成功，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又开始了有组织的扑灭天花的斗争。这时候他要对付的是这样一种疾病，其预防方法——詹纳氏①疫苗，在十八世纪末期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了。1811年，摄政王唐·若奥曾下令在里约种牛痘，以预防天花。临时政府早期所颁布的 182 一项法令，就规定过对婴儿强迫种痘，嗣后还要定期接种，可是从来也没有人遵从它。

---

① 詹纳（Edward Jenner 1749—1823年），英国医生，发明了种牛痘的方法。——译者

往人体内注入病原菌以预防传染病，一向是可供煽动家们利用的一个很方便的题目。即使是在最有教养的阶级中，对种痘的偏见，也难以完全克服。例如，实证主义者，因受孔德反对詹纳疫苗的偏见所束缚，便坚决否认疫苗的效力。其他的人虽然承认它的价值，但却反对强迫实行，在当时那种绝不让步的个人主义时期，公民的自由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而可以完全不顾流行性传染病的危险。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国会才通过了一项强迫种痘的法律。

空谈家们掀起了一个变革运动。他们中有些人是真心实意的，而有些人则是出于一种狂热，其中包括老急进民主派、鼓动家、街头演讲者、暴民煽动者和职业的闹事者，他们在那些煽动性的会议上不断制造骚乱。工人们因受挑动而罢了工。暴民们从城市的最污秽和最危险的地方、从棚户区(favelas)、从山区和贫民区蜂涌而来，时刻准备制造混乱、暴行和罪恶。

一个反对强迫种痘的联盟，创立时原是与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展开对抗的中心，现已扩大到反对政府，甚至反对既定秩序了。那种认为由实证

主义者实行军事独裁能够保全“共和主义原则纯洁性”的旧梦，又重新出现了。这次变乱的首脑是参议员劳罗·索德雷，他是一位军人和政客，曾经反对过德奥多罗·达·丰塞卡的未遂政变，并由此出了名。奥斯瓦尔多·克鲁斯对自己深信不疑，所以，他不能理解对他展开的攻击。他想要辞职，以免给政府带来更多的麻烦。然而，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信任和支持增强了他的信心，他便顶住了这种猛烈的攻击。

1904年11月10日下午，爆发了街头骚乱，次日，骚乱再次发生。在市中心，混乱、喧嚣和对警察的直接袭击，不断加剧。傍晚，暴乱激化，街道的气灯被捣毁。警察遭到来自路障、窗口和街角的枪击。交通阻塞，电话线也被切断了。

政府决定采取有力的行动。司法部长J·J·塞亚布拉和警察总监卡尔多佐·德·卡斯特罗亲自指挥行动。陆军和海军部队被调来增援警察。然而这次暴乱，其范围并没有局限于街上的平民，它 183 还蔓延到了兵营，那里的一部分青年军人也受到了这次变乱的宣传影响。实证主义的军官们在军事俱乐部里集会，组织哗变。埃尔梅斯·达·丰塞卡

将军挫败了他们对雷亚伦戈(位于首都远郊)的军事学院预科所发动的一次攻击；可是，设在维尔梅利亚滩而离城市中心很近的军事学院却叛变了。军事叛乱，很自然地使平民暴动更加严重起来。有人劝告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离开卡特台宫到军舰上避难，在那里，他的权威会得到更好的保护，可是，他拒绝了，并说："这里是我的岗位，我绝不活着离开它。"

11月14日夜间，忠于政府的军队，在皮拉吉贝将军指挥下，向军事学院挺进。在总统府与维尔梅利亚滩之间的一条漆黑的街道上，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打了几枪之后，暴动者退却了。叛变的将军受了致命伤，其他首领放弃了阵地。11月15日是共和国十五周年纪念日，黎明时分，一支陆海军混合旅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维尔梅利亚滩上的军事学院。

军事叛乱被击败了，但是，政府的这一胜利，并没有平息街头上的暴动。在一些地区，路障后面的战斗仍在进行。在海滨大街上，一伙歹徒顽强地进行了自卫。著名的"旅顺口"要塞(为纪念新近的日俄战争而命名)，在受到海军炮轰的威胁时，终

于投降了。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经住了这次考验，赢得了大众的欢呼。共和国又一次从动荡中脱险，这类动荡，除了有短暂的间隔之外，过去曾严重地威胁着共和国的生存。这位第三届平民总统，现在可以平安无事地执行他的公共工程计划了。

里约热内卢的改造和卫生状况的改善，是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政府最初取得的胜利，它们在民族生活中，也标志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事情并不仅仅是首都正在现代化和美化，它的市容不再象一个丑陋的外省市镇。整个巴西都好象获得了新生，更加充满信心而感到自豪了。

街道和广场那种污秽不堪的样子正在迅速地消逝。曾经出资经营电车，以后还将承包安装首都的照明、动力和运输系统的加拿大投资公司，正在更换不适用的路灯。首批汽车正在宽阔的两边植树的柏油路上出现。里约热内卢人的日常生活习惯正在改变。他们衣服的颜色不再那样忧郁深沉，而且与热带气候更相适合了。此刻，奥维多尔大街和其它商业区的街道上，妓女已经绝迹，太太小姐们在这里散步，再也不觉得局促不安了。横渡大西洋的轮船，开始在这个现代化港口停泊。青年人越

来越喜爱运动，特别是水上运动，喜爱野外活动。报纸评论说："里约变文明了。"

在这个变了样的城市中，新的建筑物与日俱增。尽管许多房屋还是很窄小，样式古旧，装饰过分；尽管许多房屋还是每一种可用型式的粗糙仿制品，但是，从总体看来，已经对先前几个世代的房屋，作出了本质上的改善。首批电影院出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

里约的榜样鼓舞着巴西的其它大城市。圣保罗州的首府在迅速崛起。北部的主要城市，对于它们自己的落后状态开始感到不大满意了。虽然它们是古老的文明中心，和里约一样因循守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它们也要求有现代化的港口设备、宽阔的街道和更适用的公共设施。里约既然已经根除了黄热病，那些有钱的巴西外省人，便开始到那里消度旅游季节，而不到欧洲去了。当时也正在为米纳斯吉拉斯州建设一个全新的首府〔贝洛奥里藏特〕。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在仅仅四年当中，显然不能解决有关巴西发展的一切问题。但是，他通过改善首都的清洁卫生并把该城加以美化，却已

经对巴西进行了一次最初的有力推动，而这是他的继承人所不能拖向倒转的。这样，他就为巴西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他们将会取得其他的巨大成就。由于里奥·布兰科男爵这位国家疆界的奠定者所进行的外交活动，迄今为止一向所未有的一种民族自豪感，开始在巴西成长起来。

185

第十五章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

里奥·布兰科男爵——阿克里问题——皮特罗普利斯条约——阿克里地区的并入——与阿根廷的摩擦——重建武装力量——公共工程——联邦财政——汇率与对外贸易——咖啡生产过剩——塔乌巴特协议——总统的继任问题——皮涅伊罗·马查多与共和国的政治

巴西与邻国的一些边界纠纷，仍未得到解决。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所作的诺言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些纠纷。巴西因为最后加入了统一的美洲共和体系，而按照她的政治宪章的一项原则，又主张对国际问题实行仲裁，所以，她便建议和平地划定其领土范围。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邀请里奥·布兰科男爵任外交部长，可见他是在挑选最称职的人来执行他的新外交政策。这位男爵是里奥·布兰科子爵(帝国时期的一位知名的政治家)的儿子；他青年时代的生活是放荡不羁的。然而，甚至在他还是一个青年人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著有巴西地理和历史方面的作品，而闻名于世了。对巴拉圭作战期间，他曾陪同他的父亲，去拉普拉塔河地区执行外交使命。他在担任领事职务之前，曾在议会工作，在学校任教并为报刊撰写政论文章。里奥·布兰科在阿马帕问题上获胜后，转而从事外交工作，出任了驻柏林的全权公使。

尽管里奥·布兰科毫不掩饰地同情帝政，但他还是顺从了共和国，并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担任了驻欧洲的总代表，主持向巴西输送移民的事务。弗罗里亚诺·佩绍托和他同过学，并且很敬重他，在米西奥内斯纠纷中，曾指派他去作巴西的辩护人，这使他生平第一次有机会得到全国的声望。在欧洲的三十六年中，他的外交才能受到了充分的锻炼。尽管他作为驻利物浦的领事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可是对他性格

的影响较大的，好象主要还是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的德国，当时德国正处在国家威力和民族自豪的鼎盛时期。普法战争之后，伴随着殖民帝国主义的兴起，欧洲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密谋，这位年轻的领事，与它们有过密切的接触，因之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观，而这一点将始终是他的性格特征。

里奥·布兰科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具有健全的身心，他藐视拉丁美洲那种往往是自发而纯属空谈的理想主义，并细心观察当代的进化发展。他相貌堂堂，极其威仪，但也是一个温文尔雅和精明强干的机会主义者，善于利用人们的美德、弱点和缺点。他相信，合法的形式只有以金钱和武力做后盾才能够受人重视，而这种情况，在外交事务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就里奥·布兰科的个人经历来看，他所以要强调巴西必须在国际上享有威望，乃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人比他更善于把热爱巴西的过去与憧憬巴西未来的伟大这两种感情融合到一起了。尽管他把外交部各项外交传统的实质，都保存了下来，但他对外交部那些官僚主义的守旧派和那种

架子十足的气氛，都是根本不能适应的。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公共工程政策在巴西所激起的自信心和乐观情绪，对这位男爵的大胆外交的成功也是有利的。巴西的那些尚未解决的边界纠纷中，最严重的是与玻利维亚就亚马孙河上游的阿克里广大地区所发生的争执。橡胶工业兴起之前，在亚马孙那些无法进入的河流、沼泽和森林地带，关于边界纠纷的影响并不很大。当时的巴西和玻利维亚，都因为幅员过于广阔，人口过于稀少，设备过于缺乏，而未能充分开发它们自己的地区，所以，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阿克里地区这个边界不明、神秘而令人可怕的、在汛期刚刚能够露在水面的荒凉地方，只不过是斤斤计较的定期外交谈判的借口罢了。硫化法被发现之后〔1839年〕，橡胶在工业上的用途稳步增长。这种几乎全部产于亚马孙地区的原料，在巴西的经济中开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执政初期，橡胶约占全国出口物资的20%。在亚马孙地区内，产橡胶最多的是阿克里。巴西人已经占据了这一带地方，并正在不顾一切地榨取它的自然财富。因此，承认巴西对这一地区的权利要

求，乃是十分紧要的。

在1867年的一个外交条约中，巴西与玻利维亚曾就双方之间的边界达成协议，但因该条约没有被执行，所以，阿克里与巴西之间的准确界线迄187 未划定。从野生橡胶工业开始繁荣的时候起，巴西人就络绎不绝地涌入这个名义上属于玻利维亚的地区。这些人主要是东北地区的内地人，他们为干旱所苦，被迫背井离乡。共和国成立后，这一地区经常发生的骚动，愈演愈烈，事实上已经变成了间歇性爆发的公开叛乱。例如，在1895年，一个西班牙冒险家掀起了一个运动，要把阿克里地区改变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巴西政府和玻利维亚政府，为了解决它们当时的分歧，对1895年和1899年的议定书，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其中的一份议定书，还曾经引起过秘鲁的抗议。巴西虽然拥护占领地保有主义（uti possidetis）的原则，因为这在她那渊源于葡萄牙的外交传统中已经根深蒂固，可是她仍然企图把这个原则同1867年的条约调和起来。

玻利维亚因为看清了她不能治理一个远离自己权力中心的地区，便于1901年与北美资本家的一个企业联合组织——玻利维亚辛迪加——签订

了一项合同，将权利出让给那些资本家，叫他们去开发这一整个有争议的地区。这项合同，实际上是把阿克里的主权，已经转让给玻利维亚辛迪加，它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全部民政管理权，而该地区的事务，甚至连拉巴斯政府当局也不能干涉。这样一来，便在南美洲开创了一种授与外国侨民以治外法权的制度。美国的商人们，当时已经因为他们那种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的帝国主义倾向，而严重地遭到了人们的怀疑，但他们却在亚马孙河上游的广大地区，做起无可争议的主人来了。

巴西的反应是强烈的。其他的南美共和国，虽然不想站在巴西一边，但是，也并不掩饰他们的忧虑。坎波斯·萨莱斯政府过去没有能够阻止玻利维亚国会签订或批准这一契约。这一产生不和的危险朕兆，就要留给里奥·布兰科去设法消除了。

1902年8月，由巴西人普拉西多·德·卡斯特罗指挥的一次新的暴动，控制了整个阿克里地区，并迫使在波尔多·阿隆索通关港集中的玻利维亚军队投降。玻利维亚军队，在总统潘多将军的指挥下，准备穿过高地和沼泽，迎击巴西的革命者。里奥·布兰科并不是那种光说空话的人，巴西

军队紧接着就开始向亚马孙河上游进发了。这次炫耀武力，使他得以避免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未来政治后果，可能比它直接的后果更为可怕。通过随后举行的一系列得力的谈判，终于友好地废除了授给玻利维亚辛迪加的特权。1903年11月17日，签订了皮特罗普利斯条约，使阿克里问题得到了最后的解决。

该条约签订之前，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政188府，已经用126,000英镑把美洲辛迪加的股份全部买下来了。巴西还付给玻利维亚200万英镑，并答应修建马代腊—马英雷铁路①，而长期以来人们就已经认为这条铁路对两国都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这样，巴西不但解决了一个令人烦恼

① 所以需要铺设这条短短的（227英里）然而异常困难的路线，因为它可以为内陆国家玻利维亚在巴西的马代腊河能够通航的部分提供一个出入口，使她经过亚马孙与海路相通。美国企业家佩西瓦尔·法夸尔修建这条铁路时，他在人力和金钱上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是，随着橡胶业的衰落，这条线路已基本无用，以后便被放弃了。关于这一冒险事业的生动描写，可参看查理斯·A·高尔德所著《最后的巨人》，斯坦福大学西班牙—美洲和葡萄牙—巴西研究所，1964年出版。——英译者

的古老争端，还把亚马孙最盛产橡胶、方圆18万平方公里〔69,500平方英里〕的一块地区和平地并入了她的版图，并且挫败了向拉丁美洲输入特许公司体制的企图；这种特许公司在当代非洲和亚洲的历史上，曾经常常转化为殖民主义的侵略。

三年之内，联邦从阿克里地区获得的税收（虽然征收得并不严格），就抵补了已付出的赔偿金，并足够发放马代腊一马莫雷铁路建设贷款之用。里奥·布兰科善于利用他的一些前任和技术顾问们的工作，所以即使是遭到了国会和报界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他仍然在外交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声望大大地提高了，在巴西，别人也许从来都没有赢得过如此崇高的威望。

同玻利维亚的争端，既经解决之后，巴西外交部便不难与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荷属圭亚那，直接谈判其它边界问题了。大大增强民族自尊心的另一项外交胜利，是任命了一位巴西人充当拉丁美洲的首任红衣主教。美国和巴西，把它们各自驻在里约和华盛顿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巴西第一任驻华盛顿大使若阿金·纳

布科，为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进行了辛勤的工作。

同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巴西也开始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支配势力之下摆脱出来。尽管里奥·布兰科受的是欧洲教育，尽管第二帝国又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他仍然是加强南美大陆团结和改变泛美主义这样一种新精神的先驱者。里约热内卢是第三届泛美会议（1906年）的东道城市，当时，美国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对该城进行了访问。

189　然而，里奥·布兰科的外交胜利，说得确切些，是人们对这些胜利的曲解（对此，他没有能够或者没有打算去纠正），却使得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个外交部之间，产生了无数的误会。布宜诺斯艾利斯外交部由埃斯塔尼斯劳·塞瓦略斯主持，他曾与金蒂诺·博卡尤瓦签订了米西奥内斯条约，而当该问题交付瑞士总统仲裁时，他又是阿根廷的失败的辩护人。虽然，这两位部长在心理和政治素养方面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既不了解，也不互相敬重。塞瓦略斯是旧有的反巴西倾向的化身，而这种倾向只有随着时间

的推移才会逐渐减弱。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就好象是在反映着潜伏在两国之间的仇恨一样。

巴西和阿根廷正在南美的舞台上进行着争夺大陆霸权的竞争，这和那种成为欧洲外交的标志，并且导致了1914年世界大战的竞争属于同一性质。任何一件事情，譬如巴西陆军和海军的改编，都成了阿根廷政治家表示敌意的借口。其它许多问题，当时也是容易被曲解的。甚至于还发表过一份伪造的电报，它很有可能象1870年那次普法战争的情况一样，突然挑起两国间的战争。巴西和阿根廷领导人的明智，把这一隐伏着的战衅平息下去了，南美洲这两个最大的国家才得以继续和平相处。巴西的外交胜利，并未因阿根廷的仇恨而失去了光辉。

军队的改编，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任期内，是个重大的事件。巴西要建设自己的物质防御力量，以配合里奥·布兰科的外交，并要作好准备，以应付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威胁。国内冲突的解决和国库的充实，使政府有可能开始改革军事训练，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军火工厂，构筑战略铁

路，等等。在首都郊区，第一次举行了陆军师的大规模演习。

巴西的海军，在帝国时期，曾居于拉丁美洲的首位，然而，已被1893年的叛乱摧毁殆尽了，所以，重建海军是十分必要的。1904年12月，政府受权建立一支海军舰队，其中包括12,000至15,000吨的主力舰三艘，9,200至9,700吨的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六艘，潜艇三艘及其它辅助舰只。与此同时，政府为了完成海军的重建计划，在里约附近修了一座现代化兵工厂。练习舰升起人们还不大熟悉的共和国旗帜，它们象在帝国时期一样，继续在外国的海面上往来游弋。

190 运输和公共工程部的活动也紧张起来。里约的新港工程，给它添上了现代化首都的观瞻，并且激励了国内的其他沿海城市，巴伊亚、累西腓和贝伦等地的港口建设工程，以及在南里约格朗德唯一的海港构筑防波堤的工程，都相继开工，这些工程或由政府直接营办，或者通过颁发特许权来进行。一些主要的铁路线延长了，第一批新的线路，特别是由马托格罗索通往玻利维亚边界以及由圣保罗州通往南里约格朗德州的铁路，也修筑起来

了。看起来，这样一种主张，似乎第一次起了作用，即铁路应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网，而不应该是仅仅由一些从闭塞地区通向海滨、各自分开，好象每一条线路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似的线路所组成。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这位前任财政部长所最为关注的，自然是处理公共财政的问题。关于公共财政的概念，他比坎波斯·萨莱斯理解得更为广泛，所以，他的政策便侧重于活跃国家经济。里约的改造，铁路及沿海航运的发展，激励着巴西人，使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了一种比较现实的信心。他们稍稍丢弃了过去的那种天真的自我陶醉，当时，他们满足于夸夸其谈，以“举世无双的国土”的财富，当做“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的理由”。他们开始以不太感情用事的态度来观察国家的现实。

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虽然效率低并有缺点，但它却揭示了全国的政治和经济地理的概貌。人口已从1872年的估数1,000万，增加到1,700万。自1890年至1900年，联邦区的居民已从50万增加到70万；圣保罗城的居民从64,000增加到24万人。

北部的一些大城市如巴伊亚、累西腓和贝伦等，如果说人口没有减少的话，却也没有增加。

经济和政治的轴心，已经从北方完全移到了南方。1872年，南北两方的人口相等；而1900年，南方人口比北方人口多出300余万。圣保罗州和南里约格朗德州的人口均增加了两倍。圣保罗人向西方推进，一面从原始森林和野蛮的印第安人地区打开一条道路，一面扩充咖啡种植园，这一切，颇似美国西部开拓边疆的时代。在帝国的最后几年间，移民加快了。1887年，有35,000个欧洲的殖民地开拓者进入圣保罗；1891年，达到了顶点，当时有216,000个殖民地开拓者进入南方各州。虽然，这一速度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有所下降，但随后又升高到每年10万余人。

过去一向是欧洲移民（其中多为葡萄牙人）中191心的里约热内卢和南里约格朗德（这里的移民大多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先后将头一把交椅让给了圣保罗，大批大批的意大利人涌入了该州的咖啡种植园。1900年，圣保罗州的人口为220万，其中移民为53万人。人口这样地流入，当然不仅改变了南方人口的种族特点，也改造了农业的耕作方

法。北方所吸收的移民为数不多，那里的居民常常营养不良，不大卫生，因此，容易染患死亡率极高的地方病，婴儿尤其是这样。所以，北方人口逐渐落在南方的后面了。

圣保罗州所产的咖啡，约为巴西总产量的一半。咖啡平均占巴西出口总额的60%到70%。亚马孙的橡胶，已使马瑙斯成为世界上最与外界隔绝的一个都市，成为一个奢侈、挥霍和投机的城市。巴西的大部分食品和几乎全部的工业品都是进口的。除了在大城市和移民拥塞的南方之外，广大群众的生活标准很少有什么提高，对于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些采取放任主义的统治阶级是很少了解的。

正如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曾经相信和预计的那样，里约的改造，恢复了欧洲对巴西未来的信心。而反过来说，这种局面又使政府能够执行它的建设方针，而无损于它的财力和信誉。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忠于他过去的那种自由主义的思想，继续执行坎波斯·萨莱斯关于纸币、储备金、通货的逐渐收缩和以黄金纳税等项总政策。1902年汇率为12辨士，到1906年升为16辨

士。不兑换纸币的数量降低了。公债减少了。年度预算出现了盈余。修建里约港的贷款，已节约了300万英镑，可供下届政府使用。国库在伦敦有大宗存款，国库支付的款项也很及时。每年的贸易顺差平均为20万干度。尽管巴西的自然资源不够丰富，但她还是进入了一个不可否认的繁荣时期。

经济管理，看起来好象是一个平静的领域，可是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却发现事情并不永远顺手。咖啡生产过剩的第一次大危机，使政府同圣保罗州咖啡种植者及商人的直接利益发生了对抗，政治问题也从而恶化起来。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坚持了坎波斯·萨莱斯那个提高币值计划的总方针，而公共工程中的外国投资，又为他提供了方便条件，所以，他不仅成功地提高了汇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汇率得以稳定。但这一方针是着眼于国家总体利益的，它既不为那些咖啡出口者服务，也不为其他那些与新兴的制造工业有或多或少联系的集团服务，这些集团本已享有很高的关税保护，但仍不满足。汇率越低，在国外市场上出售咖啡所赚得的密耳瑞斯的数目越大。同样，进口工业品以密耳瑞斯计算的价格提高，也将使巴西

制造的商品，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

虽然制造商的势力还不足以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可是生产者和咖啡货主们却觉得他们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设法决定经济方针。咖啡价格已在逐步降低，如以国内货币计算，则在1905年落到了最低点。与此同时，咖啡产量却有了惊人的增加。咖啡工业，已从圣保罗州北部和中部一些地力枯竭的地区迁出，而向西扩展，一直延伸到巴拉那州和马托格罗索州那些新开垦的土地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砍伐了原始森林，修建了铁路，匆匆忙忙地建起了城镇，也积累了惊人的大量财富。这种新型的圣保罗远征队员，不仅有一种地区的自豪感，还养成了奢侈、挥霍和空前的大胆创业的习惯。

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所有的竞争者之后，巴西，尤其是圣保罗州，现在差不多已经完全垄断了全世界的咖啡生产。1906年，咖啡产量达到了前所未闻的 2,200 万袋。① 如果把前几次收获量中剩余下来的 400 万袋也包括进去，那么超过世界消

---

① 每袋咖啡的标准重量为60公斤或132磅。——英译者

费量的总数就达到了1,600万袋。这种可怕的生产过剩，使价格更加低落，并在咖啡经营者及与之有连带关系的政治党派当中，引起了一片惊慌。只有联邦政府直接干涉市场，他们才能得救。然而，他们不仅要求政府立即协助他们对积存的过剩咖啡实行控制，以维持价格不再跌落，而且还要求政府效法阿根廷所实行的价格补贴计划，发放价格补贴，并采取一些很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货币政策的措施，如要求为咖啡交易规定密耳瑞斯折合12辨士的特别汇率。

主要种植咖啡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米纳斯吉拉斯这三个州的州长，于1906年3月，在圣保罗州的塔乌巴特开会，签订了一份维持咖啡价格的协议，而他们最初并没有向联邦政府说明这一点。这三个州自己约定，对交付出口港的每袋咖啡，维持一定的价格，同时，将超过世界消费量的部分收藏起来。为了资助这一计划，对运往国外的咖啡，〔每袋〕均将征收三法郎(兑成黄金)的出口税，用以偿付特别贷款的利息和分期还本。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总统本人虽然是一位大的咖啡生产者和圣保罗人，但他却坚决地不肯

193

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他清楚地预见到这个计划对将来的危害。当时，拥护联邦主义的情绪仍然十分活跃，所以政府无法制止该三州达成这样一个协议，但是他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绝不允许对货币政策做任何修改。他在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坚定而冷静地指责了关于实行低汇率的建议，并指出那样做可能破坏货币本位。他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却为时不久。反对派的政客们，当时有办法在他的继承人问题上挑起一次危机，这样，便为他们的干涉主义政策铺平了道路；而他们在1929年遭到的失败，又大大帮助了1930年革命的成功。

坎波斯·萨莱斯的政策，推动了各州寡头政府执政团的建立，它们或多或少都是一些靠家族关系而紧密连结起来的小集团。不能打进这个圈子内部的人，便形成了反对派，他们这帮人早已作好准备，随时都可以抓住军事起义和平民暴动所能造成的任何机会。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因为埋头于大量的行政事务，并不曾设法来扭转这种局势。这些寡头政府执政团，就象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的联邦共和党那样，渐渐地汇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党派联盟；该联盟由皮涅伊罗·马查多领导，他

是南里约格朗德州选出的参议员，也是卡斯蒂略斯派在政府面前的代言人。身为参议院议长的马查多，决心与总统对抗，这便形成了另一股平行的力量，它束缚着这位最高行政官的行动自由，而且好象非把他逼到不容和解的境地不可。在一些州里，出现了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因为受过帝国时期的议会环境的熏陶，并且认为国家也需要学会如何去管理自己，所以，他就按照自己的看法，完成他自己的职责，力求不介入派系之间的激烈冲突，尽管他这样做要牺牲个人的友谊和党派的利益。在一个政治传统和公众舆论非常不稳定的国家里，这位总统所保持的中立态度，看来是削弱了他的权力。

1904年，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到米纳斯吉拉斯去旅行，当时他就职还不满两年。据认为他的出访具有这样一个政治目的，即安排副总统阿丰索·佩纳做他的继承人。那些公开或秘密反对他的政客们，便抓住了官方候选人这一借口来煽动公众的对抗情绪。在没有真正的全国性政党的情况下，国家元首对他的继任人选进行干预，几乎可以说是必要的，但当时却被认为是损害共和制度

的纯洁性的最粗暴的行为。

这场反对所谓的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各项意图的运动，由皮涅伊罗·马查多掌握了领导权，他在决定联邦政策方面的权力和威信，早在坎波斯·萨莱斯政府期间就已经十分巩固地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在圣保罗州占据着统治地位、并接连有三位总统候选人当选为总统的那个政党，提名前任财政部长贝纳迪诺·德·坎波斯为候选人，他在八年以前，就曾经被认为是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总统的一个合适的继承人。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并没有反对提他的同乡的名，因为这位圣保罗同乡和他本人都是受同样的一些追随者的支持。

反对阿丰索·佩纳为官方候选人的政客，重整旗鼓，又掀起了一次更加带有攻击性质的运动。这一次，他们不仅拚命反对官方候选人，而且也攻击被提名者本人和他的主张。贝纳迪诺·德·坎波斯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态度和思想都很固执的人。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内战和海军叛乱期间，他任圣保罗州州长，维护了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总统地位的合法性，从而使他那个州不曾卷入互相

残杀的斗争，并使提名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为共和国总统一事得以顺利进行。他任财政部长时，曾支持某些经济和财政问题的大胆设想。他不赞同坎波斯·萨莱斯那种征收高额保护关税以奖励工业或改变货币本位的片面政策。

与皮涅伊罗·马查多集团有密切连系的新闻记者阿尔辛多·吉马良斯，受到了贝纳迪诺·德·坎波斯的接见。在接见的时候，这位总统候选人概述了他的施政纲领，其中摈弃了塔乌巴特协议所体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计划。那些感到贝纳迪诺的态度威胁了他们利益的集团，便在报纸上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宣传运动来反对他。皮涅伊罗·马查多提名另一位圣保罗人坎波斯·萨莱斯，这个人对国家的财政整顿工作，当时已开始得到人们比较冷静的评价。坎波斯·萨莱斯本人同意这一提名，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可以补偿他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事后他却领悟到，这是别人在利用他来削弱他本州的威望，于是他便自动退出了。

这两个圣保罗候选人被忍痛割爱之后，巴伊亚州州长若泽·马塞利诺又提出了鲁伊·巴尔博扎。可是，巴尔博扎谢绝了这个荣誉，他的理由是，

一个米纳斯吉拉斯人会有更强的生存竞争能力。皮涅伊罗·马查多和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党羽，于是便对提名阿丰索·佩纳表示了同意，而过去他那个所谓的官方候选人资格，却曾经是该党分裂的借口。这样，圣保罗州就失去了提供第四位总统的机会。这位米纳斯吉拉斯州政客就任总统，意味着那些提倡工业保护主义、政府干预咖啡贸易和财政改革的人们取得了胜利。签署塔乌巴特协议的州长之一——尼洛·佩桑尼亚，是共和国副总统的官方〔原文如此〕候选人。 195

皮涅伊罗·马查多把党内的大多数成员，都组织到一个单独的集团里面，该集团声称他们有权提名总统的候选人。通过这件事，他好象是为了巩固他自己在全国的威望。贝纳迪诺·德·坎波斯的候选资格垮掉以后，阿丰索·佩纳便轻易地获得了胜利。这样，在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便出现一个新的联邦共和党。然而，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那种圆滑老练的领导，却被另一个人的强有力的控制所取代；这个人是个活动家，是一个从前的考迪罗和典型的边疆开拓者，他既聪明、有直观能力、勇敢、粗率、强悍，又很顽固任性，但是这并

不妨害他在看来事属可行的时候，在困难的局面里，实行妥协和逃避。

他那引人注目的面部轮廓，好似用青铜雕刻而成的；他的举止具有军人的派头。他喜欢浮华的生活，喜欢运动、赌博和大胆的行径。他忠于自己的朋友，能够激起别人的热爱，也能激起别人的深恨。他控制着知名人士和饶舌的书生，仿佛他们都是些呆头呆脑的地方政治头目；他和商人们也有巩固的联系。他的住处——“格拉萨山庄”，是一所驰名的邸宅，位于里约资产阶级居住区的一座小山上，这里是政客们每天顶礼朝拜的地方，而且所有的往访者也都可以毫无区别地受到接待。皮涅伊罗热心和蔼，甚至在那些不赞成他的生活方式并蔑视他才疏学浅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也引起了一种渴慕之情——那些毫不踌躇地甘冒金钱和生命危险的人，总是会在别人身上激起这种渴慕之情的。

皮涅伊罗·马查多挫败了一位新的圣保罗候选人以后，便认为自己是当选总统的一位非正式的内阁总理了。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在任期将满时，十分小心谨慎，以便不致加深分歧，他也拒

不接受来自国会的由皮涅伊罗鼓动起来的挑战。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政府第一次失去了议会大多数的支持，不过，这既没有妨碍政府正常地执行其职能，也没有威胁到国内的和平。1906年11月15日这位帝国的前顾问，将他曾经精明、有效、沉着果断地掌管过的政权，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但十二年以后，他还将再一次执政，不过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很快就逝世了。

196

第十六章

阿丰索·佩纳
(1906—1909年)

米纳斯吉拉斯州——阿丰索·佩纳的就任——他的革新倾向——他的内阁——经济干涉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财政政策的新方向——若奥·皮涅伊罗和卡洛斯·佩绍托——"幼稚园"——达维·坎皮斯塔被提名为候选人——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元帅——对陆军部长的压力——接受了的挑战

虽然米纳斯吉拉斯州是当时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州，并在联邦议院中拥有众多的代表，但是，它的政治影响还不象圣保罗州、甚至南里约格朗德州那么大。在巴西全境，仅此一地是如此切望去保持那种古老的幽静而简朴的宗法传统和生活方

式。这一峰峦重叠的腹地的崎岖地势使这里的人民形成一种极不同于整个民族性格的心理状态。

比起北方的蔗糖大王、里约热内卢州和圣保罗州的咖啡种植者，或者大南方的豪爽健谈的高卓人，米纳斯人是更为出色的土地耕耘者，更为典型的农民。他吝啬，心胸窄小，小心谨慎，嫌烦风险和突然变革，他做事有拗劲，善于掩饰感情并对政治十分敏感。黑奴没有把他变成蔗糖大王那样的封建主。地方的消费性经济的不稳定性，使他在商业事务中小心翼翼。他缺乏夷平森林的圣保罗咖啡种植者那种英勇无畏的精神。由于没有什么突出的大首府，他能过一种比巴西任何其他省份更具有强烈村庄气息的生活。

在共和国最初那些动乱的岁月里，米纳斯州保持中立，那些受革命与内战迫害和威胁的人，可以在这里避难。它的统治者们尽可能地在联邦内平静地生活，避免卷入本州外的任何党派斗争。米纳斯州把发展咖啡种植业的经济命运与圣保罗州的连结在一起了。圣保罗人罗德里格斯·阿尔维 [197] 斯与米纳斯人西尔维亚诺·布兰当（他在就职前逝世，其职位由阿丰索·佩纳取代了）被联合提为

候选人，就是咖啡经济霸权在共和国政治上的第一次表现。

提名另一个圣保罗人贝纳迪诺·德·坎波斯为候选人一事的失败，开辟了提名米纳斯政治家阿丰索·佩纳为候选人的道路，他当选为总统几乎象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次意料中的提升。阿丰索·佩纳于1847年出生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老黄金产地。他在以严格的纪律和人文主义传统驰名的卡拉萨教会学校学完人文学之后，毕业于圣保罗学院法律系。在这个学院，他与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是同学。1874年至1879年间，他是米纳斯州议会的自由党议员，后来在里约的众议院任议员。1882年，他在马蒂尼奥·坎波斯内阁中任陆军部长。1883年，他在拉法耶特·罗德里格斯·佩雷拉手下任农业部长。1885年，他在萨赖瓦内阁中任内政和司法部长。

佩纳象大多数的前君主主义者一样，默默地适应了共和国的气候。他是本州制宪会议的成员，在1892年塞萨里奥·阿尔温辞职后，被选为州长。在任职期间，他成功地度过了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和各次内战的狂风暴雨时代。在克服了地方的

种种偏私和成见之后，他把州政府从旧首府奥罗一普雷托迁至新的经过计划建设的首府贝洛奥里藏特。佩纳与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一样，都属于受佩德罗二世严密监督之下的议会制训练出来的杰出帝国政治家一类。就当时来说，他是开明的和热心于公益的，他遵守法律条文和行政程序，一丝不苟。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执政期间，他是巴西银行行长。西尔维亚诺·布兰当逝世后，他成为共和国的副总统。

尽管阿丰索·佩纳的政治生涯是平庸的，他本地区人民的传统是保守的，他还是希望进行革新和树立自己的威望。他尽力把那些敢作敢为的青年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煞是要对米纳斯统治阶级中的根深蒂固的谨小慎微癖性造反一般。对巴西未来的那种伟大形象的信念，这原是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总统当政和里奥·布兰科外交权谋的最优异的成果之一，这种信念对他的鼓舞或许比对他同时的任何其他政治家更大。他梦想一个工业化的巴西，一个富饶和军事上强大的巴西。

他就任总统之后，几乎走遍全国各地，所到之

处无不使他感到乐观。尽管亚马孙河流域是一个198绿色的地狱，从东北部迁来的采割橡胶的内陆人遭到了至少不次于以往施加于黑奴身上的那样残酷的奴役（如果他们还能从疟疾和脚气病中活过来的话），可是那些只看统计数字的人就认为亚马孙河流域是神话般的黄金国了。这一地区每年出产的天然橡胶约达35,000吨，每吨平均价格400镑，它占世界橡胶消费量的70%，占巴西总出口量的20%。塔乌巴特协议已经预防了咖啡生产过剩足以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价值超过60万千度的大约1,200万袋出口咖啡，占了巴西外销物资的65%以上。新兴的制造业日趋繁荣，特别是棉纺厂。但是，这种新的"繁荣"所产生的乐观情绪掩盖了许许多多令人沮丧的事实：以工资糊口的人赤贫如洗，不得温饱，而且受种种热带疾病的摧残；农村老糖业贵族的衰落；对教育的浪漫理想的破灭，这种理想培育了巴卡拉瑞累斯姆①、城市的寄生生活和对公职的贪恋；可耻的选举骗局所造成

① 巴卡拉瑞累斯姆系指"博士"，特别是律师这一阶层的显要地位。——英译者

的政治腐败；地方政治寡头的卡压；以及日益贪婪的商人（他们要求实行工业保护主义，要求国家给予价格补贴和签订公共工程合同）。

阿丰索·佩纳聘请里奥·布兰科男爵出任外交部长。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元帅（德奥多罗元帅的侄儿）任陆军部长。亚历山德里诺·德·阿伦卡尔任海军部长。三个新人，塔瓦雷斯·德·利拉、米格尔·卡尔蒙、达维·坎皮斯塔分别被任命为司法部长、运输和公共工程部长、财政部长。

这位总统在概述其经济政策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这些政策的干涉主义和保护主义，这原是他在竞选时承诺过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旧概念已被忘怀。这位新总统宣布，宪兵国家的理论已不再有什么意义。“国家的崇高使命”他继续说道，“还包含着关心人民的福利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每当私人的各种创业在社会事业中显得无能为力或不充分的时候，国家必须采取有益的行动。”政府将通过保护关税、增加移民和发展内陆交通等手段来刺激和支持国家经济。简言之，巴西宏伟的建设政策将包括三大目标：增加全国人口，发展工业中心城市和改革货币体制。阿根廷政治家阿尔维

迪的著名格言“统治就是增加人口”，已成为政府199的座右铭。巴西再一次试图用放弃它专一从事农业的地位（这种农业一向是积极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的）从而登上工业舞台的办法来加速经济发展。

佩纳政府把前届政府的公共工程计划贯彻到底。运输和公共工程部特别忙于发展铁路和引进欧洲移民。巴西中央铁路一直延伸到圣弗兰西斯科河，其最终目的（后来似乎放弃了）是要经过托坎廷斯河流域达到巴拉州，从而把大北方与巴西南方连结起来。圣保罗—南里约格朗德线路和里约热内卢—圣埃斯皮里托线路已近竣工。准备连结马托格罗索州和圣保罗州、然后延伸到玻利维亚东部的诺罗埃斯特铁路工程也在加紧进行。

隆东上校① 在探察马托格罗索州和亚马孙河流域的边远森林，驯化未开化的印第安人，并把这

① 坎迪多·马里亚诺·达·席尔瓦·隆东将军，是马托格罗索州的土著人，著名的军事工程师。1914年西奥多·罗斯福在其著名的旅行中发现了“可疑之河”（后改名为西奥多·罗斯福河），他当时充当向导。在这次旅行中，罗斯福几乎死于热病和饥饿。隆东于1958年逝世，时年92岁。——英译者

边远的腹地和全国各地用电信联系起来。咖啡种植者丢弃了圣保罗首府附近的地力已经瘠贫的土地，就象他们在帕拉伊巴流域那时一样，正在通过提埃特河和伊巴内马河流域向巴拉那河迁移。他们砍伐原始森林，驱逐印第安人，建设起象美国大西部那样的典型城镇，他们到处创造着新的财富，真好象巴西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政府受到极端乐观情绪的鼓舞，寄巨大的期望于未来。为促进移民的流入，政府创设了一个专门行政机构，负责增加人口，并在欧洲设立了诽谤家们称之为黄金使馆的特别事务处。移民曲线图表曾从1897年的174,000人降到1903年的34,000人，但是在1908年，便回升到接近10万人。

在废除奴隶制以前就已开始入境的意大利移民，进入了圣保罗州新开辟的地区并在那里安家落户，与当地人通婚，他们以其勤奋、节俭和冷静的精神给巴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共和国的最初十年间人数就增加了一倍。德国人定居在圣卡塔林纳州和南里约格朗德州。波兰人和波罗的海的俄罗斯人则进入巴拉那州。在里约热内卢和北方大海港，葡萄牙人仍占优势，但是，他们已 200

经遇到那些逃避土耳其统治而来的犹太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其他小亚细亚人所经营的城市小商业的竞争了。巴西似乎在较小的规模上重复着美国向西部拓荒时期的那种扩张。

然而，内部边疆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国家经济的基础。当时它是完全依靠咖啡和橡胶的。1908年，政府借债1,500万镑，以应付咖啡生产过剩的危机，这一危机促成了塔乌巴特协议。连续的歉收使供销之间出现了统计上的平衡，而且恰好抵销了这笔债款。咖啡出口量每年平均为1,300万袋，价值40万干度以上。亚马孙地区橡胶的出口量每年近4万吨，每吨可值300至500镑，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总产量尚不足其数的一半。巴西的其他出口物资是可可、烟草、棉花、马黛茶和毛皮，其数量大大低于咖啡，也低于橡胶。

国内贸易增进了。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南里约格朗德州的畜产品及后者的谷物的国内消费量增加了，因而压缩了进口，促进了贸易平衡。毛阿以及后来临时政府的人所未能实现的理想——制造工业，由于实行了保护关税终于争取了一个立足点。1908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全国展览会对极

大多数的巴西人是一个启示。该展览会有11,000个单位提出展品，吸引了近100万观众。全民族对自己的潜力具有了越来越大的信心。

里约热内卢的乡土习惯和殖民地面貌在逐渐消逝。巴西是被邀请参加海牙会议(1907年)的唯一的拉丁美洲国家，在这次会议上，鲁伊·巴尔博扎所获得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过去几年来由于桑托斯·杜蒙特几次成功的国外飞行已经有了提高。阿丰索·佩纳政府修改了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海军重新武装计划，催促英国造船厂提交第一艘大型战舰和数艘巡洋舰，这些舰只将成为巴西未来现代舰队的基础。巴西人对停泊在瓜纳巴拉湾的大型舰只感到十分兴奋。亚历山德里诺·德·阿伦卡尔海军部长的强有力计划，可以归结为一句口号："向海洋进军!"这个计划博得人民广泛的支持。

然而，佩纳在位两年半期间最明显的特色是财政部长坎皮斯塔的货币改革。阿丰索·佩纳和达维·坎皮斯塔一上台，就抛弃了过去的财政政策，可能这主要是出于他们个人的信念，而不是出于他们在竞选运动中所作的承诺。他们主张货币 201

改革，这原是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所反对的而为塔乌巴特协议所建议进行的。这个计划很简单，大体上是模仿阿根廷已经采用的那个计划。

帝国时期的法定比价仍然被沿用，即密耳瑞斯的汇兑平价保持在27辨士，或每盎斯22开的黄金兑换32密耳瑞斯。不过，政府把外国贷款和流入国内的外币储存起来作为兑换基金。政府以这笔兑换基金（法律规定不超过2,000万镑）为保证，按每密耳瑞斯兑换15辨士的比价发行纸币。国库储备也并入兑换金，每当汇率升至法定平价时，发行的纸币就按固定比价收回。

这个计划立即显示出的优越性是稳定了汇率，从而也稳定了国家的劳动和生产价值。因为，汇率的趋势是上涨（平均汇率为16至17辨士），而咖啡价格是跌落，所以，圣保罗大种植者认为这个计划是非常好的。与此同时，由于关税增加和必须以黄金支付的关税的百分比的增加，国内新兴工业在与外国竞争时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政府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普遍繁荣和只需付低利的欧洲资本的稳定流入，使兑换基金在第一年内完全成功地发挥了它

的作用。因此，佩纳和坎皮斯塔对兑换基金的信赖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两年之后，国库的不兑换货币较兑换基金的法定储备券吸引了更有利的汇率。这将导致下届政府把兑换基金的限额从2,000万镑提为6,000万镑，并将兑换比价从15辨士提为16辨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欧洲金融市场关闭，国际贸易被搅乱，巴西的出口量被压缩，这一切就加速了兑换基金的最后破产。可是从表面看来，佩纳政府是兴旺的，遗留给它的意料之外的继承人(副总统尼洛·佩桑尼亚)的，是一个平衡的国库以及反映出信心和进取精神的商业。埃尔梅斯·达·丰塞卡成为候选人和佩纳总统逝世所引起的严重政治危机，除了使国家感到忧虑之外，并没有影响当时的经济和财政形势。

佩纳的经济计划符合了当时的乐观情绪和都市新兴工业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阶级企图从帝国昔日宗法式的蔗糖大王和咖啡种植者手中把控制权夺过来。阿丰索·佩纳为了执行自己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不得不力争首先从皮涅伊罗·马查多及其追随者的监护下摆脱出来（他们的根深扎在各州寡头集团、州政府以及联邦参议院中）。这 202

种情况，与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和联邦共和党的鼎盛时期的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处境颇为相象。

但是，1906年的人物和策略与1894年的却有天壤之别。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在挑起他终于获胜的斗争之前，曾长期地等待和妥协。与普鲁登特具有同样的政治背景并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格利塞里奥一向是喜爱和平和老练的，他不能采取大胆的行动或暴力。普鲁登特·德·莫赖斯能够在自己的活动场所——处于弗洛里亚诺·佩绍托时代的激烈冲突所造成的混乱之中的联邦国会——内逐渐干掉格利塞里奥。而阿丰索·佩纳则面对着更为强大和危险得多的对手：一个地道的考迪罗，他不仅有严格的纪律来约束他的追随者，还得到了他的州的无限支持，当时这个战痕斑斑的州正在立宪州长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的独裁统治下。

在即将来到的摊牌中，阿丰索·佩纳的胜利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形势。该州州长之职已委任给老牌共和党人若奥·皮涅伊罗。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也

把大胆有为的年轻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提出新的政治和行政措施，这些措施使他在州内的公民中享有巨大的道义威望。

阿丰索·佩纳发掘了另一个米纳斯人政治家——年轻、聪明、有学识、精力旺盛并主张极权的卡洛斯·小佩绍托担任众议院议长。卡洛斯·佩绍托是诞生于帝国末期的一代人中第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受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是一个斯宾塞派哲学家、进化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他既未沾染上一代人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浪漫主义，也没有受实证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他从勒南[①]那里接受的某些文学上的怀疑主义抵销了他可能得自斯宾塞的朴素唯物主义或者泰恩的严密的决定论的倾向。他热心地研究经济和财政，使他对国民经济有所了解。尽管他渴望权势，他却不是一个战斗者。他生来就具有贵族气派，所以，他蔑视群众和选票。他一贯相信，政府应当有不可战胜的权力，因此，他无力鼓动和指挥 203

① 勒南（Josaph Ernest Renan 1823—1892年），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剧作家、散文家。——译者

一个有战斗性有效率的反对派运动。他从议院内各州代表团中挑选一批志趣相同的青年把他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南里约格朗德州的一位已经退出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党的年轻议员詹姆斯·达尔西被推为议院中的领袖。

卡洛斯·佩绍托及其由年轻政客组成的参谋部被俏皮地称为“幼稚园”。然而，他们得到了老年政客的支持，这些政客或者对皮涅伊罗·马查多的政治感到厌烦，或者急于对阿丰索·佩纳政府表示支持，并且相信，共和国的各个政党应增添活力。由于对共和国政治的种种概念模糊不清而无法组成全国性的党派，斗争就日益形成个人间的角逐：卡洛斯·佩绍托或“幼稚园”对皮涅伊罗·马查多或“格拉萨山庄”，前者体现了青年人的志趣，后者是狡诈与强硬交替使用的旧式政治。这场斗争更象两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谁也不了解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由于得到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当然的未来总统候选人若奥·皮涅伊罗的全力支持，“幼稚园”在初期轻易地得胜了。皮涅伊罗·马查多开始渐渐觉察到孤立的威胁，甚至他的据点参议院也

可能不受他控制。但是，若奥·皮涅伊罗逝世〔1908年10月25日〕后，他的继承人把米纳斯吉拉斯州的政策和行政重新拉回到往常的谨小慎微因循守旧的老路。大多数米纳斯政治家基本上是保守的，他们对于显然无目的地反对皮涅伊罗的斗争兴趣不大，并且对卡洛斯·佩绍托也不表同情。

象大多数年老的米纳斯领袖一样，皮涅伊罗·马查多的忠实党羽认为：让达维·坎皮斯塔当总统候选人，甚至比卡洛斯·佩绍托的飞黄腾达更为危险。若奥·皮涅伊罗死后，佩纳毫不掩饰地想为坎皮斯塔当候选人铺平道路。全部组织工作都委托给了卡洛斯·佩绍托，可是他对这项工作似乎兴趣不大。反对达维·坎皮斯塔的活动，很快便波及到了佩绍托。

虽然皮涅伊罗·马查多最初同意坎皮斯塔作为候选人，可是他很快又改变立场进行反对，并且组织力量准备斗争。鲁伊·巴尔博扎给佩纳写了一封长信，反对坎皮斯塔当候选人，一则因为这一候选人资格具有官方任命的性质(它使人想起，佩纳本人是由于反对宫廷候选人才被选中的)，再则因为其提出的方式是匆促的，好象是有意与选 204

举联邦国会相吻合。皮涅伊罗·马查多要想从那些厌弃坎皮斯塔和佩绍托的米纳斯议员中招徕必需的人员来击败总统的计划，是毫不费力的。在就任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之前，文塞斯劳·布拉斯〔后任巴西总统〕曾半心半意地设法把自己的朋友集拢在坎皮斯塔的周围。两个与咖啡经济休戚相关的州（圣保罗州和里约热内卢州）采取了拖延和规避的态度，没有公开地拒不支持佩纳的候选人。

达维·坎皮斯塔对人冷漠，其程度如果说不比卡洛斯·佩绍托严重，也完全是和他一样。达维·坎皮斯塔有才智和鉴赏力，又有些目中无人，因而，在本州政党议会中多少处于孤立的地位。他在议会中获得了机智和善于讥讽的演说家的名声。以后，就新的财政政策展开大辩论的时候，他为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倾向热烈辩护，这种倾向导致了修改关税和签订塔乌巴特协议。这样，他成为候选人将是咖啡种植者和新的制造业的又一胜利。

但是，圣保罗人非常清楚，由阿丰索·佩纳开创的新秩序的动力本身将被佩纳的继承人继续推向前去，无论这个人是谁。因此，他们不愿意卷入

坎皮斯塔的候选人问题的斗争而牺牲他们与米纳斯政治家的联盟。一位在米纳斯州享有广泛威望的地方首领比亚斯·福尔特斯，自愿提出要参加对坎皮斯塔的竞选。文塞斯劳·布拉斯州长不愿让自己所漠不关心的一个候选人来损害他个人的处境和政府的安宁，因而在其本地的追随者和佩纳总统之间采取中立。皮涅伊罗·马查多获胜的可能与日俱增。那些曾一度抛弃他的政客们又络绎不绝地奔向他在"格拉萨山庄"的官邸去进香朝拜了。这座官邸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气候表。就缺一名候选人去同"官方"的候选人竞选了。

陆军部长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元帅的名字惹人注目。这个最初是由一些年轻军官所推荐的德奥多罗·达·丰塞卡的侄儿，在坎皮斯塔的对手看来，象是挑选得极为合适的。作为陆军部长，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在他的战友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改组了本部门的工作程序，使之具有更高的效率。他建立了征兵制，并且通过开展定期训练和演习，促使陆军现代化。他在国防方面的工作补充了里奥·布兰科的外交政策，他的支持者们一直认为他与外交部的外交胜利是不可分割的。他

们说，要使巴西在国内和在国外具有一个新的更现实的形象，她就必须有一个强大而有效能的政府，有勇气从使人停滞不前的法律的烦琐条文中摆脱出来。他们宣称，由公众敦促元帅做候选人就足以驳斥所谓提名是出于军界的压力的任何指责，而这一候选人就能得到普遍的支持。

那些反对阿丰索·佩纳的政客们开始对陆军部长施加压力，要他同意被宣布为候选人。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元帅基本上是一个胆小怕事、优柔寡断、性情温和、信而不疑的人。在临时政府时期，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上尉，据鲁伊·巴尔博扎所说，他小心翼翼地紧随他那强有力的叔父，一心从事本职工作，很少过问政治密谋。他默默地高升了。在反对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政府的叛乱期间，他站在合法政府一边，镇压了他所领导的军事学院的叛乱。他任阿丰索·佩纳内阁的陆军部长时，再次表现出自己不怀有任何政治或其他野心。他曾代表官方到德国去观看威廉二世的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这似乎也没有使他得意而忘乎所以。人们会说，他是不会为了争权夺利自发地采取任何举动的。

可是，他那种举棋不定的性格和不善于猜疑与戒备(这正象他的叔父)，使他服服帖帖地听任那些政客和他一些同僚的巧妙的摆布。一种能够依靠武力复活政客和商人的腐朽社会的军事独裁的源远流长的恶梦，又一次在一个将军的周围冒了出来，尽管这个梦想披着合法的外衣。

1909年5月，众议院议长卡洛斯·佩绍托在一次演说中间接提及埃尔梅斯·达·丰塞卡的候选资格："共和国已表明，它能管理自己和维护公民自由，使共和国不致成为丧失天良的煽动的牺牲品。这种煽动通向混乱和暴力，是专制和虐政的根源。"随后的数天里，政客们和共和国本身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的正常生活似乎中断了。埃尔梅斯元帅及其狂热的党羽对这些话将有什么反应呢？这位元帅是克服内心的疑虑，还是屈从于他的支持者的高压？最后，他孤注一掷，断然接受这一挑战。他在写给佩纳总统的一封简短而粗暴的信中，要 206 辞去陆军部长职务，并说，尽管他本人不是总统候选人，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种意见：不能给予军人在共和国中担任最高职位的机会。这封信对这个忧虑不安的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政

界中气氛是惊慌的。总统则深为震动，他默默地同意坎皮斯塔不做候选人，而且不去惩处他的部长违犯法律的行为。

在参议院内，一个省的一位老政治家尖锐地建议总统辞职。5月17日，卡洛斯·佩绍托在另一篇轰动的演说中，辞去了议长职务。后来，鲁伊·巴尔博扎在其争取文官政府运动期间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把一有风吹草动就四处溃散的政客们比作惊散的牛群。“幼稚园”消逝得无影无踪，在其废墟上，“格拉萨山庄”和蛮勇的高卓考迪罗的威望似乎又重新稳固地建立起来。

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在正式同意作候选人之前，还是写信给里奥·布兰科男爵和鲁伊·巴尔博扎，寻求他们的同意。里奥·布兰科没有回复这位元帅的请求，其原因可能是怕卷入这场纠纷，也可能是担心人们要他对一个军方候选人的产生负责，尽管他可能同情这个候选人。鲁伊·巴尔博扎是另一种性格的人。他在一封公开信（他的崇拜者把它说成“坚定如青铜”）中正式反对提名埃尔梅斯，并宣布他自己参加竞选。斗争在继续。共和国在度过将近二十年多事的岁月以后，受到了文

官权威与军方势力之间严重冲突的又一次威胁。

皮涅伊罗·马查多为使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召开了类似美国早期的那种参、众两院议员组织会议，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冲淡埃尔梅斯候选资格的浓厚军方色彩，也可能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为埃尔梅斯的赞助人(虽然，在埃尔梅斯和鲁伊两人间，他可能更倾向后者)。后来，鲁伊在参院的一次讲话中说，皮涅伊罗召集了弗朗西斯科·萨莱斯、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安东尼奥·阿泽雷多和劳罗·穆莱尔这四位政党领袖，让他们在鲁伊与埃尔梅斯之间进行抉择。萨莱斯和穆莱尔投票赞成军人，格利塞里奥和阿泽雷多赞成文官。皮涅伊罗不想做调停人，又暗自希望鲁伊能够获胜，他便与伯南布哥州政党领袖罗莎—席尔瓦商洽，罗莎选择了埃尔梅斯。圣保罗州、巴伊亚州和里约热内卢州的政府赞成鲁伊·巴尔博扎为候选人与埃尔梅斯竞选。这场斗争就此开始了。

在圣保罗州政客的压力下，阿丰索·佩纳决定接受埃尔梅斯辞职，任命了据认为极有利于反动势力的铁腕人物门德斯·德·莫赖斯将军为新的陆军部长。公共舆论对皮涅伊罗·马查多的操 207

纵抱敌视态度，对一个军人作候选人怀有成见，加以受到了强大的报界宣传运动和公开集会的煽动，这种舆论就显得格外激烈了。

前任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拒绝再度参加竞选，鲁伊·巴尔博扎就确定无疑地被接受为候选人。他在"恩西利亚门托"时期所起的作用曾使他自己长时间不得人心，现在，他刚刚抬起头来，并正在取得巨大的深得众望的成功。

此时，佩纳总统又失望，又难过，加上流感的摧残，于1909年6月14日逝世。政客们反驳了医生的诊断，认为其死因是精神创伤。这位年老的米纳斯政治家的逝世，出乎意料地把副总统尼洛·佩桑尼亚拥上政府的最高职位，这是皮涅伊罗·马查多的最后胜利。从此，得到行政机构支持的埃尔梅斯·达·丰塞卡的候选人资格变得越来越稳固了。

208

第十七章

尼洛·佩桑尼亚
(1909—1910年)

尼洛·佩桑尼亚传略——企图调停——繁荣时代——鲁伊·巴尔博扎的处境——反对埃尔梅斯的候选资格——候选人的特点——竞选运动

尼洛·佩桑尼亚在帝国末期以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国的鼓动者而首次闻名于世。他是一个年轻的律师，代表着新的一代巴西人：他们受到一点肤浅的教育，对法律一知半解，赶上点世纪末期不可知论的思潮，却热衷于种种自由主义的华丽辞藻。他擅长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当他进入制宪会议的时候，就成为一伙浪漫演说家中的一员，这些人真诚地相信夸张的语言和动情的呼吁的威力。

虽然如此，佩桑尼亚关心公益的精神和对时机及现实的敏感使他进行煽动的倾向有所收敛。在政治角逐中，他一贯站在金蒂诺·博卡尤瓦一边，平安地度过了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和历次内战的风暴时代。尽管他出身卑贱并具有雅各宾的性格，还是作为帝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农民派系的一员积极参与本州〔里约热内卢州〕竞选的政治活动。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总统与联邦共和党发生冲突的时候，尼洛·佩桑尼亚一直是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的最狂热的崇拜者。比登科尔特元帅被暗杀，使得普鲁登特·德·莫赖斯能够腾出手来对付狂热的弗洛里亚诺分子和雅各宾派时，尼洛·佩桑尼亚就逃之夭夭，幸免被捕。

当金蒂诺·博卡尤瓦任里约热内卢州州长时，尼洛竭力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在博卡尤瓦之后继任州长，并建立了一个在使用公共基金方面厉行节约的政府。他是塔乌巴特协议的拥护者之一，可是他没有履行该协议中那些以黄金支付税收的条款，同样，米纳斯吉拉斯州政府也没有履行那些条款。

他被选为帝国前顾问阿丰索·佩纳的竞选伙

伴，使候选人名单似乎获得某种平衡，而且也是对老牌共和党人的一种酬答。他与皮涅伊罗·马查多的密切关系没有引起佩纳总统及“幼稚园”对他这个作为总统的可能继承人的信心。他以善于耍政治手腕而出名，所以人们对他极不信任。他的州政府反对他，而联邦又支持州政府，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告终，至少将在长时期内暗淡无光。那些通常围着飞黄腾达的政客们团团转以便得到一官半职和一笔交易的人们，象躲避瘟疫一样，纷纷从他身边逃散了。

阿丰索·佩纳之死把尼洛拥上共和国的最高宝座。那些被提名为下届总统的候选人的命运，可能就要看他的手腕、权威和力量了。他能够制止埃尔梅斯的候选资格引起的危机使之不趋恶化吗？这大概是他进入总统府时首先想到的问题。他以迁就一下政客们来控制形势，并在适当时机有效地施展谋略。

尼洛的内阁反映出一种类似的调和倾向。全国一致认为不可更换的里奥·布兰科继续任外交部长。内政和司法部长职务交给了伯南布哥州政治家埃斯梅拉尔迪诺·班德拉。他曾经反对尼洛·

佩桑尼亚竞选副总统。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执政时任财政部长的莱奥波尔多·德·布良斯又官复原职。亚历山德里诺·德·阿伦卡尔海军上将负责海军。在国会内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科·萨被任命为运输和公共工程部长。在阿丰索·佩纳时期创立的并且即将行使其职能的新的农业部由执政党的一位圣保罗人主持。后来，尼洛用另一个圣保罗人、埃尔梅斯候选资格的狂热支持者替换了他（自然是迫于压力）。

尼洛急于稳定他任职共和国总统的短暂而动荡的时期，所以，他没有忽略行政事务。运输部继续执行在阿丰索·佩纳时期就开始的铺设铁路的计划。陆军部和海军部也同样活跃。在财政部，既210然莱奥波尔多·德·布良斯是塔乌巴特协议的签字者之一，他就在摧毁达维·坎皮斯塔财政政策的基础，尽管这个政策已得到尼洛本人的批准。

欧洲黄金的源源流入使兑换基金的钱箱达到了爆裂点，大大超过了法定的储存限额。作为一个自由派经济学家，布良斯部长忠于自己的信念，而无意维持外汇管理措施，他把储备限额提至6,000万镑并建立了16辨士的新的兑换率。可以说，他确

信，一旦国内或国外外汇市场出现危机的迹象，基金就将枯竭。他还较坎波斯·萨莱斯协定规定的期限提前一年开始清偿基金贷款。尼洛·佩桑尼亚在将政府移交继任者时，他可以把巨额的国库盈余当作他执政的一项成就，为此，他还接到了罗思柴尔德财团的表扬电报，一张颇为珍贵的奖状。

按照主要物资的价格指数，繁荣在继续着。咖啡价格仍然很高，它继续从最初的高价补贴计划得到好处。以黄金支付的橡胶价格为每吨640镑，出口总量达到38,000吨。这已是最高额了，因为，在第二年，远东的英国种植园便开始大批向外运销。巴西的出口总额平均为每年6,000万磅，这使巴西出现了巨额贸易顺差。

巴西各地市场开始销售本国生产的食品和本国制作的工业品，对国内贸易的信心也更大了。国库的不兑换纸币达到60多万千度，相当于兑换基金的由黄金支持的发行量的两倍。为了赎回铁路和港口的债券而连续借入的英镑或金法朗的贷款增加了联邦的外债。各州和各自治市仿效联邦政府的做法，把它们最好的收入来源抵押给欧洲银行家；其中很多承担的义务，远远超出了他们最乐

观的能力，因而难以履行。

欧洲货币的稳定流入和国内消费量的逐渐增长，刺激了无数小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主要为本地区服务，同时也有助于稳定汇率。里约热内卢在不断变化，由加拿大公司供应的公共事业使里约热内卢已经相当广阔的市区有了新的扩展。在城市南部，一个面对大西洋的新区〔科帕卡巴纳〕迅速出现了，这使里约热内卢人充满了市民的自豪感。巴西人对自己怀有更大的信心，受到更大的鼓舞，变得更加坚定，而不那么悲观了。

211 尼洛拚命讨好每一个人，为自己树立威信和名气，他从不放过任何出头露面的机会。但是，反对派认为他的政治背景和手法是可疑的，这种背景和手法的缺陷抵销了他的善良愿望。间接的方法再也不能制止埃尔梅斯参加竞选。这一由热情的年轻军官所发动的竞选已成为有关集团尊严的问题而强加于皮涅伊罗·马查多领导的政客们身上。好也罢，坏也罢，尼洛·佩桑尼亚的命运和埃尔梅斯的联结在一起了，而他的国家元首的权威又被皮涅伊罗的权威所僭越。由鲁伊·巴尔博扎的激昂演说所发起的并为圣保罗州执政党——

民众代表党所精心策划的文官运动，不仅激烈地反对执政的总统，而且也激烈地反对军人竞选总统。

与其说政客们还尊重鲁伊·巴尔博扎，不如说他们敬畏他。而他却对舆论毫不在意，有时甚至采取蔑视的态度。对于他在临时政府时期处理财政问题的不满，尽管常常是不公正的，但从未被人忘记。这种不满也给他的政治家的才干投下了一层颇不信任的阴影。在弗洛里亚诺执政期间，当他为被控告的政客们进行辩护时，他的果敢的立场激起了人们对他的衷心敬慕。后来，这一狂热的派系斗争结束后，鲁伊·巴尔博扎经过考虑加入了参议院内皮涅伊罗·马查多控制的一派。在许多场合，他所维护的见解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反感，或者至少反对派报纸所煽起来的舆论是如此，这些报纸指控他是那位大考迪罗的一个俯首帖耳的幕客。他在海牙和平会议上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深深地触动了巴西人的虚荣心。

全国都为鲁伊而感到骄傲，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但是政界名流对他的政治头脑和行政才能并不真抱有充分的信心。事实上，当时出现

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奇才和博学是领袖的消极品德。在处理公务方面，平庸的头脑，一般的学问和普通常识是更合乎理想的。为无能辩护的一句老话，就是称颂“无需准备”〔即，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就如同在帝国时期那些训练有素的官员一样，都身居政府要职〕。象鲁伊·巴尔博扎那样的人在国会内和在国际会议上进行演说辩论是很好的。可是药物只能外用。

大约与此同时，几个年轻的巴西知识分子开始批判他的学问的性质，说他缺乏对于世界与生活、对人们的心理和国家的政治现实的洞察力，他过分热衷于雄辩术和演说的激情。他的头脑中塞212满了十九世纪自由派的文化，据他们说，他不想扩展他所学的范围。他的才情焕发的言谈差不多总是出于他繁忙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和华丽的辞藻，似将成为明日黄花，犹如日渐消逝的往昔的影子一般。

尽管如此，反对埃尔梅斯候选资格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致又很快地使鲁伊·巴尔博扎重新得到了老百姓甚至巴西名流的同情。他在全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受到普遍的欢迎。报界开展的强

大运动与他在参院和广场的演说相呼应，这便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甚至出现了某种奇特带有迷信色彩的现象：没有文化的群众向一位博学而缺乏魅力的演说家疯狂地喝采，这个演说者，使用他们肯定听不懂的极优雅的语言，长篇大论地对着他们讲个没完。不过，他缺乏个人魅力的缺点大半被他的攻击和反攻击的勇气，被他的异常有力的讥讽所弥补了。这种讥讽常常流露出由于他个人经历遭受的不平和蔑视而感到的辛酸。

基于这些原因，鲁伊的文官运动的调子显然是杂文式的。他势必挠头于为党提出什么样的诺言，可又实在提不出什么新的方案，再也提不出象他担任临时政府成员时所提出的那种改组司法和革新经济的主张了。他往往是宁可指责别人的错误(他答应自己不犯这些错误)，而不讨论新的问题。当时人们普遍相信，整个国家的种种弊端，都是由于没有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地执行宪法和各种现行法律。共和制民主一旦摆脱政党的左右，并随意地挑选其代表时，它的使命就能完成。

虽然鲁伊是和圣保罗州最有势力的政治派别相联系的，但他的经济和财政的基点却是属于联

邦内最富足的州的利益的。因而，它具有干涉主义和保护主义性质，这在许多方面与鲁伊本人长期怀有的想法相吻合。他不太关心当今的所谓社会问题；当时一些眼光最敏锐的人物也是如此，所有这些人物似乎不了解在人数稀少的城市阶层及其依附的官僚和选民的背后，孳生着一个庞大的悲惨的巴西——它被政府丢在脑后，赤贫如洗，没有文化并受着疾病的折磨。从欧洲民主的词汇里拣来的冠冕堂皇的话就会根治巴西的一切弊病了。213 鲁伊·巴尔博扎也避而不谈外交政策，因为，当时外交政策由里奥·布兰科掌握，举国上下一致认为他这个人是万无一失的。因而，使全国如此沸腾的运动并没有超越纯粹的党派纠纷。

埃尔梅斯·达·丰塞卡的候选资格不仅象征着军方干预政治，而且象征着共和国寡头政治的讨厌的统治和对公民自由的威胁，也就是卡洛斯·佩绍托曾经警告过的那种又笨拙又庸俗的狭隘的拉美独裁主义。另一方面，鲁伊·巴尔博扎的候选资格却象征着维护知识、文化和自由的传统。如果这样来看，而这也是正确的看法，我们将不难预见，“文官主义”在全国较富有教养和独立的集团

中会是取得多么大的胜利了。今天，四十年以后，可以更为客观地评论巴尔博扎的运动了：它代表了对于陈旧的弊端、恶习和谬误的潜在的反抗，其中很多是帝国崩溃后存留下来的。巴西人既然有了更多的集体的自觉，便开始对曾经与巴西经济极相适应的宗法制度感到厌烦，这种体制为了补偿民主的虚伪性，也曾在巴西建立过组织良好的司法体制，并让道德高尚、具有知识才能的人去担任最高的代表职务。可以说，在1909年，鲁伊为自由选举艰苦地帮着开辟了一条道路，一条还是充满障碍与危险的道路。同时，他也找到了最有利地发挥自己才能的舞台。他乘着招摇过市的竞选车周游全国，获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极象美国盛大的总统竞选运动。对他演说才能的赞颂之声响彻四方；他不知疲劳，一讲就是几小时，那雄辩之才毫无减色，紧扣每个人的心弦，他那富丽的文采达到了高峰。他在首都和各大城市所受到的接待常常变成英雄崇拜，不少次竟在街头上引起骚动与混乱，酷似古罗马时期欢庆凯旋时那种令人可笑的收场。

埃尔梅斯元帅的党羽要现实得多。他们指望

军方和各州操纵选举的政治机器的支持，以对付巴尔博扎的争取群众的运动。双方的竞选经费大都由公共基金支付。联邦政府的慷慨捐助与圣保罗州政府的捐助不相上下。新创设的农业部成了巴西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活动经费的补贴者。皮涅伊罗·马查多就象在司令部里的一位最高指挥官，从他那"格拉萨山庄"的官邸指挥他的候选人的竞选活动。214 他面对吵吵嚷嚷反对他的街头示威毫无惧色，他作了战略上的调遣，压住了参议院的阵脚。

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文塞斯劳·布拉斯被提名为官方的副总统候选人。圣保罗州州长阿尔布克尔克·林斯被反对派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样，这两个最强大的州，在出于同样的经济利益而结成密切的政治联盟之后，似将分道扬镳；然而，两个州的领导人相信，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对他们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一旦竞选的风暴过去以后，圣保罗人与米纳斯人又将走到一起，因为，在他们所经营的咖啡和新兴工业方面，其政治经济利益是一致的。

在毫无节制的派性气氛中，尼洛·佩桑尼亚尽

可能地抱容忍态度。文官主义者随意举行往往是蛊惑人心的会议和街头游行。国会和反对派报纸对他进行无情的诽谤。埃尔梅斯和皮涅伊罗·马查多的党羽把尼洛的宽容攻击为懦弱，因为他曾拒绝在亚马孙州就一个纯属党派的问题进行非法干预。

1910年3月1日，全国举行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共和国开创以来第一次选民们满腔热忱地走向投票处。在联邦区，政府阻挠了许多城镇地区的选举，但即使在这些地方，鲁伊·巴尔博扎也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情况就和南方其他一切享有更多言论自由的大城市一样。但是，各州特别是在米纳斯州和北方，地方政府的政治机器非常强大，致使官方的候选人得以通过。

执行选举委员会职能的联邦国会，自然承认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和文塞斯劳·布拉斯。不久，他们在附近大兵营传来的阵阵鼙鼓声中的一次喧嚣的会议上被宣布为1910年至1914年的总统和副总统。国会由老牌共和党人金蒂诺·博卡尤瓦主持；担任皮涅伊罗·马查多的助手的弗朗西斯科·格利塞里奥把大多数议员稳住

了。金蒂诺作为埃尔梅斯元帅竞选运动的领导人，或许是在将功赎罪吧，因为他在数年前曾唆使人们反对提名德奥多罗元帅。

在一个长期习惯于选举舞弊和国会独断选举215结果的国家里，正式公布当选人，既不能平息反对派，也无助于获胜的候选人制定一个听取建设性批评的方案。在佩桑尼亚总统的任期即将终结的日子里，群众骚动以及国会内和报界的文官主义的辱骂无休无止。因此，埃尔梅斯·达·丰塞卡的总统任期是在一种普遍忧虑的气氛中开始的。皮涅伊罗再次试图把和他站在一起支持埃尔梅斯的几股政治势力合并为一个大党——共和保守党。这一次，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

第十八章

216

埃尔梅斯·达·丰塞卡
(1910—1914年)

埃尔梅斯内阁——海军哗变——推翻州政府——寡头集团——伯南布哥州和巴伊亚州的"挽救"——塞阿腊和西塞罗神父——最后的"挽救"——反对皮涅伊罗·马查多的势力——若奥·马里亚和康特斯塔多——皮涅伊罗受挫——提名文塞斯劳·布拉斯——财政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虽然新总统得到军界的坚定支持，但是，由于他缺乏政治和行政经验，心肠好而优柔寡断，便卷入了政治阴谋之中。他开始管理国家时所组织的内阁具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内务和司法部部长，在当时，是一个政治职位，由里瓦达维亚·科雷亚

担任，他是南里约格朗德州议员，皮涅伊罗·马查多的最狂热的党羽。财政部交给米纳斯州的弗朗西斯科·萨莱斯。运输部委托给J·J·塞亚布拉。埃尔梅斯委派他的一位圣保罗同僚罗德尔福·米兰达主持农业部，这样一来，他便和圣保罗州政府处于敌对地位。里奥·布兰科男爵留任外交部长。丹塔斯·巴雷托将军被任命为陆军部长，马克斯·莱昂海军上将被任命为海军部长。

新政府执政还不到一个星期，海军的最大的战舰"米纳斯吉拉斯"号和"圣保罗"号的水手就哗变了（巴西人对这两艘战舰是多么感到骄傲而又无力供应它们啊！）。这次哗变由一个坚强的水手领导，他首先制服了军官，有些军官已以身殉职。在两艘小型舰只的支援下，战舰开始轰击未设防的首都。整个首都和政客们一片惊恐。政府遭到突然袭击，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勇气去对付叛乱者，就只好让步，同意实行赦免，而国会也在战舰巨炮的威胁下，就赦免问题进行了表决。当时，英国历史学家、前驻美大使詹姆斯·布赖斯正在里约，他目睹了这一不体面的插曲，并对这个国家下了一些苛刻的评语。

217

数日后，在另一艘战舰上和科布拉斯岛〔离城中心不远的海湾之外〕的一座兵营里爆发了新的叛乱，要求废除体罚。叛乱而不受惩处的先例很快就带来了后果。然而，这一次政府的自信心有所增强，或者是较少顾及居民的安全，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轰击小岛并镇压叛乱的舰只。鲁伊·巴尔博扎领导的文官主义反对派曾经在参议院赞成对战舰上的水手实行赦免，但是现在却允许政府实行戒严来消弭新的叛乱了。对于新的叛乱的恐惧，也可能是对于前些日子的宽恕感到不安，导致了残酷的非法的惩罚。与"米纳斯吉拉斯"号和"圣保罗"号上的暴乱分子相比，这批新的暴乱分子并不更加愚蠢和罪恶更大，他们却因罪而被流放到亚马孙流域的边远哨所去了。

鉴于公共秩序已经恢复，政府开始致力于搞垮各州的反对党。里约热内卢州便是首当其冲的目标。继尼洛·佩桑尼亚任州长的阿尔弗雷多·巴克尔，背弃了他从前的首领，试图借助"幼稚园"来肃清尼洛·佩桑尼亚在州内的影响。尼洛·佩桑尼亚被意外地提为共和国总统时，巴克尔见风使舵，向这位新政敌讨好，但又酝酿成立一个双重的

州立法机关，以便后来能够决定他自己的继承人。

埃尔梅斯·达·丰塞卡政府继承了处于鼎盛时期的“里约热内卢省土著居民体制”：两个议会正式认可两个当选的州长。根据1891年宪法的不准确和微妙的条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联邦国会出面干涉。忠于其州长巴克尔的里约热内卢州议会预见到联邦要进行干涉，便从最高法院取得了人身保护令，以使其合法性得到承认，在当时，这种保护令是法庭可以随意用于政治斗争的一种措施。可是，司法部长却找了一个借口去调动联邦军队“保护”联邦办公处、州长府以及在尼泰罗伊的州议会，于是得到联邦政府支持的候选人没有遇到更多的麻烦就接任了州长职务。

国会中的大多数人和倾向政府的报界认为这218一政变是正当的，理由是参议院已草拟了承认尼洛·佩桑尼亚所建立的双重议会的法律。尽管政府对各州党派斗争的第一次干涉符合了在埃尔梅斯政府中争夺霸权的两大集团的利益，但是，它却拉开了今后更加粗暴干涉的序幕，这些干涉将波及到皮涅伊罗·马查多的许多忠实的追随者。

埃尔梅斯元帅的家庭成员，特别是他那些当

军官的年轻儿子们，试图抑制皮涅伊罗·马查多及其新党的影响，使之不至左右政府的方向。为此目的，他们与那些反对各州政府的军事和政治集团联合起来。巴伊亚州的塞亚布拉和一直避免参与党派活动的伯南布哥州土著人丹塔斯·巴雷托便是反对皮涅伊罗·马查多势力的两个最强大的支持者。被巴伊亚州选为议员的总统的长子，是这个集团的领袖。后来，埃尔梅斯的弟兄丰塞卡·埃尔梅斯（当过共和国制宪会议的代表），被任命为参议院多数派领袖。皮涅伊罗·马查多依靠了南里约格朗德州及其老州长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的无限的支持，而且确信统治各州并构成参议院极大多数的老政党首脑们是团结一致的，他便进行妥协并且巧妙地施展谋略。他把共和保守党的名义领导权交给金蒂诺·博卡尤瓦，并且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削弱自己的任何冲突。

共和国建立之后，从前各省的政治活动自然而然地陷入无政府状态。由于老牌的君主主义政客们已经靠边站，在各州的政治生活中便潜入了这样两批人，一批是共和制的鼓吹者，他们多半是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人，一批是没有政治倾向的

独立分子，他们自认为在大混乱中适于掌管政务。弗洛里亚诺曾让自己信得过的军人取代那些欢庆11月3日政变的州长，但是，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当政时，由于这些缺乏经验的弗洛里亚诺派州长们不合各州政党的胃口而没有取得立法机关的委托书，他们便被悄悄地排除于政治舞台之外了。

君主时期的政客们于是又开始重新出现；他们在行政和政治方面具有更丰富的经验，这确保了他们在地方斗争中能够轻易取胜。但南里约格朗德州和圣保罗州除外，在这两个州里，原先的共和党人已经能够建立起强大的政党组织了。这些君主时期的政客们及时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迷恋权势却又担心党羽的背叛，所以，就悄悄地建立了寡头集团，一般是家族寡头集团。这些寡头集团使人回忆起昔日的宗法制度以及他们那些高219大的房屋和奴隶居住的茅舍。这些寡头们在较贫困的地区和以前的蓄奴地区特别多。他们的领袖人物大体上为人平和、稳健、文质彬彬、有条不紊、本人正直、而且基本上是想办点正经事的人。一些脑子快而又灵活的人物，为当官的好处所动，就被

吸收到寡头集团里了。这种寡头集团犹如在第二王朝时期一样，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但是，共和国总统与州长之间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互让制度——这是在坎波斯·萨莱斯的财政计划处于紧急关头时，他本人被迫承认的一种制度——关闭了一切持不同政见的人担任公职的大门，因而使得经济和行政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它还势必要扼杀政客们的主动性，而这些政客几乎都是帝国的习惯于平庸的例行公事的留用人员。党派政治的龌龊游戏和竞选完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长期以来，人们就相信，如果联邦不直接进行干涉，那些在各州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家族集团是决不会自行退出舞台的。在那平静的表面下酝酿着真正的反抗、默默的憎恨和有待实现的雄心。一旦联邦政府改变态度，不予支持，各地的反对势力就将高涨，民众的怒火就将爆发。那些几乎总是处于失业和不幸、生活在落后的北方城市的广大群众，已时刻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

那些希望用武力改变各州政党体系的人们，理解这些心理状态和社会条件。里约热内卢州的

成功榜样指明了道路。在北方大城市中机警得多的民众看来，北方的反对寡头集团的运动是整肃共和体制和捍卫民主建制的纯洁性所必需的。因而，“拯救”或“挽救”一词就用于推翻各州政府的暴力行动上了。

运输部长塞亚布拉，为了夺取其本州巴伊亚的权力，开始周密地进行准备。他曾同意单一州长候选人，但是他明白，只有他本人就任州长，才能在政治上进行统治。他带领着共和国总统到巴伊亚州访问，以炫耀自己的地位。可是，巴伊亚州州长的继承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伯南布哥州的继承问题就开始激化了。这个北方大州的“挽救”似乎是最难实现的，它对舆论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自1894年以来，伯南布哥州的政治控制权就操在共和国前副总统和帝国顾问罗莎—席尔瓦的220手中。他的含蓄的习惯和超然的态度，以及他长期不在伯南布哥州，使他在那里从来是不得人心的，但他的行为端正和忠实，依然使他在联邦政界的上层人物中赢得高度评价。尽管他是皮涅伊罗·马查多的对手，他还是属于最早同意埃尔梅斯候选资格的各州巨头之列。因此，要想搞掉他，不仅需

要有威望的军方人物插手，而且还要有街头示威相呼应。

陆军部长丹塔斯·巴雷托将军同意担任反对派的候选人。他是一位出身贫寒而大胆倔强的极权主义者，早在巴拉圭战争时期，就是一名志愿人员〔年仅15岁〕，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① 丹塔斯·巴雷托将自己的职务交给同样也参与这个计划的另一位将军，而亲自领导伯南布哥州的运动。激烈的巷战在累西腓市爆发了。年轻的代理州长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英勇地抵抗着由陆军部队支持的起义。由于地方军队司令部的叛变，科英布拉失去了防御能力，而交出了政府。于是，丹塔斯·巴雷托被宣布为州长，绕过了联邦国会的法律承认手续。

不久以后，对巴伊亚州政府的征服便开始了。当由各个派别经过协商而提出的候选人放弃竞选时，巴伊亚州未来政府的问题又一次冒头了。支持塞亚布拉部长的集团组成了一个双重立法议会。

---

① 他还是一位编年史家、小说家、剧作家，而且是巴西文学院的成员。——英译者

他们以联邦区法院颁发的人身保护令为护身符，让军区指挥官命令萨尔瓦多湾的两座古老的殖民地时代的炮台轰击城市。公共图书馆和州长官邸遭到了破坏，代理州长被迫辞职。海军部长马克斯·莱昂提出辞职以抗议这种暴力行为，只此而已。一名督办领来了新的人身保护令，在街头骚乱和枪击平息之后，接管了地方政府，几个月后，便移交给正式当选的塞亚布拉。

经过计划的反对皮涅伊罗·马查多的行动开始于塞阿腊举行的选举。地方反对派提名佛朗哥·221 拉贝洛上校为候选人。他曾是德奥多罗企图政变时的州政府的秘书，现在属于丹塔斯·巴雷托集团。皮涅伊罗·马查多的追随者提名贝泽里尔·丰特内莱上校为候选人。在伯南布哥州和巴伊亚州曾经发生的骚乱事件又在福塔雷萨〔塞阿腊州首府〕再一次演出，老州长阿西奥利被拉下了台。选举结束时，双方都宣称自己获胜。从里约热内卢派来调停双方争执的托马斯·卡瓦尔坎蒂上校在一次炸弹爆炸中受了伤。州议员中的少数派接管了立法议会，并宣布佛朗哥·拉贝洛上校为州长。皮涅伊罗·马查多及其朋友们满腹牢骚地认了输，

然而，当皮涅伊罗后来恢复了对埃尔梅斯总统的影响时，他就跟拉贝洛清算起旧账来。

与此同时，州议员中的多数派取得联邦最高法院发给的人身保护令，把他们的开会地点迁到内陆城市茹瓦泽罗。在那里，他们宣布废黜佛朗哥·拉贝洛上校，将州政府交给议院议长弗洛罗·巴托洛梅乌，他是医生和内陆政治活动家，很早以前就是著名的西塞罗神父的代言人。

西塞罗·罗马奥·巴蒂斯塔神父的经历，与卡努杜斯的神秘主义者安东尼奥·康塞利罗的经历颇为雷同。尽管安东尼奥·康塞利罗愚昧无知并近于狂妄，他和卡里里内地的头脑清醒的半文盲的“圣人”西塞罗神父都是同一种原始的狂热和受压抑的苦痛的产物。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在其《腹地》一书中，把他们都看做是由社会的压抑而造成的。

西塞罗神父被解除宗教职务之后，他自称为东北部灼热的内陆的先知。那些生活在茫茫无边的皮奥伊州和巴伊亚州内地的愚昧无知的人们，早已被政府遗忘，只能凭靠自己的本能过活，他们恭顺地听从西塞罗神父的指挥。他就是万能的

教父。惯匪和乡愚也都寻求他的强有力的保护。成千上万的信徒都听从他的指点。茹瓦泽罗与卡努杜斯一样变成了一个大得惊人的城市，内陆人来朝拜的川流不息。为了同时迎合原始宗教心理和野蛮的拜物教，西塞罗神父既举办慈善事业又创造种种“奇迹”。但是，他与幼稚的安东尼奥·康塞利罗不同，他是久怀政治野心的老手。他和塞阿腊的占优势的老政党做成一笔交易，得到该党的同意，他便在这一内陆地区享有了统治权。

弗洛罗·巴托洛梅乌与皮涅伊罗·马查多结成联盟，因此，他可以得心应手地唆使西塞罗神父下令武装暴动，反对佛朗哥·拉贝洛政府，政府方面的回答便是派出警察去袭击茹瓦泽罗。警222察部队在这设防的城下被击败，退到克腊托后又一次被打散了。于是，西塞罗神父的狂热信徒们发动了进攻。佛朗哥·拉贝洛的抵抗为时甚短。为了给过去卡努杜斯的陷落雪耻，这些新的内陆暴徒带着现代卡宾枪、大口径短枪和刀子，拥到城堡的各个大门。他们头戴皮帽，脚穿生皮鞋，洋洋得意地炫耀着他们的巨大的“饰物”——念珠和护符。这是野蛮内陆的中古时代部落与沿海地区

具有现代文明的外表之间的一次精彩的遭遇。联邦政府曾抗住了军方要求救援拉贝洛的压力，但为了避免在城内发生战斗而终于介入了。与地方斗争没有牵连的塞登布里诺·德·卡瓦略上校被任命为联邦在该州的督办。西塞罗神父凯旋而归，回到他的内陆首府茹瓦泽罗，他的威望自然是得以倍增了。皮涅伊罗·马查多也获得威震四方的新胜利。

"挽救"的圣火从亚马孙州蔓延到圣埃斯皮里托州，燃遍了北方各州。那些没有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寡头集团是在最后一分钟采取上策达成协议而销声匿迹了，这至少使他们免遭炮击和街头骚乱。"挽救者"从南打到北，对皮涅伊罗·马查多和共和保守党的追随者或反对者不加区分，一视同仁。皮涅伊罗·马查多惊恐万状，他试图抑制"挽救"运动，以便救援那些最忠实于他的寡头集团——巴拉州的莱莫斯集团，塞阿腊州的阿西奥利集团和阿拉戈斯州的马尔塔集团。双重市议会也在联邦区建立起来，这对于联邦政府取得胜利是有利的。

然而，在圣保罗州，尽管皮涅伊罗·马查多的

地方崇拜者施展一切伎俩，“挽救”过程并没有摧毁文官政府。在巴西其它地方行之有效的那种方法也可能已计划好要用于圣保罗州，但是，圣保罗人预先挫败了这个政变，选举了在道义上的威望无懈可击的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为州长，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埃尔梅斯总统的弟兄、多数派领袖丰塞卡·埃尔梅斯争取到他们一边。

甚至南里约格朗德州也没有被放过，新任陆军部长梅纳·巴雷托将军企图重复丹塔斯·巴雷托在伯南布哥州的成功的做法。皮涅伊罗·马查多察觉到自己辖区内的危险，便迫使埃尔梅斯撤换了这位部长，以一位为他完全信任的军人来接替。

对于这些震撼以前各省的巨大骚乱，最初，举223国上下仅是津津乐道，而后却是一片震惊。“挽救者们”常常采取的离奇古怪的手段使那些较为冷静与无动于衷的人也开始感到过火。“挽救者”还威胁说要再搞一个回合，挑起长期的动乱。里奥·布兰科意识到这些动乱在外交上的影响，便竭力加以制止，但是徒劳无功。尽管他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很多人还是指控他直接帮助了埃尔梅斯在竞选中获胜，因而认为他也要对在埃尔梅斯执

政时所发生的事件负责。党派斗争不仅牵连到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还牵连到司法部门；最高法院开会讨论政治人身保护令的时候，那种鼓噪喧嚣真不亚于国会的各次会议。

政治混乱变得十分严重。那些曾经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以暴力推翻各州政府后自己上了台的“新的救星们”，建立了比过去更为专断的他们自己的地方机器。犹如一切在政治动乱中诞生的政府一样，这些地方机器所关心的，主要是刺激物质上的进步和应付恶性停滞。公众舆论似乎更加觉醒。在1912至1914年期间，从各州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有声有色的人物充满了国会。

“挽救者”很快失去了南方大城市中较有教养阶层的好评。然而，“挽救”既是对皮涅伊罗·马查多霸权的反应，就进而走到反对共和国总统的地步，“挽救者”并未完全失去公众的同情。国会和报界中文官主义者发动的坚持不懈的运动，力图把当代的一切错误和罪行都归咎于这个高卓考迪罗。人们似乎对他比对埃尔梅斯甚至更加仇恨。

因为对这位高卓首领和对自己的家庭承担的义务使埃尔梅斯元帅左右为难，所以他并没有采

取积极的立场。他任凭环境的摆布，而不惜牺牲公共秩序和政府的功业。到头来，家庭影响来得更大些。当总统在他的妻子死去后而再次结婚时，皮涅伊罗·马查多设法让总统的新岳父——一位退伍的海军上将选入参议院。

在联邦政府看来，皮涅伊罗是建立在严密的纪律基础之上的南里约格朗德州共和党的化身；反过来，对他自己的州来说，他是联邦的巨大威望的象征。伯南布哥州的现任州长丹塔斯·巴雷托、巴伊亚州的J·J·塞亚布拉以及大多数北方其它新成立的州政府的领导人公开反对皮涅伊罗。224 于是，在国会拥有许多代表的这两个北方最大的州就成为反对这位高卓首领的主要中心，那时他当候选人来继承埃尔梅斯总统一事已开始越来越明显了。

皮涅伊罗·马查多在参议院的地位既然十分稳固，又确信能够得到南里约格朗德州他的党的坚决支持，他便接受了敌对方面的挑战。那些被排挤出各州政府之外的党派，甚至象伯南布哥州的反对过他的党派又归顺他了。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治理下，圣保罗州平静下来了，一个法国军

事使团在为他精心地出谋划策。再度落入过去那些谨小慎微的机会主义政客手中的米纳斯吉拉斯州，还想采取弗洛里亚诺时期的做法，试图避开这一风暴。共和国副总统、参议院议长文塞斯劳·布拉斯回到了故乡。“幼稚园”已经分崩离析。达维·坎皮斯塔出使欧洲。卡洛斯·佩绍托对这场角逐感到厌倦，也避到欧洲去了。1912年初，里奥·布兰科男爵去世后，由劳罗·穆莱尔接替了他。

第三个卡努杜斯出现了。一位很原始的所谓先觉——安东尼奥·康塞利罗古老家族的一员——修道僧若奥·马里亚在康特斯塔多俨然称王称霸起来，而当时巴拉那州和圣卡塔林纳州都已对这个地方提出了要求。联邦政权已如此无能，致使这两个人口仍然十分稀少的州都争相控制这一地区，好象两个州是由传统的仇恨而分割开来的两个国家一样。地方政党的微不足道的私利，一直使这个危险的争议吵闹不休，法院也不曾设法予以解决。因此，若奥·马里亚的信徒们便得到了一个可供蓬勃发展的合适的地盘。若奥·马里亚象安东尼奥·康塞利罗和西塞罗神父一样，既蔑视政府又蔑视教会。他一声令下，南方的内陆人

趋之若鹜。他们与巴伊亚州和塞阿腊州的农民非常相似，尽管他们在地理上相距甚远。这两种人都是同一种社会状况的表征，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阶段互相敌对地同时并存。

派去镇压这位僧侣的一批州的警察部队被击败，其指挥官若奥·瓜尔贝托上校也阵亡了。公众的反响与对卡努杜斯的反响十分雷同，但是，这次谁都没有怀疑这是要复辟帝政。同样的致命错误又出现了。小规模的军事讨伐队接二连三地出征，但无力镇压那些狂热的信徒。最后，由塞登布里诺·德·卡瓦略上校指挥的一个师六千人，才剿清225在康特斯塔多骚扰达三年之久的亡命之徒。尽管如此，巴拉那州和圣卡塔林纳州之间的边界纠纷，一直拖了许多年才得以和平解决。

自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动乱使埃尔梅斯总统政府感到痛苦不堪。他那些国会和报界里的对手不给他以喘息的机会。他几次被迫发布戒严令，依据宪法的规定，下戒严令只能作为一项应急的措施。他与皮涅伊罗·马查多的关系已使许多同僚军官与他疏远了。埃尔梅斯元帅既然无法摆

脱政治阴谋，他也就和德奥多罗一样必定要尝到失望的辛酸滋味。

皮涅伊罗·马查多是继承埃尔梅斯·达·丰塞卡的最合乎逻辑的候选人。没有一个公职人员享有比他更大的威望。皮涅伊罗作为参议院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握有与总统一样大的权力。他是全国各地政治领袖的魁首，可以对大多数州政府发号施令，并使它们唯命是从。南里约格朗德州毕恭毕敬地拥戴他。埃尔梅斯总统认为他是自己的一位忠实的朋友，是一位历来支持埃尔梅斯政府的人，即使在最严重的危机时期也是如此。然而，政客们，即使是那些忠实于他的政客们，并不想让他当共和国的总统。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对他的感觉与对鲁伊·巴尔博扎的感觉是一样的：与其说他们尊重这位年老的南里约格朗德考迪罗，不如说他们敬畏他。在北方和南方的小州里那些受排挤的政客们是甘愿支持他当候选人的，但是，圣保罗人和米纳斯人却分别公开地和隐蔽地反对他。在北方的一些大州里，如伯南布哥州和巴伊亚州，在“挽救”运动之后，政治控制权被皮涅伊罗的一些死硬的对手所篡夺，这就更加壮大了他的敌

人的力量。

巴西共和国也和其它共和国一样，不趋向于选择皮涅伊罗那样强有力的、有声有色的人物做最高领导人。它有时会选择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那样四平八稳的人，然而，它更趋向于选择那些尽心职守的人和那些通情和乐于作出让步的人。再者，如果皮涅伊罗·马查多确将成为候选人的话，人们就将考虑他那普遍不得人心的情况。这样，早在1913年，当他第一次被人提出作政府的官方候选人的时候，政客们就开始活动来反对和阻止他。

代表皮涅伊罗·马查多所作的第一次试探，是里瓦达维亚·科雷亚部长向里约热内卢州州长进行的，后者是依靠政府的支持才当上州长的。圣保罗集团的领袖辛西纳托·布拉加在得知这一情况时，就开始鼓动反对势力。虽然辛西纳托相信，皮226涅伊罗的候选资格将遭到伯南布哥州、巴伊亚州、里约热内卢州和圣保罗州的拒绝，但是，米纳斯吉拉斯州却尚未表态。这就促使辛西纳托·布拉加和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萨莱斯进行接触，此人是米纳斯州的一位老政治巨头，并且，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埃尔梅斯总统的当然的继承人。萨莱斯

与米纳斯州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他本人是一位山区政客，生来就有一种类似人们了解自己家人那样难以言传的辨识能力。他马上觉察到皮涅伊罗作为候选人的危险性：一位如此强有力的人物可能燃起又一轮冲突。辛西纳托·布拉加把这位米纳斯部长安顿好了以后，便到圣保罗州去发出防备皮涅伊罗的警报。辛西纳托还在奥罗一普雷托城偶然遇见了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布埃诺·布兰当，并与他就建立反对皮涅伊罗的坚定的战线达成了谅解。

为了使挫败皮涅伊罗的活动看上去不那么具有针对性，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州州长不仅同意排除尼洛·佩桑尼亚和丹塔斯·巴雷托这样一些政客，而且也不赞成他们自己的任何党羽做候选人。这样，这两个最大的州在经历了文官运动期间的分裂之后，又联合起来，采取一致的政治行动了。此后，在联邦议院中，由米纳斯州、圣保罗州、里约热内卢州、伯南布哥州和塞阿腊州的议员组成的集团被称为“联合派”，他们共同反对皮涅伊罗·马查多的“保守分子”。巴伊亚州采取独立的立场，坚持要〔他们的宠儿〕鲁伊·巴尔博扎作候选人。

皮涅伊罗预见到了自己当候选人可能出现灾难，便提名前总统坎波斯·萨莱斯；坎波斯·萨莱斯同意做候选人，只是因为这是一个调解办法。

但是，就在那一年，坎波斯·萨莱斯故去，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一种新的做法，就是要鲁伊·巴尔博扎放弃他的文官主义的目标，在这一前提下，他将被提名。这种新做法不仅得到皮涅伊罗·马查多的支持；而且据安东尼奥·阿泽雷多和里瓦达维亚·科雷亚说，还得到埃尔梅斯总统的支持。对于这种要求，鲁伊断然予以拒绝，正如过去以类似条件任命他为奥罗·普雷托内阁的部长时他所持的态度一样。

与此同时，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圣保罗州政府已同意提名文塞斯劳·布拉斯，这是对他当副总统时小心谨慎行事的酬谢。皮涅伊罗·马查多对他也点了头。1913年8月，皮涅伊罗·马查多的“保守分子”同“联合派”聚汇一堂，宣布文塞斯劳·布拉斯与乌尔巴诺·桑多斯为1914至1918年期间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

由于鲁伊·巴尔博扎得到巴伊亚州的正式支持，他便仍与他的竞选伙伴、圣保罗议员阿尔弗雷

多·埃利斯一起坚持进行竞选活动。为了赞助从 227
前的文官主义纲领，一个新的政党——自由党组成了。但是，巴西的注意力已被欧洲的战争乌云所吸引，因此，它没有心情象四年前那样去过问震撼全国的竞选运动了。文塞斯劳·布拉斯从心底就不愿意进行一场象鲁伊·巴尔博扎的辩才所作出的那种样式的斗争。而且各州强大的政治机器也确保了文塞斯劳的胜利。自由党很快地衰败下去，正如共和党人许多次类似的努力一样。鲁伊·巴尔博扎再次感到痛苦和失望，又由于欧战的威胁，他内心充满了忧虑，也就洗手不干了。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执政期间出现的短暂的繁荣时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欧洲的上空升起了第一簇战争的乌云。曾经在拉丁美洲找到出路的欧洲资本开始抽回去了。坎波斯·萨莱斯签订的偿债基金贷款期限满了。

亚马孙原产地的天然橡胶已经开始衰落。作为实验，远东的橡胶种植工作，已于1876年在锡兰用亚马孙的种子开始进行。1905年，在亚洲的英国其他属国里，种植园的经营开始了。只要合理种植，东方的橡胶所提供的收益比亚马孙原始森林

中生长的橡胶的收益能够大好多倍。1911年，东方的出口量相当于巴西的出口量。1913年，东方生产48,000吨，而巴西只生产39,000吨。1914年，即埃尔梅斯元帅任期的最后一年，亚马孙的产量仍保持以前的水平，而东方的产量却上升到10万吨左右。由于橡胶危机，巴西大北方的经不起风雨的大厦倒塌了。在一片充满着冒险、榨取活动、顷刻之间可以发财的国土上，以往那种富裕和豪爽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沮丧与贫穷。①

塔乌巴特协议签订后，政府开始对咖啡市场进行干涉，并获得成功，这就促成了支持咖啡商品的新的政策。为此目的，两笔数额为750万镑和420万镑的新贷款协议分别于1913年和1914年达成。在埃尔梅斯的四年任期中，由国库和兑换基金发行的通货平均为80万到90万千度。国家的自然成长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时高时低，使得日益增大的通货量有可能被吸收，而不会对汇率产生十分严

① 在橡胶的黄金时期花费上百万美元建立起来的歌剧院仍然耸立在距海岸九百哩之外的亚马孙首府——马瑙斯城。它使人追忆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不仅戏班而且女人的精美服装及其它奢侈品曾从欧洲源源流入。——英译者

重的后果。1911年和1912年，出口额超过100万千 228
度，而1913年和1914年的出口额则低于进口额，仅为75万千度。同期，密耳瑞斯的平均汇率从15辨士降到10辨士。联邦岁入仅为60万千度，不足以防止一系列的预算赤字。

面对着收入的减缩，外资的短缺，出口物资在数量和价值上的下降以及连续不断的政治和社会的危机，政府无计可施，不知所措。1913年，政府得到1,100万镑的贷款。次年，当借入更多的贷款的试探失败后，政府就冻结了兑换基金，并停止赎回其证券，国库再次开始印发纸币，以弥补预算赤字和支付工商业的银行贷款。1914年末，国库的不兑换纸币券几乎达到100万千度，而兑换基金证券只有15万千度。尽管如此，这些措施都没能防止联邦财政危机的最后爆发。总统在其任职的最后一年中，又谈妥了一笔新的偿债基金贷款，数额为1,400万镑，三年后付息，分十三年摊还。公众对于这第二次分期摊付的借款甚至比第一次借款还更加漠不关心，但是，它却惹起国会和报界的一片吵吵嚷嚷的反对声。

在当时兼管普通教育的内政和司法部里，里

瓦达维亚·科雷亚部长根据实证论哲学宣布实行普遍的教育改革。中学被授予教导和行政全权，古典文学不再仅仅作为预科课程。在一个数世纪来就习惯于国家管理教育的国度里，里瓦达维亚·科雷亚的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建立起来，这就使学位获得者已经过剩的老问题更加恶化，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十分可怜，而又必然要寻求公职。这样，从一种使教育摆脱官僚的繁文缛节的政策中所可能收到的好处就都被淹没在不适当的环境之中了。

在外交部，劳罗·穆莱尔沿袭里奥·布兰科的传统作法。前总统坎波斯·萨莱斯被任命为驻阿根廷公使，同样，阿根廷也派其前总统胡利奥·罗加驻节巴西。这样，曾使本大陆上两个最大国家之间的关系满布阴影的最后一点误会被驱散了。运输和公共工程部继续建筑铁路和延长电信线229路。埃尔梅斯元帅继续贯彻他在阿丰索·佩纳内阁任陆军部长时就开始执行的计划，他使征兵正规化了，并修建科帕卡巴纳炮台，加强了里约热内卢的防卫能力。在诸如巴伊亚和累西腓这样北方沿海的大城市中，现代港口建设工程终于动工了。

1914年8月，恰恰是埃尔梅斯任期届满的三个月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巴西的经济和社会演变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和其它那些或多或少限于单一制种植和出口经济的美洲国家是一样的。巴西人完全被战争所吸引，对于其四年任期将在战争的乌云中度过的文塞斯劳·布拉斯总统的就职表现得漠不关心。

230

第 十 九 章

文塞斯劳·布拉斯 (1914—1918年)

大战的爆发——皮涅伊罗·马查多的衰落——1915—1917年的立法机构——大战的直接后果——鲁伊·巴尔博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演说——巴西在大战中分担的义务——大战对经济和文学的影响

尽管很多人认为现代武器的破坏力将使得这场战争能够速战速决，但它仍然震撼了整个世界。那些生来就崇拜法国、景慕英国的巴西上层人物，最初感到极大的苦闷，因为当时德国人的胜利似乎是肯定无疑的。后来，战争变成了胶着状态的堑壕战，于是每个人为了寻求安慰，都希望协约国获得最后的胜利，认为这是“正义和自由”的胜利。

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中就任的文塞斯劳·布拉斯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文塞斯劳在一段发展迅速、受人尊敬但并不显赫的经历之后，于45岁就攀登到总统的地位。他为人有耐心，能够顺应潮流，富于灵活性而且宽厚，从不愿意采取强迫手段。他的策略一贯是回避争端，希望时间来解决它。这场急剧蔓延起来的战争对他产生了两种效果：它转移了人民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并且使他有机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皮涅伊罗·马查多在竞选总统失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尽管国会中的大多数仍然服从他，可是人们一向对他的尊敬和恐惧都逐渐地淡薄了。与此同时，卡特台宫正在小心翼翼地加强它在政治上的自主。当总统的内阁①组成的时候，皮涅伊罗·马查多的威望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他 231

① 内阁组成人员有：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卡洛斯·马克西米利亚诺，任内政与司法部长；圣卡塔林纳州的劳罗·穆莱尔任外交部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萨比诺·巴罗佐任财政部长；比里约格朗德州的塔瓦雷斯·德·利拉任运输部长；里约出生的若奥·潘迪亚·卡洛热拉斯任农业部长。——原著者

未能使得他所提出的人在内阁中得到任何职位。由于相信可以得到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圣保罗州以及国会中若干集团和北方的“拯救者”（如一贯敌视皮涅伊罗的丹塔斯·巴雷托将军）的支持，总统便能够采取更为独立的行动。

皮涅伊罗的另一次挫折是在里约热内卢州遭受到的。有两位候选人争逐州长的职位：一个是由奥利维拉·博特略和皮涅伊罗·马查多支持的费利西亚诺·索德雷；另一个是尼洛·佩桑尼亚。有两个双重立法议会被选举出来，而且各自正式宣布自己的候选人为监选者。联邦最高法院，象它在当时经常所做的那样，根据人身保护令，承认由尼洛·佩桑尼亚的支持者所控制的议会为合法的议会。这个争端直到埃尔梅斯总统任期届满时仍未得到解决。文塞斯劳总统命令驻扎在尼泰罗伊〔里约热里卢州的首府〕的联邦部队执行法院的判决，于是尼洛就出任了州长的职位。

文塞斯劳总统的另一个独立自主的实例，发生在1915至1917年立法机构的补选期间。皮涅伊罗·马查多曾迫使国会不承认丹塔斯·巴雷托将军作为新选举出来的参议员的候选资格，却把这

个席位给了反巴雷托派的成员和皮涅伊罗以前的敌人罗莎一席尔瓦。文塞斯劳总统立即改组了内阁，他任命那位未被承认的议员若泽·贝泽拉接替卡洛热拉斯任农业部长；卡洛热拉斯在萨比诺·巴罗佐辞职时调任财政部长。

卡特台宫与“格拉萨山庄”之间的分歧已不再能够掩饰。前文官主义反对派（忘却了在文塞斯劳任副总统时期他们曾经常攻击他）变本加厉地反对皮涅伊罗·马查多，坚决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从公众生活中消除出去。在联邦的众议院中，一位来自伯南布哥州的议员提出一项可笑的议案，这个议案只有一条，就是“把皮涅伊罗·马查多将军消除掉”。

1915年9月8日下午，在里约的外侨饭店的休息室里，一个癫狂症患者（显然是地地道道的弑逆者）从背后猛刺皮涅伊罗。正象他曾经多次预言过的那样，他终于死于叛逆性的袭击。这种犯罪行为，在全国所引起异常激动的情绪很快也就消逝了，在巴西生活中，发生了轰动的事件之后，情况通常都是这样的。

消除了皮涅伊罗的竞争之后，总统就把政治

统治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是，他在行使权力上一向是温和而富于妥协精神的。他对各州之间所签订的协定提供保证。他解决了为争夺马托格罗索州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建议当地的主教唐·阿基诺·科雷亚阁下出任州长。他召集两位州长在一起达成了一项协议，顺利地结束了巴拉那州与圣卡塔林纳州关于康特斯塔多的斗争。由于法律专家和语言学家的争论在国会中已搁置多年的民法法典，也在他的推动下完成了。

232

当大战在欧洲开始的时候，它使得商业界感到惊恐不安，国际贸易中断了，外汇市场也紊乱不堪。进出口贸易额直线下降。文塞劳斯·布拉斯总统从他的前任者那里已经继承了一份烦重不堪的重担，如今又看到自己政府的问题更加严重起来。由于人们普遍预料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政府对于发行更多不兑换的国库券犹豫不决，而宁愿发行短期债券。公共岁入减少了，政府经常费用的开支也感到困难。在一个时期中，用银币和镍币来支付这些费用。政府提高了关税中需用黄金支付的百分比，而且还增加了消费税。

当战争进入相持状态的时候，协约国转而求

助于那些能够供应原料和食品的国家，其中也包括巴西。出口货的价格上涨了，人们竞相争夺那些冒险横渡大西洋船只的货运舱位。一种异乎寻常的大量贸易的前景，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工业诞生了，旧工业也重新组织起来。巴西能够生产的一切原料、食品甚至一些制成品，在欧洲也可以找到直接销售的市场，而且有利可图。与此同时，由于进口制成品的困难，迫使巴西消费者去购买本国制造的商品，即使这些商品的质量是比较低劣的。工农业生产大大地增长起来。

但是，这一切都是有一天过一天、临时应付着进行的，既无计划，而且政府又无统筹安排。银行信贷很难获得，最主要的是当时还发生了运输混乱，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待运的商品，因为缺乏运输工具，在内地火车站上堆积如山，损坏甚多。每个人都认为战争结束时，这些异乎寻常的大量贸易将会终止，因而利用当时的机会，尽一切可能谋取利润。巴西人既急于谋求这种利润，又为他们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不去干预政府了，让它暂时免去持续不断的骚乱。生活费用不断高涨和煽动者挑拨而引起的一些不满情绪，在战争的

可怕的喧嚣声中，几乎没有被人理睬就消逝了。巴西的知识分子不断进行热烈的宣传，支持协约国，特别是支持他们长期宠爱的法国。

233 英国在经济上的霸权，有时使巴西以及其他贫穷的、在政治上被肢解的拉丁美洲国家遭到难以忍受的困难和屈辱。外国银行家的利益，在他们本国的财政政策中，似乎总是得到最优先的考虑。但是巴西人对英国银行家所持的任何保留态度，并没有影响在巴西公共人士的心目中对英国的钦佩。除了在某些军事和科学界之外，德国并没有得到巴西人的同情。人们可以说，巴西的知识分子从未宽恕德国在1870年战败法国，尽管那是令人讨厌的拿破仑三世的法国。

尽管巴西与美国的接触相当少（美国在建国初期几乎是受到崇拜的，后来它在墨西哥、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又引起了愤懑情绪），然而巴西仍然感到她自己的外交政策必须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生活的事实，特别是在一场可能把整个世界都牵连在内的战争期间，使得泛美主义具有新的、更具体的意义。鲁伊·巴尔博扎为一项特殊使命访问阿根

廷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律学院发表演说，批评了长期以来人们所持的中立的主张。这篇富有勇气的演说，使巴西人支持协约国的强烈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了。当美国于1917年对德国宣战的时候，巴西也不能再保持中立。当巴西的船只在大西洋上遭到鱼雷袭击时，她就立即与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看来为人极为温和而又极端渴望在没有冲突和仇恨的情况下进行统治的文塞斯劳总统，为舆论所迫，也把巴西卷进了对外国的战争中，而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对于巴西并没有实际影响。巴西所采取的这个步骤，主要是表明与美国在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巴西继续向欧洲运送她能够提供的一切补给品。在人力方面，她对战争所作的全部贡献，仅仅是派去了少数的军官和医生。由于公开宣战，政府在全国宣布戒严，但是它并没有利用戒严来达到政治目的或对私人进行迫害。人们怀疑外交部长劳罗·穆莱尔是亲德国的，因为他的祖先是德国人，而且他所持的某些态度也使人这样看待他。他的辞职引起了一次小的危机，但是，当尼洛·佩桑尼亚接替了他的职位时，这场危机就轻

而易举地消除了。

这次大战对巴西经济和文学生活方面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在战前，世界的经济制度似乎把各国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提供贷款和输出制成品的超级资本主义化和超级工业化的国 234 家；另一类是提供原料和殖民地产品的农业国家。因此第一类国家并没有兴趣去帮助第二类国家发展工业。自由贸易是十九世纪的经济理想，它曾经为大英帝国做出巨大贡献。然而，美国和欧洲大陆逐渐地开始采取了一种保护主义的反措施，这就等于政府干预经济势力的自由活动。这样的思想成长起来：最强大的国家乃是一个最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国家；战争的长期威胁要求最大限度的自给自足。

这种思想倾向也自然地反映到巴西来。由于巴西煤的质量很差，或者由于煤矿与铁矿蕴藏地米纳斯吉拉斯州相距甚远，建立基础工业是很困难的，然而巴西还是能够为自己制造很多东西的。制造工业将使用本国的原料，并且不再依靠外国的市场。但是，不管奥罗·普雷托和鲁伊·巴尔博扎曾经作过各种美梦，开始兴办工业的尝试不久

都失败了，巴西仍然恢复了帝国时期传统的农业政策。咖啡种植和橡胶采割的成功充分地维持了巴西的经济。咖啡生产过剩和橡胶业崩溃所引起的危机清楚地表明，将巴西的经济置于少数几种农业和采割业产品的基础之上，该有多么危险，因为这些产品很容易受到外国市场忽涨忽落的影响。阿丰索·佩纳总统所制定的计划便是与这种新看法相配合的。

1914年的战争证实了，那些依靠别国供应生活必需品的国家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它也证明了，巴西能够随时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工业，或者至少是半工业。在大战期间，经济民族主义高涨起来，并且为巴西人开辟了新的前景。

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愿望，一向是和知识上得到解放的愿望同时出现的。如果有一个制成品的市场，那么也必然有一个精神产品的市场。在二十世纪初期，旧唯物主义的哲学趋于衰落。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伯格森的直观论以及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了最优秀的新的时代精神。但是，人数不多的巴西知识界对于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却毫不活跃。在几乎所有象巴西这样的国家中，更为活跃

的是由民族主义思想所激起的要求文艺复兴的愿望。1914年的大战摧毁了十九世纪的许多幻想，也激起了在所有领域中争取自主的要求，并且使新 235 的一代的巴西知识分子更急于探索同自己的国家有关的一切。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觉醒（某些政客把它描绘成一种仇视外国人的恶兆），成为几年以后开始的一场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文塞斯劳总统的政府，在大战开始时就职，在1918年签订停战协定、波及全世界的西班牙流感袭击巴西的痛苦的日子里宣告结束。世界的大屠杀却使巴西境内得到了和平。巴西人毫不热情地接受了文塞斯劳，如今他们虽说表露出对他的尊敬但也毫不惋惜地与他告别了。尽管他具有乡巴佬式的质朴，他还是给予了巴西人四年的公共秩序与安宁，在此期间，他并未企图压迫他们、剥夺他们的公民自由权利。协约国的最后胜利满足了这个国家上层人物的极其热切的愿望。由大战促成的商业方面的异乎寻常的增长，引起了对国家愈益繁荣的普遍信心。甚至推选前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为文塞斯劳的继任人这件事，都没有遇到不满或困难，而且是深得人心的。

236

第二十章

埃皮塔西奥·佩索阿
(1918—1922年)

战后的巴西——德尔芬·莫雷拉副总统的临时政府——埃皮塔西奥·佩索阿传略——虚假的繁荣——政治上的冲突——革命风云——“共和主义反抗”联盟——伯南布哥行政上的变动——政府的胜利——在科帕卡巴纳发生的叛乱——百周年纪念博览会——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总统创办的大事业

战争期间，巴西的出口额从1914年的2,647万英镑，上升到1919年的7,817.7万英镑，其贸易顺差于1919年达到5,200万英镑，当时的英镑汇率达到18辨士兑换1密耳瑞斯。这种经济上的繁荣，已影响到国内的一般思想倾向。战时兴办的各

种制造工业，正在设法巩固基础，并且发展起来。巴西参加凡尔赛和会一事，使公众感到莫大的自豪。威尔逊总统①苦口婆心的劝告，唤起了巴西上层知识界的希望，他们认为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之下，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次为期四年，使全世界遭到洗劫的战争，也将是发生在文明人中间的最后一次了。

在这种乐观主义的气氛里，国内的政治形势，便大大地失去它的重要性。文塞斯劳总统的后继问题，秩序井然地得到了解决。他干练地操持了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竞选，于是这个人也就第二次当了总统。米纳斯吉拉斯的州长德尔芬·莫雷拉当选为副总统。

然而，这位当选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却未能在1918年11月15日就任，原因是他被困于疾病，先在圣保罗州的瓜拉廷圭塔耽搁，后来又在里约他自己的家里停留，并于1919年1月18日逝世。总统失去工作能力的期间，由副总统德尔芬·莫雷拉秉政。这位米纳斯吉拉斯政客，确实作梦也没

① 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年），美国第28届总统（1913—1921年）。——译者

有想到他会当上总统。他为人谦虚、廉洁、谨慎而不露锋芒，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背景，并且也是一 237 个健康不断遭到损害的重病患者。不过，他的某些缺点，已被他那山地人禀赋中的常识和政治上天生的机敏所弥补。只要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总统活在世上，这位副总统所采取的行动就要十分慎重。他的权力受到了削弱；跟他一起执掌政务的部长们，并不是由他自己挑选的。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一死，德尔芬·莫雷拉便依法承担了总统的全部职责。可是，他尽可能不去干预全国和他本州的政治问题。在行政事务方面，他完全听从他的部长们的意见，特别是运输部长阿弗拉尼奥·德·梅洛·佛朗哥（此人可以说是变成了总统助理）和财政部长、米纳斯吉拉斯银行家若奥·里贝洛的意见。联邦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德·弗隆廷，把佩雷拉·帕索斯改造里约热内卢的工作，又重新拣了起来。

巴西既是交战国之一，便受到邀请，要她派出参加凡尔赛和会的代表。在当时看来，鲁伊·巴尔博扎是领导该代表团的当然人选。这不仅因为他的才智卓绝，而且还因为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

作的那次著名演说为他在协约国方面赢得了不同寻常的声望。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总统一再明确地提到，已经由副总统代表他作了这项关于率领巴西代表团的邀请。但外交部长好象是自己希望得到这份荣誉，他的态度，使得鲁伊对这一邀请的诚意（尽管还不是对阿尔维斯总统本人在这件事情上的诚意）产生了疑问；另外，事前未同他商量，便把代表团的其它成员也都任命了。因为鲁伊·巴尔博扎固辞不就，这才任命了埃皮塔西奥·佩索阿。埃皮塔西奥曾任坎波斯·萨莱斯手下的部长、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帕拉伊巴州选出的参议员，他并且当之无愧地以才智、法律学识及活动能力著称于世。

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逝世，再一次引起了总统的继任问题，而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又往往十分棘手，并且孕育着暴乱。在皮涅伊罗·马查多时代，候选人的资格，大都为他那种非凡的个人威信所左右。不管他获胜或者失败，不管他是否宣布他所选择的对象，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他的权威。皮涅伊罗逝世之后，巴西政界不再有令人心悦诚服的顾问，除非这个人碰巧是当时的总统。病弱疲

愈的德尔芬·莫雷拉副总统，对总统的继任问题并无兴趣，所以就指靠了一群主要是来自圣保罗、238 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的政客，让他们去提出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的继任人。当时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的州长，是两个比较年轻的人'名叫阿尔蒂诺·阿兰特斯和阿图尔·贝纳德斯。前者由于米纳斯和南里约格朗德的反对，不可能被提名。这就间接地暗示着贝纳德斯的中选。其他代表性人物当中，这时候还有鲁伊·巴尔博扎和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后者是南里约格朗德多年连任的州长和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所缔造的强大政党的无可争议的首脑。

尼洛·佩桑尼亚赶忙发起倡议，支持鲁伊·巴尔博扎作候选人，这一活动得到了巴拉州当权的政客们的支持。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以及对总统后继问题态度不大明确的其他一些州的领导人，都同意鲁伊当候选人，至少是保持缄默。但事实的真象却是，没有一个政客真诚地希望鲁伊当总统；他那独立的见识，他那坚强的意志，他那种空谈理论的倾向，他那不肯妥协的立场，他对于玩弄小权术的轻蔑，以及他对一切党纪

所持的拒绝态度，使得共和国的政治寡头们对他十分畏惧。由于这个原因，当米纳斯吉拉斯的政客劳尔·苏亚雷斯赞成推举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时，人们对鲁伊·巴尔博扎的支持便迅速地消失了。一个小州的代表竟然想当总统，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只因为南里约格朗德反对从圣保罗或者米纳斯吉拉斯提出候选人，因为害怕鲁伊·巴尔博扎成为候选人，这才促使政客们推举了埃皮塔西奥，而且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仅仅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国外执行外交使命的缘故。

鲁伊再一次遭到那帮假装支持他的政客们的背叛之后，他又一次反对起那个统治着全国的小集团了。后来，他同意作为反对派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尽管他已经年过七十，并且确知非失败不可，但还是重新搞起那个文官主义运动，到全国各地去作艰苦的长途旅行，其中包括他的故乡〔巴伊亚〕；也就是这个州的政府，对他的候选资格提出了最初和最激烈的辩护。尽管大量的选票是拥护他的——差不多在所有的大城市里，他都得胜了——但他决定不去争夺选举的结果，而代之以向全国发表了一项声明。

埃皮塔西奥・佩索阿，1865年生于帕拉伊巴。他在古典文学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之后，又在累西腓的法学院获得了优异的成绩，该学院那种不可知论的环境和对于法律的尊崇，给他留下了经久不灭的印象。共和国宣言发表的前夕，他来到里约热内卢。通过他的叔父卢塞纳男爵，他与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开始接触。他被帕拉伊巴第一任共和派州长维南西奥・内瓦任命为秘书长，翌年又被选进制宪议会。后来，他在议会中竟能安然无恙地反对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因而便出了名。1898年，坎波斯・萨莱斯组阁时，出其不意把司法和内政部长的职位主动地给了佩索阿〔根据埃皮塔西奥的自述，他总是出乎他意料地被授予了包括总统职务在内的各种最高职位。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自述，题名为《讲老实话》(Pela Verdade)，是一部关于巴西这一奇特联邦的共和政治的饶有兴味的文献〕。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工作辛勤而精力旺盛的部长。因为在一项嗣后将以埃皮塔西奥命名的教育改革法案上，与坎波斯・萨莱斯意见不合，他便离开了内阁；不久，又被坎波斯・萨莱斯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继而是共和国的首

239

席检察官；在这两个职位上，他都以素有的才华和胆识，履行了他的职责。由于健康原因而辞职之后，他又重新进入他本州的政界，并被选入联邦参议院。他还在国内和国外，执行过一些有关专门技术的使命。他的为人始终保持严肃，重礼仪，讲风雅，善修饰，爱交际，十分注意自已在公共和在私人场合上的姿态。

当他被选拔率领巴西代表团去参加和会之后，他奋力于酬答政府与同胞们对他的信任。凡是能够采取行动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出色。当时对巴西最有重大意义的是两大问题，即：战时被德国冻结的若干资金的现状；以及一些德国战舰已被巴西使用的问题。

1914年，圣保罗有1,835,361袋咖啡存在汉堡、不来梅、的里雅斯特和安特卫普① 的货栈，作为两笔欧洲银行贷款的抵押品。大战开始时，因为担心它们被德国政府没收，圣保罗州政府便下令将咖啡出售，并将货款收入（12,500万战前马克）

① 汉堡和不来梅，均系德国的商港，的里雅斯特港在意大利东北部，安特卫普港在比利时北部。——译者

存进一家德国银行。后来，德国扣留了这笔款项，答应在战后偿还。巴西要求按照原来的汇率，偿还全部金额，外加利息；然而凡尔赛和会的财政委员会，只同意按现行汇率（马克的币值为1914年的10%），将德国的债务列入和约。巴西的立场，由于埃皮塔西奥·佩索阿的努力，在威尔逊总统的支持下，最后获得了胜利。

但是，关于德国船只的问题却比较困难了。巴西在1917年1月，就已经扣押了停在其港内的德国船只，不过因为她极其尊重私有财产，所以没有象其他的国家那样加以没收，甚至在她对德宣战以后，也是如此。现在，巴西想买下这些船只，让它们抵作适当数量的赔款。英国、法国和美国当时完全控制着和会，而且也都很需要船只，因而反对巴西的要求；只是在威尔逊总统再一次向巴西提供直接支援之后，该项要求方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料这个问题，又被另一件事弄得复杂化了，因为这些船只都和法国订了租约，以致引起了漫长而令人气恼的外交辩论，直到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执政期间，才在有利于巴西的情况下最后解决。 240

在1919年凡尔赛那样的气氛中，无论是巴西、

拉丁美洲的其他交战国或者遭到残酷牺牲的欧洲小国，都不可能长期保留他们的幻想。法、英、美、意、日等五个胜利大国的委员会，乃是战败国、欧洲以至世界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在这个委员会里，克莱蒙梭①、劳埃德·乔治②和威尔逊这三个人，使得所有其他的人都黯然无光。别的国家在凡尔赛宫里露面，主要是装装样子。不管是威尔逊总统关于国际联盟的伟大梦想，还是他那赫赫有名的"十四点③"，都无法掩盖会议内部的幻想破灭和意见分歧。美国人对欧洲景况之日益失去幻想，加上孤立主义者的自私态度，使得美国立于国联之外，因而也就注定了国联的失败。但是，巴西却得到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中和她团结一致的另一次表示。埃皮塔西奥·佩索阿当时已当选为巴西总统，并且已经作过意大利和比利时国王的贵宾，现在

---

① 克莱蒙梭（George Eugene Benjamin Clemenceau，1841—1929年），曾任法国总理（1906—1909年，1917—1920年），1919年凡尔赛和会主席。——译者

② 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年），曾任英国首相（1916—1922年）。——译者

③ 指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演说中列举的所谓"公正与持久和平"所必须具备的十四点原则。——译者

又受到邀请，要他在返回巴西之前去访问美国。

刚从美国回到巴西〔1919年7月21日〕，他便采取措施，表明他不受狭隘的党派政治的约束。在组阁过程中，他一反常例，用人时不是基于政治而是基于实用的考虑。他的部长们是：内政和司法部长——法学家和前期的政客阿尔弗雷多·平托；外交部长圣保罗的法律教授阿泽维多·马克斯；运输部长圣保罗的工程师皮雷斯·多·里奥；奥梅罗·巴蒂斯塔和西蒙斯·洛佩斯，两人都是高卓政客，他们分别担任财政和农业部长；卡洛热拉斯和劳尔·苏亚雷斯，这两个米纳斯吉拉斯政客，分掌陆军部和海军部。

为了把军事部长的职位授予两位文官，埃皮塔西奥·佩索阿不仅顶住了某些军人集团，特别是海军的粗暴的压力，甚至也顶住了他们的威胁。在德尔芬·莫雷拉手下做过海军部长的那位海军上将，拜会了佩索阿，劝他改变计划。这位当选总统回答说，文职官员，第二天就将被任命为军事部长，而海军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担负扰乱宪法秩序的责任。巴西人民真诚地为这届新政府拍手叫好。总统的职位，第一次被一位著名的文职政客所 241

占据，他不仅有在议会和司法部工作的经验，而且也有在最高法院工作的经验，同时，因为他来自一个北方的小州，他不受议会里的某个大集团或者巨大的工农业既得利益的约束。

尽管国库空虚，商业的一般情势却是乐观的；但埃皮塔西奥总统并没有被这些表面现象所欺骗。一年以前，他在为当选总统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举行的宴会上，就曾经在一次发言中，详细讨论了巴西的政治和行政问题。他在向议会提出的一份咨文中，批评了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以及过分依靠信贷和纸币而不顾及将来的作法。国家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国外销路飘忽不定的增加之上。这次战争最惨重的后果一旦得到清除，欧洲就将努力重建它的工业，恢复对外贸易。因此必须要有一项审慎稳妥而节约的政策。这种想法，对于那些强大的政治集团和赞成关税壁垒的制造工业来说，显然是很不中听的。总统所采取的其它主张，在议会和新闻界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对。这个国家的总统，过去从来也没有否决过这么多的议案，其中包括否决一项增加军费的议案，以及否决一项预算拨款法案，后者在共和国历史当中还是第一次。

总统关于战争引起的繁荣并不可靠这一合乎逻辑的估计，不久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出口锐减，在1920年甚至低于进口。外汇行情不利所反映出来的经济不稳，使工业家、咖啡种植园主和商人都一致感到惊慌。圣保罗热切地希望联邦发给更多的咖啡津贴。埃皮塔西奥总统无法长期地抵制咖啡业的强大压力，因为它毕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所在。咖啡价格的不断跌落，伴之以外汇率的下降，几乎造成了经济恐慌。联邦政府决定借款900万镑，用以买进若干剩余咖啡，在巴西许多港口的货栈中贮存起来。这个办法成功地防止了价格的进一步跌落。以后，为使问题圆满地解决，国 242 库在巴西银行贴现了一张票据，取得400万英镑。另外两笔大宗外债，使得埃皮塔西奥的财政政策继续发生变化，专为东北地区抗御连年干旱的公共工程，借款5,000万美元；又借入另一笔2,500万美元，用于巴西中央铁路的电气化和其它铁路的改进工作。财政部长奥梅罗·巴蒂斯塔因为受到德国新银行理论的影响，在巴西银行内设立了一个再贴现部，以贸易承兑期票为基础，发行国库券。

这期间，在议会和新闻界，反对佩索阿政府的

势头不断升高。政府的政治活动以及经济和财政措施，都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不久之前还是那样被人们大加赞扬的总统，受到了最严苛的非难。禀性好斗、喜爱斗争和冒险的埃皮塔西奥，对这些攻击进行了答辩。这就造成了一种有助于革命变革的论战和对抗气氛。政府职责的正常行使遇到了障碍，就象文官主义者反对埃尔梅斯·达·丰塞卡时的情况一样。

巴伊亚的一次选举，促成了更大的骚乱。两个候选人都要求承认自己是胜利者，其中J·J·塞亚布拉是地方政府支持的，另一政客是由鲁伊·巴尔博扎支持。内地的某些酋长宣布说，塞亚布拉的胜利是诈骗得来的，他们发起了一次武装行动，扬言要向州首府进军，以阻止他接任州长职务。在驻巴伊亚的联邦部队司令官和平解决遭到失败之后，埃皮塔西奥总统答应了巴伊亚州长的请求，同意由联邦出面干涉，但在他尚未提出第三个候选人来设法解决这个争端之前，他一直没有采取行动。总统为了支持塞亚布拉而在巴伊亚进行的干涉（根据有争议的宪法第六条，他自己认为是正当的），对反对派来说，不啻是火上浇油。

在1921年最初的月份里，也就是在埃皮塔西奥总统的任期还有将近两年的时候，政客们——按照他们的老习惯——就开始选择他的继任人了。当时任米纳斯吉拉斯州长的阿图尔·贝纳德斯，一被提名，立即得到大家的赞成；只有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除外，他认为一个候选人，必须在提名之前，先公开发表其本人的政纲。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深知总统不应该干预自己的后继人选，所以尽管贝纳德斯的提名是在他任职的中期进行的，他也照样同意了。作为答谢，米纳斯吉拉 243 斯和圣保罗的政客们主动提出，让他来指定贝纳德斯的竞选伙伴，总统婉言谢绝了。不过，他倒确实强调过，应该从北方的一个州里提出一个人来。不久，巴伊亚州州长J·J·塞亚布拉和伯南布哥州州长若泽·贝泽拉，都宣布他们要做副总统候选人。他们在这两个州里分别拥有的支持者，随即发生了争论，虽然这些人一致拥护贝纳德斯当总统，但是这场争论，却眼看着就要推翻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两派之间的工作协议。为了不让这个裂痕扩大，埃皮塔西奥总统向这两个北方州长直接发出了呼吁。但是，当他的努力证明毫无用处的

时候，他便提出了第三个候选人——马腊尼昂州的参议员乌尔巴诺·桑多斯，这个人在文塞斯劳·布拉斯执政期间曾任副总统。

然而，政治上的和平已经破灭。这帮意见不同的政客，包括两个遭到挫败的副总统候选人在内，这时组成了一个名为“共和主义反抗”的联盟，并且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即：曾经支持贝纳德斯的尼洛·佩桑尼亚为总统候选人，J·J·塞亚布拉为副总统候选人。这一小群通过控制大州来统治巴西的人物，又再一次发生了分裂，但其原因并不在于思想或政纲的不同，而在于大大小小的虚荣、委屈和打算叫他们的政治机器继续掌权的欲望。文塞斯劳执政期间，因为战争才勉强压下去的一切革命愿望，已经用不着再加以克制了。党派运动，为机敏的煽动家所利用，以至于连军队也给搅得人心惶惶。一切事情表明，在普鲁登特·德·莫赖斯的统治下开始、而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统治下臻于鼎盛的国内和平，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政府的终结，标志着一个革命运动的开始，它在1930年那次胜利的运动和1937年的权力主义国家中，将要达

到高潮。不管表面上有什么差别，产生这次大变动的根源，乃是1909年的文官主义反抗活动，当时鲁伊·巴尔博扎起来反抗那个控制着巴西、而且有一个时期他本人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寡头政治执政团，他这个实际例子已经证明，虽然中产阶级一贯不去投票，而群众又漠不关心，但是为了好的或者坏的目的，却都可以直接向他们呼吁求援。经济上更加迅速的发展，从庄园转向城市的迁移活动，以及战争后果所造成的纷乱不安，已经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心理状态；而对于这一点，那帮政客，即使是头脑最清楚的政客，不论他们是否分得了政府的职位，当时也都一概没有觉察。今天，我们对于那些在1921年至1930年间震撼着巴西、而且若不是因为战争大概早在1914或者1915年就会开始的颠覆运动，可以毫不费难地找出它们的 244 原因，这些原因就是：积年累月的幻灭，正当的不满，对世界危机的反应，野心，通常的恶意宣传以及对冒险和骚乱的爱好。

虽然遭到了革命风浪的全力打击，埃皮塔西奥总统仍旧果敢如常，他保证将按照自古以来的方式，把他的职位传给正式当选的继任人。关于下

届总统的争论，唤醒了人民，他们对可能影响国家的其它问题都不大关心。反对阿图尔·贝纳德斯的剧烈程度，为历次的运动所不及。他的对手们，在议会和新闻界，对他进行了无情的诽谤。里约的一家大报，发表了一封据说是他写给劳尔·苏亚雷斯的信，其中包含了一些侮辱军队的话。这份文件具有伪造的一切特征，但它却是一个极好的借口，足以激起军方的偏见。贝纳德斯和苏亚雷斯接受了几个朋友的倒霉建议，把这份文件提交到军人俱乐部的一个委员会去作鉴定，因为他们满有把握地认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将全体一致地断定它是伪造的。然而，不出埃皮塔西奥总统所料，这个委员会竟然全体一致宣布它是真实的。斗争愈演愈烈。"共和主义反抗"联盟的候选人四出活动，到处去煽动街头的暴民。

在伯南布哥州，因为州长若泽·贝泽拉逝世而必须进行的一次选举，又给反对埃皮塔西奥·佩索阿的蛊惑性骚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有两个大政治集团在争夺统治权，双方都为这个空缺的州长席位，提出了候选人。一个集团，以参议员受努埃尔·博尔巴和罗莎—席尔瓦为首。另一个

集团，为首的是联邦众议院多数派领袖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和丹塔斯·巴雷托将军，这个集团里，包括有埃皮塔西奥总统的一些亲属。反对派指控说，共和国总统正在设法把伯南布哥的政治统治权交给他自己的家族。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战斗，在累西腓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通常从内地引进的盗匪、街头闹事、开枪射击、打埋伏、发电报以及报纸上怀着成见的文章。反对派指责埃皮塔西奥，说他把陆军部队交给了他亲属所参加的那个集团的一位候选人支配。总统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公开发表了他与伯南布哥军事指挥官的通信。①

已经对贝纳德斯感到恼火的军人俱乐部，吁请伯南布哥的驻军抵制想象中的联邦政府的命令。这份离奇的电报，是军人俱乐部主席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元帅签署的，他和当年任国家元首的时候一样，听凭阴谋家的摆布，天真地认为他或许还能够重返卡特台宫。当陆军部长就这份电

245

① 劳利塔·佩索阿·拉雅·加巴哥利亚在她那部杰出的关于埃皮塔西奥·佩索阿的传记里透露：埃皮塔西奥的家族成员，曾利用他的信任，并盗用他的名义，与驻伯南布哥的联邦军队司令官接触。——原著者

报向他提出质问时，这位元帅确认了是他写的，而当政府下令谴责他的时候，他却拒不接受谴责，于是被逮捕。政府还按照普鲁登特·德·莫赖斯从前采取过的办法，封闭了军人俱乐部。在伯南布哥发生的这场选举之争，经过撤销已有的两名候选人而提名联邦法官塞尔吉奥·洛雷托为第三个候选人之后，不久便解决了。

三月间，按照宪法规定的日期，在全国各地和平地进行了总统的选举。阿图尔·贝纳德斯以大约15万张选票的优势，战胜了尼洛·佩桑尼亚。但是，就和走了样的代议制政府时代所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次选举并没有结束争端。贝纳德斯乘车驶上里约的主要大街时，人们对他发出了嘘声。"共和主义反抗"联盟宣布，它不承认这位政府的候选人获得了胜利。各州爆发了兵变；政府声明说它们是在贯彻一项全面革命的计划。身为军人俱乐部主席、因而自认为是军队发言人的埃尔梅斯元帅，在写给参议院副议长安东尼奥·阿泽雷多的一封信里，建议成立一个"选举审查庭"来确认这次选举的结果，因为按照宪法的要求，议会进行的检证，并没有取得军队的信任。尼洛·佩桑尼

亚、J·J·塞亚布拉和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不如埃尔梅斯元帅那样激烈，则提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由两个集团派出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一个仲裁法庭或者委员会，来调查和通过这次选举，但是不能损害议会嗣后作出的决议。尼洛·佩桑尼亚在一封也是写给阿泽雷多的信件里指出，这同美国与智利先前曾经采取过的办法是相似的。

埃皮塔西奥·佩索阿召集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的一些领袖、参议院副议长以及陆军和海军部长，在总统府开了一次会，即后来闻名的“卡特台会议”。这次会议，原来打算揭示时局的严重性(在他看来是极端严重的)，同时决定如何处置拟议中的仲裁法庭。这项提议被否决了，但总统的态度和他所说的话，嗣后却被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据推测，他曾经建议，让当选总统贝纳德斯退出，而支持一位有很高威望的足以安抚全国的第三个候选人。至于他自己，他可以保证，让他的继任人井然有序地举行就职典礼，可是他不晓得新政府成立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后来，埃皮塔西奥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里，又在一本书里，否认了他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然而，劳尔·苏亚雷斯在写 246

给贝纳德斯报告这次会议情况的信件①中却说，鉴于总统对国家当前危险所作的解释，他曾经询问过总统，既然不可能解散军队，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不是就在于让当选总统退出呢？对此，埃皮塔西奥曾经回答说："完全正确，贝纳德斯的退出可能就是答案。"

这一最新方案，本来就已提得过晚，又被劳尔·苏亚雷斯直截了当地驳回，而归于失败了。于是，议会便承认得到多数票的候选人为两个最高政府职位的获得者。当选的副总统乌尔巴诺·桑多斯未能就职，就逝世了，J·J·塞亚布拉当即向联邦最高法院，请求发给他一份人身保护令，俾使他成为副总统。法院自然是拒绝了这种过分的要求，但是他竟然提出这一点，则至少再一次揭示了当时的形势如何恶劣。众议院中的政府领袖、前伯南布哥州长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被提名，当选为副总统。

1922年7月5日，科帕卡巴纳地区的伊格雷吉

① 1930年10月，与贝纳德斯的复信一同发表在维吉利奥·德·梅洛·佛朗哥的著作中。——原著者

尼亚要塞起义，军事学院也发生哗变，不用说，他们在盼望其他军事单位也照样会这么做。反叛的要塞向城内的战略要点轰了几炮。政府动用了仍旧效忠于它的大部分军队和战舰进行回击。在军事学院和若干兵营发生的这次起义，很容易就被镇压下去了。当要塞遭到轰击时，除了很少一伙年轻的官兵以外，全都投降了。后来受人们称道的“科帕卡巴纳十八勇士”，跑到海滩上进行战斗，其中大部分为了抵抗强大的政府军，就地牺牲了性命。① 埃皮塔西奥取得的戏剧性胜利，实现了他关于维护公安秩序的诺言，履行了他的职责，而且也提高了他的个人威信。不过，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骚动并未中止，对当选总统的憎恨也丝毫没有减轻。

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政府临结束时，举办了一次国际博览会，以纪念巴西脱离葡萄牙宣告独立一百周年。里约的行政长官、卡洛斯·桑巴约工程师，先干掉了市内的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小山②，

① 爱德华多·戈麦斯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后来成为空军高级军官和1945年的总统候选人。——英译者

② 即卡斯特洛山（炮台山），其旧址即现在里约城商业区的中心。——英译者

247 以便沿海湾开辟一块新地，然后在那里建起许多展览馆。这次一百周年纪念博览会，让共和国对它的经济活动进行了一次评定。为了放弃专一从事农业的传统，它已经设法发展了制造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生产和商业的破坏，给巴西以及象她类似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开始利用本国资源的最好的机会。欧洲的大工业国，正在努力从战争的浩劫中复原，它们渴望重新获得巴西的市场。这次一百周年纪念博览会，是向他们敞开的第一个门路。葡萄牙总统安东尼奥·若泽·德·阿尔梅达，对巴西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1920年，比利时国王阿伯特①，也光临过这个国家，他在德国入侵比利时期间所表现的英勇立场，使他成为当代的伟大人物之一)。在国内外给人留下好印象的另一事件，是废除了将皇室逐出巴西的法律，并将佩德罗二世和特雷莎·克里斯蒂娜皇后的遗体，从欧洲迁回巴西。

在埃皮塔西奥·佩索阿主持的巨大事业当

① 阿伯特一世（Albert I，1875—1934年），比利时国王(1909—1934年)。——译者

中，东北地区的抗旱公共工程，要算是最值得注意的一项了。长期以来，周期性的干旱就在东北地区的内地为患成灾；君主与共和时期的中央政府，一向仅限于提供临时救济。共和政府曾打算修筑一些水坝，1909年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以便由中央来统筹这项工作并使之系统化。埃皮塔西奥总统本人就是东北地区的，因而深知这个周期性天灾的为害程度，他着手制定了一项更为广泛的计划。他经议会授权，借款达20万干度，用以修筑堤坝、道路和港口，使干旱地区能够永久居住，并防止当地居民定期外移。由美国的一些公司订了承包合同，而工程也立即开始了。做这件事，和佩索阿政府所有的事业和成就一样，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想要在经济上重建一个广大的地区，可是它所引起的反应却既有热情的赞扬，也有尖刻的批评。跟一家外国公司签订的另一项关于发展钢铁工业与出口铁矿石的合同，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论。①

---

① 这家公司便是伊塔比拉铁矿公司，它是佩西瓦尔·法夸尔的最大梦想。这个美国资本家和企业家，曾在巴西建设了马德拉一马莫雷铁路和其它一些大企业。他的伊塔比拉企业计划，虽然得到佩索阿总统的支持，却遭到贝纳德斯的阻挠，最后在瓦加斯当政期间逐渐消亡。——英译者

1922年11月15日，即宪法所规定的那一天，正248象他在“卡特台会议”上就曾宣誓保证过的那样，埃皮塔西奥·佩索阿将政权移交给阿图尔·贝纳德斯。但是全国，特别是首都的气氛，却普遍地焦灼不安。这位新总统将觉察到，他难以防止新的革命运动的爆发。

对于佩索阿总统在三年半的执政期间里所进行的活动，一时还不可能作出稳妥可靠的评价。从他的气质来看，与其说他是个搞政治和行政的人，还不如说是搞法律和司法的。几乎他所有的政策和重要的行政法案，如果不是遭到了责难，也都遭到了苛刻的批评。他的那些不可调和的敌人，连他的私生活也不肯放过。作为一个从事公务的人，他固然有他的优点和缺点，作为一个行政官，他又有他的成就和败绩，但是可以说，共和国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比他更出色、更有精力或者更有才华的总统。也可以说，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政府是巴西历史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个期间里，部分地由于数年以前皮涅伊罗·马查多的退场，比较大的权力已经开始集中到总统的手里。

第二十一章

阿图尔·贝纳德斯
(1922—1926年)

阿图尔·贝纳德斯传略——财政危机——各州政府的政治危机——行政权力的增大——在圣保罗发生的革命——普列斯特斯纵队——财政政策——文学上的现代主义——贝纳德斯的成就——共和国的分裂

阿图尔·贝纳德斯于1922年11月15日，就任共和国总统。他的副总统是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在埃尔梅斯·达·丰塞卡执政的时候担任伯南布哥州的州长，在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政府时期担任联邦众议院多数派领袖。这位新总统的内阁，是由一些好战的政客组成的。① 无论是贝纳

① 司法部长：若奥·路易斯·阿尔维斯，他的继任人是

德斯的当选，还是国会对他表示的确认，都没有使反对他的人减少。政界和军界都公开策划反对他。

阿图尔·达·席尔瓦·贝纳德斯只有47岁，他在政界升迁得十分迅速。他在作众议员的数届任期内，始终明智谨慎，一点也显不出是他本州大集团里的一员。在米纳斯吉拉斯任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已表现出有作行政官的能力。刚一当上州长，他便制定了一些违反地方党派积习的新政策。和若奥·皮涅伊罗、卡洛斯·佩绍托，以及劳尔·苏亚雷斯一样，贝纳德斯也是他那个保守的山区州里有成就的年轻政客的一个榜样。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总统逝世时，提出来的补缺人中有一个便是贝纳德斯。后来，米纳斯吉拉斯和圣保罗

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阿丰索·小佩纳。财政部长：圣保罗的桑巴纳·维达尔，他的继任人是伯南布哥的阿尼巴尔·弗莱雷。运输部长：塞阿腊的弗朗西斯科·萨。农业部长：巴伊亚的米格尔·卡尔蒙。塞登布里诺·德·卡瓦略将军连任陆军部长。亚历山德里诺·德·阿伦卡尔海军上将连任海军部长，他逝世后由平托·达·卢斯海军上将接任。联邦区的行政长官一职，授给了米纳斯吉拉斯的政客阿劳尔·普拉塔。——原著者

两州的政治领袖们选中他来接替埃皮塔西奥·佩索阿。

贝纳德斯所继承的是个很沉重的负担：政治上的骚乱，革命的威胁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上任[250]后几天，他的财政部长桑巴约·维达尔便对全国的财政状况作了公开的报告，其中谈到令人窒息的债务、预算赤字、出口额下降以及1894年以来最低的汇率。埃皮塔西奥·佩索阿对这位财政部长的严苛批评，进行了答辩；随着出现的外汇市场的活跃，又在国会和报界重新掀起了关于各种外债用途的辩论。但这次为害全国的危机产生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财政管理上的错误，而主要在于欧战所造成的形势；因为，正象佩索阿总统曾经预言过的那样，欧洲一经从战争的惨重后果当中恢复过来，巴西的贸易顺差便彻底转向它的反面了。1920年，她在贸易上的赤字达到17,484,000镑，密耳瑞斯的比价跌到 7 辨士。不兑现的货币数量，从1913年的90万干度，增到 1920年的170 万干度，而巴西主要出口商品按黄金计算的价格，则急遽下跌。贝纳德斯政府初期，党派斗争的加剧，只是使国库更加陷于窘境罢了。

和他的前任一样，贝纳德斯把他的时间和注意力大部分用于设法维护公共秩序。他没有实行温和的政策以缓和新近选举运动中结下的仇恨，没有象他说的那样作到“当了总统要忘却对候选人的侮辱”，而采取了报复的政策，其中包括颁布法令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延长戒严状态以及解散反对过他的各州政治核心组织。通过与巴西银行达成的一项协议，实即扩大佩索阿政府时期所设立的再贴现部，一项新的、增加信贷以维持咖啡价格的政策实现了。

所谓政治案件，在数量和严重性上，均有增无已。贝纳德斯的任期刚一开始，就发生了争夺里约热内卢州长职务的斗争。和往常一样，成立了双重的立法会议，各自拥护一个候选人。尼洛·佩桑尼亚一派，是反对贝纳德斯总统的，他们从联邦最高法院弄到一份具有约束力量的命令，它允许现任州长劳尔·费尔南德斯继续任职。最初，总统有意服从法院的命令，如有必要，还打算动用陆军部队强制执行。但是，尼泰罗伊和州内其他地区不断发生的骚乱和本地警察军纪废弛，已使费尔南德斯被困于他的官邸里面了，因为联邦当局对他的地

位的正式承认还没有及时来到。和过去类似的情况一样，这两个党派之间的争论只能由国会来解决（当时国会正在休会），但戒严令却仍然有效；因而贝纳德斯总统下令由联邦进行干预，并任命了[251]一位督办。费尔南德斯无法抗拒而且他的首府已被军队占领，便只好屈服。国会5月间复会的时候，戒严令仍继续生效，国会承认了总统的命令，批准了督办的行动，解散了州立法会议，同时废除了它所制定的法律。不久之后，贝纳德斯提名的候选人，平安无事地通过了选举并就任了州长的职位。

与此同时，南里约格朗德的州长选举，也正在胜负未决之际。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逝世以来接连担任州长的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正在进行连任的竞选活动。当地一个强大、顽固的反对派（其组成日期可以推溯到共和国的初期），则提名阿西斯·布拉济尔。等到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被宣布为当选者，而调解的企图又归于失败之后，反对派便策动武装暴乱，他们自然也是希望得到贝纳德斯总统支持的，因为他竞选总统时曾经遭到过梅德罗斯的共和党的攻击。

但是，贝纳德斯总统却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

来使党派和好，他先把审计长(前任司法部长)塔瓦雷斯·德·利拉派了下去。利拉失败之后，又代之以陆军部长塞登布里诺·德·卡瓦略将军，他顺利地设法签署了“佩德拉斯阿尔塔斯协议”(这一名称，取自协议的签订地点——阿西斯·布拉济尔的大牧场)。根据这个协议，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将继续担任州长，但是该州的宪法，因为十分明显地受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将要进行修订，连选连任将予以禁止，同时，一向是委任的副州长职务，也将改为选任。

各反对派别在全国合并成一个党，取名为“争取自由同盟”。在圣保罗，提名华盛顿·路易斯接替卡洛斯·德·坎波斯担任州长，引起了新的党派斗争的危机，但不久便被平息了。在巴伊亚和其他州里，贝纳德斯总统尽力帮助他自己的同党伙伴，因而也就是帮助了他自己的组织。在长期、顽强的抵抗中，总统表现得冷静而且有勇有谋，这点即使没有引起人们的热情称颂，却也激起了人们的敬畏之心。国内的其他政治首脑，好象都俯首听命于这位总统的最高统治权了。

当贝纳德斯总统感到有充分把握可以得到国

会大多数和各州政治机构的支持时，他修改了1891年的宪法，这是佩索阿总统所未能做到的。这些修改的部分主要包括：禁止卡乌达·奥尔萨门塔里亚〔cauda orçamentária——直译为预算尾巴〕，这是用伪装的方法在预算法案之后附加的有 252 关特殊利益的条款，多年以来即成为产生巨大弊端的原因；缩小人身保护法的有效范围，因为它已经蜕变成为一种政治手段；授与总统否决立法的若干权利；以及允许将危险的外国人或讨嫌分子，驱逐出境的规章等等。总而言之，修改宪法的目的在于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特别是总统的权力。但是总统的高压政策并没有扑灭、也许反倒刺激了革命的骚乱，隐没在这种骚乱之中的有蛊惑性的煽动，一般的权力欲望，以及要求生活方式更为自由或者至少是不大受帝国的残余势力约束的一些正当愿望。一次文官的或者军人的阴谋刚刚被排除，另一个阴谋又接踵而起。

1924年7月5日，即科帕卡巴纳要塞起义两周年这一天，在伊西多罗·洛佩斯将军领导之下，在圣保罗州爆发了革命；洛佩斯是一位退休的将军，过去曾在南里约格朗德参加过内战。他得到一

帮青年军官的拥护，这帮人从佩索阿时代起，就已经公开图谋造反。驻扎在圣保罗的联邦守备队，大部分都投向这位将军。圣保罗的舆论也拥护他。州长卡洛斯·德·坎波斯丢下了他的官邸，到由里约和其他邻近据点派出的军队保护的市郊去避难。贝纳德斯总统由于有各州政府和国会的全力支持，便在拒绝了关于进行调解的建议之后，进行了猛烈的反击。陆军和海军人员以及来自很多州的警察部队，包围了圣保罗首府，并威胁要对它施行轰击。叛变者从暴动之日起，共经过二十二天之后，因为无力抵抗便秩序井然地从城里撤退，向西方和南方转移。其中有一部分人集结在巴拉那州境内、与巴拉圭隔河相望、由伊瓜苏河与巴拉那河形成的一个三角地带。在那里，由于政府军队不断地施加压力，他们最后交出了自己的丛林据点——卡坦杜瓦。联邦政府又击败了一次组织拙劣的革命，这次革命的目的并不明确，它的突然爆发就好象是一个溃烂已久的脓疮破裂了一样。在亚马孙、巴拉、伯南布哥、塞尔希培和国内其他地区，圣保罗的革命激起了更多的骚乱，这些都由当地政府靠自己或者靠联邦的帮助给镇压下去了。

10月间，南里约格朗德的革命运动，在以前的米西奥内斯地区，突然激烈起来，它采取了过去曾经屡屡蹂躏本州的别动队和游击战争的形式。由 253 青年人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1]率领的一支造反纵队——后来被人们称为“普列斯特斯纵队”——从靠近乌拉圭阿纳与乌拉圭边境的阿累格里出发，向北方挺进，想要和来自圣保罗的伊西多罗·洛佩斯将军的队伍联接起来。这个纵队有一千多人，是由一些被流放的旧军官，以前各次内战和新近起义中的老兵、考迪罗、普通的步兵以及形形色色的冒险者所组成的庞杂队伍。这次不寻常的行军，要北上6,000多哩，进入马腊尼昂〔再向西到边境去〕，他们边走边战，曾同正规军、地方警察部队、南里约格朗德的临时大队、甚至从外国雇佣来的匪徒作战。他们涉水爬山，披荆斩棘穿过丛林，抢劫了所到的乡村，拚死也要保证反叛的火焰继续燃烧；直到最后，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普列斯特斯带着剩下来的800个装备恶劣精疲力竭的战

---

① 普列斯特斯后来成为巴西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并一直持续到现在（1965年）。在他动荡的一生中，很多年是在监狱和流亡中度过的。——英译者

士，在玻利维亚境内找到了庇护所。

1924年11月6日，“圣保罗”号战舰叛变了〔在瓜纳巴拉湾内〕，并声言要炸毁卡特台宫。但是因为意识到他们与海军其他部分的联系被切断，或者是因为不愿意毁掉这座城市，这艘旧舰上的反叛者便改变了主意，冒着要塞和其他舰船上的炮火，驶出了港口。他们后来开到了蒙得维的亚，向乌拉圭当局投降了。

这种经久不息的公开骚乱表明，总统尽管有很多专制权力，但是，在他的政治纲领中却存在着一种先天的缺陷。缺乏真正的全国性政党、没有在统治阶级和广大群众中间进行足够的政治教育，以及国家的经济水平低下，这一切都促使公务生活不断败坏。由于长期的戒严和众多的造反檄文也罢，由于连续不断的革命活动也罢，巴西的共和制度正在显露出崩溃的迹象。

经济状况的逐步改善，在国家的财政中得到了反映。1923年1月，国会审定了政府与巴西银行订立的关于设立发行部的契约，并于同年4月加以批准。这是一项消除货币混乱状态的新尝试。每当准备金达到10万千度时（若黄金可按1密耳瑞斯

值12辨士的比价买进，准备金即随时兑成黄金），银行即着手收回大约190万干度的未兑现的纸币。国库将价值30万干度的1,000万磅黄金储备，移交给银行，对此，银行受权以黄金（按12辨士的比价）占三分之一、贸易认付款占三分之二为基准，发行纸币。当黄金储备等于发行额的60％的时候，银行的钞票可随时按1密耳瑞斯对12辨士的比价，兑换成黄金。财政部长桑巴约·维达尔和银行行长辛西纳托、布拉加这两个圣保罗人，很快就突破了法律所规定的发行限额。政府大概是因为害怕通货膨胀，便挑起一次政治危机并强迫他们辞职。在以伯南布哥的议员阿尼巴尔·弗莱雷取代维达尔时，贝纳德斯总统把银行倡议的比较松动的信贷政策，改变为积极的信贷紧缩政策。汇率和国库状况都有所改进，虽然镇压革命运动增加了大量的开支。 254

在完全控制着联邦政局的情况下，贝纳德斯总统提名圣保罗州长华盛顿·路易斯作为候选人来继任他的总统职务。副总统的继任人选，却比较困难一些。提出来的第一个人，好象是北方的政客、当时任农业部长的米格尔·卡尔蒙。但是，当

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梅洛·维亚纳开始公开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便被选为华盛顿·路易斯的竞选伙伴，而也就安静下来。1923年，鲁伊·巴尔博扎和米纳斯吉拉斯的政治领袖劳尔·苏亚雷斯双双逝世。

在圣保罗，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小组发起了一个新的文学艺术运动。他们当中的主要人物是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他以革新者所惯有的夸张语气，宣布说他藐视陈腐的枯燥无味的形式和欧洲的仿造品。格拉萨·阿拉尼亚这位有很高成就的作家、艺术学会会员参加了这个小组。在圣保罗举办的"现代艺术周"(Semana de Arte Moderna)，也引起了里约的注意，并在新老文学家之间，激起了一次不怀恶意而饶有风趣的斗争。① 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看，圣保罗所传播的"现代主义"与音乐、造型艺术中也正在进行的对新艺术价值的探索分不开的话，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便与民族情感的觉醒分不开了，而这种情感，在巴西也和

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运动中，出现了今天世界闻名的圣保罗两年一度的艺术展览。——英译者

在别处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一。

贝纳德斯总统的政府，在相对的和平之中结束了。由于阿尼巴尔·弗莱雷部长稳妥的财政政策，国库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而且从1914年筹集[255]偿债基金贷款起，已经停付的外债利息，也重新支付了。若奥·路易斯·阿尔维斯和小阿丰索·佩纳这两位司法部长，曾经辛勤地工作，以改造司法和公共教育。运输部长弗朗西斯科·萨和农业部长米格尔·卡尔蒙也一直是很勤奋的。然而，在新闻工作者费利什·帕切科主持下的外交事务是纷乱而鲁莽的。巴西舍弃了国联，而被卷入1924年圣地亚哥泛美会议上发生的许多吵嚷不休的事件之中。

但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却可以从许多的革命活动与反动活动的背后，看到1891年的共和国正在迅速地解体。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痛苦的生活之后，总统制和联邦制已被证明不可能真正地应用于巴西。它们的一切美好概念，都在实践中给败坏了。代议制是一个巨大的骗局，这就和帝国时期已经发生过的情况一模一样；连个全国性的政党都没有，这一点也和帝国期间的情况一模一

样。由政府控制的选举，在一个家长制的政体里，还有可能按照人们的个人价值进行挑选，但是在共和国里，当选举反映了反对派的蛊惑宣传所煽起的民众激情时，它们就变成为危险的事情了。

许多政府，以多种方式掌握大权，而且并不避讳专制，它们为了生存下去，被迫经常求助于宣布戒严，或者与之实质上相同的办法，暂时停止宪法所保证的公民自由。联邦主义已经变成了狭隘的不肯妥协让步的地方主义。每一个大州都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将小州置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州与州之间的同盟，其缔结的情况，一如国际间的政治游戏。它们通过国会里的庞大集团控制着总统，时常迫使他与他们达成协议，或者进行谈判。不同的地区，诸如北方和南方，互相作对。很难进行面向全国的经济建设，因为地区利益高于一切。各州之间用各种不同名目的边界税，相互争抗，公开地藐视宪法。各州有它们自己的武装警察部队，往往和小规模的军队相仿；有的甚至由外国的军事代表团加以训练，圣保罗的情况就是如此。国会里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不是按照政党的路线，而是按照他们所属的州，彼此分帮成伙。

对于任何一个州的代表来说，谈论与另一个州更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甚或是行政问题，都是失礼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完全不通声气，既引起了强烈的对立情绪，也经常发生骚动。想要把持权力或者想要收复权力的政客们，毫不犹豫地把军队拖入激烈的党派争论之中。在当时这种到处动荡不安的状况之下，要建立什么行政管理上的 256 连续性，简直是不可能的。每一任总统和每一任州长，都不得不临时筹划他自己的一套办法，而这些办法差不多常常是和他前任的恰恰相反。一次典型的政策变更，就是贝纳德斯废弃了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抗旱公共工程，而它却曾经构成了佩索阿总统施政纲领的基础。这项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是否有错误；工程废弃之后，一片广阔的地区注定要遭受什么样的苦难；或者国库会受到多大的损失——这一切都不当一回事了。在贝纳德斯任期中，巴西的金融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件事所以来得那样容易，也是缺少行政连续性的另一明显的例证。

人们可以理解，贝纳德斯为维持公共秩序而不断进行的斗争，对于他的行政纲领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他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宽恕那些公开的侮辱，同时，他那强烈的权力主义倾向和僵硬的、激进的民族主义，也没有激起公众的同情。可是，由于强制实行法律，并向国民慢慢地灌输了一种对于暴动和革命感到厌倦的情绪，贝纳德斯总统给他的继任者留下的局面，比他自己当初所继承的要好一些。未来的总统只须消灭引起冲突的最后原因，从而实现那种被梯也尔认为是街头上“有形秩序”不可少的伴随物——“精神秩序”。巴西在表面上已经厌倦了党派争论和连续不断的叛乱，她希望新政府将开创国内和平的局面，使经济恢复工作能够不受干扰地继续进行。

第二十二章

华盛顿·路易斯
(1926—1930年)

华盛顿·路易斯的内阁——修建公路——币值的稳定——咖啡政策——萧条的最初迹象——圣保罗州长儒利奥·普列斯特斯——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安东尼奥·卡洛斯和米纳斯吉拉斯州政府——华盛顿·路易斯继任问题上的斗争——南里约格朗德的重要性——帕拉伊巴州的叛乱——选举和革命——革命的原因

华盛顿·路易斯是里约热内卢州人，年轻时迁往圣保罗州。虽然他以前从未担任过联邦的任何职务，然而在任圣保罗州长时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行政才干，却使他誉满巴西。这位新总统时常

出现在公共场合，和那位严肃、讲究形式、与人疏远的阿图尔·贝纳德斯不同，他看上去身体健康而又精力充沛，漂亮而又踌躇满志，并且因为这些特点，他引起了公众的真正好感。他取消了长期的戒严并且恢复了出版自由，这使得全国都感到宽慰。因为他是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且没有结下宿怨，所以，他如果同意对那些同贝纳德斯作战的叛乱者进行大赦的话，他本来是能够轻易地提高自己的声誉的。然而，他为了党的团结或者为了其他原因，却拒绝这样做，尽管他冒着挑起旧的政治争吵的风险。

他的内阁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又是由众议院中政党的领导人组成的，他们是否能胜任他们所负的各部职责，在选任时并未加以考虑。这样，米纳斯吉拉斯的维亚纳·多·卡斯特洛便接任了司法部长；巴伊亚州的奥塔维奥·曼加贝拉接任了外交部长；南里约格朗德州的热图利奥·瓦加斯接任了财政部长（嗣后由里约热内卢集团的领袖奥利维拉·博特略接替）；圣卡塔林纳州的维托尔·康德尔是交通部长；巴拉州的利拉·卡斯特罗是农业部长。塞泽弗雷多·帕索斯将军被任命

为陆军部长，贝纳德斯总统的海军部长平托·达·卢斯重任了该项职务。有一项非政治性的任命，那 258 就是小安东尼奥·普拉多担任了联邦区长官。

华盛顿·路易斯的两个主要目标是修建公路——由于交通运输日益增加，非常需要公路——和改革财政。由里约到圣保罗以及由里约到皮特罗普利斯的公路立即开始兴建，后者是通往贝洛奥里藏特的第一步。联邦政府树立的榜样鼓舞了各州的政府。阿丰索·佩纳总统的旧口号"统治就是增加人口"，被"统治就是修筑公路"这个新口号所代替。但是最重要的事还是财政改革。

财政学的经典理论和实践认为，货币的稳定永远来自于预算平衡、国际收支平衡、限制信贷以及有条不紊地处理国家债务等等。在巴西这样的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产生了两种关于外汇的学说。主张发行纸币的人把外汇率的波动主要归咎于贸易逆差，他们主张保护关税和加速工业的发展。他们的反对者采取的是某种重农主义或者放任主义的态度，他们相信货币的数量原则，把通货贬值归咎于印发纸币过多和信贷膨胀，并且反对城市计划、工业化和国家的干涉。说明第一项主张

的实例，是临时政府时期鲁伊·巴尔博扎所实行的发行纸币的政策；说明第二项主张的实例，是坎波斯·萨莱斯和穆尔蒂尼奥所实行的严格的通货收缩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严重地扰乱了参战国的经济。一个激烈的金融波动时期出现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例如英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才设法渡过了难关，其主要措施是：大幅度增加赋税，平衡预算以及减少债务。受这个战争悲剧破坏最为严重的欧洲大陆各国，试行了其他解决办法。虽然它们并没有抛弃旧的途径，但是它们却认为取得一种迅速的、部分的稳定是可能的，并能以此为起点恢复财政平衡。法国所遵循的就是这种政策，她的广泛讨论的彭加勒① 试验，华盛顿·路易斯于1926年就职前就曾经亲自进行过观察，其巨大成就十分自然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巴西和法国之间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别，法国有悠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财政机构，其中包括法兰西

① 彭加勒（1860—1934年），于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后任法国内阁总理。——译者

银行，这就要求在巴西采取不同的办法。刺激密耳瑞斯增值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已经在增值。1926年，平均兑换率降至每密耳瑞斯为7辨士左右。然 259 而，即使这样低的兑换率对华盛顿·路易斯来说也似乎是不安全的，他把它压低到5辨士，以减少可能发生的危险。这种作法直接违背了得到普遍承认的稳定政策，该政策力图寻求一种高于当时平均兑换率的比率，正如巴西在1833年和1846年曾经尝试过的贬值计划那样（在那两个年份，平价分别为43.5和27辨士）。坎皮斯塔兑换基金改革法案维持了后项兑换率，虽然黄金券的兑换率被确定为15辨士。这个5辨士兑换率被它的反对者们称为“滥便宜”。

新总统就职不到一个月，便向国会提出了一项货币改革议案，该议案在两周后被通过成为法律。简单地讲，这个改革是由三个连续阶段组成的：基金的稳定——可以兑换——以铸造金克鲁赛罗代替密耳瑞斯。按照新的标准，密耳瑞斯的含金量为200毫克（纯度九成），这几乎恰好是40密耳瑞斯等于1英镑。一个专门机构——稳定基金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和以前的兑换基金委员会一样，被

授权以巴西在伦敦和纽约的黄金信贷为后备，发行纸币。如果稳定基金耗尽的话，就授予巴西银行同样的权利。该银行负责将外汇保持在新的平价，也就是恰好保持在那种应该符合国家金融情况的比率之上。巴西现在和将来所有的黄金都要转交给这个新的稳定基金。为了开始执行这个新计划，政府借了一笔外债来偿还贝纳德斯政府遗留下来的短期债务。这样，巴西在一个时期内一并存在着三种货币：不兑换的国库券，巴西银行的旧钞票，以及稳定基金的黄金证券。

华盛顿·路易斯的计划，只不过是巴西又一次试验。贝纳德斯遵循的德国人所鼓吹的理论——银行发行纸币，由三分之二可兑换的汇票为储备来支持它——被抛弃了，代之以一种法国人所鼓吹的更为激烈的理论，但是它和阿丰索·佩纳的兑换基金是同样地不完善，因为信贷结构并不是由一个能够发行通货并且对票据进行再贴现的中央银行来支持的。人们错误地认为，借外债得来的黄金将当作硬币来支持尚未偿付的靠信用发行的通货(大约为260万干度)。

无论如何，路易斯总统的政策的直接效果是

良好的。公共财政有条不紊，预算也保持着平衡。由于和平环境和很高的咖啡价格，巴西似乎感到 260 很轻松，而且聚集力量准备大踏步地前进。当时，总统对于他的稳定计划的信心，看来并不是过分乐观的。

联邦和圣保罗政府已经统一了它们的咖啡政策。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政府期间，从塔乌巴特协议开始、由政府进行的支持咖啡的第一次紧急干涉，在埃皮塔西奥·佩索阿和阿图尔·贝纳德斯政府期间变成了向外国或者向巴西银行借款来支持咖啡的永久性制度。临近贝纳德斯任期结束的时候，联邦政府取消了它对咖啡的支持，而由圣保罗州完全承担起这个任务。因为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圣保罗州便创建了咖啡协会，以便向外国银行家借款。征收用黄金缴纳的特别税来作为偿付外债的保证。圣保罗银行管理咖啡协会的基金，也办理资助咖啡工业的业务。生产咖啡的各州每年集会一次，确定出口的定额。该协会既然绝对地控制了市场，便通过停止装运和大量积存的办法，随意确定价格。该协会忘乎所以，把价格提高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并且引起了激烈的投机活

动。

在此期间，萧条的最初迹象表现出来了。这次萧条开始于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将扩及全世界并且沉重地打击巴西。人们最初认为，这和其他许多次一样，不过是周期地打乱资本主义国家节奏的一次生产过剩，但不久就认识到，这次萧条具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其影响不仅比通常更为严重而且是灾难性的。咖啡收获量创纪录地达到2,900万袋，而价格则直线下降。这一严重的形势，又由于总统毫不妥协地拒绝圣保罗的请求——发行新通货来支持咖啡，达到惊人的程度。华盛顿·路易斯一向反对以任何的形式人为地去支持价格。圣保罗政府无计可施，只好让大约200万袋咖啡堆积在仓库里。尽管有许多不利的因素——如黄金外流，出口下降，岁入减少等，通货贬值以及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相对来说，却并不严重。

从1929年末起，不兑换的货币或者“劣”币显著地贬值，而且根据格雷沙姆① 定律，这种货币照例开始驱逐可兑换的货币或者“良”币。对稳定基

① 格雷沙姆，英国财政学家。——译者

金券的需求猛增，因而减少了借外债得来的黄金储备。1930年1月的储备约为80万干度，同年9月降为125,000干度，同时英镑的市价高出平价6密耳瑞斯。稳定的幻想逐渐消失了。 261

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不仅给巴西而且给其他进行货币改革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彭加勒计划本身就是短命的，以后，甚至最坚挺的货币——美元和英镑——都不得不贬值。然而否认华盛顿·路易斯的改革的直接效果是不公正的。在他执政初期全国普遍的繁荣足以证明他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在三年期间，它完成了更快地发展国家经济的总目标。例如，圣保罗的数字是最令人振奋的。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人口增加了52%，总产值增加324%，通过圣多斯港的出口量增加165%，进口量增加180%，州岁入增加820%，联邦收入增加227%，各城市的收入增加271%，银行往来增加224%。1929年圣保罗按人口计算，每人的产值达到670密耳瑞斯，每人的出口额为400密耳瑞斯，和美国与法国的出口额相等，而全国每人的出口额为120密耳瑞斯。圣保罗的贸易顺差弥补了其他各州的贸易逆差，而且为联邦提供了国际收

支所需的信贷。在将近500万干度的总产值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工业产值。

根据共和国的惯例，华盛顿·路易斯的任期刚一进入第三年，政客们就开始讨论谁可能做候选人来继任他。圣保罗政客儒利奥·普列斯特斯，从华盛顿·路易斯任期开始时，就担任众议院多数派的领袖，似乎是总统最相信会继续执行他本人所创始的财政改革的人。因此，有不少人预料他可能会登台。然而，那些习惯于以现实的眼光观察这种事的政客们相信，总统会倾向于支持热图利奥·瓦加斯，以便总统自己不至于在他的本州中被降到次要的地位。

圣保罗州长卡洛斯·坎波斯的突然逝世，加强了儒利奥·普列斯特斯充任候选人的地位。他的父亲费尔南多·普列斯特斯是这位逝世州长的合法的继任人，但是他没有充任这个职务，为的是让他的儿子在补缺选举中赢得这个职位。儒利奥·普列斯特斯还很年轻，他的政治经验几乎完全限于州一级的水平，但在人们心目中，他既有学识又262有勇气。咖啡的高昂价格和城市工业的高涨为该州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作为州长，也会表现出自

己是一个勤奋的行政长官。在这种情况下，他被提名为华盛顿·路易斯的继任人，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全国最显赫有名的政客却都是老一辈的人，他们并不甘心情愿地同意这位年轻的圣保罗州长充任候选人，因为这个候选提名不仅具有不加掩饰的官方背景，而且也意味着要埋没他们的一个伙伴。但是在一个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之下，他们要公开反对是不容易的。

当时，在具备资格充当总统的其他社会人士中，有三个人最为突出，他们是：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安东尼奥·卡洛斯，以及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①。虽然埃斯塔西奥是伯南布哥州长，曾任共和国的副总统，而且他个人的资格也受到大家的承认，但是却没有大量的人投他的票。

安东尼奥·卡洛斯〔里贝罗·德·安德拉达〕当时任米纳斯吉拉斯州长，是巴西政界中占据显要地位的极不寻常的人物之一。他出身于一个显

① 他的全名是安东尼奥·奥古斯塔·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一直到1961年97岁时逝世，他在本州始终有强大的影响。他多次而严厉地抨击过的联邦政府，在他逝世前曾授予他最高勋章。——英译者

赫的家庭①，具有贵族气派，高雅出众。他轻视廉价的威望，但不失和蔼可亲。他基本上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折衷主义者，简言之，他做什么事都是行家。他的思想敏锐、细致而机敏。他极为精明，是一个有力的雄辩家，一位名副其实的议会领袖。他对于艺术和哲理却是感觉迟钝的，而且不善于进行内省；他以思想的敏锐、直觉和经验来弥补他文化方面的缺陷。他喜欢讽刺，象魔术家一样地玩弄字眼，而且善于使用警句和俏皮话。他常滥作诺言。虽然他激起强烈的共鸣，却也引起人们对他毫无掩饰的不信任。他有一点白里安②的气味，而且可以把若阿金·纳布科对科特吉佩男爵的评语转用于他："他是很有头脑的。"他研究财政，写了几本有关财政的书；而且长期以来在众议院里是国家收入问题的专家。他是一个激烈反对发行纸币的人，但是在文塞斯劳·布拉斯总统手下任财政

① 他的祖父是安德拉达三兄弟之一，这三兄弟是使巴西脱离葡萄牙获得独立的有力人物。现在三人中最受怀念的是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一席尔瓦大主教。——英译者

② 白里安（1862—1932年），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译者

部长时，却经常求助于印刷机，同样，他后来大体上接受了华盛顿·路易斯总统的货币政策而没有踟蹰不前，虽然这种政策原来和他自己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

他当米纳斯吉拉斯州长，几乎是贝纳德斯一 263 手扶上台的，他上任后所采取的行动却是十分出人意料的。他没有遵循米纳斯人通常执行的审慎政策和谨慎的行政措施，却大力进行宣传工作并且采取非常壮观的——虽然时常是有价值的——主动措施。无需细心观察即可看出，安东尼奥·卡洛斯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树立他自己，以便被提名为候选人接替华盛顿·路易斯。虽然他不能不怀疑后者是不赞成他的，也不能不怀疑严格和正直的贝纳德斯也是不赞成的，但是他也许设想由于环境所迫，他们终于会接受他的提名。因此他明智地不去引起无可挽回的决裂，而是利用国会内巨大的米纳斯集团去支持华盛顿·路易斯。但是，当他确信不会得到华盛顿·路易斯的赞成，又不会使之放弃儒利奥·普列斯特斯作第三个候选人的时候，他的反对态度就公开化了。①

① 1929年夏季，当我从伯南布哥州返回时，我在米纳斯

有一种老的说法，年龄的增长意味着：感情冷静下来，对人对事更为忍让和更多理解，即使不能完全不受事物的迷惑，也是更能超然和更能克制。然而，在哲学思想上，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在政治活动里，人们有时看到了相反的情况。那些性格犹豫、沉默、具有矛盾的感情的年轻人，在接近老年时，变得自负和激烈，好象他们在自己的性格深处发掘出一种新的精力、顽固性和斗争性的源泉。安东尼奥·卡洛斯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因为他年近六十并且掌握一个大州的政治机器，他知道他升任总统的最后时机正在从自己手中消逝；但是正如他所说的，他仍然能够阻止官方候选人获胜。

当然，安东尼奥·卡洛斯不会采取这样的最后步骤，就是说，把党的纠纷扩大到不顾及后果的

吉拉斯州遇见安东尼奥·卡洛斯，他以通常并不使用的尖锐的语调向我说，虽然他知道他不能迫使"卡特台"支持他提名为候选人，他却有充分的力量阻止儒利奥·普列斯特斯取得胜利。我把这些话告诉了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嗣后又告诉众议院中某些我的同党的议员。没有人相信，安东尼奥·卡洛斯会把他的恫吓付诸实施。——原著者

程度，而他自己却不同自己的性格、同他所受的保守主义的教育以及同他的恐惧进行内心的斗争——他深恐巴西会走上践踏宪法的道路，走上他自己不久就会极为悔恨的道路。作为一个老练的阴谋家，他设法分裂那个聚集在华盛顿·路易斯和儒利奥·普列斯特斯周围而并无很大热情的多数派。这就说明了他促使提名某些圣保罗的首领和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等为候选人的企图。一切迹象似乎表明，他只是作为最后一招，才考虑一位南里约格朗德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认为高卓 264 人充任总统的权利应该比任何其他人要小些，而是因为如果那个饱经战祸、在政治上很团结的州参加选举运动的话，这个运动会获得无法改变的革命的性质。

在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安东尼奥·卡洛斯的反对态度所生的影响只会是很有限的。在共和国的历史中，有好几次（如在文官运动时期）多数派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却没有破坏治安。在另外的场合中，鲁伊·巴尔博扎曾经同政府的多数派所支持的候选人进行竞选。作为"共和主义反抗"联盟的领袖，尼洛·佩桑

尼亚曾经把南里约格朗德拉到他反对贝纳德斯的战斗之中。但是，现在是第一次，米纳斯吉拉斯在反对由联邦政府支持的圣保罗人当候选人。

安东尼奥·卡洛斯反对提名儒利奥·普列斯特斯为候选人这件事，发生在经济萧条和政治骚乱的时期，因而在共和国的政治中，造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大多数的政客们对于当权的政府取得胜利已感到习惯或者无能为力，而且也怀疑卡洛斯的战斗意志，因而他们并没有感到很大的激动就把竞选运动交给总统去处理了。总统专横、骄傲、而且顽固，不愿意妥协而且似乎已经拒绝了任何妥协的建议。① 他似乎认为，放弃提名普列斯特斯，即便不算是背信，至少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这就会永远损害他自己的声望。按照当时流行

① 多纳·劳里塔·佩索阿·拉雅·加巴格利亚在她所写的埃皮塔西奥·佩索阿的传记中说，当埃皮塔西奥由欧洲返回时，他专程拜访华盛顿·路易斯总统，建议放弃儒利奥·普列斯特斯和热图利奥·瓦加斯，而选择其他任何合格的第三者。这种意见曾经由阿弗拉尼奥·德·梅洛·佛朗哥在一封信中向佩索阿提出，而且得到自由派联盟首脑——安东尼奥·卡洛斯、热图利奥·瓦加斯和若奥·佩索阿——的同意。但是，总统确信他的人会获得胜利，拒绝了和解的尝试。——原著者

的政治道德以及出于单纯的对于中途撤手的厌恶，普列斯特斯如果退出这场竞争，也不能不丧失政治上和个人的体面。

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是南里约格朗德州久经战斗的共和党首领，在佩德拉斯阿尔塔斯协议终止了他连选连任之前，几乎是一个终身任职的州长。由于他为人严肃正直，他在全巴西受到很大的尊敬。但是，他刚愎自用，他的地方主义以及他的集权主义，使得巴西其他地方的政客对他敬而远之。作为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的继任人，他具有那位年轻的共和主义领导人严守纪律和进行指挥的能力，但是缺乏他的热情坦率的品格。皮涅伊罗·马查多在世时，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让他全权控制该州在国会中的集团。在这位勇 265 敢的考迪罗死去之后，他指派别的合格的人充任了这个职务，但是他们的权力却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必须经常服从梅德罗斯的最后决定。他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能够做得到的话，他宁愿从他在内地的小农场，而不从阿雷格里港的州长府，去统治他这个州。这种孤立主义，使得这个在地理和历史上颇有差异的边境上的州，难于和巴西生

活的主流相结合。

梅德罗斯根据贝德纳斯在佩德拉斯阿尔塔斯协议中所做的规定，表示改悔之后，又重新博得了联邦政府的好感。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被阻止充任州长的职位以后（虽然他在本党的领袖地位并未失掉），很自然就失去了一些他过去享有的权威。和他比较起来，年轻的州长热图利奥·瓦加斯的声望却在日益增长。一批年轻的政客似乎受旧的纪律的束缚少一些，而更切望于取得对联邦事务的直接发言权。安东尼奥·卡洛斯闹分裂，给予了南里约格朗德前所未有的最好时机。从共和国开始的时候起，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南里约格朗德的那种唯一的合法政党组织，一直是在她的强有力的领袖——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和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的控制之下。在南里约格朗德所发生的激烈战斗，使得她的政客被排除在“卡特台”之外。帝国和共和国的统治者也可能宁愿使它处于那种状态，而不愿激起地方争吵。尽管皮涅伊罗·马查多是全国非常著名的人物，圣保罗和米纳斯却否决他当候选人来继任埃尔梅斯元帅。在皮涅伊罗死后，除了博尔热

斯·德·梅德罗斯以外，高卓人充当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这种可能性，其他州总是会持敌视的态度，虽然不一定总是公开的敌视。但是，现在事态发生了变化：该州在政治上团结起来了，而且一位南里约格朗德人成了总统候选人。

南里约格朗德所占的优越地位时常推翻多数派提名的候选人，推翻的原因大多不是由于政纲或者人选上的分歧，而是由于形式、官方协议、提名方法等等别的原因。例如，儒利奥·德·卡斯蒂略斯就曾经反对提名坎波斯·萨莱斯，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反对过达维·坎皮斯塔与阿图尔·贝纳德斯的提名。提名坎皮斯塔为候选人这件事一开始就失败了；尼洛·佩桑尼亚在投票中被击败时，这位高卓首领称之为胜负不分的局面，这样就清除了把政治斗争转变成革命的任何想法。然而，在南里约格朗德共和党内，仍然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潮流，主张和华盛顿·路易斯与儒利奥·普列斯特斯进行和解，相反，解放党〔解放联盟〕却同圣保罗的反对派（民主党）、同一些在反对埃皮塔西奥·佩索阿与阿图尔·贝纳德斯的未成功的 266

叛乱中遗留下来的年轻军人达成谅解，从而把地方上的反对派纠集起来了。

安东尼奥·卡洛斯到最后时刻一直感到的疑虑，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与热图利奥·瓦加斯也同样感觉到了。热图利奥·瓦加斯在致华盛顿·路易斯的信中(有些信已经公布)一再明确地说明，他同他是团结一致的。1929年5月，当时众议院中高卓集团的领袖若奥·内维斯已经发动了支持一位高卓候选人的运动，而热图利奥·瓦加斯好象是故意贬低内维斯的信誉，写信给总统说，他已经决定：

在总统继任人的问题上，不以任何方式表示自己的意见，原因是：为了避免扰乱局势；为了使阁下在您认为适当的时候，完全自由地处理这个问题；为了防止那些制造事端的人、提出候选人的人或者自封的倡导人的干扰，这些人会以南里约格朗德的名义和声誉进行赌博，以便嗣后提出要求为自己取得报酬。

他还在另一信中写道：“阁下可以相信，南里约格朗德的共和党在必要的时候将不会不支持您。”华盛顿·路易斯确定于1929年9月就总统候选人问题

开始进行会谈。除了和总统直接通信外，瓦加斯授权他的老友和同党党员小派姆，采取同若奥·内维斯恰好相反的立场，即支持总统和圣保罗州长并同他们团结一致的立场。在革命爆发前，小派姆在外表上一直是保持这种立场的。

1929年6月，安东尼奥·卡洛斯、热图利奥·瓦加斯和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结束了他们的含糊的会谈，并且通过他们的代表——米纳斯吉拉斯州内务部长弗朗西斯科·萨莱斯、议员若泽·博尼法西奥与若奥·内维斯——缔结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是共和政治的典型。根据这项协定，两州同意坚持不变地提名一位高卓人（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或者热图利奥·瓦加斯）为总统。如果华盛顿·路易斯总统提出相反的意见，主张由一位米纳斯人任候选人〔即安东尼奥·卡洛斯〕，副总统的职位就给予南里约格朗德。这个协定应得到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的批准。依靠两大州的官方机构，全国所有小的反对党派和所有地方和军方的不满分子，当时都联合起来，反对提名儒利奥·普列斯特斯为总统候选人。这个联盟和"共和主义反抗"联盟极为相似，便称为自由派联盟。

当然，要使1930年革命以前全部事态的发展重新展现出来是不可能的，而那些试图用历史综267合眼光观察事变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要观察出哪些事件（从表面上看，可能是次要的事件）是最终说明一个时代的标志——也不会感兴趣于事态的全部细节。有关1930年的参考书目很多，有书籍、专论、小册子、证词、报告等等，几乎所有这些都为当时的情绪所左右。但是，有些书，如巴尔博扎·利马·索布里诺所著的《1930年革命真相》，对于事实进行了较为有条不紊的阐述，并且作出了比较公正的判断。这种比较可靠的文献以及同那些参与这次革命准备的人的个人联系，可以使我们做出比较稳妥的结论。

瓦加斯在以后受到指责，说他玩弄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式的冷酷的两面派手法。他曾经设法取得华盛顿·路易斯的信任，路易斯很尊重他，曾任命他为部长，并因而使他在政界中飞黄腾达。这种两面派手法或许并不是蓄意采取的而是一个性格谨慎的人的犹疑态度，他的受到压制的热情和自私的利己主义混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不愿意对事件负起全部责任的人的性格。同样的模棱两

可的倾向，在瓦加斯对联邦的长期统治中，也表现出来。革命的解决办法使他感到惊恐，这倒不是因为他象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那样，在理论上痛恨革命，更多地是因为革命可能给他个人带来的政治后果。理想的办法是通过华盛顿·路易斯的友好支持来取得总统的职位。甚至在他已被自由党联盟正式提名之后，他还和安东尼奥·卡洛斯一样，再度给总统写信，仍然希望取得一种有利于他的政治解决办法。使人感到意外甚至惊异的是，华盛顿·路易斯差不多以一种带有恶意的幽默口吻，给他们俩人回信说，除了帕拉伊巴州尚未表示意见外，所有各州的州长已经表示支持儒利奥·普列斯特斯。

在这最后的一着失败后，总统竞选运动便开始了。巴西的普遍气氛对于反对派是极为有利的。即使广场上的群众的热情大体说来是表面的而且一向易于为煽动性的言词所左右，但是那种可以称为下、中、甚至上层资产阶级的支持却似乎是比较真诚的。从帝国继承过来的寡头政权从来没有扶植过真正由人民选出的政府，虽然在特殊环境的冲突之下，有些政府——例如，弗洛里亚诺·佩

绍托政府——似乎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在鲁伊·巴尔博扎的文官主义运动之后，政府的孤立和丧失人心的情况迅速增长，而且随着关于埃皮塔西奥·佩索阿的继任人选的斗争，进一步地恶化起来。联邦和州政府的行政首脑不仅表现为限制公民自由的工具，而且体现了政治和行政的腐268败，仅仅这些就为一切革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这种局面和其他不发达的、政治上不成熟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局面是一样的，关于这种情况，凯泽林写道："执政的政府贪污腐化所触发起来的所有南美洲的革命，其结果和以前的革命一模一样，其差别只是更换了统治集团的人物。"①

几乎所有的政府领袖都因为他们倾向于相信朋友、党徒、或自私的谄媚者们所作的颂扬，而终于受了蒙骗。华盛顿·路易斯没有察觉到或者不愿意察觉到，他最初所受到的普遍尊重已经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种不满，与其说是针对他个人，毋宁说是针对他所支持的事物。由于他的反对者持批判的态度，他们更为清楚地了解了真实情况，因而他们就利用这种情况使国会、报刊和街头

① 凯泽林：《南美冥想录》。——原著者

的选举运动充满了激烈的感情，甚至公开扬言使用武装暴力。他们不仅在首都这样做，而且在巴西的其他地方，如北方和东北，也这样做，这些地区的长期贫困和暴虐的地方政府早就在培育革命的思想了。他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去招募那些年轻的反叛军人，其中许多人是在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的指挥下，流亡在各拉普拉塔共和国，而普列斯特斯在成为正统的共产党人之后，对于资产阶级政客间的斗争是不会感到兴趣的。

同时，政治上的纵横捭阖、盛与衰、前进与后退、满意与沮丧的时期接踵出现。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拒绝了自由派联盟提他为副总统候选人之后，这项提名给予了拒绝支持儒利奥·普列斯特斯的帕拉伊巴州长若奥·佩索阿。在米纳斯，共和国的副总统梅格·维亚纳在未能实现其重任本州州长的野心之后，便退出了执政党，而且副州长、许多联邦和州的议员、市议会和地方政界头目也随着退了出来。这次分裂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米纳斯政治上的团结是安东尼奥·卡洛斯同南里约格朗德所缔结的协定的条件之一。这样，热图利奥·瓦加斯就获得一个新的机会去和华盛顿·路易

斯设法取得和解，结果达成了一项奇特的君子协定：热图利奥·瓦加斯将不到他本州之外去竞选，并且将接受全国投票的结果；华盛顿·路易斯和儒利奥·普列斯特斯将不支持南里约格朗德州内反269对瓦加斯的党派，将促使国会承认该州选出的议员而且将恢复同该州当权派的友好关系。热图利奥·瓦加斯如果当选为总统，将对圣保罗承担同样的义务；在这场交易中，米纳斯吉拉斯和帕拉伊巴被撂在一边了。然而，毫无疑问，在他的当地的同党人士的压力下，瓦加斯的确曾到过圣保罗和里约，在大的公共集会中宣读他的施政纲领。正如这种文件的通常情况一样，他的施政纲领差不多是一篇有益无损的讲话，一个人想做的任何矛盾的诺言都可以塞进这种讲究修辞的陈词滥调之中。

人们普遍的心情是十分平静的；华盛顿·路易斯和儒利奥·普列斯特斯具有充分的信心和毫不动摇的乐观想法。十七个州的州长和联邦区的主要政界头目的坚决支持，使他们确信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当时的政客几乎都是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人。只要他们自己不是革命对象，他们便以嘲笑的态度来看待本国的革命以及

拉丁美洲所有的其他革命。他们谋求使当权的寡头统治集团间取得协议来避免纠纷，至于向威胁屈服，他们连想都不愿意想。因此，纵然他们意识到人民的不安和难以说明的厌倦以及对于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新的政府的模糊的愿望，他们很难看出在他们面前所进行的运动实际上是多么严重。嗣后，当着反对派的攻击更为激烈的时候，那些政客的信心当然就动摇起来。那些有卓识远见或者是经验较多的政客开始感到忧虑不安。认识不足，欲罢不能，甚或个人的离奇想法，都会把这个经济上灾难深重的国家陷入革命的混乱之中。伯南布哥州长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的个人想法是典型的，在他的党的两翼竞相争取他站在自己方面之后，他成功地把它重新统一起来了。他没有热情，但是仍然对他的选民负责，因而不敢径自重新挑起关于总统候选人的讨论。①

巴伊亚的政治局势不如伯南布哥州那样稳

① 那时我仍然积极参加政治而且不久之后被选为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的继任人。1929年我由欧洲返国，途中在累西腓停留时，科英布拉向我吐露了他的巨大遗憾：他没有能够理解局势的严重性，而且没有抓住时机迫使人们提出另一位候选人〔他自己〕来扑灭这次烈火。——原著者

定；执政党内部两个派系在互相斗争。它牵连得甚至更深一些，因为它的州长维塔尔·苏亚雷斯是儒利奥·普列斯特斯的竞选伙伴。

270 在国会，尤其是在众议院，辩论更为激烈。在会议结束时，由于小索萨和一个南里约格朗德议员发生了激烈争吵，伯南布哥州的多数派议员小索萨被这个南里约格朗德人在国会大厦的休息室中暗杀了。

1930年初，在帕拉伊巴州的内地，一次颠覆运动爆发了。普林塞萨（革命开始的城市）革命的原因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该州州长若奥·佩索阿抱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剪除内地头目——这些现代的封建主时常是雇佣匪徒的招募者和保护人——的羽翼，并且把帕拉伊巴州的商业由累西腓转移到帕拉伊巴州的首府和海港〔卡贝德洛〕。在内地的首领中，没有人比普林塞萨的若泽·佩雷拉——佩索阿家族的老朋友——更为强大有力。佩索阿扬言要把佩雷拉的老朋友、前任州长排除在联邦议员的候选人名单之外，因而造成了两人之间的断然决裂，这种情况不久就被当地的反对派利用了。

它的经济目标导致州政府对于通过卡贝德洛港和通过邻近各州边境运进的货物，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这就实际上禁止了内地和累西腓间的传统贸易。这种政策显然不但不符合宪法，而且损害了内地的商人以及同他们进行贸易的累西腓的商行。此外，累西腓的主要商行是若奥·佩索阿的亲属开设的。这样，佩索阿和若泽·佩雷拉之间的党派争吵因增添了家族斗争的因素而更加严重起来，并且有变成叛乱的危险。巴尔博扎·利马·索布里诺描写说，这一争吵，是性格急躁的州长和亟思维护旧有特权的内地头目之间进行的一场无法预计的决斗。虽然联邦政府对这次争吵并没有采取正式的立场，它却允许它的一些党徒怂恿和帮助佩雷拉，因为华盛顿·路易斯和儒利奥·普列斯特斯的反对派正在设法帮助若奥·佩索阿。帕拉伊巴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西班牙一样，被当做了内战的试验场。

在巴西的其他地方发生了小的骚乱。在北方各州，反对派的竞选队发生了几起事件；在米纳斯的一座城市发生了暴力行为，副总统梅洛·维亚诺受了伤。但是，尽管如此，全国的选举于1930年3

月1日平静地进行了。正如预料的那样，儒利奥·普列斯特斯和维塔尔·苏亚雷斯在总投票数150万张中赢得了95万张以上的选票。在一些大的都市里，选举人一向还是比较自由、比较遵守法律的，而其他地方的选举，却被通常的贪污腐化行为所玷污。双方都感到各州政治机器的强大压力。自由派联盟中的最审慎的一部分政客倾向于接受这次投票的判决；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向里约的一家报纸发表的声明提到了这一点。但是，那些比较激动的高卓人不同意他们的老首领的意见，他于是被迫修改他原来的讲话。在热图利奥·瓦加斯的直接干涉，联邦政府达成了一项新的临时协定，该协定可能会防止一次革命。

271

按照宪法的规定，在5月3日那一天，联邦国会召开了预备会议。它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研究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的投票结果。全国对于国会在执行那项任务时那些徇私舞弊的丑闻已是习以为常；所谓“承认当选资格”往往看起来不过是新的选举罢了。但是，当巴西的政界在总统问题上发生分裂时，承认的工作变成了极为重要的事，因为它表明了国会的倾向。曾经支持华盛顿·路易斯

和儒利奥·普列斯特斯而且对于当权的高卓政客一向持和解态度的国会多数派，没有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后果，拒绝承认那些大抵是正式当选的、得到米纳斯州或帕拉伊巴州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帕拉伊巴州的整个代表团都受到了排斥。其结果是：关于普列斯特斯获胜的公告，以及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关于他将接受这个公告的声明，都未能平息党派的纠纷。

这种专横武断的承认当选资格的办法，给了急进派以新的活力。革命在公开地策划着。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的和平主义似乎是动摇了。在一篇对全国的宣言中，瓦加斯州长以暧昧的语言谴责了对米纳斯和帕拉伊巴的议员的清洗，他的话既发出了颠覆性的威胁，又呼吁协调一致：

> 必须重新建立安宁，这在今天是没有意见分歧的。安宁完全取决于统治集团的容忍、尊重和保障权利的政策。统治集团越自信本身强大有力，这一政策将获得越多的赞扬……然而，〔需要〕是大于他们所想象的，我相信必要的纠正将不会长期拖延下去，我们不久将看到巴西的民主制度处于一个对全国的幸福负责的政权的控制之下。

当然，关于一次革命运动的明确宣言从来是不容易制订出来的，即便是在那些一向不很尊重宪法权威的国家也是如此。环境在激烈地变化；庄严的诺言被背弃；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了；人们开始感到沮丧。当时，如果说已经存在着普遍的厌倦和对新的政治秩序的渴望，那么巨大的革命目标所必须依靠的群众的强烈热忱还没有出现。反对派领袖们的诚意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为各种野心、个人的虚荣、虚伪的骄傲和区域性的斗争所分裂。和他们对华盛顿·路易斯的指责一样，他们也具有同样腐败的经历，而且或多或少地犯有同样的失职和专制的罪过。武装部队——它们必须最后决定革命的成败，大体上并没有受到颠覆活动的诱惑。

272

当时缺少的只是燎原的火花，而7月间若奥·佩索阿在累西腓的一个糖果店中被暗杀的事件便提供了这个燎原的火花。这一犯罪行为是由地方的争吵和个人仇恨引起的，而伯南布哥州的警察也无法加以防止。正象通常的情况一样，当一个人在一项政治运动中牺牲了生命的时候，反对派很快就对它进行派性的曲解。全国的反响达到了空

前的程度，特别是在南里约格朗德，那些极为激动的政客想立即发动革命。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和热图利奥·瓦加斯将无力阻止这次革命。从那时起，尽管出现了暂短的延缓时期，却没有人会怀疑革命即将到来了。

同时，经济萧条所引起的革命正在循环袭击各南美共和国，最后袭击了阿根廷。巴西和邻近的国家一样，受到的震动是巨大的。人们认为，阿根廷的政治文化已经使它免除了那种政治上的大动乱。用暴力推翻伊里戈延政府这件事表明，在整个西班牙拉丁美洲，革命的动乱是非常深刻的。本书对于阿根廷的颠覆活动或者对伊里戈延政府都不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无论革命的特点如何，它却表现出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共和国的那种使人焦虑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是内部原因和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的总的世界情况所引起的。它对于已经动荡不安的巴西各界必然要产生直接的影响。

把1930年10月3日（这个日期曾经确定和推迟过好几次）爆发革命前巴西后来的许多运动情况逐个地追叙一遍，会是很单调的，而且只起年表的作用。重要的事情是，革命爆发在支持自由派联盟

的三个州：南里约格朗德、米纳斯吉拉斯和帕拉伊巴。由于拥有警察部队并且同联邦存在着法律上的冲突，这些州已经在采取国际战争中交战国所采取的行动。

尽管曾经多次表露出革命的迹象，可是在革命到来时，中央和各州的政府却都处于毫无防卫准备的地步。政府没有全面的计划，没有协调一致的目标，只进行了零星的（即使是勇敢的）拖延性的战斗，就使许多忠实于联邦的人牺牲了生命。越来越多的部队转到反叛者一方，或者保持中立，二者都是一样的。华盛顿·路易斯总统直到最后时刻没有失去胜利信心；而各州长却没有那么乐观。北方各州的政府，由于它们的反对者长期而顽强的战斗已根基不稳或者由于受到法律条文过分严重的束缚，经过很少的斗争甚或未经过斗争就垮台了。这样，在儒瓦雷斯·塔沃拉上尉统率下，反叛部队离开帕拉伊巴再度去进攻累西腓，未遇到抵抗就到达了巴伊亚州；对累西腓的第一次袭击由于预计中的援军没有到达而取消了。除巴拉州外，其他北方各州在第一次交锋中就垮台了。

南里约格朗德的叛军由陆军、警察和平民联

队组成，在戈伊斯·蒙特罗中校的军事指挥下，由热图利奥·瓦加斯任革命的最高领导人，未遇到什么困难就达到了巴拉那州和圣保罗州之间的边界；圣卡塔林纳州政府进行抵抗的微小的核心力量被孤立在该州首府所在的岛上。在米纳斯州（在那里，安东尼奥·卡洛斯已经为正式选出的奥莱加里奥·马西埃尔所接替）和在南里约格朗德州一样，进行抵抗的联邦各中心据点受到了突然袭击，而且很快地被击败。训练很差、装备低劣的反叛部队向里约热内卢和圣埃斯皮里托州前进；薄弱的联邦防御到处土崩瓦解，时常是由于受到信任的军事首脑的叛变。位于巴拉那州和圣保罗州边界的伊塔拉里四周的地区，预计是战斗的中心地点。这次期待着的战役（“拉丁美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只不过它并没有发生罢了”是当时的一句有名的俏皮话）将决定革命的胜负。根据革命者最高统帅部的无疑夸大的说法，有3万人——他们可能并没有获得胜利的确实把握——由南方开来。联邦和圣保罗州政府所处的地位很有利，距离自己的供给中心更近一些，而且交通更为方便。

在这个阶段，里约驻军的一批高级军官——

他们已经向总统提出了两份没有得到答复的最后通牒——大致事先已和叛乱的首领取得了协议，因而加入了战斗，并且对于华盛顿·路易斯所勇敢维护的合法的宪政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这时，既缺乏进一步的军事手段，又受到市民中不健康情绪的反对（由于征招后备队来保卫政府，这种情绪更严重起来了），再加上高级军事助手图谋不轨，几乎只有总统自己愿意继续战斗，他遭到了逮捕，并

274 且被监禁在科帕卡巴纳的一个炮台之中。不久，他就从这个炮台登船，到欧洲和美国过长期流亡的生活。[①] 里约的大主教D·塞巴斯蒂昂·莱梅红衣主教陪送他到监狱，向他这位公民和国家元首致以最后的敬意。

和解洪达所采取的行动使得进一步的武装冲突成为无益的事，该洪达由塔索·弗拉戈佐将军、梅纳·巴雷托将军与伊萨亚斯·德·诺罗尼亚海军上将（海军是中立的）组成。热图利奥·瓦加斯、戈伊斯·蒙特罗和奥莱加里奥·马西埃尔发出了语言

① 直到1946年，在瓦加斯第一次被赶下台之后，华盛顿·路易斯才返回巴西，虽然，如果愿意的话，他是可能早日回国的。——英译者

生硬的电报，这似乎表明他们和洪达间的谅解进行得并不顺利。为了表明自己的目的是缔造和平，洪达愿意把政府交给瓦加斯，但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叛乱成功的首领，因而他只能执政到进行新的选举时为止，而不是象瓦加斯和他的伙伴所要求的那样，让他接替那位被免职的总统。然而，由于缺乏勇气和权威，洪达于1930年10月24日，无任何保留地把政府交给了热图利奥·瓦加斯，这恰好在叛乱开始的第21天。在这段期间，洪达公布过许多法令来任命部长，辞退公务人员，撤销前政府的法令并且调整行政机构。

这次短期的事变就这样结束了，它把各种出身和各样性格的人混合在一起，这里有：三位前任总统——文塞斯劳·布拉斯、埃皮塔西奥·佩索阿和阿图尔·贝纳德斯；老的保守政客，如安东尼奥·卡洛斯和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圣保罗的反对派；年轻的政客，包括南里约格朗德的若奥·内维斯、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弗洛雷斯·达·库尼亚、林多尔福·科洛尔、毛里西奥·卡尔多佐和巴蒂斯塔·拉萨多，米纳斯的维吉利奥·德·梅洛·佛朗哥、弗朗西斯科·坎德斯、克里斯

蒂亚诺·马查多和马里亚·布兰特，里约热内卢的佩德罗·埃内斯托和阿道弗·贝加米尼以及北方的若泽·阿梅里科；年轻的军人，如儒瓦雷斯·塔沃拉、若奥·阿尔贝托·爱德华多·戈麦斯和儒拉西·马加良斯。有些人，特别是年轻的军人，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其他的不过是些一无所失的怀有野心、愤懑和仇恨的人。

瓦加斯接任时，在里约的街头爆发了疯狂的示威。该城成了半无政府状态的无人地带，为高卓人和新混入的革命者所占领。鲜红的手帕、阴暗的流言、取消政治权利、流放、无理解雇、拚命争夺官职和其他有利可图的买卖、虚声恫吓、骗人的诺言——简言之，这种景象是有代表性的，但是还没有欧洲革命在胜利后的死刑处决。首都发生的事件也在圣保罗发生了，而且以较小的规模发生在全国其他地方。

这个争取民主的革命并没有超出争取“正义和代表权”的旧的愿望，没有任何成熟的建设性的计划。在普遍混乱与惊恐的气氛中——一种由右派和左派以及新的世界大战的令人不安的征兆所促成的气氛中，这次革命导致了一切这种革命所

不可避免的后果，导致了“救国的”独裁制，它反过来又会引起那种由群众的冲动直接支持的新的革命。这种独裁制对巴西来说，还是件新鲜的事。那些失败的政客是他们所维护的过去时代所积聚的大量错误的受害者，是环境、误解和严重错误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安于他们的不幸命运，在震撼全国的骚乱中，耐心地等待在胜利者中间产生分歧和失望，以便补偿他们在其政敌胜利时所受的屈辱。

我们时常提到过1930年革命的原因。我们认为，现在可以对这些原因试图做一次综合性的研究，而不陷入对于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问题的学究式的辩论。原已存在的条件，在一定时机同其他偶然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一系列的事件而促成事物的秩序的突然变化，但当然这不是僵硬的决定论的因果关系的变化——象在实用科学中人们可以用归纳的方法得出规律来的变化。反映在个别人或一批人的行动之中的人的动机所起的作用，可以改变，促进或者推迟看来是不可抗拒的事变进程。

这就是1930年运动的情况。巴西生活的许多观察家和解说者——其中包括一些外国人，认为

这次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之间的冲突。这冲突的两个方面就是农村地区的停滞和保守同大城市——主要是里约和圣保罗——加速走向工业化的前进的动力。但是，在1930年，这两种文明形式上的对比还是很不显著的。当时的政治革命发生在更为落后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中，在那里并不存在酣睡的乡村和觉醒的城市间的对抗。甚至反对伊里戈延的叛乱也可以用其他的原因来说明。

276 和今天一样，在昨天，形成和爆发革命的主要因素，是经济上的软弱无力，以及不仅群众而且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蒙昧无知。经济的软弱在巴西大部分地方是经常性的，它倾向于造成一种不明确的不满状态，沉默的愤懑以及不容怀疑的受压抑的情绪，这一切将在任何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中爆发出来。一次深刻而长期的商业萧条——如在圣保罗所发生的——在最富有和最自信的社会阶层中发生了同样影响。人们就把困难和灾祸归罪于政府。另一方面，当私人企业萎缩或者其成功的机会变得不稳定的时候，政府就变成最高和唯一的分配利益和机会的机构。因此，以任何手段，

夺取和掌握政府就成为合情合理的事了。

长期的恩赐和消极服从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他们的冷淡态度，把自己完全置于公共生活之外，但是，这也使他们对于煽动性的激烈解决办法，几乎象对基督一样易于接受。所谓保守阶级的最新的不满和群众的感情用事结合起来，形成了对革命的有利气氛。这种情况主要在巴西这样的国家中发生，在这里甚至在目前，恰恰由于政治训练不够，对于民主制度的尊重也就没有巩固，而且也不能指望共同遵守法律了。

1929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崩溃所造成的局面，严重地损害了巴西的咖啡经济，并且及时挑动起用暴力推翻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这一局面，我们曾经指出，是引起巴西1930年革命的偶然因素。政治的因素很多。例如，一个因素就是对于一种不那么腐化的代议制的真诚的渴望，这种可厌的腐化的代议制是继承了帝国的寡头政治的半家长制造成的；一种普遍的信念是，不能和平地或者在宪法的范围内加以摧毁。这种想法普遍起来了，秘密投票方式的单纯的选举的原则在现行的制度内是不能实现的。

圣保罗和米纳斯两大州，由于实际上独占了总统职位而造成的无形的统治地位，乃是另一个引起愤懑的原因，特别是对于南里约格朗德和其他居于次要地位的州来说，更是如此。事实上，在八位文官总统中，四位是圣保罗人，三位是米纳斯人。帕拉伊巴州的埃皮塔西奥·佩索阿的当选，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产物。显然，在一个象巴西那样不平衡的联邦中，最富有和人口最多的州不可避免地要享有霸主的地位。

在贫困的支离分散的巴西，强大的国内市场277还未形成，它在经济上依靠出口而且资金不足，它的政治活动也未能导入全国性的大政党的轨道，各不同地区和各州之间的经济上的差别，例如，比起美国来，是更为显著的。经济上的相对隔离使政治上的对抗更加剧烈，然而这种隔离状态，有时不免使地方上的党派情绪把全国政治支配权力的斗争给掩盖起来。在圣保罗就发生过这样一个实例，那里的共和党曾经长期安然无恙地受到政府的关照，而它的反对派却极其热心地为1930年的革命进行辩护。

另一个有利于革命的条件是军事集团的经常

的不稳定状态，他们时常真诚而天真地认为，他们注定要从“知识分子”和“职业政客”的奴役下“解救”国家。事实上，军队中只有少数人受到了政治纷争的吸引。海军在反叛弗洛里亚诺被解除武装之后，在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和阿丰索·佩纳的整军计划之下，恢复了它以前的声誉，它对党派活动和阴谋破坏法律秩序的兴趣一直比陆军要少些。陆军的心理状态、行为表现和生活标准，在较好训练和纪律、法国军事代表团以及较好的薪饷待遇等影响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同巴拉圭作战时期和帝国临终时期那种粗鲁的旧骑兵，象军事的实证主义者和狂热的弗洛里亚诺派一样，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到国外旅行和定期训练，在军事院校中增设内容广泛的课程，这些措施都扩大了青年军官的眼界，使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减少了教条主义的成分，并使他们增强了职业责任心，使他们更加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实质上与清教主义相似的“共和独裁制”已不再是他们的理想。然而，就是最不赞同这种制度的人，也从来没有消除这样一种信念，即在危机关头，为了恢复物质和精神上的秩序，国家只能求助于大刀阔斧，凭

借武力的补救办法，至少是暂时地利用一下。平民们并不认为这样一种想法是离奇的，在其他象巴西这样对于自己的政治上层建筑持怀疑态度而且对于自己的进程缺乏信心的一些国家也是一样。

但是，如果把这次革命运动的直接原因归于几个人的行动的话，那就是华盛顿·路易斯、安东尼奥·卡洛斯以及热图利奥·瓦加斯等人的性格和作法上的冲突。我们已经着重地说明第一个人的正直和缺乏灵活性以及第二个人的狡猾和顺应通变，他们利用这些特点来实现自己的顽强意志和野心。第三位诡诈而且要两面派的选手的登场，使这场竞赛更为危险了。如果华盛顿·路易斯听从了友好地解决他的继任人问题的各项建议，并且在来得及的时候同儒利奥·普列斯特斯断绝关系，如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对贝纳迪诺·德·坎波斯那样，这次革命也是可以避免的。① 如果热

278

① 阿弗拉尼奥·德·梅洛·佛朗哥曾致函埃皮塔西奥·佩索阿，请求他为了党派的和平去劝说华盛顿·路易斯。此外，阿弗拉尼奥还提供了另一个人们不很知道的证据。在《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回忆录》一书的一篇文章中，阿弗拉尼奥·德·梅洛·佛朗哥说，在某一个时候，自由派联盟的领导人——其中包括热图利奥·瓦加斯——愿意同意提名当时伯南布哥州长〔埃斯塔西奥·科英布拉〕为总统候选人，以此作为一种妥协的办法。——原著者

图利奥·瓦加斯从开始起就采取公开和决定性的行动或者同华盛顿·路易斯与儒利奥·普列斯特斯进行合作或者公开反对他们，革命也会同样是可以避免的。然而，最专横和无益的事莫过于用空洞的揣测来重新编写历史；我们需要的是说明事实。而事实就是：革命发生了，胜利了，而且使一个最不想革命和最害怕革命的人成为它的最高的首脑。

279

第二十三章

热图利奥·瓦加斯时代(1930—1945年)

热图利奥·瓦加斯传略——“10月3日俱乐部”——临时政府的政纲——社会立法——财政改组——圣保罗与1932年宪政派的革命——1934年宪法——整体主义——政治斗争——11月10日政变——“新国家”——1937年的宪法——社会变革——经济状况、对外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国家”的结局——热图利奥·瓦加斯下台

因为没有明确规定的方针，对于在建设国家的尝试中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也没有深刻的理解，而且由于一种传统的政治风气，各选举集团和家族寡头，又往往将政党改变为联合组织，致

力于拚命取胜以享受眼前的政治利益，巴西一直都很难培养起任何维系行政连续性的精神。一个总统，不努力夸大自己碰到的问题而且使用临时制定的新方针去暗中破坏其前任的工作，那是非常罕见的。他当候选人时的纲领，从来没有使他负有任何明确的义务，他的同党或者是公众的舆论也并不要求他取得很大的成绩。在他任职的整整四年期间，或者说，至少在提名他的继任者从而降低他的威信之前，他在掌管国家事务方面，即使不是永远正确绝无谬误的，也是一个具有无穷智慧的人。假如这种情况能够发生在那些出身相同而且代表同一最有势力的集团的总统之间，那么，通过一次从其定义和声明来看都具有破坏性的革命运动而掌了权的总统，对于这种惯常的吹毛求疵和批判工作，便自然要变本加厉地进行了。

在巴西，没有一个人比热图利奥·瓦加斯遭到的议论更多了；对他的评价，从无限的颂扬和神化，到最粗暴的批评和诅咒谩骂，不一而足。同时，没有人比他掌握过更大的权力，唐·佩德罗二世在其漫长而平静的统治期间没有掌握过，弗洛里

280 亚诺·佩绍托在其短暂的独裁时期也没有掌握过。作为临时政府的一个不受限制的首脑，作为国会根据宪法选出的一位总统，作为那部他以专制方式授予国民的纳粹式宪章之下的独裁者，最后，作为人民根据宪法正式选举出来的一位总统，瓦加斯很象旧时代一个得到葡萄牙皇帝的赏赐被授以大片领土的人那样，统治巴西几达二十年。即使在他的两届任期里，他的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时，他通过政府设立的银行和各种半自治的政府机关(autarquias)所掌握的权力，也足以抵销那些加在他身上的政治约束。

因此，瓦加斯给巴西带来的好处和灾祸，可以说归因于他本人，而不归因于国家的结构，即不归因于政治和行政机关所起的好的或坏的作用。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没有几个新闻工作者能够抵住诱惑而不去设法解开他这个谜了。他的政府不同于以前共和派的任何一届政府。无论是有益还是有害，他并没有按照宪法规定的任期任职。但是，他当政的那许多年份以及巴西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在此期间发生的许多著名变革，却给这个时代标上了他的名字(好坏与否姑置勿论)，如同佩

德罗二世、福兰克林·罗斯福[①]和一位近邻——阿根廷的伊里戈延给他们的时代标上他们的名字一样。从历史上看，他的时代，在某些方面，与拿破仑三世的时代相似；在其它方面，很象西班牙美洲比较落后的国家里的某些考迪罗的时代。

热图利奥·瓦加斯在人们的心理上所引起的兴趣，其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并不是寻常的人物。他那种机会主义的机智和精明的政治手腕，以及它们变化多端和灵验有效的程度，一定远远超出他的敌人的估计；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跟政客们打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交道，而经常得心应手，除非我们毫无疑问地承认，这些政客统统都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同样，他对付无产阶级群众所获得的成功，也将无法能理解，因为他的出身、教养和外表都非常明显地属于资产阶级。

在出任共和国的最高职位以前，瓦加斯在他本州的职业政客当中，并不突出。他于1883年4月

---

① 福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年)，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19日生在圣博尔雅，该地在乌拉圭河的东岸，与阿根廷隔河相对，位于从前耶稣会布道区的境内。他的家庭是富裕的牧主，世代参与党派斗争，这种斗争有时候又蜕变为剧烈的流血冤仇。他父亲曼努埃尔·瓦加斯，参加过对巴拉圭的战争。1892年联邦主义革命期间，他是一位游击队首领，原来是卡斯蒂略斯集团的一位名誉将军。这些早期的印象281——对外战争，边疆的考迪罗主义以及残暴的党派斗争——给热图利奥·瓦加斯打下了终生难忘的烙印，并且可以部分地说明他的过激主义。

在奥罗·普雷托(米纳斯州)的预备学校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瓦加斯决定投身军界，于是返回南里约格朗德，〔在17岁时〕进入了设在里约·帕尔多的士官学校。有一个时期，他曾在阿雷格里港和马托格罗索州的驻军中任军士，里奥·布兰科男爵与玻利维亚就阿克里地区进行谈判的期间，曾把一部分军队集结到这里，以炫耀武力。也许是因为军人生活如何光荣的幻想破灭了，他抛弃了这段已经开了头的事业，在阿雷格里港进了法律学校〔1903至1907年〕。他经历了一个热衷于文学的阶段，对文学，他从来也没有完全丧失兴趣。很

久以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还回忆过对左拉①、尼采②、博德莱尔③、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以及贡萨尔维斯·迪亚斯等作家的广泛爱好。哲学的论述，大概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只有孔德的实证主义——他所属党派的正式学说——除外，实证主义关于政治组织的那种概念化的和反动的论述，可能满足了他对于一般概念的兴趣，也投合了他对于独裁主义国家所抱的那种天生的和模糊不清的兴趣。

瓦加斯在充任了短时期的公务员和律师之后，终于加入了那个在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的严格纪律控制之下的卡斯蒂略斯的旧的政党，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骨干。虽然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卓越的个人品质，但是他的镇静、谨慎和自制力，却给他的党内同事和高级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作州议员的时候，他担任了议会的领袖，

① 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年），法国小说家。——译者

②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德国哲学家。——译者

③ 博德莱尔（Pierre 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年），法国诗人兼评论家。——译者

然而议会的职责已经降低到仅仅是编造预算。1924至1926年，作为联邦议员和他所属集团的领袖，他似乎是一位典型的、谦虚谨慎的立法者。在被派到财政委员会时，他直爽地承认自己对这门学问一无所知。可是，这种对经济与财政问题缺乏兴趣的情况，并没有妨碍他接受当选总统华盛顿·路易斯给他保留的财政部长职位。在这个政府最重要的部门任职〔1926至1928年〕，需要他实施一项新的财政计划，所以这个职务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他对竞赛中与参加者自身有利害关系的各个方面，都非常注意，但是对一般事务，尤其是细小的事务，却不感兴趣。与普通的考迪罗所经常有的那种不信任的倾向相反，他对于日常行政事务和那些以他的名义处理这些事务的人，相信得过分了。

282 瓦加斯以联邦政府部长的资格，被选为南里约格朗德的州长〔1928至1930年〕，纵然这次选拔意味着要越过其他一些人，他们为党服务的时间更长，而且也有更大的权利来担任这个职务。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在名义上仍然是这个官方政党的全权首脑，不过佩德拉斯阿尔塔斯条约〔禁

止他再次当选为州长〕，已经使他的权力受到了一些钳制。这位新任州长觉得他在行政和政治问题上，都可以比较自由地主动采取行动。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当地的党派都合并在一个单一的阵线(Frente Unica)里，让它在联邦那一级上进行活动，至少起一种催化剂的作用。

政治上的胜利似乎能够说明，一个人先前的态度或者偶然的行动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预先规定的目的。因此，在瓦加斯升到总统的地位以后，他早年间在本州采取的息事宁人的行动，很容易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他是个天生的战略家，他的目的在于取得新的胜利。不过，他倒更有可能是仅仅听从他天性的支配。他虽然性格顽强，临危不惧，酷爱权势，却不喜欢挑起倾轧不和的气氛，或者在这种气氛里生活，尽管后来，在他统治联邦政府期间，他的斗争精神加强了一些。不论他的目的如何，他经常关心的是取得胜利，他的方法是：忍耐、看风使舵和适应新的环境；不轻易树敌与随时准备交朋友（这很可能是出于容忍精神而不是出于计谋）；给与政府的恩惠、职位、赏赐和奖金，而完全不顾受惠者本人的基本品质。在总统竞选

运动期间，他就表现出他自己是持这种观点的。而在他当权的时期，他差不多一直是坚持同样的观点的。有一句据认为是他讲过的话，对他的方法做了解释，那就是：决不要与那些不能变成朋友的人为敌。

1930年革命的起因，是政治的或者说是属于文官方面的，但其最终结果，却取决于武装部队的态度，也就是取决于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的直接干涉，或者说，取决于那些继续忠于合法政府的大多数人在这场斗争中的无所作为或缺乏兴趣。在充当革命先锋的军队里，有一群年轻的军官占据突出的地位，他们是早年起义和暴动的幸存者，一向差不多全都在邻近的共和国流亡，或者隐藏在巴西境内。热图利奥·瓦加斯1930年10月24日掌握政权的时候，他还不能，或者说不想抑制这些青年追随者的热情，而他们是没有政治或行政经验的。有些人持有一种真诚然而混乱的愿望，要进行矫枉和革新；其他的人则单纯是受政治野心或名利欲望的驱使。这就是"尉官派"(Tenentes)的得意时代，而他们这些人的象征，则是一个1789年那种样式的"雅各宾俱乐部"——"10月3日俱乐部"。这

283

个俱乐部和后来的"10月军团"，产生于一项在甜水井〔米纳斯吉拉斯州内的一个矿泉；时间大约在1931年初〕订立的协约，订约的有关各方是司法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驻圣保罗的督办若奥·阿尔贝托上尉以及儒瓦雷斯·塔沃拉上尉，这位上尉曾经被授予了古罗马地主总督一样的权力，统辖着从亚马孙州到圣埃斯皮里托州的整个北方。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北方副王"。热图利奥·瓦加斯——他仪容秀美、有几分专横(虽然他身材短小，并有发胖的趋势)、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热诚而令人迷惑不解——听任这种权力分散的状况，而耐心地等待适当的时机，在他的伙伴们开始削弱之后，再去取得他那独裁的绝对权力。

"10月俱乐部"和"10月军团"，代表一次思想混乱的革命中的激进派。这一派，打算通过无限期地延长独裁专断的政府（据若奥·内维斯在所著《在圣保罗与巴西》一书中说），"保证现在的独裁统治延续到完全实现其目的时为止。它的目的是：彻底改变新近消灭的政权所留下的政治一行政环境"，并通过取消政党、压制各州警察部队、控制军队等等办法，将过去承担的义务一笔勾销。如果

说这次运动除了受到独裁主义政府的一般性的鼓舞之外，还持有其他主义的话，那么这个主义，就是一种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结合起来的反对联邦主义的复古倾向。这可能是受到阿尔贝托·托雷斯的那种混乱的思想的影响，而这种思想在奥利维拉·维亚纳社会学的“中央集权化”中，经过修补并进一步系统化了；但它终于是符合热图利奥·瓦加斯本人的意向的。

在11月3日，即革命爆发以后恰好一个月，当热图利奥·瓦加斯对政府掌握了无限控制权的时候，他让阿弗拉尼奥·德·梅洛·佛朗哥、莱特·德·卡斯特罗将军和伊萨亚斯·德·诺罗尼亚海军少将，分别留任财政、陆军和海军部长；他们过去都是由洪达任命的。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①——过去曾经是南里约格朗德革命的合作者，被提名担任司法和内务部长；若泽·马里亚·惠塔克，一位银行家，曾经是圣保罗秘书处的成员，当上了财政部长；南里约格朗德的阿西斯·布拉济

① 他后来成为很有名气和能干的巴西驻华盛顿大使(1934—1938年)、外交部长(1938—1944年)、巴西驻联合国代表(1946—1947年)，以及1947年联合国大会主席。——英译者

尔成为农业部长；儒瓦雷斯·塔沃拉当了运输部长，但不久就由若泽·阿梅里科·德·阿尔梅达 284 所代替，他曾是若奥·佩索阿的秘书，并已在北方，成为塔沃拉之后最重要的人物。

临时政府的第一号法令，将所有“曾经为革命效力的爱国的与州属的军事单位”，征召参加常备军。华盛顿·路易斯总统在战争期间采取的紧急行政措施，都被废除了，并对“与国内发生的各次革命运动有牵涉的一切文职与军事人员”实行了大赦。11月11日，政府颁布了组织法，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等作了明文规定。它批准了解散联邦议会，以及解散各州与各自治市的立法机关，但是规定行将起草的宪法将保存联邦共和制，而且不限制1891年宪法中所规定的自治市、巴西城市或个人的权利。独裁者将行使一切行政与立法部门的职责；司法工作将按现行法律继续进行，但要服从可能施加于它的一切修改和限制。驻在各州的督办，其权力与国家独裁者相同，对他们的行为则可以向独裁者提出申诉。联邦、州与市政府对公债或任何公共信贷活动所负有的契约性义务，维持现状，但其它契约、特许权与合同，则应重新受到审

查。在职和赋闲的公务员及官吏(包括地方长官)所获得的权利,新法律未予保证。由此可见,这届临时政府比1889年推翻君主制以后的那一届,走得更远。根据对新法律所做的广义的解释,公职人员成批地被解雇,结果一种经常性的分赃制度形成了,人们对公证人的职务、待遇优厚的工作和有利可图的职位,进行着疯狂的争夺。

立法工作并没有中断。这一时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法令,规定了设置教育与公共卫生部,米纳斯吉拉斯的政客弗朗西斯科·坎波斯被任命为该部部长。革命法庭,这个迫害和侮辱被打败的对手们的工具,在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革命者对它进行了指责之后,就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了,因为这些革命者的兴趣不在于迫害这群无依无靠的人,而在于重新改造他们,尽管他们过去充任过政界和政府的要职,但现在却多半都贫穷不堪了。

革命政府很容易就得到了外国的承认。外交285部,在阿弗拉尼奥·德·梅洛·佛朗哥的精明指导下,设法避开了革命风暴,同时保持了强大的巴西外交传统,特别是她与本大陆其他国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得到了梅洛·佛朗哥的继任者的维

护，他们之中包括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若泽·卡洛斯·德·马塞多·苏亚雷斯、若奥·内维斯·达·丰托拉和劳尔·费尔南德斯。在国联出面干涉未能成功之后，经过梅洛·佛朗哥的斡旋，秘鲁与哥伦比亚因为位于巴西亚马孙州边界附近的累提西亚而发生的边界冲突得到了解决。也是在国联失败之后，南美的一些共和国为结束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旷日持久的查科战争〔1932至1935年〕，曾进行了更为艰苦的努力。伊塔马拉蒂获得了几项双边贸易协定，其中包括"最惠国"的条款。

在运输部，若泽·阿梅里科·德阿尔梅达恢复了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政府开创的东北地区的抗旱工程。教育部制定了一个关于全国改革国民教育的庞大计划，但是未能执行。在其他部里，改革和改组公共事业的运动，不管它是有益还是有害，都一直没有中止过。

欧洲的思想冲突，在巴西所引起的反响，一直都很微弱。废除奴隶制的法律，是君主制时期唯一的社会立法，而这种立法的观念，在"老共和国"期间，只是在缓慢地继续发展着。国会的一些委员会

对它进行研究，并通过了少数几项法律，但也跟往常一样是权宜之计。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由1917年编纂的民法以及商业法典作了规定，但是没有象欧洲工业化国家正在扩大和调整的那样制订专门的法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西本身在走向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以及她在日内瓦定期会议上所作出的诺言，促使她制定了使工人直接受益的第一批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到工时、工业事故、带薪休假、抚恤金及退休金等。

在1930年的革命以后，建立了劳工部。后来，又在其中添设了管理工业和商业的部门，这大概是为了节约，而不是想要把这三项由国家监督的活动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部，在它的首任指导者南里约格朗德的林多尔福·科洛尔的主持下，推动了很多项立法工作，并且建立了关于劳工国有化、最低工资、身分证明和雇佣手折、劳工组织化等项司法裁判标准。在〔瓦加斯〕临时政府时期，劳工政策的特点是：民族主义的思想，在雇主286与雇工之间进行调解和仲裁的精神，以及政府控制下的单一工会。这个由科洛尔开始着手的计划，虽然有辞句含糊和临时拼凑的毛病，而且最后又

遭到官方煽动家的滥用和败坏，但它仍然是瓦加斯政府最伟大与最大胆的一项成就。

劳工法庭建立起来了，它所起的各种保证作用与普通的法庭相同，但因为它完全是在城市工人中进行工作的，便使得没有组织的农村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处境，在很多方面，都与劳工运动以前的普遍状况没有什么改变。社会福利活动，有了巨大的而且常常是不合情理的发展，这些活动是那些特定的工人所设立的许多半自治机构进行的，这些机构又变成了替政府本身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

华盛顿·路易斯总统留下的遗产，并不象人们根据1930年10月10日他抨击革命运动的宣言所推测的那样美好。他当时引用国家的对外信誉、货币的稳定、国民生产数量和价值的增长、预算的盈余等，指出经济繁荣和国库秩序良好的周期，已经在一年前随着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而宣告结束了。根据华盛顿·路易斯政府一再发表的声明，在他执政四年当中，每一个财政年度结束时都有盈余，这些声明，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一直继续到这次革命胜利以后。流通中的纸币数

量，即使在巴西银行被征用之后，也不过稍多于300万干度，这与联邦的收入相等。

按照革命政府所透露的材料来判断（在这些材料中，没有把世界性的萧条考虑进去），客观形势恰好和华盛顿·路易斯所描绘的相反，实际上是一种财政上彻底破产的局面。1927至1929年的盈余，已经变成为130万干度的赤字。革命的爆发，迫使政府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如宣布戒严、对各州进行干涉、召集后备兵、进行囤积、宣布商业的延期偿付令等等。为了支付由于革命而开支的特殊费用，曾授权巴西银行发行30万干度的纸币，而以100万磅黄金储备和外汇为保证。国库后来又把全部黄金储备共1,000万磅，拨作其他的用途（这是1926年法律所允许的），而同时又对银行早先发行的592,000干度，也承担了责任。在此期间，因为纸币的发行数量增加了17万干度（受权发行的30万干度除外），于是国库负担的责任也就增加同样的数额。银行和国库为了支持外汇率而采取的各种权宜之计，已经占用了国家的大部分黄金储备（其形式为铸币或者金条），其中包括那些从联邦、州和自治市所借外债中得到的黄金储备。

287

巴西银行在国外的贷方余额（意为债权——译者），也变成了借方。银行的黄金储备转移到国库去，实际上等于重新发行一次纸币，这件事遭到了严厉的谴责。革命政府提出要纠正前任政府的错误和弊端，惩治它的罪恶，恢复秩序、廉洁与职能，以便“使全国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光辉前景。”

在若泽·马里亚·惠塔克的主持下，瓦加斯政府的财政管理工作，继续坚持使用若阿金·穆尔蒂尼奥的古典派方法，即：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虽然国库收入减少，却尽可能使预算收支平衡。为了满足支付外债利息的需要，政府动用了巴西银行剩余下来的黄金和稳定基金，这就和先前的政府为维持外汇率而采取过的办法一样。政府放弃了华盛顿·路易斯的不妥协政策，直接干涉了咖啡贸易，以便为该项贸易取得“统计上的平衡”。增设了一项10先令（后来提高为15先令）的特别税，用来收购贮存的咖啡，然后将这些咖啡烧掉。有些咖啡被用来交换美国的小麦。

1931年末，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接替若泽·马里亚·惠塔克任财政部长，他并不坚持其前任的

政策。他把那种标志他在司法部整个工作过程的紧张不安的心情，也同样带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来了。大概是受到了提倡新的办法（如不久将在美国试行的新政）的思想影响，他可能觉得，一份公共工程建设计划和增加一次工资，就能够引起抵制萧条的心理反应。但是因为他不能象罗斯福那样，采用各种强迫或自愿的办法举借内债，所以只好采用国库发行纸币这个应急的老办法。直接收购咖啡的制度，由“大牺牲”的制度〔经过控制的生产限额〕取而代之，而全国咖啡会议，也改为隶属于财政部的一个部门。正如丹尼尔·德·卡瓦略在所著《经济与财政研究》一书中所说，这个费用浩大的新机构，并没有致力于改善产品，使产品降价，反而坚持它目前仍在进行的那种作法，坚决主张人为地保持高价，而结果只能在国际市场上鼓励竞争者。

288 依照英国专家们的建议，由同巴西有长期商业往来的罗思柴尔德财团派出了奥托·尼马尔代表团，达成了一项统一外债付息的筹措偿债基金新方案，它比先前的方案更加露骨地采取了一种同濒于破产的债务人和解的偿债形式。这个奥斯

瓦尔多·阿拉尼亚方案承担了一笔偿付2,000万镑外债利息所需的款项，或者根据丹尼尔·德·卡瓦略的说法，这笔款项等于本国有效汇票或贸易承兑期票的总额。各州和自治市的对外负债，是一些条件苛刻而且名声往往很坏的贷款造成的，对它们也进行了整顿。一个研究经济和财政的特别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农业贷款的整顿——经济调整——是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着手进行的另一个步骤。它在性质上虽然是属于政治方面的措施，但假若它没有搞过了头，特别是假若它没有替其它一些只是明显的徇私舞弊的“调整”大开方便之门的话，它本来可以证明，是具有很大经济价值的。

同时，全国已经遭到了一些事件的骚扰，它们好象在预示着全面无政府状态的出现。胜利初期的那种热情，很快就冷却下来，在那些十分起劲地欢迎瓦加斯的文职政客和保守的中产阶级中间，情况更是如此。在各州，军队的间或是市民的骚乱，此伏彼起，多少有点儿象弗洛里亚诺·佩绍托的时代。在圣保罗，险象环生的纷乱，有增无已。和解洪达在它接管政府的当天，就给指挥该州军

区的将官下令，叫他掌握圣保罗的政权，并停止进一步的敌对行为。当时在职的州长，因为无法再依靠当地警察司令，未加抵抗便投降了。儒利奥·普列斯特斯原来为了取得总统的候选资格，辞去了州长职务，这时已经到英国领事馆里避难。在公众的欢呼之下，建立了一个秘书处，以阿斯丁菲洛·德·莫拉将军为首，并包括有一些显要人物、民主党的政客以及商人在内，它后来被人们称为“四旬政府”。这就消除了用武装抵抗入侵部队的一切可能性，入侵部队当时驻扎在巴拉那州边界沿线。可是，不管是热图利奥·瓦加斯，还是他那个由政客和官员组成的参谋部，都不欢迎洪达所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五天以后，若奥·阿尔贝托中尉作为革命政府的军事代表，在圣保罗进行接管；实际上，他对于那个在莫拉将军被免职之后由普利尼奥·巴雷托任主席的秘书处，握有否决权。这样一来，就开始出现了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被革命者认为是圣保罗的“错误”，而且将爆发为1932年宪政派的革命。同样的“错误”也在米纳斯吉拉斯发生了，在那里，唯一保留了合法头衔的州长奥莱加里奥·马西埃尔已接近于被免职。

289

1932年3月，在皮特罗普利斯向“10月3日俱乐部”的代表们讲话时，瓦加斯同他在其他场合一样，坚决主张在制定宪法之前，需要“清除地面上那些窒息它的丛生杂草”，“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重建国家，整顿政治，改革行政，以便确保她在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复兴。”所以，年轻的革命者“和平地宣传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他的称赞。那些希望加速恢复宪政制度的人，都是“一些渴望安享权势之乐的哭泣者，……脱离国家现实的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

当然，在革命队伍的内部，急进派遭到了温和主义者、“搞自由化的人”、仍旧忠于1891年政治结构的人以及许多职业政客的反对，在这帮政客们看来，随着华盛顿·路易斯这个犯有长期败坏民主制度的错误、造成弊端和腐化堕落的人被赶下台，革命就已宣告结束。分歧扩大了，特别是在圣保罗和南里约格朗德。普通百姓，对革命的诺言已经丢掉了一半幻想，现在最害怕新的武装冲突。内阁部长和联邦政府派出的督办接连不断地迅速更替；偶发事件和公开骚动日益增加。

里约一家报纸遭到一群暴徒的袭击，这件事

使危机提早发生了。其实，第一任陆军部长〔莱特·德·卡斯特罗将军〕的离职，以及司法部长和里约警察总监（他们俩都是南里约格朗德人）的离职，就已经预示着危机的出现。最大的骚乱中心是圣保罗，那里的民主党政客还没有消除他们原来的失望情绪，因为热图利奥·瓦加斯未能信守他许下的要任命一个圣保罗人任督办的诺言，他任命了若奥·阿尔贝托充任督办。党派的煽动和经济上咖啡的衰落，使阿尔贝托的政府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过了几个月，他就把工作转交给著名的法官劳多·德·卡马戈，但是劳多不久就以一份简单通知被免职了。接替这位法官的是军区司令，他是一位诚实的实证派将领，办事的特点是，态度有些不合情理和异想天开。圣保罗人的愤懑与日俱增。接受其他州来的军人统治（这些人与当地人的利害和愿望又不相同），这在他们看来，不仅很可耻而且难以忍受。“让文职的圣保罗人当督办”，变成了他们要求的宗旨。瓦加斯在他那些里约格朗德的追随者们的压力之下，被迫答应了这个要求。

290

但是任命那位受到广泛赞扬的佩德罗·德·

托莱多（即埃尔梅斯·达·丰塞卡内阁的农业部长及前任驻阿根廷大使），已不足以缓和紧张的形势。同时，尽管瓦加斯采取了全国“重新实施宪政”的措施（例如：委派一些专门委员会精心制订选举法和起草宪法，挑选参加选举委员会的法官，以及规定1933年5月为选举日），圣保罗人和其他一些自由派的上层人士，都不相信他具有诚意。在圣保罗，反对瓦加斯的武装阴谋开始了。两个大党——圣保罗共和党（PRP）和民主党——结成了统一战线，该州的大多数居民和社会阶层都以巨大的热情集结在它的周围，而且这个战线也和南里约格朗德的解放党有着紧密的联系。

革命于1932年7月9日爆发，为首的是马托格罗索军区司令贝尔托尔多·克林热将军，他领导的叛军，由州内的宪兵、联邦警备队的大部分和志愿民军大队所组成。现在还很难推测和说明，这次起义之前的政治动向和它那复杂的直接原因，其中包括巴西国外的某些关系和某些退出联邦的模糊愿望；这些东西，后来又被起义失败而自然地引起的怨恨进一步加强了。这次在圣保罗的土地上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许多军事行动，也同样难以

追述。看起来，这次运动的意义并没有阐述清楚，而且是匆匆忙忙地拼凑起来的。瓦加斯在7月12日向全国发表的宣言中承认，联邦政府“获悉在圣保罗爆发了一次性质显然反动的叛乱运动”，感到吃惊。

叛乱分子确信可以得到全国在道义上的支持，但更相信可以得到米纳斯吉拉斯和南里约格朗德在军事上的支持。这两个州都使他们失望了。米纳斯吉拉斯州长奥莱加里奥·马西埃尔和南里约格朗德的督办弗洛雷斯·达·库尼亚倒向了联邦政府方面，并把他们的警察部队和民军大队同当地的联邦警备队结合起来，对圣保罗的革命者采取了敌对行动。他们很容易地攻克了当地的起义据点，逮捕了一些领导人，如在米纳斯吉拉斯的阿图尔·贝纳德斯（前任总统）和在南里约格朗德的博尔热斯·德·梅德罗斯。因为海军没有给予支持反而封锁了该州的海岸线，因为州长托莱多要求驻圣保罗的外国领事馆在国际上承认处于交战状态而遭到了拒绝，因为有从空中被轰炸的危险，因为里约的公共舆论已被戒严令所窒息，因为瓦加斯在北方各州都可以很容易地募集军队，所以，

圣保罗的革命者很快就发现，他们已被戈伊斯·蒙特罗将军所指挥的联邦部队包围起来了。

由于失去了向联邦区迅速进攻的有利条件，圣保罗人只得开展小规模的阵地战。这样，他们不久就投降了〔1932年9月29日〕，同时也葬送了他们那些非凡的努力与公民的热忱，其中包括已被转入军事生产的工厂。瓦加斯政府对待失败的敌人并未采取新的报复形式，而只是重复了1930年的那些作法，特别是监禁、放逐以及取消政治权利。虽然在军事上是失败了，圣保罗人的革命，实际上却达到了它的主要的目的，或者至少是达到了它最明确地宣称的目的，即：迫使政府不再借词推托而立即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1930年革命的一项主要诺言实现了；对选举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建立秘密和强制的投票制，其中包括授予妇女投票权，制订专门的选举法和建立专门的选举司法机构，各州设立地区法院，在里约设立高级法院。可是，实行这一新制度的最初经验表明，一些固有的缺点仍在起败坏作用，譬如选票计算的缓慢，尤其是仍然给欺骗和行贿开着方便之门。但不管怎么说，11月间召开的制宪国民代

表大会的选举，总算平安地举行了，翌年〔1934年〕巴西得到了她的第二部政治宪章。它的一项重大革新，在于规定了阶级代表制，这一社会观念使工会、职业和行业协会得以直接插手政府的指导工作。

在一种正式的民主政体中，国家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结构，所以，它的代表机构也是如此。被选进这些机构里的人，就成了国家主权的化身。代议制政府的这个基本原则，看来是确定不移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深刻变化——俄罗斯共产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迫使人们对自由主义的而且基本上是个人主义的民主，重新评价其理论上的价值。共产主义通过消灭社会阶级，消除了它们的代表问题。法西斯主义，有点叫人想起古罗马的恺撒主义或者拿破仑三世的专制帝国，它自称劳资协会主义国家是它的首创。它说，单有政治代表，即使是合法的，也并不完备。个人是属于有特殊经济利益的一个阶级、一个行业或职业的。因此，阶级代表可以把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结合起来。反对这种观念的大量论证在本文中不再复述。巴西的1934年宪法没有敢走得象意大利

292

法西斯主义那样远，或者重复德国威玛共和国分设政治和经济两院的悲惨经验，而是把这两种成分同时容纳在议会的同一分支机构里。

按照这种制度，在250名政治代表之外，又增加了由工会或协会直接选出的50名阶级代表。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是政府通过工会间接选拔出来的，所以他们很快就与政治代表同流合污，只不过变成了议会运用计谋的一种工具。因此，他们使国会很早地就丧失了威信。

但是，即使没有这些品质低劣的阶级代表，1934年宪法似乎也注定只能存在一个很短时间。它缺少1891年宪法所具有的那种思想上的统一，因而，反映了时代的混乱以及大多数制订者在政治上的缺乏经验，而且它还载有一套烦琐的详细规定。它保持了1891年的联邦主义与总统主义的结构，但是对总统的权力规定了比较严格的限制，并且为反对联邦主义的过分行为，规定了间接的防御措施。国家各部部长对他们的行为所负的直接责任，以及他们出席国会和参加辩论（但不能投票表决）的特权，使初期的严格的总统制有所削

弱。假如部长是国会议员，他们并不失掉他们的议员职位，而由其候选议员来代替。总统和州长（这些都禁止连选连任），将继续由人民直接选举，不过按照新宪法，第一任人选，要由国会确定。副总统的职位废除了；总统出缺而任期未满的，由众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与最高法院院长依次递补。

参议院的组织和职能大为削弱。参议员的数目减为每州二人，任期连续八年，并可以延期四年。因为参议院的职能并未明确规定，它的性质有些模糊不清。参议院，在关于立法权的一章里并没有提到，而是被赋予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即：促进“协调公共权力、维持行政的连续性、保卫宪法”，等等。在国会休会期间，参议院的二分之一将改变为一个常设的立法团体。参议院不参与预算立法，但可以提出建议撤销它认为不合法的行政议案，并且可以暂时停止执行最高法院宣布的违反宪法的法律、法案和条例；最高法院取代了旧的联邦最高法院，其成员由十五人减为十一人。

1934年宪法的社会化倾向明显地表现在，它要求政府负责制定庞大的行政管理计划并且设立专门的协商会议。关于经济与社会秩序、家庭、教

育以及文化，都有专门的章节。联邦区被授以自治权，其行政长官由民众投票选举。行将当选的第一任长官佩德罗·埃内斯托，结果竟被联邦政府逮捕。1891年宪法所建立的司法体制被保留下来。国家岁入在联邦、州与自治市之间的分配办法，经过修改后稍稍有利于后二者。为了发展开采业〔例如矿业〕，从法律上将地下与地面财产分开，于是取消了1891年宪法规定的关于添附权的传统规定。规定了最低工资，并且成立了劳工法庭。宗教训练被确定为可以任意选择。和1891年宪法一样，新宪法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作了一项关于个人同国家关系上的“个人权利声明”，但是它却限制了外国人的政治权利。对人身保护令的应用范围规定了界限，并制定了安全法令〔一种禁止或羁押的法令〕，以“保护显然遭到非法行为威胁的确实而不容置疑的权利。”热图利奥·瓦加斯被〔国会〕推选为总统，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圣保罗集团投了空白票。

简言之，1934年宪法是各种思潮，例如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整体主义者之间，彼此妥协的一种方案。某些部分之所以被接受，是

因为各党的首脑们要保全整个宪法。它始终注意防止总统滥用职权，因而过分地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依靠各大州通过它们大的国会集团所表达的政见。因此，恢复宪政政体，并没有使全国获得至少是上层社会曾经期望的那种安全与平静的感觉。

热图利奥·瓦加斯天生的脾性，他受到的党派训练以及他运用专制权力的经验，使得他根本不想在实践当中纠正这种制度在理论上的缺点。相反，立法机构的迅速腐蚀，或许使他看到了彻底改变国家结构的可能性。而且，变化不定的状态和潜在的动乱，便利了极端主义思潮的宣传，这些思潮当时正在欧洲互相斗争而且不久就要把差不多所有文明的国家都投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去了。

各种极端思想之间的冲突的影响，在象巴西这样一个政治与经济都很软弱的民主国家里，往往要更加强烈一些。一方面是共产主义，它的领导人是先前的革命者、陆军中尉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并有一个由知识分子和职业煽动家组成的参谋部；它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运用通常的政党策略，企图在无产阶级群众当中获得一个

立足点。另一方面是整体主义，它正设法争取被布尔什维主义吓坏了的中间阶层。

整体主义的基础，是1932年10月普利尼奥·萨尔加多在一篇“告巴西国民书”里奠定的；这个人是圣保罗的一位作家，在那以前，一直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除了在形式和方法上有一些次要的差别之外，整体主义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直系后裔；欧洲其他的反动运动，例如整体主义最近似的典型——在奥利维拉·萨拉萨尔独裁统治之下兴起的葡萄牙新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整体主义，据它的领袖讲，其灵感得自古老的三部曲：上帝、国家和家庭。它是反对不可知论的，是天主教、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在政治上，它反对联邦主义而拥护自治城市。在经济上，它奉行工团主义和劳资协会主义。简言之，它鼓吹“一个整体的国家，即许多民族实体的最后的综合”，这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政党和只有一个元首的独裁主义政府。同其它类型的法西斯主义一样，整体主义也有自己的象征：绿衬衫、一面旗帜、一首赞歌、一种敬礼的方式，以及军事训练和确定的学习中心。他迎合了当时存在的一种混乱的保守愿望，即要求有一个

能够阻挡共产主义渗透的纪律严格的等级制度，它也得到了某些天主教分子的同情，其中包括教会一些显要人物在内。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把它的影响扩大到整个巴西。

1934年宪政政体的结构，似乎证实了政府一再重复的关于国家的防御手段并不可靠的主张，这种策略，德国纳粹党人在威玛共和国时期，就曾经采取过。瓦加斯是运用分而胜之这个古老战术的能手，对于单纯镇压他的敌人——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分子——的可能性，并不感兴趣。象大的民主国家在外交和内政当中所实行过的那样，让它们彼此互相敌对，才是保证一个人生存的巧妙办法。因此，极端主义者们发现，他们有几乎是充分的活动余地，不仅可以转变为合法的政党，而且可以公开地阴谋反对既定的制度。政府与极端主义的首脑——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与普利尼奥·萨尔加多，保持着公开的或秘密的接触，而且不止一次地给予后者一项内阁职务。① 临近1935年末，在伯南布哥和北里约格朗德两州的首府，发

295

① 普利尼奥·萨尔加多：《整体主义与国家》。——原著者

生了血腥的共产主义暴动。11月27日，又发生了对里约联邦兵营的一次突然袭击，忠于政府的官兵遭到了共产党军官的无情杀害。政府随后取得的胜利，自然地巩固了它的威信，但是全国的紧张状态却严重了。

热图利奥·瓦加斯被国会推选为总统之后，其任期在1938年结束。政客们急忙地提名他的继任人。最后决定了两名候选人：一个是〔帕拉伊巴州的〕若泽·阿梅里科·德·阿尔梅达，他得到官方的支持；另一个是圣保罗的州长阿曼多·萨莱斯·德·奥利维拉，他吸引了大多数反对热图利奥·瓦加斯的人。共产党人也提出其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为候选人。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之下，那个促使1932年宪政派叛乱发生的圣保罗州的联盟，不久就被粉碎了。已往斗争中的仇恨，又被放在比一位圣保罗候选人的利害关系还要突出的地位。1930年，民主党同反对华盛顿·路易斯和儒利奥·普列斯特斯的革命者站在了一边。现在，在1937年，已经被1930年的同盟者所击溃，并且被迫害的圣保罗共和党，便出来支持瓦加斯和若泽·阿梅里科。

这两个候选人的竞选运动，从一开始就很激烈，这在那些比较胆怯的人们看来，乃是一个坏兆头。也许与他们自己的愿望、与他们那些比较谨慎而有经验的追随者们的愿望相反，这两个竞选者把全国分裂成似乎不可调和的两个阵营。若泽·阿梅里科似乎代表着最纯正的革命精神；他这个候选人，来自全国最贫困的地方，也来自群众，总之，他是一个从左的方面最有可能遏制共产主义潮流的人。阿曼多·萨莱斯来自最富裕的州，他好象是体现着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和上层资产阶级的愿望，也就是说，他体现着保守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归根到底是老共和国的标志，并且给予了1930年胜利的运动以鼓舞。然而，对两位候选人的这种牵强附会的评价，并没有阻止地方党派的争端来分裂圣保罗人，另方面也没有阻止北方以前各主要党派的残余部分去支持若泽·阿梅里科，纵然他们受到了1930年革命派的迫害。他们所以要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一个北里约格朗德人的地方观念，倒不如说是由于本地经济上的理由。

在共产党人和整体党员制造出来的骚乱不安的气氛中，尽管瓦加斯的一群对手在国会里结成

一个联合的反对派坚决反对他，他却能够从国会获得了特殊的权力，由国会通过一些法律，将全国置于战争状态之下，并且把他以前的独裁权力恢复了一大半。两位候选人的某些追随者认为，他们俩人当中，应该有一个人退出去，来支持另一个人，否则应共同退出来支持第三者，以便解除危机，防止一次可能发生的政变；有些警惕性较高的人，对于可能发生的政变已经感到疑虑了。但是和以往的情况一样，这种警告是毫无用处的，至少在开头的时候是如此。

建立一个独裁国家——一个“新国家”——的宫廷阴谋，开始形成了。主要的谋划者，除瓦加斯本人以外，还有陆军部长欧里科·加斯帕尔·杜特拉将军、陆军参谋长戈伊斯·蒙特罗将军、司法部长和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坎波斯与阿加梅农·马加良斯。一份伪造的文件出现了，它透露说一场共产主义的大革命即将爆发。社会上普遍的忧虑不安，极右派正在取得的进展、国会的懦弱无能和随之而来的丧失威信、在国会里和军队里巧妙地培植起来的对骚动与叛乱的恐惧，这一切都非常有利于总统所策划的政变。安东尼奥·卡

洛斯是一个可能竞争总统职位的人，他被夺掉了众议院议长的职务。司法部长派出去的一名密使，已经使一些州长（这些人不久就将一变而为联邦的督办）默认了这次政变。然而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州长弗洛雷斯·达·库尼亚是一个在别人之前首先被征询意见的人，他却反对采取这个步骤。联邦政府利用战争状态作借口，解散了支持他的临时民军大队，破坏了他的地方警察，最后迫使他放弃职务，到乌拉圭避难去了。

为了牢牢抓住个人的权力，瓦加斯采取了一切手段，来扩大民主势力内部的分裂。他的一部分战略，便是煽动左右两个极端主义集团，使之互相敌对，并经常把它们当作恫吓中间派的稻草人。因此，他同共产党，特别是同整体党，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共产党1935年的暴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它的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被关进监牢，该党也被宣布为非法，瓦加斯与整体党靠得更近了。根据普利尼奥·萨尔加多的证词，瓦加斯曾要求他支持当时正在准备的政变，也向他征求过对新宪法的意见。萨尔加多对“新国家”的劳资协会主义基础表示同意，“不过我认为，单单修

订一下1934年宪法，就足以使社团选举取代普遍选举，就足以扩大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并加强中央的权威。”不管怎么说，“只要政府得到武装部队的支持，整体主义就不会给它添麻烦。”据说，为人狡黠也比较爱说讽刺话的司法部长弗朗西斯科·坎波斯曾宣称：“整体主义的学说构成了‘新国家’的基础，可是，这个党仍然需要开门接纳所有愿意合作的巴西人，以便共同建立一个庞大的团体，来支持国家元首所提出的目标。”这样一来，〔萨尔加多认为〕整体主义就将通过其他手段，取得它在理论上的胜利。但是，他不久就认识到他的错误。11月10日政变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据他自己承认，更使他震惊的是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演说，这篇演说宣布镇压一切政党，包括整体党在内。甚至不允许任何一个党派作为一个文化、体育或者慈善团体而存在下去。官方的法西斯主义的一党制，是不容忍竞争的。 297

六个月以后，在1938年5月11日，某些整体主义者与某些自由主义政客联合起来，试图对总统的官邸瓜纳巴拉宫进行一次夜袭，他们很快就被陆军部长所指挥的忠于政府的军队击退了。热图

利奥·瓦加斯也将再一次战胜他那些互不团结而轻举妄动的敌人。一经宣布为非法，整体主义也将要和共产主义遭受同样的命运：它的一些主要人物被逮捕了，它的领导人则被客客气气地流放到葡萄牙。

1937年11月10日，没有遭到任何反抗，里约的警察便关闭了国会两院的大门，恰好似六年前葡萄牙议会被关闭的情况一样。如果说，忠于自由主义传统的政客们和全国大部分上层人士，是带着惊恐和内心深处的反抗情绪接受了这次政变的话，那么，广大的群众，以至于不过问政治的中产阶级，则是带着一种模模糊糊的同情心，或者至少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来接受它的。这次政变甚至也使部长们感到惊骇，他们或者为它拍手叫好，或者很文雅地接受了它，但他们都坚守了部长的职位；只有农业部长奥迪隆·布拉加例外，他辞职了。

当晚，在瓜纳巴拉宫，热图利奥·瓦加斯由其同党和朋友们(其中包括被解散的国会的成员)簇拥着通过无线电广播宣读了一份“告国人书”。共和国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民主制度正在垮掉。

巴西正在进入极权主义国家的行列。瓦加斯所持的理由，跟其他独裁者所持的理由毫无差别：自由主义已经过时，政治与经济结构是虚伪的，政府结构患了不治之症，过分的地方主义损害国家的统一，行政无能，立法徒劳无益，总统的竞选加剧了 298 无政府状态的威胁，等等。所以，注意到“巴西人民对社会和政治和平的合法愿望……〔以及〕共产主义渗透所引起的恐惧……共和国总统，在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公布新的宪法。”

1937年宪法，丝毫也没有保留旧的自由主义传统，它的主要授意者与显而易见的编制者乃是弗朗西斯科·坎波斯部长。这部宪法使共和国的总统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独裁者，他变成了“国家的最高权威，他协调上层代表机关，掌握国内和对外的政策，推动或指导国家的立法政策，并监督国家的行政管理。”总统除了传统的权利之外，又被授以解散国会、颁布法律以及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权利。假如他没有提名任何人，便由总统选举团进行选择，选举团则由自治市议会选出的选举人、国家经济委员会、众议院及联邦委员会组成；否则，通过普选进行选举，而现任总统的任期

将延长到他的继任人就职时为止。立法权由众议院在总统与联邦委员会的合作下行使之。众议院应由一个专门的选举团进行选举。代表的任期为四年，每个州选出的代表不得多于十名，或者少于三名。联邦委员会应由各州选出一名代表和总统指派的十名委员组成，任期六年；委员会的主席由国家元首推荐。国家经济委员会由全国工业界代表组成，这些代表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平均分配，由法律上承认的职业协会或工会进行推选；该委员会由国家的一位部长主持。在原则上，立法的动议，属于政府的职责范围。不管是哪个议院提出的议案，如果与预算问题有关，或者牵涉到增加支出，便不能予以考虑；而那些涉及国民经济的议案，则提到经济委员会去听取意见。预算事务与行政管理政策，都全部操在总统下面的一个行政委员会手里。规定这些条文，是要把立法机关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

司法部门由它的传统机关组成，即：联邦最高法院，各州、联邦区和地区的法官与法院，以及军事法官与法庭，它们的职责与从前的职责大致相同。假如一项法律被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总统可

以把它重新提交给国会，国会可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宣布最高法院的判决为无效。

"新国家"宪法里包括有关于个人权利与保证的一章。规定了对新闻、电影和广播的检查。在巴西，以前除了对战争罪犯外，死刑是一向没有的，现在却适用于某些违反公共秩序和反对国家的犯罪行为了。婚姻是不可解除的，私生子女得到承认。初等教育被确定为义务教育。

现行的劳工法得到了巩固，并另有增加。职业协会和工会是自由的，但因为只有被国家承认的工会，方才有权选举〔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方代表，所以它们的自由也不过是一幕滑稽戏而已。工人罢工和资本家闭厂被宣布为反对社会的举动，同时，将劳资协会置于国家管理和保护之下，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这样一来，巴西就变成了一个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法西斯主义劳资协会的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总统可以停止国会的豁免权。这部独裁宪法须经公民投票批准，总统任期也同时予以延长。在州长的职位未经人民投票确认的各州之内，由联邦进行干涉（仅米纳斯吉拉斯州长的职位，曾得到确认）。事态发展的

必然高潮是，在全国宣布了紧急状态。

瓦加斯的1937年宪法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反映了一定时期的巴西生活。1891年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全文很短，形式严谨，说明了十九世纪末占据优势的自由民主愿望。历史上的共和党人——其中最主要的是鲁伊·巴尔博扎——都曾经从事于反对中央集权和议会制君主政体的斗争；他们也促使国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很自然，他们效法的榜样是美国，并且参考阿根廷作了一些调整。这部宪法虽然在四十年的实践过程中遭到了贬抑和损害，可是从整体来看，它却经受了许多次严重骚动的挑战。由热图利奥·瓦加斯强加给巴西的这部带有若奥六世或佩德罗一世专制主义的1937年宪法，是本国民主发展史中很独特的一个章节。在1823年解散制宪会议以后，佩德罗一世赐予了一部宪章，它在某些方面，比制宪会议精心编制的那一部还要自由一些。1937年宪法，是几个人擅自颁布的，他们当时是国家的统治力量。为了这个缘故，1937年宪法，从来也没有付诸实行，甚至也没有按照它自己的条文的要求，交付公民投票表决。

凭借着新宪法，或者全然置它于不顾，热图利 300 奥·瓦加斯的巨大权力，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里。他让一切事情都处于一种不固定的状态之中，对于他的这种倾向，有一句流行的话讽刺说："不要去管它，等我们看看它结果怎样再说吧。"他的对手和其他一些不信仰他的人，不止一次被暴虐的法庭判处流放或者监禁，其情况的残酷，显然是警察国家的典型。别的人就设法适应这种局面。新闻出版和其他公共宣传机构，被时刻警戒着的检查员剥夺了自由之后，由一个特设的机构——新闻宣传部（DIP）为"新国家"和它的独裁者大肆进行宣传。它使用的手法与其他极权主义政体的手法并没有什么区别，所取得的成果也毫无二致。

热图利奥·瓦加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耐心倾听别人的意见，他说话极其小心谨慎，时刻注意不作出任何诺言。虽然他没有个人的吸引力，可是他却始终都激起了民众的真挚同情。当1930年革命的某些最重要人物最初垮台的时候，瓦加斯却幸免于难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关于他性情善良、天性仁慈宽厚的传说（有一部

分是真实的)。他在政治上的机巧,也是受公众尊敬的一个原因;到处流传着一些关于他精明机敏的传闻,讲他怎样躲过了一场凶险的危机,或者是摆脱了一个难于应付的对手或胆大妄为的朋友。他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民众的意向。我们可以设想,他对巴西社会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发自内心的厌恶,以及他那种显然在于煽惑民众的意图,这二者都促使他要在时时刻刻为官方宣传所鼓动的群众当中,去寻求上层阶级所拒绝给他或者不情愿给他的那种支持。

共和国的政治,由于帝国时代的传统,向来都是由一个形成了辛迪加的严密的小集团,在最高阶层来进行指挥。国家的经济只限于出口农产品,中产阶级又没有掌握实力,而且人们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所抵制的那种欺骗选举又已习以为常,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广大的人民群众,除非是在大的城市中和在激烈的政治运动期间,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他们还是一片需要开垦的新土地。新的劳动法,直接有利于成长中的城市工人阶级,使他们开始有了阶级觉悟。瓦加斯巧妙地利用工人处境的改善,来改善他自己的处境。任何事

情出了毛病，他的宣传机构都归咎于他的主要助手们的疏忽或失职；任何事情成功了，则要归功于他。这就是事情的奥秘所在，对它进行任何反抗，看来都是毫无用处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两年当中，巴 301 西的生活过得比较平静。巴西的乡村，仍然保持着她那古老的面貌和陈旧的思想方式，即使有些运输，也是很少的。低得无法维持生活的工资，加上几乎完全没有国家的补助，使乡村工人长期处于消费不足的状态。但是中心城市，特别是里约和圣保罗，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高额关税保护的鼓励之下，制造工业的勃兴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农民群众，不过他们却无法就业，甚至连住处都没有。在科帕卡巴纳的华丽住宅和公寓大楼的后面，迅速出现了肮脏的棚户区(favelas)和它们的化外之民。圣保罗市的发展是与该州的发展分不开的，反之，里约的发展则是人为的。它是个官僚和寄生性的城市。它的地形美丽如画，因为它位于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地带的边缘上。所以，里约的居民，只好通过很远的路程，运进他们的日用必需品。公用事业跟不上城市无秩序的发展；水、交通运输、

电力、食物等供应不足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经常。专政期间，由精力充沛的行政长官恩里克·多兹沃恩开辟的新的大马路和通往市外的新公路，也不过使运输的恐慌稍微减轻一些罢了。

大城市迅速发生的拥挤情况，人们迁移到公寓住宅之内，妇女为谋取从前由男人独占的政府机关和商业部门的工作而展开的竞争，以及美国习惯的影响日益扩大等，加速了城市生活的急剧变化。那种与世隔绝地居住在边远地区、住宅有前庭和后院但通常并没有现代化设备的宗法制大家庭的古老传统，正在逐渐消失。不久之后，随着通货和信用的膨胀，从前贫富之间的悬殊将变得更为严重，而短时间内发财致富的诱惑，也将变得难以抑制。房地产——混合办公大楼和公寓住宅大楼，把土地分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建筑用地——的投机买卖，将变成世界上最荒诞的交易。容易借到的长期抵押贷款，使中产阶级实现了他们先前要求有自己住宅的荒唐美梦，同样，分期付款购物法，使他们甚至可以拥有豪华的室内设备。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却用于城市的

投资和消费，这对于巩固国家的经济毫无作用。

按照罗斯福的政策，美国逐渐地度过了1929年的萧条时期，而伴随着美国的恢复，世界的经济和金融状况，其中包括巴西的在内，也得到了改善。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巴西长期的兴衰交替情况的停止。尽管如此，在保守的财政部长阿尔图 302 尔·德·索萨·科斯塔（他在1934年取代了阿拉尼亚，并继续占有这个职位，直到瓦加斯政权结束为止）的主持之下，商业开始渐渐地恢复了它的正常步调。咖啡以外的商品，例如圣保罗的棉花，出口开始增加，这就改善了贸易情况。对咖啡生产者规定定额、使咖啡的产销达到平衡的作法，并没有被国外的竞争对手所仿效。所以，政府便解除了未满期的协议，并对咖啡降低了出口税；咖啡的出口额开始迅速增加，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下降了。不过，数量的减少却被价格的上涨所抵销。

在实行一系列的计划与协议（例如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与罗恩柴尔德财团之间的计划和协议）之后，统一外债已经大大减少。当外国贷款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切断了的时候，政府便发行了自

愿认购和摊派的内债，例如国库券和战时公债。纸币的流通量，从1930年的28亿密耳瑞斯，增加到〔1939年的〕170亿，而外汇率则降低到巴西历史上的最低点。尽管如此，巴西的硬币仍然保持了它在国内的购买力，这是由于巴西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展和国内的物价仅有适度的提高。

很自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迹象大大地刺激了巴西商业的活动，同时，随之而来的繁荣，也缓和了对"新国家"的批评。凡巴西能够供应的东西，特别是原料，都和1914年一样有销路，只不过规模更大罢了。巴西无法购得她通常需要进口的、特别是从美国进口的民用商品，这就迫使她积聚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并且刺激了本国工业的发展，尽管其生产象1914年一样，遭到了不合理的临时措施、牟取暴利的行为、交通运输的不足以及官僚作风的严重损害。

巴西的新硬币，也就是取代过了时的密耳瑞斯的克鲁赛罗〔南十字〕，终于〔在1942年11月1日〕发行了。〔1944年7月〕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国际会议上，它按美元计算的价值，被确定为1926年币值稳定时的两倍以上。这仍然是官方的汇率，而

它只相当于公开市场上现行汇率的四分之一。①

经济上的进展，既不稳定又缺乏组织。在伏耳 303 塔一里东达〔里约热内卢州〕建立了炼钢厂，而多西河公司的设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矿业开采，并开始从米纳斯吉拉斯（通过圣埃斯皮里托州的维多利亚港）输出铁矿石。在解决十分紧迫的运输与燃料需要方面，所做的工作却很少。铁路的营业几乎全都亏本，而且和公路一样，严重地失修。铁路和公路这两个系统都没有什么扩展。总之，尽管巴西的工业在拚命地向前奔跑，但她仍然是个典型的不发达的大国，按人口计算的平均收入很低而又急遽多变，她过分地依靠对外贸易，而且她那很低的生产当中，三分之二是初级商品。这一切原因，造成了生活水平的低下和对经济事件的极度

① 自从写下了这一点以后，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克鲁赛罗实际变得毫无价值。1965年底，与美元的比价是2,200比1，政府的某些财政数字，因之不得不以按兆计算的克鲁赛罗来表示。一种价值为现有克鲁赛罗二、三千倍的新币，一俟政府确信它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已经在稳定物价方面取得成功，便可望在1966年予以发行。——英译者

敏感。①

巴西所需用的全部油料和一半的煤，都继续依靠国外来源。水力发电的利用，只达到最低限度。可是，她幅员辽阔和她在水陆交通方面的不发达，却加速了商业航空的发展。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民用与军用航空部，在它的主持之下，开辟了许多条航线通往实际尚未发现的偏远地区。在政府的许多民事和军事的部门里，日常工作以及少数比较大胆也比较有效的计划，都在继续进行，但是相沿成风的缓慢、文牍主义、官僚机构的拥塞和拖沓，则依旧到处存在。

瓦加斯政府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将永远是耐人寻味的。工业化不断发展，现代化大城市随即控

① 因为官方和半官方的统计都靠不住，所以，过多地引用有关巴西经济发展的数字，就未免愚蠢了。在一个慢性的通货膨胀时期，即使是估计性的国民收入，也是一个具有很大相对性的指数。尽管如此，实际生产增长的百分比，尤其是1939年战争开始以后，在制造业方面，还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它大于人口的增长率。农业生产，在1939与1953年之间增长30%；矿业生产增长55%；工业生产增长163%；交通运输增长142%；商业增长94%。实际生产的总增长率为74%，而人口的增长率为38%，其结果是，按人口平均生产增长了26%。——原著者

制了乡村地区，在由此而产生的新的气氛中，靠工资生活的劳动群众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瓦加斯的劳工立法和宣传鼓动激起了人民群众对他的深刻甚至是狂热的同情。由于培养了这种同情并且得到武装部队的坚决支持，他可以不需要旧式的民主政客的合作。但是，他的政府的这种平民主义的性质，并没有妨碍它取得工商业巨头们的支持，因为这些人相信，它会改变工人阶级的极端主义趋势的方向。圣保罗州在1930年革命期间失掉了对联邦的政治领导权，而且在1932年宪政派起义中被击败，恰恰是在这个最富裕和工业最发达 304 的州，瓦加斯获得了最高的个人威信。

全国，至少是城市中心，在道德上和在社会风气上，已与1930年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全世界动荡不安和社会准则遭到破坏，另外也是由于巴西本身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形成则不仅是因为政治支配权突然而紊乱地从乡村地区转移到城市，而且，按照民主国家所理解的那种概念来说，也是因为她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缝隙。当时既没有选举，也没有立法会议，又

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新的一代便无从表示他们的政治思想。这种迫不得已而放弃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情况，就在一定的程度上，促成了文学的繁荣，小说和散文都是如此。与此同时，通货和信用的急剧膨胀，激起了人们对于迅速发财致富、豪华排场和物质享乐的欲望。独裁主义国家——这是当时的一种矛盾的现象——受到了一个漫无纪律的社会的拥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正好象是在颓风败俗风靡于世而引起的新异教信仰当中，存在着对精神复兴的向往一样。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加讨论。因此，我们只能概述一下它对巴西生活的影响。

巴西既没有也不可能制订欧洲国家所执行的那种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巴西处于很次要的地位；实际上，她跟拉丁美洲的其它国家一样，是在英国强制实现的和平的庇护之下生存的，这种和平帮助她获得了独立，但对她的自尊心却造成了很多的创痛。

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打算重新恢复泛美主义，办法是让它在政治和经济上起到积极协调的

新作用。第一次大会〔1890年4月14日〕所产生的那个简单的泛美商业局，已经变成了泛美同盟，总部设在华盛顿。它的名称后来又改为美洲国家组织。它跟联合国一样，建立在所有“友好邻邦”享受平等权与表决权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会员国之间的冲突，并以保证不干涉内政来确保它们的完全自主。各式各样的常常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演说的会议和代表大会，一个紧接一个地召开了，从193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有罗斯福总统出席的一次“巩固和平”会议，直到一些名副其实的泛美会议，乃至在哈瓦那、利马、蒙得维的亚、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地召开的外长会议，等等。巴西在争取均势、和睦与合作的愿望激励之下，不顾国内事务的情况，竭力保持外交上的连续性，并且积极地参加了所有旨在增进和睦的国际活动。在泛美事务方面，她觉得她有义务在美国与西班牙美洲的共和国（特别是阿根廷）之间，充当一名调解人，或者说一个减震器，因为在她出席的会议当中，阿根廷差不多总是一个不谐和的因素。 305

1939年的战争，和1914年的战争一样，给巴西带来了痛苦的焦虑不安，这种情况与所有的国家

都一样。但是，在她的全国人口中，那些比较了解世界一般问题的人的反应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不管它的间接原因（即欧洲国家旧有的政治和经济竞争）和直接原因（产生于德国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如何，1914年那场突然爆发的大战的影响，就象一次海啸似的，把从十九世纪继承下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社会准则，都给扫荡一空。因之，它就是在过时的专制观念与自由的代议制政府的理想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巴西人当时几乎全体一致地同情自由主义的堡垒——协约国。而在另一方面，1939年突然发生的大战则使每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分裂。持民主主义的大多数人遭到了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反对。纳粹党人确信希特勒的胜利即将来临；共产党人预计他们的立场正是俄国所要采取的立场，因为这次战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世界的领导权与领导中心而进行的决斗罢了。整体主义者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尊崇为他们的学说的鼓舞者，甚至是他们的超国家领袖，犹如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的超国家领袖一般；为强大政府进行辩护的军人，把德国强大的战争机器铭记于怀；

若干保守集团无时不在担心社会会发生大变动；还有某些极权主义国家的鼓吹者，其中包括热图利奥·瓦加斯，是巴西人当中的少数派，这些人不管他们承认与否，都是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随波逐流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也依附于这个少数派，他们总是和那些他们认为最靠近胜利的人站在一起，同时，他们也认为自由主义的国家，就要寿终正寝了。

美国的直接参战，结束了巴西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中立，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情况一模一样。巴西的宣战〔1942年8月22日〕，是遵循着她的传统外交政策；战时外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在各民主国家方面，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人物，而且也忠于泛美主义的精神。巴西是在认 306 真履行着她所承担的洲际义务，其中有1942年在里约召开的外长会议；同时，她也在使她的行动与国民的情感协调一致。巴西成为对德、意的交战国，也是在回击它们的第五纵队的活动以及在巴西海域用水雷袭击巴西船只的野蛮行径。但是，她在这次战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并不只是象征性的。她在不太充裕的人力物力范围之内，承担了保卫

自己的海岸以及附近海面的责任。她的一个空军分遣队参加了美国在意大利的作战部队，后来，又有一支26,000人的远征军参加了意大利半岛上的战斗，在该地大约死掉了500人。巴西允许美国在她的北部和东北部设置了空军和海军基地，该地区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十分重要的战略地带。以北里约格朗德和伯南布哥为中心，巴西变成了攻入非洲的一个桥头堡，或如罗斯福所称的“通向胜利的走廊”。俄国参战以后，巴西立即同她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共产党人来说，俄国的参战，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意义；它不再是两种牌号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成为反对纳粹——法西斯暴政的不可调和的毁灭性战争。于是，整体党和共产党的地位就颠倒过来了：后者扬眉吐气，而前者则遭到了迫害。

当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由于轴心国的失败已经肯定无疑，因而，在巴西无限期地继续实行一种她在遥远的意大利战场上帮助摧毁的独裁主义制度，就越来越显得荒唐透顶了。对“新国家”的反对越来越强烈。反对派秘密地设法来巩固自己。曾经赞同1937年不流血政变的武装部队，现在开始

重新考虑它们对恢复民主的义务。米纳斯吉拉斯某些杰出的人士在1943年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书，是造反的第一个公开信号。虽然这个声明书的措辞是温和的，但是却遭到政府的报复，它逮捕了声明书的几个签名人，免去了该州的很多长官，并对一些私人财团施加了压力。但是热图利奥·瓦加斯无法长期抵制受到军队直接支持的舆论。他被迫宣布了大赦。1945年4月，戈伊斯·蒙特罗将军完成了一项外交使命后从乌拉圭归国时，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我回来是结束'新国家'的。"

1944年末，这位总统请他的部长们"提出与国民磋商的实际步骤"。他指的是一个宪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虽然取消了1937年宪法的公民投票，却能够把该宪法的一般特点与公职的直接选举结合起来。这样一种让步，自然不能使那些要求重新建立民主程序的人感到满意。1945年2月22日，若泽·阿梅里科显然是在陆军部长的支持下，接见了里约一家大报的记者，鲜明有力地提出了选举的问题。据他说，有三位政治家在道义上受到了阻碍而不能竞选总统，他们是热图利奥·瓦加斯、阿

307

曼多·萨莱斯和他本人，因为他们在1937年全都参加过竞选。后来，他向另一家报纸提出了一个对于这次竞争既有最好的资格又有最适当身分的第四位人物：爱德华多·戈麦斯准将，他是1922年科帕卡巴纳要塞起义期间“向死亡进军”的唯一幸存者。他是位军事首领，是有很高威望的革命者，并且是未曾赞助极权主义国家的少数人当中的一个。2月28日，部长们精心制订的宪法修正案公布了，规定“选民登记与选举共和国总统、州长、国民议会和立法会议”的法令也同时公布。另一方面，紧接着就发生了由个人和有组织的团体进行的公开示威活动，坚决拥护若泽·阿梅里科的主张。官方新闻检查的堤坝已经崩溃了。

虽然反对派最初反对二月法令（其理由是公布该法令的机构是非法的），但最后却以预定召集的议会将被授予充分的宪法权力为条件而接受了它。全国性的政党都按照选举号召书的规定，组织起来：全国民主联盟（UDN）吸收了所有的反对派分子，而社会民主党（PSD）则吸取了拥护政府的人。热图利奥·瓦加斯创建了巴西工党（PTB）。按照比例代表制，各个小政党，包括极端主义的政

党，也将会出现。两个重要的保守派政党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差别是很次要的。工党为工联主义所激励，主要是面向雇佣劳动者，但是和往常的情况一样，无数的资本家和商人却急匆匆地归附于它，而它为了竞选的目的，也同其他一些显然是正好相反的党派进行了联合。

尽管有了新法令，并且将12月2日确定为选举日，政治骚动并未停止。瓦加斯的反对者们担心他正在准备另一次政变，或者利用各州的政府机构操纵选举，因为各州都由他派出的督办控制着。于是，形成了两股潮流：一个要求在没有瓦加斯作竞选人的情况下，进行制宪代表会议和总统的选举；308 另一个有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领导的共产党参加，他们只要有一个制宪代表会议，也就心满意足。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不要热图利奥的制宪代表会议"与"一个要热图利奥的制宪代表会议"在对抗。瓦加斯的支持者们的态度，于是就被人们给起了一个绰号："我们要主义"（queremismo），这个绰号是从"我们要热图利奥"（Queremos Getúlio）的口号得来的。

与全国民主联盟的候选人爱德华多·戈麦斯

准将竞选的，是社民党提出的另一名军人——陆军部长欧里科·加斯帕尔·杜特拉将军。1945年这一年，是在一种不信任与猜疑的气氛中度过的。如果说爱德华多·戈麦斯受到了他的追随者们的热情支持，那么支持杜特拉的当权政客们之间的团结，却总好象是靠不住的。竞选运动在报纸上得到了反响，报界已从多年的新闻检查当中解放出来了。

这两位军界候选人的同党，可能在适当的时机达成了采取联合行动的协议。热图利奥似乎确信他不仅可以得到平民百姓（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同情，而且也可以得到一部分军队的同情。所以，他坚持要继续主持政府。他任命他那个喜欢暴力的弟弟取代已经可疑的若奥·阿尔贝托去担任里约的警察头目，这件小事竟成为导致最后毁灭的原因。经过几个小时戏剧性的暂停之后，里约驻军的摩托化部队占领了该市〔1945年10月29日〕。瓦加斯丝毫没有表示反抗就放弃了他的职位。在革命与政变的编年史里，不管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别处的国家，一个被赶下台的国家元首未被放逐，甚或未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这是第一次。瓦加斯在

官方的保护之下，自由地飞往他在南里约格朗德的大农场。

这样，在种种伪装下执掌最高权力达十五年之后，这位南里约格朗德政客便结束了他的公务生涯。由于他的离去，人们可能认为从1930年开始的革命周期，也要宣告终止了。抱着这种幻想的，确实大有人在。

309

第二十四章
巴　　西
（1945—1954年）

恢复民主制度——总统候选人——杜特拉政府——1946年宪法——政党——共产党人——外交事务——财政——瓦加斯重任总统——经济政策——社会环境——政治丑闻——热图利奥·瓦加斯之死

兵不血刃地驱逐了热图利奥·瓦加斯之后，由谁来代替他的问题，便留给对此事负直接责任的军事首领，特别是正在竞选的杜特拉将军和爱德华多·戈麦斯准将这两个人去解决了。因为宪政秩序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他们却又不打算照搬通常的作法建立一个象1930年那样的临时洪达，所以，他们便把政府移交给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

官——塞阿腊人、职业法官若泽·利尼亚雷斯。他立即成立了一个紧急的非党派性的内阁。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个利尼亚雷斯政府并不能制定出明确的行动纲领。它的职责范围便是维护法律与秩序、保持正常的行政业务与保证公正的选举。

两位民主派候选人加紧进行了竞选活动。社会民主党所支持的杜特拉，或多或少地得到1930年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各州机构的信赖。戈麦斯是全国民主联盟推举出来的，这个联盟是反对瓦加斯及其极权主义国家的各种派别合并成的。两党的竞选纲领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都声明自己是保守一自由派。在巴西，就可能估计到的公众舆论的趋势而言，全国民主联盟主要在上层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自由中产阶级当中，从而也就是基本上在城市里，得到了人们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则得到上层阶级和下中层阶级的支持，同时也得到尚未受到触动的官方机构的支持，因而得到大部分乡村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比城市的投票者更屈从于政治头目和小的政客们。第三种选举势力——巴西工党，主要是企图控制有组织工人的选票的一个城市政党。它最初迟疑不决，最后按照该党创 310

始人瓦加斯的明确指示，支持了杜特拉。小党派当中最大的共产党，显然希望瓦加斯能取消这次总统选举，而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所以，它就设法利用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声望，以便选出一个大的代表团到立法机关去，据广泛流传的谣言说，其成员将在那里支持瓦加斯继续留任的努力。共产党对"新国家"的垮台感到非常惊异，在选举前两周，才提出了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非共产主义者伊埃多·菲乌扎作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在热图利奥·瓦加斯规定的日期——1945年12月2日，全国各地平安地进行了总统和议会的选举。这是自1934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选举。经过了十一个年头以后，选民已经增加了五倍，这部分地是因为妇女已经被授与选举权，但主要是因为有更多的公民现在达到了投票所要求的文化条件。在总统的竞选当中，由于巴西工党转而支持杜特拉而且乡村政治头目们也对他在竞选上给以巨大支持，所以他以绝对多数票获得了胜利。杜特拉得票325万多张，占55%，对比之下，在大城市里遥遥领先的戈麦斯所得票数只略略超过200万张，占

35%。约有57万张选票，即总票数的10%，投给了伊埃多·菲乌扎，这主要是对两个军方候选人的抗议。没有进行副总统的选举，因为这个职位从1930年起就已经不存在了。1946年1月31日，在选举法庭宣布了杜特拉将军的胜利之后，他便就任为1946至1951年这一期间的共和国总统。

杜特拉于1885年生于马托格罗索州的一个普通家庭。他投身到军界之中，而且由于他在历次震撼全国的革命运动中，包括1930年革命和1932年圣保罗的革命，都站在合法的一方，他稳步地升迁到最高的军事职位。他担任瓦加斯的陆军部长达九年之久，而且在1937年那次最后产生了“新国家”的政变中，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八年以后，他也是摧毁这个“新国家”的一个人。他为人单纯，谦逊，沉默寡言，有礼貌，勇敢而不自负。杜特拉生活朴素。他缺乏闯劲，以致有时显得优柔寡断，但是当他为确定的目标而工作时（如他后来在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时所表现的那样），却是顽强的。他也很沉着冷静，在同人们打交道时，他实际要比表面更精明一些。除军事外，他缺少政治和行政的素养。他行使总统职权的情况，反映出他的个人品格

311

是容易为人所了解的，而在心理分析上，他的直接前任（和后任）却一直在引起人们的争论。他为他最初的内阁，从曾经支持过他的政党中挑选了几位阁员，也选了几位无党派人士；后来，为了促进全国中间派政客的团结，他又把以前在实际上并未激烈反对他的反对派的几个代表也收罗到内阁之中。

在1945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两院都获得了牢固的多数，这就保证了新总统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在参议院的这次通过直接投票进行选举的候选人竞选中，清楚地表明了各政党之间的力量分配情况。在这方面，各政党的实力和它们全国性的组织起了明显的作用，因为在竞选的全部42个席位当中，社会民主党赢得了26个席位，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12个席位。在其余的参议员中，巴西工党当选2人，共产党当选 1 人，小党派民众工团党1人。社会民主党和全国民主联盟在众议院的竞选中也同样是顺利的，在全部286名议员中，它们分别有151名和83名候选人当选；五个小党只当选了16名议员。其余的席位被巴西工党和共产党获得，它们利用了选举法的革新条款，在下

议院中取得了不相称的庞大的代表权。虽然候选人只能担任一项公职，可是他们却可以同时在几个州竞选，并可以把他们赢得的多余席位转让给他们本党的其他成员。而且，一个政党所得的席位的数目，是按照它所有的候选人在选区里所得总票数为基础的复杂方式来决定的。因此，一个对投票人有很大号召力的候选人，能够使候选人名单中较弱的成员当选。热图利奥·瓦加斯对巴西工党起了这种作用，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对共产党也起了这种作用。瓦加斯并没有直接参加竞选，但是他允许巴西工党的各州领导人自行决定，把他的名字列入竞选名单。与此同时，他也是南里约格朗德州社会民主党的参议员候选人，他很轻易地赢得了这个席位。瓦加斯还被列入六个州和联邦区的巴西工党的候选人名单而当选为众议员，他为该党多赢得了30多万张选票；在该党的22名联邦众议员中，有17名就是因此而当选的。积极参加竞选活动的普列斯特斯在五个州和联邦区中当选为联邦众议员或候补众议员，他又当选为联邦区选出的参议员。在众议院的竞选中，他得了6万多张选票，这些票足以使获胜的14名

312

共产党候选人中至少有4名当选，在众议院中他们协力起草了新宪法。

第四部共和国宪法是在1946年9月18日颁布的。它和1934年的宪法一样，保持了联邦和总统制的结构，然而在许多方面，却脱离了1891年的传统。新宪法适应了南美大陆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国内倾向中央集权制的强大趋势，一般地说，在联邦与各州的关系上加强了联邦的地位，然而却取消了联邦可以对不遵守联邦法律的州进行干涉的权利。它也保留了以前宪法中的一些条款，如：要求内阁成员在受到邀请时出席国会提供情报和解答问题；要求内阁成员说明他们所批准的法案；以及按照美国的实例，设立国会调查委员会。从国会中选派的部长，可以保留他们在立法机构中的职位。1946年宪法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如1934年宪法那样明显，但它却反映了同样的社会化的动机。它在前言中仍保留了对上帝的祈祷。这部宪法的一些制定者和几位按照这部宪法来统治国家的总统认为，它有几项条款妨碍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有效行使。它分配公共收入的办法损害了州和自治市的利益，这点也遭到了很多抨击。因此，总而言之，

这部新宪法是注定要加以修改的。由于未能制定出支持它的法律，国会于是允许“新国家”的部分立法继续生效。

1946年宪法恢复了副总统的职位，据此，国会选出内雷乌·拉莫斯（圣卡塔林纳的参议员和社会民主党主席）为第一任副总统；同他竞选这个职位的是全国民主联盟的若泽·阿梅里科·德·阿尔梅达。

1946年宪法扩大了全国立法机构并规定了全国各州州长和州议会的选举事宜。从五个州和三个地区新增的18名联邦众议员，使众议院的议员增至304名，而参议院则根据各州和联邦区增选一个第三名参议员的规定，增加为63名。新宪法又规定了，每选一名参议员应同时选出一名候补参议员。为充实这些职位的人员（总数达1,000名以上），在1947年1月19日进行了选举。

尽管参加投票的人数稍少，而且现在已有十四个政党竞选，但1947年这次投票的方式与1945年那次大致相同。四个主要政党照旧保持了它们各自的地位。社会民主党仍然是势力最大的一个党，该党获得了参议院的十二个席位、众议院的

六个席位、九个州长职位和40%的州的职务。全国民主联盟当选了五名参议员、六个州长和四分之一以上的其他职位。四大主要政党中，在1947年唯一增加了得票数量的巴西工党，以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政党的面目出现了，它的州一级的候选人中有94名被选入三个州以外的全国各州之中，还当选了一名联邦众议员，并且促成了五名州长和三名参议员的当选。共产党的票数降低到50万张以下，但是它还有充分的力量在十五个州里当选46名州议会议员，并在联邦区的市议会里，以18名议员而占据过半数的地位。此外，列入社会进步党（PSP）候选人名单参加竞选的两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圣保罗的众议员。在较小的政党中，有三个党得到的票数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它们是：由前总统阿图尔·贝纳德斯领导的共和党（PR）；由圣保罗州前任督办阿德马尔·德·巴罗斯控制的新成立的社会进步党；还有普利尼奥·萨尔加多的前整体党改装成的民众代表党（PRP）。共和党系由1930年以前的各州机构的残余人物所组成，它得票约40万张，选出了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第三名参议员以及属于十个州和联邦区的共53名州级官员。它

还促成了5名联邦众议员的当选。社会进步党因为夺得了圣保罗州的州长并且当选该州的第三名参议员，变成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该党在其他地方的组织都很软弱。社会进步党仅仅在四个州里当选了26名州议会议员，其中包括圣保罗州的9名。民众代表党得到的选票不足总票数的3%，在十个州和联邦区里当选了15名州议会议员。然而，该党却因为赢得了巴拉那州的州长职位而得到全国的承认。其余的党派得到的选票不到总票数的6%，获得选任职位的百分比就更小了。

选举同盟与联盟是1947年竞选运动的一个新特点。1947年1月选出的二分之一的州长、三分之二的联邦众议员以及四分之一的参议员，都得到两个或者更多的政党的同意，有的甚至得到五个政党的赞同。所有较大的政党和大多数的小党派都在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参加了临时性的同盟。这种联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当地政党领袖的直接利益和方便，在州与州之间各有不同。因此，某些政党在大多数州内竞争得很激烈，而在其他一些州里却互相协作。而且，即使结成了联盟，这些联盟也未必能够在一个州里扩及到竞争的各

个方面。两个或者更多的政党可能共同支持一个314州长候选人，但它们对所有其他的职位，却提出对抗性的候选人名单。这种作法使政党的纲领失去了意义，但是对于1946年宪法下的政治制度来说，它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特点。

杜特拉政府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它尊重民主自由，尊重合宪当局的正常职能。杜特拉坚决拒绝下令由联邦政府对圣保罗进行干涉，尽管他的一些政治上的支持者竭力要求他这样做。这种行动会违反宪法。基本上出于他自己的主动，他根据宪法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杜特拉政府，对于该党日益公开表示同苏联采取一致行动的立场，感到惊恐不安。从1946年3月起，参议员普列斯特斯曾经公开地并且反复地说，一旦巴西与苏联发生战争，共产党人将同巴西政府作战。在1935年共产党起义时担任过陆军部长的杜特拉，对于这些话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尽管一般公众并非如此。他的政府可能仍然漠视一个无足轻重的共产党，但是却不能容忍一个在全国拥有广大追随者的共产党。1947年5月7日，该党的登记就被选举法庭撤销了，理由是该党公开宣布的目标，直接

违反了1946年宪法所保证的“政府以大多数政党为基础的民主制度”。1948年1月，国会取消了该党候选人名单中所有当选各州或国家的职务的共产党员的任命状。列在社会进步党候选人名单上而选入众议院的两名共产党员，被允许供职到任期届满。有些自由派人士认为，禁止共产党是不必要的，但是并没有一个大的团体起来替巴西共产党人辩护，他们作为公民应享有的宪法权利是受到杜特拉政府尊重的。部分地由于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巴西和苏联在1947年10月断绝了外交关系。

在社会民主党的若奥·内维斯·达·丰托拉以及后来在全国民主联盟的劳尔·费尔南德斯指导之下，外交部又恢复了它传统的均衡与谨慎的作法。它通过双边协定和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洲国家组织，努力促使美洲各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巴西和美国的关系包括民间的和军事的两个方面。1946年，签订一项空运条约，以调整巴西和美国之间的民间空中旅行。两年之后，成立了巴美技术联合委员会，以便为全国的卫生、食品、运输和动力资源的迅速发展，进行调查并提出实施方案。它在1949年提出的报告，变成

了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未来工作计划的基础。为了促进南美洲各共和国与巴西之间的合作，一些类似的机构建立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军事协定失效，又议订了一些新的条约。杜特拉政府的第一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收回1942年以后租借给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这些基地的最后一批，于1947年初交还给巴西。巴西仍继续参加设在华盛顿的泛美防务委员会的各种会议，继续从美国取得军事装备，并且请求和接受美国军事部门派出的顾问团，例如1948年的一个顾问团就曾协助建立为武装部队高级军官开设的高等军事学院。1947年泛美维护大陆和平与安全会议在皮特罗普利斯召开。杜鲁门总统出席了闭幕会议，由于他的来访，后来杜特拉总统进行了回访。这次会议起草了泛美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美洲国家共同防御武装袭击。这个条约于1947年9月2日在里约热内卢签署，嗣后称为里约条约。次年它就第一次被使用了，当时美洲国家组织对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之间的冲突，进行了直接的干涉。巴西在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中，继续积极地工作。

1951年在热图利奥·瓦加斯重新担任总统职务时，他将公布五年前他被赶下台时的良好的经济和财政情况：外国信贷60亿克鲁赛罗，黄金70亿，流通的纸币170亿，等等。实际上，情况却远不如它们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有利。外国信贷会因偿还外债而用得一干二净。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过的情况一模一样，出口锐减而进口增加。在1919年，支付的差额特别反映在外汇率的下跌上，这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在1945年，上述情况表现为在国外信贷消耗得非常迅速。大战期间连续不断地出现了预算赤字、通货膨胀以及在一切方面，特别是不动产方面的日益严重的投机活动。

杜特拉总统从圣保罗和里约，任命了一位银行家、一位商业家和一位工业家，来充任他最初时期的三位财政部长，他们任职期间都很短。这是1930年以后的一般作法，与君主国以及1889年的共和国恰好相反，那时候的作法一直是任命政客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在国民经济和财政方面，他的政府却缺乏明确的方针。最初，它削减开支，使赤字减少，通货膨胀放慢。后来，在下列因素的

316

压力之下，为增加文武官员薪俸、过期未付的票据、大型公共工程，尤其是为农业和工业提供资金，它又重新采取了预算赤字、发行不兑现纸币和通货膨胀等项办法。在国外的信贷结余，大部分被用来偿付外债（英镑和法国法郎的外债已几乎全部偿还），和把那些困难重重破烂不堪的铁路购买下来，实行国有化。然而咖啡的情况却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而得到改善。由于在国外的信贷和国内黄金储备的枯竭，一向自由的外汇市场，由巴西银行进行严格的控制，它控制进口并要求其他银行提供所购外汇的三分之一。但是，杜特拉政府仍然在纽约，给他的继任者存有2亿美元的盈余。国库券的流通量增加到310亿克鲁赛罗。

1946至1951年这届政府，在建设成就方面，因为实行了几项很有价值的工程计划而得到人们的称赞，其中有：改进和铺设里约—圣保罗公路，兴修里约—巴伊亚公路，建设炼油厂、油船队和港口设备以及开始进行泡卢—阿丰苏水力发电工程①

① 水力发电工程坐落在圣弗兰西斯科河上，其地点位于现在由它供电的巴伊亚、伯南布哥、阿拉戈斯及塞尔希培等四个州的中心。——英译者

等。内阁在改组之后，把农业部委托给一位米纳斯吉拉斯人——共和党的丹尼尔·德·卡瓦略。农业部加强了小麦生产运动并且改善了联邦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粮食供应状况。

因为杜特拉总统经常抱着一种愿望，要把民主的或者反对极端主义的政党联合起来，于是他设法让它们共同支持一位候选人来接替他本人的职务。但是，政客们不是由于思想上的分歧，而一般是由于个人、集团和地区的对抗与野心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他们之间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各种各样可能的候选人的名字被提了出来，其中有些是真正有政治才干的人，另一些人则只是提出来作为试探而已。全国民主联盟坚持拥护它那个威信很高的领袖爱德华多·戈麦斯准将。多数党社会民主党毫无热忱地提名米纳斯吉拉斯一个政客——克利斯蒂亚诺·马查多，它也许感觉到他是注定要失败的。人数不多的社会党提名若奥·曼加贝拉，他是旧共和国的一位著名的社会人士。由于中间党派支离破碎而社会民主党又犹疑不决，巴西工党便与社会进步党联合起来，提名热图利 317 奥·瓦加斯，并使他在选举中获胜。

除了三分之二的参议员以外，全国所有的选任职位，都由1950年的大选来决定。十三个政党在争夺825万多名选举人的选票。选举人于10月3日到投票处投了票。在没有共产党的情况下，社会进步党在社会民主党、全国民主联盟和巴西工党之后，居于第四位。为首的四个政党得到的票数远比1945年和1947年为少，但是它们在当选的州长、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和州议会议员中，仍占总数的80%，或者还更多一些。在主要的政党中，巴西工党的力量急剧增长，这主要是在城市里而且是以全国民主联盟的失利为代价的。共和党在一些次要的政党中领先，得到30%的选票，有2人当选为参议员，11人被选为国家立法机关联邦众议院的议员。

在1950年的总统竞选中，热图利奥·瓦加斯获得了将近385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49%[①]，而占据多数。戈麦斯得票230万张，占30%。其余选票，只有很少一部分落在马查多手里，他名列第

① 按前述总投票数为825万多张，则瓦加斯所得不及总票的49%。本书第二十五章再涉及此问题时，讲的47%较为可靠。详见第666—667页。——译者

三，得到总票数的21%。瓦加斯的竞选伙伴——社会进步党的若奥·小卡费，在单独进行的副总统竞选中，在五位候选人中居于领先的地位，以总票数的三分之一弱而获胜。瓦加斯和卡费于1951年1月31日就职，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于是，这位1930年革命的文官领袖、1937年政变的受益人，又重新取得了共和国的最高职位，这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对手缺乏政治远见和互不团结，而不是由于他个人的努力。他在1945年毫无抵抗地离开政治舞台，并没有损害他在人民中的威信。虽然他没有赢得绝对多数的选票，但是他的当选却多少具有一次公民投票的性质。而且，同以前的几届政府一样，他又得到了上层阶级和工业、商业、银行与企业界代表人物的支持，也得到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支持。

对杜特拉政府进行分析是很困难的，因为它距离今天太近了。当然，对热图利奥·瓦加斯第二次充任权力有限的总统的经历进行分析，就更是加倍困难了。我们只能大体上对事实和形势作一番概括的叙述，使人们了解它的戏剧性的结局。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当瓦加斯重新担任总

统职位时，他公布了他被赶下台时的实际情况，以显示它和他现在所继承的局面之间的差别。他所继承的局面是：预算赤字达10亿克鲁赛罗；应付的债券20亿；巴西银行欠国库10亿；流通中的纸币310亿；在国外信贷减少了10亿，黄金储备减少了7亿。所有这一切，按照瓦加斯的说法，是由于生产没有增加而收支又不断出现赤字。所以，必须实行一种严格清理财政的政策，以奠定经济复兴的基础。但是，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新措施不是没有效果，就是没有实行，特别是在外汇方面，因为偿付进口货物用的外国银行汇票，当时正在由巴西银行进行拍卖。奢侈品无限制的进口，以及毫无理由地假定朝鲜战争会扩大而进行的囤积居奇，把下余的外国信贷都给用光了。纸币流通量从1951年的310亿上升到1954年的500亿，每个人为1,000克鲁赛罗，而1950年为600，1930年为80。伴随着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又出现了难以控制的物价上涨和投机（其中包括外汇）的增加。外汇保持了国际协议所确定的平价，这就使通货在国内市场上不断贬值，其后果之一就是它反过来，又使巴西的传统出口品无法在国外销售；它们被称为高价产

品〔即外币价格过于高昂的产品〕。在通货膨胀的同时又发生了信用膨胀，这主要是各项筹款计划（其中许多项是很丑恶的）所引起的，这些计划都是由巴西银行和半自治的政府机关，例如，社会安全协会承办的。

扩建伏耳塔—里东达钢厂和泡卢—阿丰苏瀑布水电站，是官方取得的两项成就。对进口施加的限制、对外汇的高额贴水以及通货膨胀等，这些条件互相结合起来刺激了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些工业则集中在本国两个最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的周围，并且由少数的集团和家族所拥有或控制。农业的增产，大部分是由于开发新地区（如巴拉那州北部），而不是由于已使用的土地的产量提高了。国内运输，除航空外，很少进步；燃料的缺乏已经成为长期性的。吸引外国资本遇到了困难，这是一种僵硬的民族主义心理造成的，其典型的表现是，不许外国人（除工程师和技术员外）参加石油工业或国家石油专利公司——巴西石油公司。甚至在本地出生的巴西人，只要与外国人结了婚，就不能拥有巴西石油公司的股份，尽管他们有充分的资格担任最高的公职，包括总统的职位在内。

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愈益尖锐地反映到巴西社
319 会的总的风尚之中，它表现出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众所周知的社会失调的病态：一种往往超过实际情况的表面繁荣；人数很少的富裕集团与广大群众和中下层阶级之间在生活水平上越来越大的差异；瘟疫般的道德衰退；以及普遍存在的穷奢极欲的诱惑。这种现象也表现在，贫困地区与南方，特别是与圣保罗之间极为明显的差别之中，南方拥有全国经济和财政资源的80%并且创造出同一百分比的国民收入，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它已增加到近4,000亿克鲁赛罗。1930年被推到一旁的旧的政界上层人物，在新的依宪法选出的政府之下，似乎已经打算重新恢复他们的政治生活，但是却因为自私、怀疑、没有能力了解或适应巴西社会情况的变迁，或者因为厌恶猖獗一时的煽动宣传和贿选，而没有这样做。

巴西以其一贯迟滞的步调，继续追随欧洲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的趋势：伯格森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康德主义等，也就是本世纪初开始的所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精神反应。欧洲思想在战后的反应，在以后的时期才散布到巴西。在雕塑艺术方

面，早期的法国印象派已被遗忘。从本地民间歌曲中吸取灵感的巴西音乐，一直沿着比较独特的道路发展，尽管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埃托尔·维拉—洛博斯在国内却没有在国外那样受到人们的赞赏。巴西的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物和摩天大楼，以其想象力和风格驰名于全世界。经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现代派”的实验，小说达到了更为稳妥的境地。自由体诗日益盛行。写作政治、社会和历史小品的趋势，表现得很明显。报纸的版面编排有所改进，出版社和书店也扩大了。以本国的事情为主题的巴西影片，在欧洲的电影节中，开始博得人们的好感。第一批电视发射台出现了。对教育法的修正和改革法案连续地提了出来。随着古斯塔沃·卡帕内马部长对教育的改革，很多新的公立和私立大学成立了，其中有些基础很巩固，而大多数并非如此。巴西以其辽阔领土、潜在财富、经济发展与外交政策上的连续性，引起了世界人民更大的兴趣。她不再是易于被人们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混淆起来的一个不很知名的风景如画的国家，而开始具有自己特殊的风格了。 320

热图利奥·瓦加斯在没有旅行游览的兴趣而

且似乎在没有社会交往的情况下，在他位于南里约格朗德边界的庄园中，度过了五个年头之后，看来是更加退缩、更加沉默和更加疲倦了。因此，当他回到卡特台宫的时侯，已经同他在1930年进入该宫时判若两人，甚至同他在1945年离开时也大不相同。1945年被赶下了台这件事，也许使他增加了对政客的偏见和对军人的不信任。然而，看起来全国却平静地把他接了回来。甚至那些同他斗争得最厉害的人，也仿佛对他表示了某种信任。瓦加斯任命了四位社会民主党党员和一位全国民主联盟的代表参加他的内阁，这表明了他谋求和解的意愿。后来，象杜特拉将军做过的那样，他改组了内阁，但只是用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成员来接替该党的部长，并且让全国民主联盟的若奥·克莱奥法斯留任农业部长。这次政治上的休战并没有持续很久。和1937年与1945年的情形一样，猜疑在到处传播着，人们认为瓦加斯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正在密谋使自己永久掌权。国会和报刊的反对声调，一天比一天强烈起来。他的政府愈益频繁地遭到人们的指责，说它腐化堕落，公开受贿，盗用公款，非法牟利，并且由巴西银行以不正当的手段

提供财政上的支持；这家银行是一个强有力的公私混合机构，是国家信贷的最高操纵者而且实际上是处于总统的单独的控制之下。国库差不多一直是在完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遭受抢劫，这种对国库管理不善的丑闻再也瞒不过公众的耳目了，尤其是当瓦加斯下令对杜特拉政府时期巴西银行的行为进行的调查被证明是毫无结果的时候。当时普遍的情况是，对渎职和贪污腐化等案件进行的审查都是虎头蛇尾的。

大量的丑闻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反对派的运动大部分是以若奥·古拉特为目标的，他是瓦加斯的被保护人和巴西工党的副主席，1953年任劳工部长。反对派认为，古拉特正在非法地运用他职务上的权力和财政来源，把工会和劳工联合会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政治机构，以便建立一个庇隆的正义主义类型的工团主义共和国。他的一些最激烈的抨击者是陆军军官，他们在1954年2月的所谓“上校宣言”里，要求把他撤职。古拉特关于把最低工资增加一倍的建议激怒了这些军官，因为增加工资会引起另一次通货膨胀，并且还将把非熟练工人的收入提高到军士的收入之上。在陆

军的压力下，古拉特被撤了职，但他仍然是瓦加斯政治班底里的一个成员，而且他的工资法案也被制定为法律了。反对派运动的暴烈行动或普遍的不安，从未停止。

瓦加斯政权的最后一次危机，开始于1954年8月5日，起因是企图暗杀一位恶毒抨击政府的报纸编辑卡洛斯·拉瑟达。那天夜里，拉瑟达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后归来，有一位空军军官鲁本·瓦伦蒂诺·瓦斯少校与他同行，当他在科帕卡巴纳他的住所前面走出汽车时，遭到了枪击。该军官被打死，拉瑟达受伤。这次罪行通称为“托内莱洛斯路罪行”。最初发现的线索表明，瓦加斯总统自己的庞大警卫队是可疑的。总统同意由空军的军官团从警察手中接管对这次罪行的审查，因为警察受到怀疑。事实证明：上述线索是正确的，总统府卫队长〔一个名叫格雷戈里奥·福图纳托的人〕供认，他是这次罪行的直接唆使者。这个警卫队长是个粗鲁而狂妄自大的混血儿，卫兵们大都是具有很坏的警察记录的人物，这些人贩卖他们在总统府的权势，而且用瓦加斯本人在绝望的情况下所说的话来说，他们是在“泥海”中捞取利益。

公众的呼声再也无法压制下去了。在国会里，在报刊上，在军人俱乐部里，到处都要求总统辞职。副总统若奥·小卡费自行建议，他们两个人一起辞职。可能是由于他的陆军部长控制着一部分军队，瓦加斯打算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只是当他相信自己无法抵抗时，他才愿意暂时辞职。1954年8月23日夜，召开了最后一次戏剧性的内阁会议。热图利奥·瓦加斯宣布说，他并不想辞职，但是他愿意保持国家元首的称号，暂时退居一旁。这未能满足军人的要求。24日晨，他在他的私人住宅里，在接到坚决要求他无条件辞职的通知之后，用一颗子弹射入心脏自杀了。

接着，这个惊恐的城市以及全国各处，整整一天都陷入无法说明的苦闷之中，仿佛是处于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之中；但是即时采取的军事措施，或者再加上这幕空前的悲剧所引起的迷茫的感觉，使这场暴风雨没有出现。在那种和1945年并无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军事首脑们要求副总统若奥·小卡费主持政府。他们很可能相信，他能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实现必要的改革，以改正先前的状况；但不久就证明他们的想

法错了。

322 热图利奥·瓦加斯留下了两份简短的绝命书，它们很快就被认为是他的“政治遗嘱”。他在绝命书里说，某些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压力迫使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自杀是为了要把巴西人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而做出的牺牲。他的名字将成为他们的战旗，而他的血则是他们赎身的代价。只有经过相当的时间之后，他这份遗嘱所表达的全部心理状态和意义，才能心平气静地解释清楚，而其长远的效果，也才能得到应有的评价。但是，如果它是被用来挑动民众对他的敌人立即进行反抗的话（看起来，这是很可能的），它的目的却悲惨地未能达到。他的绝命书是写给普通老百姓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响应。有些人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这样，根据一张显然没有价值的便笺，瓦加斯用他自己临终的话来说，竟然“离开了人世而成为历史上的人物”。

第二十五章

1954年以来的巴西

（罗利·E·波皮诺撰写）

背景——瓦加斯以后的十年的政治环境——卡费政府——1955年的“反政变”——库比契克政府——巴西利亚——雅尼奥·夸德罗斯——1961年危机——议会的试验——公民投票——古拉特政府——1964年的革命——卡斯特洛·布兰科——巴西民主政治的危机

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戏剧性自杀，标志着巴西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位曾经把共和国统治了一代之久的人死去了，而且至少在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比的人物出来代替他。评价瓦加斯及他的时代对于巴西的全部影响，现在尚为时过早，但是毫无疑问，在瓦加斯年代里发生的经

济、社会和心理方面的深刻变化，改变了国家的政治面貌。在那些岁月里，中央政府维护了对州、市的政治权力，并且深深侵入了以前专属国内外私人资本的经济领域。与此同时，作为这同一进程的一部分，中央政府迈出了建设工业经济的艰难步伐。工厂和钢铁厂变成了新巴西的象征。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城市在规模、财富和政治影响方面都增长了，而传统的农村地区的影响却削弱了。几百万人从内地迁向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其它大城市，他们进入了市区也进入了货币经济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恢复了民主政府，城市工人势力和工业中产阶级也都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拥有大量的选票可以使他们最近感到的需要和愿望获得满足。这些新的集团尤其容易接受正在增涨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影响。民族主义在1954年已经变成每个全国性政党的共同特点。民族主义带有的324程度不同的乐观主义和排外性质，无疑地是，目前仍然是，瓦加斯遗产中渗透和传播最广的成分。

1954年以后的十年里，在瓦加斯时代形成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对全国政治的进程，继续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民族主

义和人口突然膨胀的刺激下（人口膨胀之快眼看就要超过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资源的增加速度），发展经济的迫切性更加强烈了。从农业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工业生活方式所引起的社会纷乱，既深刻而又不为人们理解；这种纷乱不安也同时被引导到对经济改革和社会正义的要求上。十年来，这种要求不断受挫，使得煽动性的和“革命的”呼吁成为表达政治要求的标准形式。信仰不一的政治领袖们，有的富有热情，有的无可奈何，但都一致认为巴西已卷入了看来是无法逆转的“革命”潮流之中。但是，为了防止全国性灾难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们却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时还争论得颇为激烈。

针对1954年以后的国家问题，制定一个能站得住脚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各种努力，受到关于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持续不断的传说的牵制。这个传说左右着民众和官方对于共和国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的反应。现在已经很明显了，1930年以来，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此巨大，决不会是由一个人所引起的。但是当瓦加斯在世时，要把他同他的政策所推动的过程区分开来，则是很困难的。

况且，作为一个机敏的政客，瓦加斯早已声称有创建新巴西的功劳。这种说法得到他的拥护者大喊大叫的赞赏，他的敌人却因指责他危害了传统制度和有价值的东西而无意中帮了他的忙。围绕着他的激烈争论，在他自杀后，继续划分着他在世时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两派。这些争论掩盖了促成他最后一届政府危机的症结所在。对于他的反对者来说，瓦加斯仍然是一个错打算盘、贪图权力，把巴西引向危险绝境的复仇女神。在另一方面，对于追随他的广大民众来说，他是一位献身于巴西民族主义的烈士，也是那些想阻滞巴西必然上升到大国地位的人的牺牲品。当瓦加斯被淡忘时，人们的注意力便逐渐从他的人格方面转到与他的政权相联系的一些争端上面了，但是政治力量仍大体上继续分成亲瓦加斯和反瓦加斯两大阵营。就真实的意义而言，1954年以后的国家政治，可以看作是这位前任独裁者的继承者和他的敌人之间的一场持续的夺权斗争。

325 在瓦加斯以后的十年内，最引人注目和意义最为深远的政治发展，要算是军队在决定国家大事的方向上重新起关键性作用。从共和国成立以

来，军方一直把他们自己看作是负责维护宪法权利的永久性国家机构，历届宪法也都确认了这一点。一般地还进一步承认，当国家处于危机时刻，也就是共和国的基本制度看来陷于危险境地的时候，军队便享有超越法律、干涉政治活动的权利。但这种超越法律的权力却很少使用，即使使用，也仅仅是为了把政治统治权从一个文官政府移交给另一个文官政府。从1894年普鲁登特·德·莫赖斯总统就职到1951年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就职，发生过三次反对执政政府的成功的军事干涉。而在1954年到1964年期间，使用武力或者扬言使用武力推翻了三次政府，而达到同一纪录。武装干涉次数的上升，表明了军队对文官的政治领导越来越失望，也表明了他们对巴西所开展的一系列民主活动的功效，越来越失去信心。1964年革命之后，武装部队不愿将全部政治权力交回给文官，这件事情终于给巴西政治增添了新的要素，这是从共和国早期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瓦加斯既然被推翻而且自杀了，政权便落到他的反对者手里。从巴西的代议制民主恢复以来，在1945年以前反对过“新国家”的人，才第一次有

权决定联邦政府的政策。在1954年8月24日执掌总统权力的前副总统若奥·小卡费，立即开始重新组建内阁来反映新的政治形势。他从四个主要政党里挑选他的阁员，但是重要职务却多半给了全国民主联盟的成员。这个联盟通过对享有国际声望的正统派经济学家欧热尼奥·古丁和他的继承人圣保罗银行家若泽·马里亚·惠塔克的任命，控制了财政部；外交部的首脑是劳尔·费尔南德斯，他是在旧共和国时期形成了政治观点的老政治家；1955年4月以后，极重要的司法部被置于全国民主联盟主席若泽·爱德华多·德·普拉多·凯利的掌管之下。司法部长负责有秩序地进行全国选举事宜。这个内阁还包括两名“尉官派”，他们326曾在二十年代的政治动乱和1930年革命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在1937年实行独裁统治时，就同瓦加斯断绝了关系。他们是：新上任的航空部长爱德华多·戈麦斯准将，全国民主联盟曾两次提他为总统候选人，但都未能当选；后来成为卡费军事阁僚领袖的儒瓦雷斯·塔沃拉将军，他有着基督教民主的倾向，但是却没有固定的党派联系。内阁的最重要职位——陆军部长则指派恩里克·特谢拉·

洛特将军担任，他是一个并不著名的无政治色彩的军官，曾在促使瓦加斯辞职的8月22日“将军宣言”上签过名。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政府对于所谓“生产阶级”的建议是乐意接受的，并且认为反瓦加斯集团的主要目标现在将要实现了。人们预料，这个新内阁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制止通货膨胀，用扶助私人企业的办法来鼓励经济发展，限制有组织的劳工的政治活动，并且运用它的权力去防止在1955年选出另一个瓦加斯式的政权。就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这种预想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它忽视了卡费总统的态度和决心，因而也只是空想而已。

在正常情况下，若奥·小卡费是决不会成为巴西总统的。对于这个最高的国家职务，在具体的政治方面，他至少有三种缺陷：他来自这个国家的不适当地区，他是一个不适当党派的成员，而且他又没有立下文官或者武官的功名业绩。共和国建立以来，获胜的总统竞选者大多是从富裕的、人口稠密的圣保罗州、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南里约格朗德州选取的，而卡费却是北里约格朗德州人，这个州经济萧条，在1950年其选民只占全国的2％。总

统通常是全国性党派的代表，而卡费却只作过社会进步党的地区领导人，这个党基本上是阿德马尔·德·巴罗斯的私人工具，他的选民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圣保罗州。再则，卡费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涯里几乎都在扮演反对派的角色。1928年，当他还是伯南布哥州的一个年轻新闻记者时，就曾因批评州政府而坐过监狱。1930年，他是自由联盟的热情支持者，1934年被选进国会，1937年因为公开猛烈抨击独裁政权而被流放。在1946年到1950年这一届制宪会议和国会里，由于他敢于攻击滥用权力，攻击那些看来是侵犯个人宪法权利的行为，他被称赞为当时政治制度的一位令人生畏的批评者。327 他是作为忠诚的民主主义者和反对政府机关腐败的战士，而受到尊敬的。但是人们没有把他看成具有总统资格的有创造性的政治领袖。卡费之所以被选作瓦加斯的竞选伙伴以保持候选人名单的平衡，完全是巴西工党和社会进步党在1950年竞选运动中偶然联合的结果。在对总统和副总统的分别计票中，卡费比那位来自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前独裁者少得100多万张选票，仅够总票数的30%，

而瓦加斯得到了总票数的47％。① 选举之后，他避免公开露面。在瓦加斯内阁的最后日子里，他建议以总统和副总统的联合辞职作为1954年8月危机的解决办法，在此以前，他一直不为人们所注意。瓦加斯拒绝采纳这个建议。他的辞职和自杀，以及军人们愿意尊重宪法条文的连续性，造成了一系列的巧合事件，这才使若奥·小卡费成为巴西的第十七任总统。

卡费作为一个维护法律条文的人，以及他对于促使他掌权的环境的估计，使他对于总统职责产生了一种狭隘的守法主义观点。他十分清楚，公众对共和国政治制度的信任，由于瓦加斯的垮台，已经被严重地动摇了。他也深信，代议制民主政府的幸存有赖于他任职到瓦加斯任期届满。卡费最为关心的是维护立宪政体，以及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的权利。因此，他始终反对少数派的主张，这些人大喊大叫地要求设置临时专政体制，以中止一切正常的政治活动，直到瓦加斯之死所引起的激昂情绪冷却下来为止。卡费以国家

① 参见本书第648页的注释。——译者

利益为理由，呼吁主要政党进行合作，但是他也毫不含糊地表明，必要时他将允许不受约束的党派政争，而不愿违反宪法关于政治言论自由的条款。这种忠诚的、实质上也是消极的对宪法中有关政治条款的保护，是卡费政治纲领的内容。卡费对他出乎意料地继承下来的职务似乎感到望而生畏，而且对行使他所拥有的权力的能力和合法性表示怀疑。他认为，他不是选出来的总统，因而他没有取得巴西人民的委托来严重地背离他的前任所制定的政策。所以，尽管他私下里倾向于同意温和的保守党领袖们的大多数目标，他却拒绝使用总统的全部权力去实施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瓦加斯纲 328 领。在执政十五个月的全部时间里，卡费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看守内阁的首脑，其主要职责是：维护法律和秩序；主持全国的公开选举；以及如期把政权移交给人民选出的继任人。由于他的坚定的立场，卡费根据法律的文字和精神完成了其中的两项目标，而且仅仅是由于武装部队侵犯了他曾极力维护的宪法，他才未能完成第三个目标。

在卡费执政期间，巴西绝大多数由选举产生的官员都得重新选举或是进行调换。在全国范围

内，任期四年和八年的国家和州的官员，都要在1954年10月份进行选举，那些任期五年的官员，则是在一年之后选举。另外，大多数市政选举，都预定和这一次或下一次主要竞选同时举行。这些选举的准备，一直使这个国家处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之中。1954年，瓦加斯被迫离职时，竞选运动便已经开展起来，没有人能够预言8月危机将会给10月3日的投票带来何种后果。这次选举将决定十一个州长，二十个州以及联邦区的立法机构，三分之二的参议员和全部众议院议员，众议员已从304名增加到326名，以反映1950年普查所记载的人口增长。由于害怕重新唤起公众对“烈士”总统的同情，反瓦加斯的极端主义者们吵吵闹闹地要推迟选举，但是瓦加斯的继承者以及他们的温和反对者，却坚持要在投票中获得辨明是非的权利。

不管是政客们的恐惧或是期望，都没有全部成为现实。1954年10月3日的选举未能解决这个政治困境，也未能鲜明地表示出公众对于卡费政府以及对于那些曾使他当政的事件的态度。选举结果之所以不能产生明确的结论，大部分是由于各种沿袭下来的竞选手法使得已在选民中广为蔓延

的混乱变得更加严重了。参加竞选的党都不是始终坚持着一个亲瓦加斯的或反瓦加斯的政治纲领。尽管有些候选人是以反瓦加斯政府的资历参加竞选的，然而各党的大多数候选人都在争夺现在已失去领袖的前任总统的党羽。与此同时，名义上是亲瓦加斯和反瓦加斯的党派，却经常在州一级结成联盟，而且在许多国会议员的选举中也是如此。各州临时性的选举联盟，仍是取决于地方性329问题和一时的方便，而不是取决于各党的全国领袖所宣布的总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瓦加斯危机对于正常的选举方式的影响，便是微乎其微的了。

从整个看来，那些支持内阁的党派，对1954年的选举结果，是感到失望的。全国民主联盟仍然是国家的第二大党，但是在总的实力方面却有所减弱。它赢得了两个州长位置，并且帮助击败了工党在瓦加斯本州的竞选人若奥·古拉特，但是在参议院里却退居到第三位，而且无力保住它先前在众议院里的席位。社会进步党巩固了它在众议院里排行第四的地位，但是在参议院里却落在小小的共和党后面，退居到第五位，而且连一个州长也没能选上。社会进步党还由于阿德马尔·德·巴

罗斯在一场争夺圣保罗州州长职位的势均力敌的竞选中，败给了无党派的雅尼奥·夸德罗斯，而使其党组织和声望都遭到了损害。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虽然在一些州里被宗派主义搞得支离破碎，而且其所得选票占选票总数的百分比又较比以前略低一些，但是它仍然十分突出地是第一大党。它继续提供远比其他任何党为多的州长、州议员、参议员以及联邦众议员。巴西工党尽管在南里约格朗德州受到了挫折，在全国各地的党羽却增加了，而且还在每个州的立法议会里安插了人员。巴西工党还选上了一个州长，在参议院里超过了全国民主联盟，在众议院也稳步地逼近了全国民主联盟。因此，这两个与瓦加斯传说密切相关的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席位远远超过了半数，与此相反，全国民主联盟和社会进步党所输送的议员，还不到两院的三分之一。其余的议员是从八个少数党里选取的，支持政府的和反对派的大致各占一半。在国会里，即使党的标记仅仅能粗略地标志出议员个人的政治倾向，但是，显然不可能指望这个立法机构，对反瓦加斯派所主张的变革，会给予持久的领导或者是多数的支持。

甚至在统计国会选举的票数之前，人们的注意力就已经转到总统的竞选上了。这次竞选给各党提出了许多严重的困难。由于卡费继续抵制那种寻求宪法范围之外的解决办法的压力，也由于没有一个党能独自掌握赢得总统职位的足够选票，重新组织选举联盟的谈判便立即开始了。人们认为，候选人若要获胜，必须有两个大党的支持，并且最低限度要得到军队的默认。这些条件似乎限制了可能提出的候选人的范围，因为反瓦加斯的极端主义者是不大可能得到广大公众支持的，330 而提出一个赞成瓦加斯传说的候选人却会招惹起军方的进一步干涉。当报纸和各党派仍然在激烈地辩论这些问题时，米纳斯吉拉斯州长、社会民主党人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声明，他要参加竞选，并且掀起了旋风般的运动，争取社会民主党的提名。

库比契克的行动激起政府里的军队成员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卡费总统在1955年1月27日的一次电台和电视讲话里向全国宣布了他们的建议。建议要求推选一名各党拥护的“全国统一”的候选人。这份呼吁书的起草者们建议不提军人为候选人，而且他们全都保证本人不担任“全国统一”候

选人名单的首席候选人。全国民主联盟欢呼说，这个建议，是在社会和经济危机的严重时刻，旨在促进国家稳定的一个利他姿态。人们并不认真期望工党会接受“全国统一”的想法。然而方案的提议者却是希望由全国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和社会进步党组成联盟，它有了一名共同的候选人，将同意进行和平竞选，而这位候选人将能确保得到全国半数以上的选票。因此，这个建议主要是针对库比契克，并且也顺便反对了阿德马尔·德·巴罗斯想当总统的愿望。这两个人都是全国民主联盟所不能接受的。然而，库比契克拒绝退出竞选。社会民主党在2月份对他的正式提名，实际上注定了“全国统一”观点的失败。当阿德马尔·德·巴罗斯作为社会进步党的候选人出现时，实现这种想法的最后希望便彻底破灭了。普利尼奥·萨尔加多代表着极右派；他是由他自己的民众代表党提名的。民众代表党系由战前巴西的整体主义运动演变而来。全国民主联盟在几经犹豫之后支持了儒瓦雷斯·塔沃拉将军。这位将军已经得到了小小的基督教民主党以及巴西社会主义党的支持。全国民主联盟的米尔顿·坎波斯作为塔沃拉

的竞选伙伴参加了副总统的竞选。与此同时，工党则着眼于其主席若奥·古拉特，然而却只是授权让他同其它党谈判。6月份这位工党领袖接受了社会民主党将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它再一次肯定了热图利奥·瓦加斯所缔结的这两个党的联盟。五个小党，其中包括非法的共产党，都公开支持库比契克和古拉特，这使反瓦加斯阵营感到十分惊恐。工党内持不同政见的丹东·科埃略正与古拉特争夺着对有组织劳工的控制权，他作为德·巴罗斯的副总统候选人，也参加了竞选，这时，竞选的阵容就全部摆开了。

竞选运动是在政治形势极为紧张的气氛里进行的。武装叛变近在咫尺的谣言，以及对这个政变331的责难，闹得满城风雨。争论主要集中在瓦加斯以前的被保护人——古拉特身上，许多保守派分子认为他太公然倾向于劳工和共产党，不能担任高级的政治职务。一些直言不讳的反瓦加斯分子，公开要求军队出面干涉，以事先防止库比契克和古拉特可能取得胜利。古拉特的支持者们也以同样的激烈情绪声言：军队中的护法者如果必要便发动"反政变"，以制止对竞选和投票的干涉。负责确

保选举秩序的武装部队，既要尊重宪法又担心出现另一个瓦加斯式的政府，因而感到心神不宁、左右为难。军人制宪运动派支持前陆军部长、现任军队监察长官济诺比奥·达·科斯塔的意见，他们坚持选民的意志必需取得胜利，不管获胜的候选人对于军队来说可能是如何地令人讨厌。这个观点是海军和空军的大多数军官以及称作民主十字军的一部分军人所不能接受的。领导这一派的是军人俱乐部主席、患病的坎罗贝特·佩雷拉·达·科斯塔将军，他在1945年和1954年两次推翻瓦加斯的事件中都起过积极作用。民主十字军认为，选出库比契克和古拉特，将会恢复去年由军队被迫摧毁的那种腐败而不负责任的政权。然而这两派都不愿出面干涉，希望选民会选择军队各派都能接受的候选人。

卡费总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安静的态度，并且一再申言他深信选举将会不受阻挠地如期进行。他的预言是正确的。1955年10月3日，在共和国头一次最正当和最有秩序的选举里，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和若奥·古拉特被选为巴西的总统和副总统。他们俩都没有得到超过900万选票的绝

对多数票。库比契克获得选票总数的34%，而古拉特在三名副总统的竞选中得到了将近40%的选票。塔沃拉和坡波斯名列第二，分别得到选票的29%和37%。几乎四分之一的选举总统的选票投给了阿德马尔·德·巴罗斯。他的竞选伙伴科埃略获票100多万张，主要是夺了古拉特的选票。塔沃拉的支持者们认为，如果把普利尼奥·萨尔加多得的70多万张选票投给他们的候选人，塔沃拉将会获胜。然而，各个候选人都承认了选举结果，没有提出严肃的抗议。

库比契克和古拉特已经被人民选举出来了，但他们就职的权利尚有待于军队决定。在经过短暂的统计票数的安宁时期之后，关于武装政变的谣言，甚至传得比以往更加频繁了。在这种气氛下，11月1日举行的坎罗贝特·佩雷拉·达·科斯塔将军的葬礼仪式上，一篇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引起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最终酿成了1955年11月11日的似非而是的“反政变”。演说者是高等军事学院的儒兰迪尔·马梅德上校，他猛烈抨击那些把个人和党派利益凌驾于“祖国崇高利益”之上的政客的“自杀狂”，抨击中似乎在再三重申民

主十字军反对库比契克和古拉特的毫不妥协的立场。陆军部长洛特要求惩处马梅德，因为他违反了军官不得公开参与政争的军人条例。在此之前，洛特曾以同样的理由，解除过亲瓦加斯军官的职务。但是洛特没有管辖军事学院官员的权限，而马梅德的上司们认为不存在触犯条例的情况。报纸立刻大肆宣扬起马梅德事件，夸大其真实意义，仿佛是陆军部长和武装政变的鼓吹者之间的一次力量较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双方都不能体面地让步。他们便上告总统，因为只有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期间，卡费总统却于11月3日得了轻微的心脏病。五天之后，他把政权临时移交给宪法规定的继承人众议院议长卡洛斯·卢斯，便住进了医院。这样，曾反对库比契克当候选人的这位持不同意见的社会民主党人、现任代总统卢斯，便面临着一种抉择：是作有利于洛特的裁决，还是接受这位陆军部长的辞职。卢斯选择了后者。他在11月10日和洛特商定在第二天下午正式任命一个新的陆军部长。这个决定，洛特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军人制宪运动的领袖们却不能接受。他们使洛特相信，马梅德的演说，卡费的生病，以及卢斯的行动，都是旨

在阴谋废弃选举结果的计划周密的步骤。在里约热内卢陆军警备司令奥迪利奥·德尼斯将军的授意下，洛特决定继续留任，并且掌握了“反政变”的领导权，以确保库比契克和古拉特的就职。

1955年11月11日拂晓，洛特，这位被罢免的陆军部长率领着军队和坦克，进行了反对政府的不流血叛变。卢斯由马梅德上校、国会议员卡洛斯·拉瑟达和一些内阁成员陪同，到海军巡洋舰“塔曼达雷”号上避难去了，他们冒着炮火开往圣多斯，希望在那里组织对叛变者的抵抗。然而这个努力失败了，因为陆军继续忠于洛特，而且州长雅尼奥·夸德罗斯拒绝帮助这位代总统。两天之后卢斯乘“塔曼达雷”号返回了里约热内卢。与此同时，国会迅速采取行动，由宪法规定的另一个总统继承人参议院副议长内雷乌·拉莫斯接替了他。那些维护短暂的卢斯政府的人们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处，不过马梅德上校被调到了内地的一个偏远的陆军募兵站，卡洛斯·拉瑟达选择了志愿流放葡萄牙的道路。卢斯辞去了众议院议长的职务，但继续是米纳斯吉拉斯州选出的众议院议员。洛特将军仍然是陆军部的首领，并且是巴西非官方的

强有力人物。1955年11月22日，卡费寻求恢复总统职位，但国会加以刁难，它投票追认从11月11日开始的戒严，以阻止卡费向法院起诉。接着宣布戒严继续有效，直到1956年1月31日内雷乌·拉莫斯正式把总统职权移交给儒塞利诺·库比契克的时候。在同一仪式上，若奥·古拉特宣誓就任了副总统。库比契克事实上不是靠选民，而是靠陆军部长洛特和军队才当权的。这就是“反政变”的结果。这个“反政变”借口防止一个超出宪法范围的更激烈行动而侵犯了宪法条文。

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德·奥利维拉这位巴西的新总统，是瓦加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自我奋斗出来的人。他于1902年出生在米纳斯吉拉斯州迪亚曼提纳市。他在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是由母亲抚养大的。他母亲是捷克人的后裔，是初级中学的一位教师，她教育儿子要深深崇敬和渴望知识，并激励他要具有雄心壮志去摆脱他早年的寒酸斯文的生活。从12岁起，库比契克便主要是依靠自己谋生了。他在迪亚曼提纳当过信差，后来在贝洛奥里藏特上卫生学校的时候还作过报务员。在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和在大学研究院学习之后，他于

1930年返回故乡，开办了一所私人诊疗所，并接受了州警察部队的军医职务。在1932年革命期间，他是负责圣保罗前线医务工作的军官，在那里他引起了贝内迪托·瓦拉达雷斯的注意，后者是瓦加斯在米纳斯吉拉斯州政治机构中的年轻有为的人物。作为瓦拉达雷斯的被保护人，库比契克的政治前途便有了保障。在后两年里，他在州政府机构中担任了几个职务，以后从1934年到1937年担任了联邦议员，在1940年又被任命为贝洛奥里藏特市市长，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新国家”垮台为止。1945年，他和瓦拉达雷斯一起成了社会民主党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创始委员。库比契克成功地通334过竞选被选入制宪会议，他帮助起草了1946年的宪法，而且他还在众议院里任职直到1951年。在那一年，他被选为他本州的州长，并且在全国取得了一个精悍的行政官的声望。库比契克关于改进他本州的经济结构——主要是在电力和运输方面——以便把工业吸引过去的计划，取得了引人注目的重大进展。他的最巨大的改革，便是创立联合资本企业，通过这一企业，州政府和私人企业在热力和水力发电设备的建设上进行合作。在他任

州长的四年期间，这个州的公路哩数增加了四倍，发电量增加了两倍。主要是由于这些成就，他的党在1954年才提名库比契克为总统候选人。

作为总统候选人，库比契克利用了瓦加斯传说，利用了广为传播的民族主义精神，尤其是利用了巴西人几乎一致要求迅速发展经济的愿望。他把工业化说得象似能为巴西正在开始增长的人口提供更高生活水准的万灵药，他把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计划和技术，加以修订后，提给了全国。跟他的总统竞选对手一样，他也答应改善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保证以后要把联邦首都迁往这个国家的内陆。这一保证后来变成了他施政纲领的主要部分，但是在竞选中，他的政策宣言和公开声明的重点，却是集中在三十项特定目标上——主要是到1960年在运输、电力、食品和基础工业等几方面要达到的生产指标。库比契克坚决认为，共和国必需拥有对前途满怀信心、大胆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他愿意用大量资金去开发国内能源，他决心建设一个连接国内偏远区域的巨大的道路和公路网，他准备提供信贷和关税保护，并采取其他必要的

措施鼓励私人工业加速成长。他许诺他的计划将使巴西“在五年里获得五十年的进步”。他认为：只有这样，巴西才会在热图利奥·瓦加斯所铺设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从而取得它命中注定的世界强国的地位。

库比契克的五年任期，是巴西政治上安宁和经济上积极活跃的一段时间。到处是乐观和充满希望的气氛，与前任总统在职期间的政治气氛形335成了鲜明对照。党派政治活动，一如既往，进行得很激烈，但是，实际上，所有的派别现在似乎都同意遵循民主和宪法的程序了。不管是1958年的国会选举，还是1960年竞争激烈的总统选举，军队或者政党都不认真考虑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了。库比契克是能够圆满结束他的任期的，只不过有两起富有戏剧性但却无关大局的事件：一小撮空军军官的抗议。在他执政时期，巴西似乎终于达到了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经济上的进步，这从共和国建立时起就是它的一个目标。

库比契克政府在经济领域里的成就，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总统所公布的公共和私人企业的绝大多数生产指标都已经完成或是超额完成

了。发电量从300万瓩提高到500万瓩，而且后增加的计划工程业已动工，这些工程到1965年将使发电量再增加300万瓩。在石油方面，也取得相当的收获。已经证实的贮藏量增加了1,400%，日产量上升到10万桶，油船队增加到两倍，炼油能力提高到三倍，石油已经能够满足当时的国内需要。开辟的新道路和公路（共11,000多哩，其中将近三分之一铺装了路面），相当于1955年原有哩数的80%。政府资助私营航线添购新飞机，政府也买进了80艘现代化船只，使奄奄一息的巴西商船队重新活跃起来，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商船队。相对来讲，库比契克政府对于仍占劳动力半数以上的农业注意较少，即使如此，农业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粮食和活鲜食品的贮存量提高了500%以上，肥料生产也远远超过了原定指标的三分之一，农业用的拖拉机进口了25,000多台，而且到1960年年底，巴西造的拖拉机也开始在市场上出现。最直接受益于政府的这些政策的还是工业。钢产量几乎翻了一番，每年大约生产200万吨，而且在库比契克任职后期，还在增建两个具有200万吨生产潜力的合资经营的工厂。铝和其他有色金属的产

量增加了800%，巴西生产的水泥已能自给。有了这些金属以及电力和运输方面的条件，就可以创336建或扩建多种制造工业。最引人注目的改变，是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建立了汽车工业，1960年即生产出13万辆卡车和轿车。小麦、煤、橡胶和铁矿的产量没有达到原先公布的指标，尽管这些商品的生产在库比契克执政时期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总的来说，从严格的物质方面来衡量，库比契克给予巴西的或许比他所许诺的五十年进步要少一些，可是十分明显的是，他的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闪现出了一个空前的跃进局面。况且，库比契克年代对于巴西人要求经济发展的态度，无疑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那些年月里，当巴西人民超额完成了库比契克所制定的“不可能实现”的指标时，对于快速发展经济的可能性以及对于他们支持这种快速发展能力的种种怀疑，便一扫而光了。总统对于巴西继续进步所怀有的那种富有感染力的信心，已被不同政治色彩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项真正的信条，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下来。

巴西利亚于1960年成为巴西首都。建设这座城市，似乎是库比契克政府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成

就，它是巴西民族主义的一座永久纪念碑。巴西梦想家所长期怀有的梦想，由于这个在荒野里的未来派城市的建成而实现了。迁都内陆，早在十八世纪独立的先驱者蒂拉登特斯就曾倡议过，1823 年若泽·博尼法西奥·德·安德拉达—席尔瓦也提出过。这个梦想被写进了1891年的宪法，并且又在1934年和1946年颁布的宪章里加以重申，因而它便成为全国的愿望，并且一直是共和国的义务。1892年，在遥远空旷的戈亚斯州东部高原上初步选择了一个地点，1922年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总统在独立一百周年纪念日时埋置了一块象征性的基石，至少是直到1950年出版的官方的巴西地图才正式标出未来联邦区的位置。但是，在库比契克利用它之前，这项宪法条款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库比契克也只是在竞选总统时几乎十分偶然地提到了它。当公众对于这个倡议表现出意想不到的热情时，他便发誓要在新首都结束他的总统任期。

巴西利亚终于成为库比契克发展计划的顶峰和主要象征。政府用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理由论证了迁都的正确性。巴西利亚的存在

将加速内地的移民和定居以及经济发展。新首都337的位置处于全国地理中心附近，它将促进内地与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的联系，结束农村人口与世隔绝和落后的状态。而且，一旦政府的领袖、议员和官僚们离开繁忙和纷乱的里约热内卢，便至少还可以指望他们更客观地看待全国的问题。然而，巴西利亚的根本目的，却在于破除巴西人民的“殖民地”心理和减少他们对海外世界的传统的依赖。巴西利亚将迫使他们向内审察他们的国家和它的未经开发的潜力，迫使他们更多地依靠他们本国的资源，而不是象他们过去那样，到国外去寻求鼓励、帮助和幸福。新首都的倡导者们坚决认为，只要政府所在地仍然设在大西洋岸边，这些变化便永远不会到来。

库比契克一上任，便给予巴西利亚工程计划以最大的优先权。授权迁都的立法在1956年9月被国会怀着相当大的怀疑批准了。为了选择这个城市设计蓝图而进行了一次国际竞赛——卢西奥·科斯塔获得了胜利，世界闻名的建筑师奥斯卡·尼马尔负责建筑设计。三年半的建筑以疯狂的速度进行着，在道路修通之前，人力和设备都用飞机

载运到工地。巴西利亚的建设还在进行的时候，它便已成为卡车公路的运输网中心，这些公路将这个国家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同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巴西南部联结了起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源源不断地从这些新的路线流入巴西利亚，使得这个未来联邦区的人口，在1960年便超过了14万。虽然建设还没有完工，正式的落成典礼却如期举行了。在1960年4月21日——蒂拉登特斯日这一天，政府正式迁到了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便同时改为瓜纳巴拉州。然而，迁都多半是象征性的。实际上，巴西这时有两个首都。国会在巴西利亚开会，而内阁各部却留在里约热内卢，在那里继续处理政府的大部分事务，就象以往的197年一样。然而，库比契克这个最困难目标的实现，却受到了里约热内卢以外大多数人的欢呼，他们认为这是迈向伟大的国家所不可取消的一步。在这种欢乐的时刻，很少有人关心或者甚至是敏锐地意识到新首都所付出的没有必要的昂贵的代价。

库比契克执政期间，巴西显著的物质进步，是以大量增加公共债务和通货贬值来抵偿的。五年发展规划的资金，大部分是通过巨额的外债、超支 338

和通货膨胀取得的。与此同时，大发横财的心理，以及薪金收入者的实际收入的逐步减少，促使人们对于政府官吏的贪污腐化和公开的偷税漏税行为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些对巴西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在库比契克执政期间，它们却达到了新的令人吃惊的程度，因而引起反政府的人愈来愈多的尖锐批评。政府的开支不断大幅度地超过岁收，使得通货供应和生活费用提高3倍，也造成了克鲁赛罗价值的相对跌落。1955年欠有6亿美元的外债，一下子便上升到20多亿美元。库比契克政府单从美国就借了短期、中期贷款达5亿多美元。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制订都是冒着预料之中的风险。库比契克和他的顾问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伙伴；大宗外国贷款是达到基本事业预期的快速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些事业需用来吸引私人资本在工业部门的更大规模的投资。他们期望增加生产，认为它是国家的真正财富，能够用作偿还经济上巨额投资的手段；他们还期望地方工业能供应大部分消费品的需求，并且期望出口的大量增加，将赢得偿付外债所需要的外汇。这些即使不算幻想也是高

度乐观的打算，却被意想不到的国内消费的突然增加而破坏了，因为国内消费的增加，减少了外销货物的数量。巴西主要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又同时猛跌，这也破坏了上述的打算。因此，库比契克在离职之前被迫进一步借债以偿付公债利息。他给他的继任人留下了一份沉重的偿付债款的时间表，看起来好象不是要同外国债权人进行困难的重新磋商，就是要对公共开支进行急剧的而在政治上又不受欢迎的削减。

库比契克政府继续执行巴西同美国保持紧密友好合作与积极参加国际机构的既定的外交政策。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里，巴西始终鼓吹裁军，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工业强国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给予更大的援助。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和1960年的刚果危机之后，巴西向在这些地 339 区的联合国紧急部队提供了军事分遣队。在报界和国会激烈争论一年以后，库比契克政府于1957年赋予美国在费尔南多一德诺罗尼亚岛建造导弹追踪站并且使用五年的权限。这个决定是在极左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抗议声中作出来的，他们抨击它是对巴西主权的限制。库比契克在外交政策上

最主要的创举是泛美行动（OPA），这一创举后来被称赞为进步联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的先驱。这是一项关于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巨大的进行协作的建议纲领，它包括拉丁美洲政府之间的互相援助，而由美国和国际信贷机构提供前所未有的财政支持。国外对这一建议的冷淡反应，十分明显地导致了巴西在库比契克任期的最后一年里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关系的急剧恶化。在这一年，巴西和古巴的关系也变得不和了。极端民族主义者赞扬卡斯特罗的革命，认为这是巴西将要效法的先例，而温和派和保守派却对卡斯特罗政府的暴力，以及它对法律准则的漠视，公开表示遗憾。库比契克政府执行了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政策，它重申巴西维护自决原则的传统，但为古巴难民提供庇护所，并且在美洲国家组织里投票谴责国际共产主义对这个岛屿共和国的干涉。围绕着古巴问题的争论，加深了过分的民族主义的气氛，1960年的竞选运动就是在这种气氛里进行的。

意味深长的是，在总统竞选中，不再听见求助于瓦加斯传说了。原有的政界领袖们继续大致分

成亲瓦加斯集团和反瓦加斯集团，这是因为瓦加斯时代的基本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这些问题已逐渐同一些新的人物联系起来了，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向迅速扩大的年轻选民们宣讲这些问题。至少有一半选民，是“新国家”垮台以后才成年的，他们似乎对这位前独裁者的名字很冷淡。然而，他们却被库比契克的国家发展的途径激励起来，并且吵吵嚷嚷地参加关于库比契克计划的错误和缺陷的辩论。

因此，库比契克政策的成功和不足之处，便大体上决定了1960年竞选要提出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最严重和最直接的问题，便是通货膨胀，它使得生活费用始终盘旋上升，超出了工资和 340 薪水的增长。人们还愤怒地抗议政府的缺乏效率和腐败，抗议对农业、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的忽视。偏远地区的发言人抱怨绝大多数新工业集中在圣保罗，对其他地区的经济需求不闻不问。保守派反对劳工不适当地影响政府，反对库比契克过分容忍那些力图破坏巴西传统制度的学生和左翼组织所进行的鼓动和宣传。左派人物，大多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反过来责难库比契克的计划对富人

有利，并且把巴西人置于外国资本的利己剥削之下。人们谴责政府没有修改税收体制，没有使主要工业国有化，没有严密控制外国投资的流入，也没有限制赢利汇出国外。那些要把农村居民引上政治舞台的人们，也抨击库比契克没有进行一项彻底的土地改革。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政府被攻击为所谓的屈从于美国，又因为它拒绝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在共产主义集团中开辟新市场，而受到攻击。在选举前的几个月里，公众不断地听到这种以高亢的民族主义腔调发出的一阵一阵的指控和责难。在这种环境里，所有想当总统的人都把他们自己装扮成热情的民族主义者，表示决心要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而又不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

总统竞选最后发展成三人之间的竞争，他们是：恩里克·特谢拉·洛特元帅，圣保罗现任市长阿德马尔·德·巴罗斯，以及前圣保罗州长、巴拉那州的国会议员雅尼奥·夸德罗斯。洛特辞去陆军部的职务成为政府候选人之后，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巴西工党以及联合起来的一些左翼小党的支持。他以朴实的姿态参加竞选，其基础是：库比契克的成绩，以及他为人正直无可挑剔和对国家深

切的责任感而享有的声望。德·巴罗斯再次被他自己的社会进步党提名为候选人，他没有提出一个首尾一致的纲领，但是，他在华而不实的演说辞里，似乎曾许诺使私人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许诺大大增加社会福利。洛特和德·巴罗斯都答应维护巴西一贯的外交政策，包括在冷战中同西方坚定地站在一起。难以捉摸和神通广大的夸德罗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从一个在政治上默默无闻的人一跃成为全国的显赫人物，他现在成了全国民主联盟提出的首席候选人。夸德罗斯挑起了反对派的重担。他用一把新扫帚作为旗号，许 341 下诺言：要扫除贪污行为；要卓有成效地谨慎而诚实地管理国家的财政，就象他在圣保罗所作的那样；要使非特权阶级能享有社会正义；并且要使巴西具有一个真正“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些呼吁感动了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副总统候选人有：若奥·“然戈”·古拉特，他正在谋求继续留任；费尔南多·费拉里，他怀有改良思想，是巴西工党的持不同政见者，谋求把工党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劳工党；以及再次成为全国民主联盟候选人的米尔顿·坎波斯。

1960年竞选运动的离奇和似是而非的现象，由于非法的共产党和副总统古拉特的活动而突出了。共产党人理应全力支持夸德罗斯，因为他许诺要完成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的一些主要的改革。然而，共产党却尽其所能极力反对他，反而全力支持洛特和古拉特这对候选人，尽管洛特怀有众所周知的反共观点。共产党的领袖们私下里解释说，巴西在库比契克—洛特纲领执行十年之后，从左的方面进行革命的时机将会成熟。与此同时，古拉特允许他的支持者把他的名字同夸德罗斯的竞选联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雅尼奥—然戈委员会要比政府主办的、旨在使洛特和古拉特当选的委员会活跃得多。1960年10月3日，就是在这个混乱的旋涡里，1,200多万选民前去投票。他们投给夸德罗斯的票数，超过任何一个政府职务的候选人在巴西所曾获得的票数。他获得5,636,623张选票，几乎占总数的45%，而洛特的选票只占31%左右，阿德马尔·德·巴罗斯的选票仅略高于17%。雅尼奥—然戈竞选运动的效果表现在副总统的选举上，古拉特超过了拥有34%左右选票的坎波斯，而以36%的多数票重新当选。费拉里得到选票

总数的17％。古拉特险胜夸德罗斯的竞选伙伴这件事，在大选以后一年之内对巴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雅尼奥·达·席尔瓦·夸德罗斯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位新的非凡人物。他的流星似的一生，在巴西是没有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他是以平民身分出现的战士，他藐视获得成功的政客们的那套清规戒律，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别人注意修饰、姿态文雅，而夸德罗斯却是不修边幅、举止唐突。他以导演的眼光，将他那张瘦削的、长着一双大白眼睛的面孔转变成了政治财富，他的这一着迷惑了听众，又使他早期的对手把他当成一个毫无心计的村夫俗子而不放在心上。夸德罗斯公开摆出一贯尊重个人(不管这个人如何低贱)尊严的令人信服的场面，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可是，在私人接触中，他常常不去理会他所不喜欢的同事和下属的感情。在一个改换党派成为常事的环境里，夸德罗斯对各个政党的满不在乎的傲慢态度是很出名的。在他前进的道路上撒布着许多小党的残骸，他曾经随自己的方便利用过这些小党，然后又把它们抛在一旁。他的永不满足的私心使他

相信，这些组织总是随他任意摆布的。

夸德罗斯生在马托格罗索，在巴拉那度过了童年，但是他在政治上却与圣保罗发生关系。他在那里受了教育，便担任公职作一名中学教员。1948年，30岁时，他以巴西社会主义党候选人的身分，成功地被选进圣保罗市议会，1951年，他辞掉了这个职务，以便作为基督教民主党的议员进入州立法议会。两年后，作为基督教民主党和全国劳工党的共同候选人，他出乎意料地当选为圣保罗市市长，因而引起了全国的注意。1954年，当夸德罗斯在争夺圣保罗州州长职位的竞选中击败了阿德马尔·德·巴罗斯的时候，他那种日益增长的"闯关新将"的名声就得到证实了。直到此刻，他的每一个职位都是用来取得更高官职的跳板。现在，夸德罗斯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任满了这个被选上的官职的任期。当了州长以后，他并不隐瞒他要当总统的雄心壮志，但是他的精力主要是用于处理州政府的问题，以及用于巩固他在圣保罗的政治力量。夸德罗斯采用激烈措施去消灭浪费和办事无能的现象，而使这个州有了多年来所未曾见过的最有效率和最富有个人色彩的政府。1958年，在任期届满

时，他没有费什么气力就使他的财政厅长卡洛斯·卡瓦略·平托教授当选为他的继承人，他本人则以巴西工党候选人的资格，被巴拉那州选为联邦议员。在众议院当选的326名候选人中，只有4名谋求连任的老练的竞选人的票数，超过夸德罗斯第一次竞选国家职务时所赢得的票数。这个辉煌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全巴西的威望和政治魅力，使他能够在国家总统的竞选中，取得全国民主联盟的支持。

人们欢呼夸德罗斯当选为巴西总统，认为这是选举的一场革命。从1945年以来几乎从未间断地一直控制着行政部门的一帮政界人物，遭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抵制。六年前错过了执政机会的反瓦加斯势力，又得到了第二次机会。现在看来，巴西可以有一次真正的在反对派和政府派之间的轮流执政了。人们期待这届政府将继续执行库比契[343]克发展计划中所有积极的东西，而消灭上届政府所容忍的那些不公正和非正义的东西。圣保罗肯定会得到好处，这是30年来第一次由一个圣保罗人出任总统。但同时，这个国家经济萧条的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也同样将领略工业化带来的好

处，而且将从国库得到更多的巨额补贴。非特权阶级过去寻求的尊严和较好的生活，都屈从于物质进步的紧急措施，而现在他们那种正当的不满情绪也将为人们所承认。人们还希望，夸德罗斯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显示出巴西是有能力根据自身的利益来作出自己的决定的。总之，实际上每个曾经受过库比契克政府刁难和对它感到失望的具有发言权的集团，都指望夸德罗斯解决他们的困难和满足他们的要求。从未有过这么多的巴西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国家领袖的个人身上。

这些希望和期待很少在新总统的领导之下得到实现。1961 年 8 月 25 日，夸德罗斯上任后不到七个月便辞职了。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公众以及他的最亲密的同事感到完全意外和震惊。他的辞职动机，除了一个含糊的难以服人的关于"可怕的势力"使他无法管理这个国家的声明之外，人们只能猜测，而夸德罗斯也不想加以说明。很显然，他在短短的执政期间，没有作出奇迹，但是却也没碰上什么前几任总统所未曾遇到过的风险。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等问题既未得到暂时的延缓，也是无法掩饰的。他竭力推行财会责任制和处

理公务的较高标准，这些都遭到官僚、政党和各州政府的反对。他亲自对内阁部长们进行严格的监督，以至惹怒了政府的官员，他们都被淹没在一大堆一大堆他所潦草写成的指示中了。夸德罗斯改变了巴西外交政策的方向，从面向美国和西方世界，转而面向中立国家和共产主义集团，这种转变深受他的拥护者的欢迎，然而，即使这个最成功的冒险行动，也引起了其他方面的严重不安。支持政府的温和派，怀疑他这个富有进取性的“独立”政策在事实上是否对国家最为有利。夸德罗斯在短短几个月的执政期间，设法同欧洲的共产党国家建立或者恢复外交关系，他顶住了美洲社会内部要对古巴采取共同行动的种种压力，他尖锐地 344 公开侮辱了肯尼迪总统的私人代表，他把巴西赠予外国人的最高奖章授给了古巴工业部长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而且还派副总统古拉特为首的国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夸德罗斯在有争议的外交政策方面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他对国内事务的处理，使全国民主联盟的一些领袖消除了幻想，并且也导致了他同卡洛斯·拉瑟达（现任瓜纳巴拉州州长）的公开决裂。拉瑟达这位夸德罗

斯以前在全国民主联盟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谴责他谋求成为一个独裁者。拉瑟达的责难或许有一些是正当的，因为夸德罗斯在同国会的交往中，确实遭到了失败。这个在1958年选出的机构，没有反映出各派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或者没有反映出在选举夸德罗斯时那种要求改革的十分明显的热情。国会必须在巴西利亚开会，这是违背大多数议员心愿的，因而国会开会时经常不足法定人数，以至不能通过夸德罗斯所提出的专横的立法要求。在雅尼奥·夸德罗斯担任巴西总统的七个月里，没有一项政府有关国内施政纲领的重要法案被制定成法律。立法议员们既不愿按照他的条件给予合作，也不允许他用指令进行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夸德罗斯提出辞职的用意似乎很明显，就是玩弄权术，用辞职来加强本人的地位，从而削弱立法议会。他一定很有把握认为：不是国会将拒绝接受辞职，就是人民将坚持要他继续留任。他还能够不无根据地设想：另一途径——即副总统若奥·古拉特晋升为总统——将是政府各党派，更重要的是军队，所无法接受的。夸德罗

斯在古拉特出国期间作出这种戏剧性的姿态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在副总统可能正式就任国家元首之前，公众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对辞职作出反应。然而国会领袖们却异常痛快地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宣布将总统职位空起来，又根据宪法条例任命众议院议长帕斯库亚尔·拉涅里·马济利为临时总统，这肯定使他感到惊愕万状。他没有向既无领导又无能为力去支持他的群众发出呼吁，其原因何在，这只有他本人清楚。在返回圣保罗以后，他乘船离开了这个由他引起危机的国家，到欧洲暂时地进行自我流放去了。

夸德罗斯的辞职，使巴西的民主制度紧张得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因为它造成一个用法律手 345 段看来不能摆脱的困境。紧迫的问题便是武装部队现在是否将要违犯宪法阻止副总统古拉特就任总统，他们在1955年曾以维护宪法之名进行过干预。古拉特返回巴西之后，有权取得最高的职位，这在法律上是明文规定的。然而，内阁里以陆军部长奥迪利奥·德尼斯为首的军队成员，却坚持古拉特不得当总统，并且敦促国会从宪法上来解决这个困境。如果国会是在里约热内卢开会，那

里大多数军队司令官以及拉瑟达的州政府都赞成陆军部长的要求，国会几乎肯定会默认军方的压力。但是在比较偏僻的巴西利亚，大多数议员都拒绝服从武装部队的指挥。甚至连这位副总统在政治上的死敌，也都赞成他按宪法规定的权利就职。当古拉特缓慢地从东方回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已经一个星期了。南里约格朗德州长莱昂内尔·布里佐拉——古拉特的内弟，开始武装一个民团，并且扬言如果必要的话，要用武力使他的亲戚就职。在里约热内卢，当时已退休的洛特元帅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古拉特并呼吁军队维护法律条款。洛特被捕了，但是他维护法律的呼吁，却受到了巴西其他地方的大多数报纸和公众的欢呼。在洛特的呼吁之后，阿雷格里港武装警备队司令若泽·马查多·洛佩斯将军，决定和布里佐拉州长共命运，再也不接受德尼斯的命令了。古拉特抵达阿雷格里港的时候，危机进一步恶化，此刻，圣保罗的武装部队正开向南方，镇压对陆军部长的反抗。

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了避免军队成员之间公开作战，在巴西利亚达成了一项戏剧性的妥协方

案。国会运用宪法修正案改变了统治的结构。自1889年以来巴西将第一次由议会统治。总统被降低到几乎只是名义上的领袖地位，因为行政权力将由选自立法议会并向立法议会负责的部长会议行使。在这种安排下，担任部长的军人们辞职了，而且容许古拉特于1961年11月7日正式就任。报纸和国会有些过早地高兴，把这项妥协解释成是文官民主的一次胜利，而且还把它说成是在危机时刻由军队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再有必要或者不再是正当的一个证据。

议会制政府的试验彻底失败了。古拉特要当总统就必须以接受这项妥协方案为交换条件，现 346 在他却利用他身为总统和巴西工党领袖的影响来贬低议会制度。国会，除去其中的一小伙热情支持者外，都是把这项妥协方案作为解决政治危机的权宜之计接受下来的。再者，公众舆论似乎是完全漠不关心以至于持反对的态度。总之，没有一个重要的组织认真地关怀这个制度，使其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立法议员们又不愿意把他们新近获得的政治权利交给总统，因而形成了一个僵持局面。古拉特和国会互相指责，总理和内阁则日益频繁

地更迭。每一方都因为政府无所作为而设法指责另一方，至于对社会和经济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却无人过问。十六个月之后，国会不得不授权进行一次公民投票，以便选民们决定是保留议会制度，还是恢复传统的政府形式。在1963年1月6日的投票中，1,200多万选民中有900多万人否决了妥协方案，并且授予古拉特以总统的全部权力。由于1961年干涉失败而声名狼藉的武装部队，现在也没有能力反对公民投票作出的这个决定了。

虽然古拉特从事国家的政治活动已有十五年之久，但是他成为合法总统的时候，还不到45岁。他先后作过巴西工党的副主席和主席，又作过劳工部长，出任过两届共和国副总统，最近又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他从来没有在地方和州一级国家机关里任过职。古拉特于1918年3月1日出生在南里约格朗德的圣博尔雅附近，他父亲是那里有名的牧场主。他学过法律，却从没有开过业，他宁愿经营家里的牧牛生意，直到1945年遇见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时候。古拉特变成了这位前独裁者的亲密朋友和被保护人，瓦加斯让他负责组织支持巴西工党的工会。古拉特以这种身分登上了政

治舞台，他同广泛的劳工政治人物（包括共产党人）一起亲密地有成效地工作。直到他在1964年被赶下台以前，城市劳工运动始终是他的主要的力量源泉，虽然他一直试图从农村地区、军队以及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中争取选民。古拉特并没有强烈的思想信念，他的基本政治信条是从瓦加斯那儿学来的，即不要树立永久的敌人，也避免对任何一个组织承担全部义务。他被普遍地称誉为一个人情练达的人，朋友称赞他在政治上的灵活性，敌人抨击他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人们希望他从议会制试验的残骸里恢复秩序，带来健全的财政和社会正义。

347

库比契克和夸德罗斯政府执政初期盛行的那种乐观而自信的气氛，在1963年1月明显地消失了。舆论的一般趋势既无助于带来乐观主义，又不能导致有效的政治妥协。从夸德罗斯辞职以来，经济形势即使还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也明显地每况愈下了。生活费用上涨了60%，克鲁赛罗的兑换率下跌了200%。国民生产总值经过1960年的稳步上升后已经开始下降，而且在几乎是四年的时间里无法扭转。通货膨胀过去被认为是经济健康发

展的标记，现在却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了。这种经济趋势在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安以及在越来越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上反映出来了。仇外的民族主义和煽动主义在抬头。“革命”成了每个谋求公职的政客的词汇里的突出字眼。这在东北地区尤为明显，那里的农村下层阶级已觉悟到了他们的处境以及土地改革的可能性。普遍认为大土地所有制、教育、选举制度、税收体制和国家财政等方面都需要进行根本的改革，但是在各政党之间和各党内部，还没有就改革的先后次序问题和这些改革应有的性质取得一致认识。全国没有一个团体在政治上明确表态，准备为国家的福利而牺牲它的切身利益。

尽管政府面临着严重困难，古拉特却仍然有可能象全国在1月6日要求的那样实行有生气的领导。他拥有几项雄厚的政治资本，在当政的最初几周里，看来他是在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本。公民投票曾以压倒多数表示信任文官总统的统治。这样，古拉特实际上就摆脱了武装部队的干涉，而且能指望有三年的任期。在公民投票以前，他就邀请巴西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起草一份三

年经济恢复计划：把通货膨胀压缩到可以管理的规模；满足外国债主的要求；并且加速工业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古拉特任命了议员弗朗西斯科·圣蒂亚哥·丹塔斯为负责实现经济计划的财政部长，他是受到各主要政党尊重的一位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取得国会支持的前景是光明的，因为政府现在得到了社会民主党以及古拉特的巴西工党的支持。这两个党在新国会的两院里占有绝大多数的席位，新国会是在1962年10月7日选举出来的，任期从1963年3月开始。在这种前途有望的形势下，古拉特政府接受了美国提供的巨额财政援助。这个国家在持续了一年半的危机之后，好象已经找到了通向政治稳定和有条不紊的社会经济进步的途径。 348

古拉特计划的成败，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推行那些不得人心的节约措施，而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工人阶级、拿薪水的政府雇员和商业团体都会感到极为苛刻的。如果那时古拉特愿意顶住劳工和官僚的要求，并且不理睬执政党内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刻毒批评，他是能够得到国会温和派必要的合作的。然而，作为一个劳工政客，他不愿

意冒风险把他的支持者丢给激进的极端主义者，这些极端主义者正在竞争着来控制城市选民群众和新近觉醒的农民阶层。因此，古拉特举棋不定。他既想讨好温和派，又不想疏远左派，结果两者都不满意，因而加深了同他们之间的裂痕。他批准了工资和薪水的无计划的增加，又容忍公共机关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这就否定了为制止通货膨胀盘旋上升而采取的那些措施。他允许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加强他们在劳工运动中的地位，允许他们渗入官僚机关，又允许他们十分显眼地充当他的顾问，由此，古拉特给人的印象是，他在谋求摧毁宪政政府的基础，以便终身当政。这些行动，不但把温和派赶进了老一辈的反瓦加斯的文官主义者的怀抱里，而且还使军人回到政治舞台来担任国家制度保护人的传统角色。

国会和各政党要与古拉特一起对延长行政部门同立法议会之间的僵局负责。而且，国会的反对派至少要对迫使古拉特采取比他原来选择的更为过激的立场负部分责任。在日益不满的公众看来，国会似乎已经堕落成一个瞎吵瞎嚷的场所，它一面拿着优厚的公务津贴，一面却在鼓吹一些不相

称的解决国家问题的极端办法。各党的大多数立法议员都似乎对抵制政府计划更感兴趣，却不愿意制定出另外行得通的变通措施。国会所持的否定态度，从它对古拉特的土地改革法案的处理上，就可以得到说明。这个法案是在1963年3月提出来的，它违反了宪法关于征用地产必须在征用期间全部付款的条文。很显然，这是在立法议会权限之内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立法议会可以否定这项 349 议案和修改这项议案，或者是通过它而同时修改宪法。然而，国会却采取了第四种办法。议员们僵持不下，便把这份土地改革措施搁置了整整一年。后来古拉特指责国会有意地不采取任何行动，并且建议召开立宪议会修改宪法，表面上的理由是使他的主要改革纲领能制定成法律。国会里的反对派却攻击他的建议是烟幕弹。他们不无根据地断言，古拉特企图修改宪法，是为了让他自己连任。当总统和立法议会互不相信对方是正直的时候，他们之间进行有意义合作的一切可能性便烟消云散了。

到1964年初，形势已变成灾难性的了，而且在宪法上好象找不到回避这场灾难的办法。在古拉

特统治下，通货膨胀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在1963年里，生活费用上涨了70%，翌年的头三个月里，又飞涨了两倍。尽管工资较高，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却降低了。在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暴动，农民联盟企图夺取他们认为有资格占有的土地，地主则以武力对抗武力。中产阶级和政府几乎完全疏远了，因为他们认为古拉特正在把国家引向混乱，甚至可能导致共产党夺取政权。而且他们害怕，如果他关于召开一次制宪议会的要求付诸表决的话，普通群众将会支持他。

在这种情况下，自从夸德罗斯辞职以来一直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反瓦加斯势力，重新获得了力量和决心。在1963年，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扭转事态的趋势，否则就有危险成为一个永久的反对派——这样一来，他们将会真正失去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的机会，于是，他们便加紧攻击古拉特，说他是瓦加斯传统的主要继承人和受惠者。瓜纳巴拉州州长卡洛斯·拉瑟达又成了反对派的最刻毒的发言人，他公开指责古拉特政府是对国家制度和巴西基督教传统的致命威胁。与此同时，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全国民主联盟的若泽·德·马

加良斯·平托正在暗地里和拉瑟达以及圣保罗州州长、社会进步党的阿德马尔·德·巴罗斯一起谋取文官和军队对于革命的支持。

一旦公众放弃了极端维护文官宪政统治的态度(而这曾是古拉特政府的主要保障)，古拉特便失去了总统的权势。然而，他要是不惹起军队联合起来反对他，或许还能够执政到任期届满。尽管古拉特起初并不惧怕武装部队会持拚命反对的态度，但是他却充分理解许多军官的疑虑，以及他们对1961年以来国家政治向左转所表示的极大关注。因而他特意赞扬军队的守法传统，并且奖励了重视这种传统而不愿担当政治事件仲裁者这种超宪法角色的军官。在这一方面，古拉特对军方的政策同前几届总统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但是，他到士兵当中寻取更多的人支持他，这却和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了。古拉特允许共产党人和其它左派煽动者渗进军队各部门，而且积极鼓励士兵的政治要求，而根据现行的法律，是不允许他们担任公职的。古拉特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劳工—军人机器，以便加强公众的压力来支持他的改革计划，并且使之成为一股与军官集团抗衡的力量。

350

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古拉特肯定引起了一些军队司令官的敌视。在1963年，愤愤不满的军官们很快地，几乎是同时地，在各军种进行不约而同的阴谋策划。因为事情已变得十分明显，古拉特讨好下级军官的做法，大大削弱了海空军在军事与政治上的实力。到了这一年年终，各军种的绝大多数军官都深信，必须抑制古拉特或者把他赶下台，因为他在破坏军队的组织、纪律和等级的基础。1964年初，文官和军队的反抗思潮便汇合在一起了。只需要星星之火，便能点燃革命。

古拉特在1964年3月间的行动，导致了军事起义，这次起义颠覆了他的政府。他看到他的地位逐渐维持不住，便试图用一个大胆的行动来恫吓保守的反对派，并且重申他对全国劳工和极端民族主义力量的领导。3月13日，星期五，由公开的共产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为护卫，他在里约热内卢有15万热情支持者参加的露天大会上发表电视广播讲话。在这里，古拉特重复他对制定一部新宪法的要求，坚持把一份彻底的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计划制定成法律，而且他公然蔑视国会，颁布总统命令把外国炼油厂收归国有以及开始部分土地改

革。他的作为似乎是加强了劳工和民族主义者对政府的支持，但是在全国其他人中引起的反响，却不象他所预期的那样。文官和军队的反对派，现在已确实知道他正谋求建立左翼的独裁统治。中产351阶级自发地坚定地作出反应。3月19日在圣保罗仓促组织起来的“上帝儿女向自由进军”，吸引的参加者接近50万人。五天之后，在圣多斯的一个类似的游行有15万人参加。别的更多的示威还没有组织好就发生了一桩新的事件，它使得几乎所有的军队司令官都认为革命再也不能延迟了。危机起源于里约热内卢亲古拉特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的一次罢工，这次罢工立即就被认为是叛乱，因为他们拒绝接受上司关于停止政治活动、返回工作岗位的命令。古拉特拒绝惩处这种不遵守纪律的行为。更有甚者，当海军部长以辞职来抗议时，古拉特却用一个傀儡接替了他，而且对那些曾对罢工者表示同情的少数军官的命令，有意识地加以确认。在这之后，一些革命的司令官们便把3月31日定为向古拉特政府发动武装进攻的日期。

革命在介于巴西利亚、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之间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爆发了。虽然革命者对中

央政府发动的战争，做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准备，然而战争却仅仅进行了三天。州的和陆军的部队从米纳斯吉拉斯出发去占领巴西利亚并开向里约热内卢与效忠古拉特的部队作战。由于各地的驻军都遵守预先制定的归向革命的计划，造反者在几小时之内便控制了内地的大多数城镇。在圣保罗，阿毛里·克鲁埃尔将军劝说古拉特同共产党支持者断绝关系失败之后，便宣布关键的第二军在4月1日起义。古拉特为起义的巨大规模所震撼，便飞往巴西利亚去寻求支持，但是当里约热内卢他的保卫者也加入到反叛的行列的时候，他便放弃了希望。总统没有号召人民采取武装行动，也没有志愿军起来保卫政府。除了阿雷格里港之外，所有主要的城市都落到反叛者手里，于是古拉特便在1964年4月2日流亡到乌拉圭。同一天，拉涅里·马济利再度被国会任命为共和国的临时总统。

文官的革命领袖和军队的革命领袖还来不及制定出一整套共同的方针，古拉特政府便垮台了。他们在维护宪法、保持民族传统精神、反对总统玩忽职守进行颠覆的危险的必要性上，有着大体一致的意见。但是，从在短暂的暴力期间所仓促发表

的布告和宣言里，却看不出未来政府及其政策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策划并实行推翻古拉特政府的军队首领们所推行的行动纲领，就比他们352的文官同盟者所愿意接受的要严峻得多。这些军官的大多数人都在十年前参加过驱逐热图利奥·瓦加斯的斗争，并且都对连续几届的文官政府不能实现当时所要求的重振国家政治道德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共和国对于左派的颠覆活动、公共机关中的大量贪污以及自私自利的政客们所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党派争吵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国家的政治机关必须清除绊脚石，这样，革命政府才能够以人民的名义，在西方和基督教传统的范围内，去执行“重建巴西的经济、财政、政治和道德”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上任的军人部长们在4月9日发布了一项所谓的国家制度法案，它缩小了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限，大大增加了行政部门的权力。驯服的国会立即承认了这个文件，并把它作为宪法的修正案，在总统的剩余任期内一直有效。

国家制度法案为革命政府以后的一些行动提供了法律基础。第一项行动，便是自1930年以来对

官吏进行的一次最彻底的清洗。正常的司法程序和公民权利中断了半年，以便军事法庭逮捕和审讯所有被政府怀疑有贪污行为和颠覆活动的人。甚至在国家制度法案颁布之前，便有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捕入狱。后来，绝大多数人，未经起诉便被释放。但是，有1,000多人被特别法庭宣告有罪，并且不准上诉，他们在全国各级的选任和委任的公职都被撤免了。将近400人，其中包括前总统古拉特、夸德罗斯和库比契克，被剥夺十年全部政治权利。国会幸存下来了，但是却清除了不受欢迎的成员，换上新政府所能接受的候补议员。虽然立法者仍然能够进行辩论和修正法律提案，但是他们再也不能拖延或阻止通过行政部门提出的措施了。

革命的战争局面已经结束，人们才知道成功地推翻古拉特政府的起义的主要负责人。他就是同僚们极为尊敬、然而在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职业军人温贝托·德·阿伦卡尔·卡斯特洛·布兰353科将军。他于1900年出生在塞阿腊州福塔雷萨附近的一个军人家庭，1918年以士官生的身分进入了军队。二十年代他在圣弗兰西斯科河流域参加

了反对革命者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巴西远征军一起出征意大利。然而，卡斯特洛·布兰科基本上是一名教官，他被认为是军队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他进过法国的高级陆军学院、美国的陆军军官和参谋学校以及里约热内卢的陆军参谋学校（他在不同时期担任过该校的战术和军事历史教官），在最后成为指挥官。1960年他当上了军司令部的总监。1962年在担任了短期的累西腓第四军司令以后，他被调往里约热内卢，出任陆军总参谋长。他在这里处于一个战略上的地位，可以协调各种各样的矛盾的革命计划，并且在军队内部宣扬对古拉特政府的疑惧和不满。在此之前，他唯一参与的政治冒险活动，便是1954年在要求瓦加斯辞职的将军宣言上签了名。作为所有的军人革命派系都能接受的一位高级军官，国会在4月11日选举了他。他带着元帅军衔退役之后，在1964年4月15日正式就任了共和国总统，任期到1966年1月13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担任非军事的职务。1964年7月，在武装部队和国会文官领导人的坚持下，他接受了把任期延至1967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

1964年的革命是共和国建立以来巴西民主政治中周期性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它还可以被解释为是对文官政治领导的一次控诉。总之，当被推选出来的各政党的领袖们鼓动或者是未能劝阻军队推翻古拉特总统的时侯，他们便逐渐承认，象巴西那样的代议制民主是无法在宪法的条文和精神的范围内去解决当前的紧迫问题的。其他的途径看来不是军人政府，就是无政府。无论是总统、各个政党还是那些当选的人民代表，都不能够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出一条行得通的路线。因此，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或者是无所作为地把领导国家 354 的权力和责任交给了军队，显然是希望军队作出并执行他们没有能力或是不愿意作出的痛苦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司令官们以非凡的克已精神行事，他们拒绝建立彻头彻尾的独裁统治，而尽量保留代议制政府的形式及其精神，并且发誓，在延误了的制度变革的工作完成后，便把国家交回给文官统治。被严重肢解了的政党的发言人，只能希望军队和人民真的将会愿意，在卡斯特洛·布兰科任期届满时，选出一个文官担任总统。

巴西历史简明年表

詹姆斯·L·泰勒

殖民地时代

1500年	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发现巴西
1532年	葡萄牙人最初的永久性殖民地
1565年	建立里约热内卢
1580—1640年	葡萄牙和巴西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1624—1654年	荷兰人控制巴西的东北地区
1788—1792年	“米纳斯吉拉斯密谋”时期，即企图建立共和国而未获成功的时期。这次密谋由一位陆军军官领导，他曾经做过牙科医生，现在人们通常只记得他的绰号——蒂拉登特斯（拔牙者）。他在1792年4月21日被处决，现在被尊为巴西最伟大的烈士
1808—1821年	葡萄牙王室迁驻巴西。

巴西帝国时期

1822年	9月7日宣布独立。佩德罗一世即位
1825—1827年	因巴西最南部的领土问题（东岸），与阿根廷开战，结果，乌拉圭作为独立的国家而诞生

1831年	佩德罗一世退位。摄政时期开始
1835—1845年	南里约格朗德的法拉波斯战争
1840年	佩德罗二世即位（在位期间1840—1889年）
1850—1852年	对乌拉圭和阿根廷作战
1864—1870年	对乌拉圭（1864—1865年）和巴拉圭作战
1871年	颁布“新生儿自由法”
1888年	5月13日废除奴隶制

共和国时期

1889年	推翻君主制度并宣布成立共和国。临时政府持续到1891年
1891年	颁布第一部共和国宪法，选举第一任总统
1893—1895年	南里约格朗德发生内战。海军叛乱
1896—1897年	巴伊亚的卡努杜斯叛乱
1917年	巴西对德国宣战
1924—1927年	圣保罗和其他州发生叛乱
1930年	革命与华盛顿·路易斯被逐。瓦加斯领导临时政府
1932年	圣保罗“制宪主义者”的反革命活动
1934年	第二部共和国宪法。瓦加斯被国会选为总统
1937年	政变，宣布成立“新国家”。瓦加斯成为独裁者。第三部共和国宪法
1942年	巴西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1945年	“新国家”被推翻，瓦加斯被军方驱逐
1946年	第四部共和国宪法
1950年	公民投票，重新选举瓦加斯为总统

1954年	军方要求瓦加斯辞职。瓦加斯自杀。军方支持临时总统
1956年	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就任总统
1960年	巴西利亚成为新的联邦区和巴西首都
1961年	雅尼奥·夸德罗斯总统的就职和辞职。在修改宪法建立议会制政府之后，若奥·古拉特就任总统
1963年	全国公民投票废除了议会制度
1964年	军事叛乱废黜古拉特。国会选举卡斯特洛·布兰科元帅为总统

索　引

（所附数字为原书页码，原书页码附于正文页边）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巴西近代史 (上、下册) 共2 册
作者= [巴西] 若泽 · 马里亚 · 贝洛著英译者: 詹姆斯 · L · 泰勒辽宁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新续一章作者: 罗利 · E · 波皮诺
页数= 7 5 3
S S 号= 0
出版日期= 1 9 7 6 年1 月第1 版